

主編 孫思白

北京大學  
九十年  
勛回憶錄

仝德新 題



# 北京大学一二九 运动回忆录

主 编 孙思白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

孙思白 编

责任编辑:何瑞田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32开本16.5印张300千字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册

统一书号:ISBN7—301—00226—2/K—021

定价:6.60元

## 内 容 提 要

北京大学是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学校之一。本书收集了亲身参加这一运动的北大同学所撰写的回忆文章三十余篇。其中分“综合回忆”、“片断回忆”、“专题回忆”、“怀念师友”四类。为便于读者了解北大二九运动的概貌，书中还刊出二十余幅照片。同时又附编了当年北大学生会主办的《北大旬刊》上的几篇文章，以资参证。以上，记述了自1935年12月至1937年7月，具有“五四”光荣传统的北京大学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这些内容，不仅表现了北大在一二九运动中的特点，也从不同的角度，具体反映了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及运用。本书为历史工作者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史料，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好的材料。

普物，一、二、九、運動的、愛  
國精神，團結奮鬥。振興  
中華。

許德新題



北京大学  
“一二·九”历史回忆  
汇编小组

组 长 刘导生  
副组长 陆 平  
刘玉柱  
张学书

胡昭衡 宋尔廉  
刘居英 葛佩琦  
白文治 汪洪文  
孙思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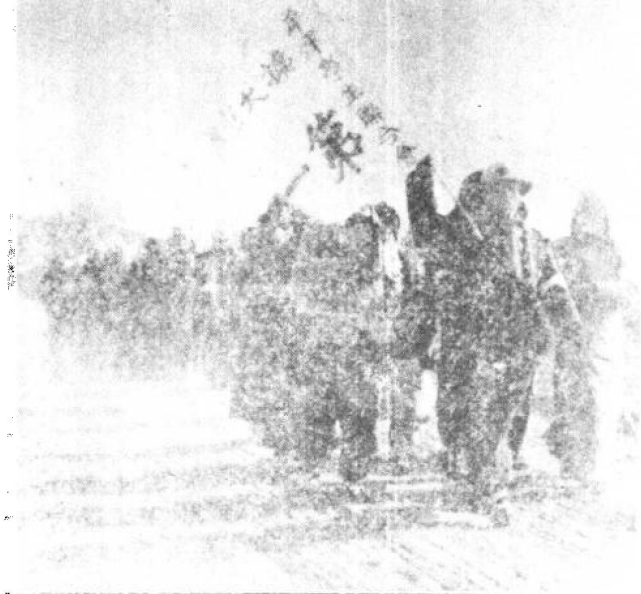
“一二九”学生游行队伍通过王府井大街



北大游行队伍







南下扩大宣传第一团

進保定款

【本報特訊】昨晨六時，北平三院內，發生一宗突擊，乃屬突擊隊，突入內院，將院內學生，及教職員，全部逮捕，並搜去大批文件，及武器，現正由軍警，嚴加審訊中。

北大三院昨被檢控  
劉耀榕等三人被傳訊

【本報特訊】昨晨（二十九日）六時二十分，東城區北平三院內，發生一宗突擊，突擊隊突入內院，將院內學生，及教職員，全部逮捕，並搜去大批文件，及武器，現正由軍警，嚴加審訊中。

【本報特訊】昨晨（二十九日）六時二十分，東城區北平三院內，發生一宗突擊，突擊隊突入內院，將院內學生，及教職員，全部逮捕，並搜去大批文件，及武器，現正由軍警，嚴加審訊中。

**平大昨開校務會議**  
**通過修正組織大綱**  
即呈報教育部核奪  
改訂上午上課時間

【本報特訊】國立北平大學於昨日召開校務會議，出席者有校長及教務長等，由校長主持，討論修正組織大綱，及改訂上午上課時間等事，經全體通過，並決定呈報教育部核奪。

**私中最後年**  
**招編**

【本報特訊】私立中華中學，現正招收最後一年學生，凡有志就學者，請速來校報名。

**中院註冊**  
**經濟保衛會**

【本報特訊】私立中華中學，現正招收最後一年學生，凡有志就學者，請速來校報名。

北平《晨報》報導軍警搜捕北平同學



“一二一六”游行时被军  
警大刀砍伤臂部的北大  
李俊明同学（身后是血  
衣）

## 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立宣言

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中華民族的危機，已經到達最後關頭了！

「九一八」事變，在「不抵抗主義」下輕輕地斷送了東北四省，「一二八」的停戰協定，徒然是增高了敵人侵略的氣焰，塘沽協定，何種協定完全奠定了日本在併華北的基礎，冀東獨立與警察政委員會的成立，更說明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已完全破碎淪喪了，最近在接受廣田三原則及新二十一條的默契下，又來召開中日南京會議，這正表現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把整個中國殖民地化，同時也顯示出我們「政府」的屈辱退縮。其他，如日領土肥原奔走平津，公開宣佈增加華北駐屯軍，這些事實，都在告訴我們華北問題又展開了新的階段，也就是說「華北國」不久要出現了！

憑着這種空前危機，處在國防第一線的平津學生，發動「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英勇的示威鬥爭，不到一個星期，便掀起了全國各地抗日的怒潮，在這種勝任，因此平津學聯會發動了徒步南下擴大宣傳團，使民衆知道當前的中華民族危機的嚴重和救亡策路。這樣才能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大衆，充分地覺悟到只有自動武裝起來，共同抗日，才是活路。果然，我們的偉大行動是勝利了；徒步七百里，歷時三星期，博得了民衆同情，散下了抗日的種子。

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立宣  
言



“一二一六”在天桥广场开大会

“一二一六”游行时被军  
警打伤的朱仲龙（朱穆  
之）同学



“一二一六”天桥大会，  
北大同学俞启威（黄敬）  
在电车上演说



“一二一六”军警殴打北  
大蒋昌声同学





进步教授尚仲衣因同情、支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被北大校当局解聘。此照为教育系部分同学与他的留影。（后排左起：刘济勋（刘火）、尚仲衣、卢荻（陆平）、宋尔廉、于倬、周树仁；前排左起：汪洪文、许德富、陈克辛、于经海（于眉）、阎顺行



“三三一”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追悼郭清大会的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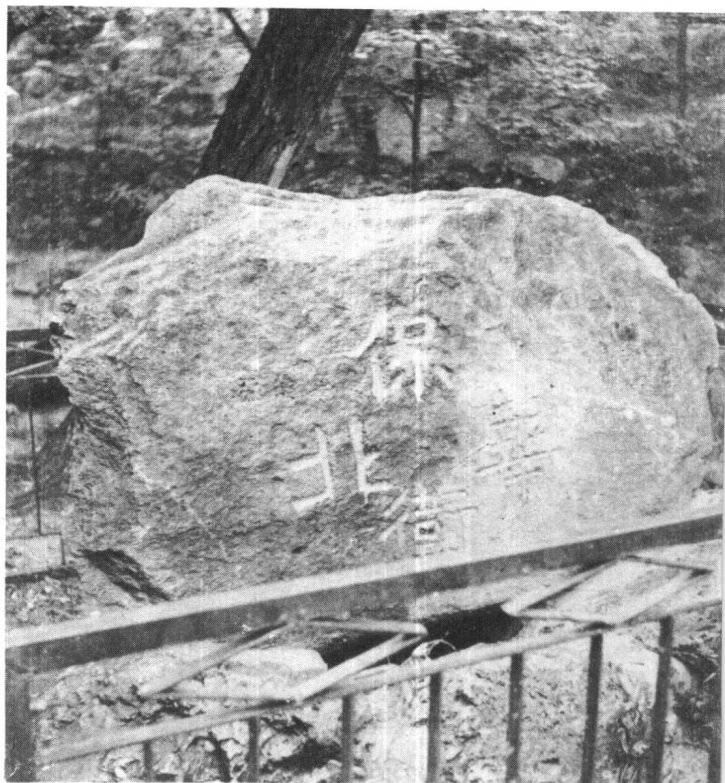
“三三一”抬棺游行



北京大学女同学会成立纪念 五月廿六日

1936年4月26日北大女同学会成立纪念

1936年暑假北平民先队  
举办樱桃沟露营时，北  
大卢荻（陆平）和清华赵  
德尊二同学雕凿的“保  
卫华北”石刻



（一九三七年摄于北大校园）

王冀青 陈纯英 唐尊淮 于瑾 仇学慧 刘长兰 何兆仪 李金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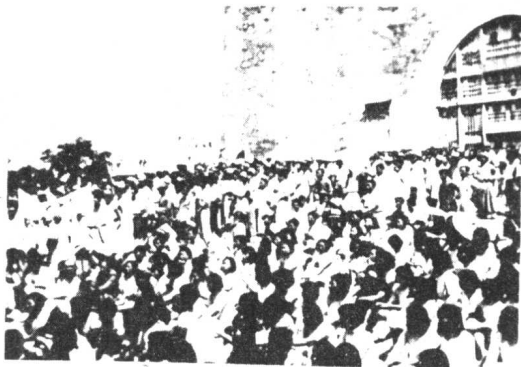
（右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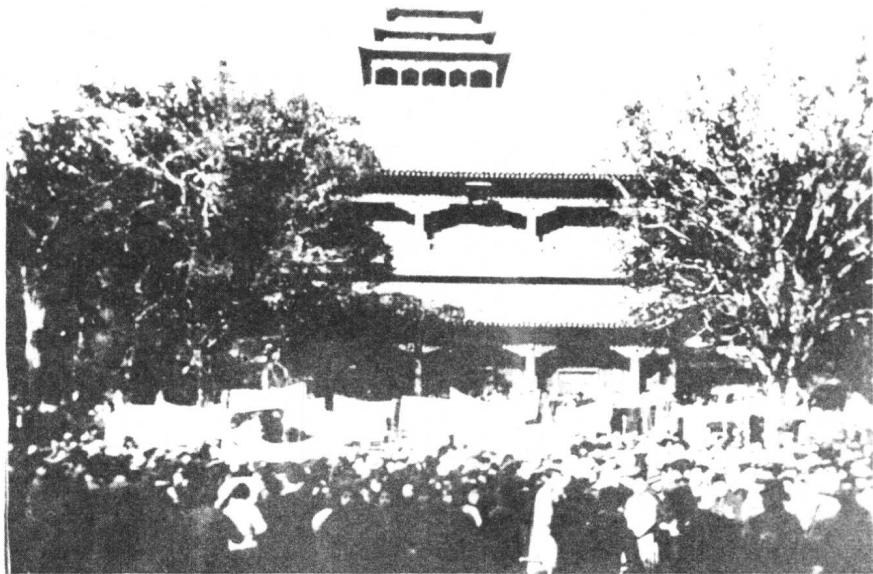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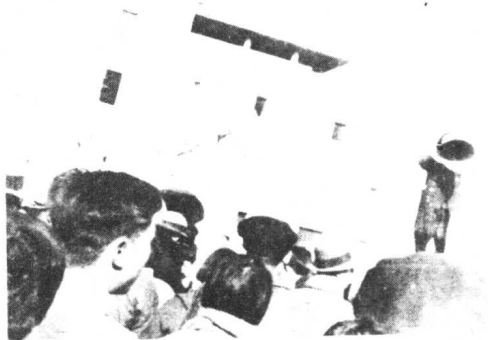
北大救亡啦啦队女生队合影

1937年春，北大女生救亡啦啦队合影

1936年“六一三”鼓楼市民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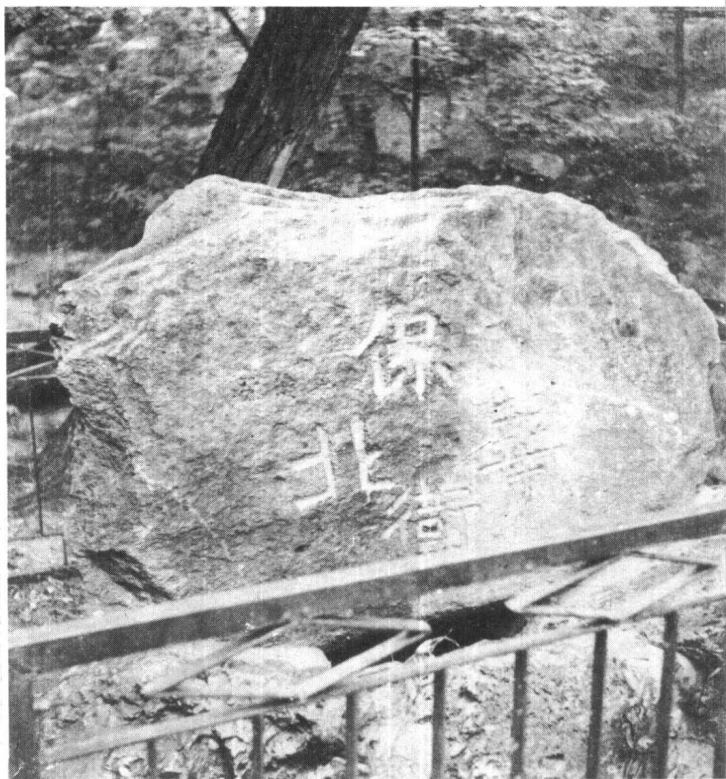
1936年12月12日，学生游行队伍在北大操场开群众大会



1936年12月12日，景山大会情景



1936年暑假北平民先队  
举办樱桃沟露营时，北  
大卢荻（陆平）和清华赵  
德尊二同学雕凿的“保  
卫华北”石刻



（一九三七年摄于北大校园）

王冀青 陈纯洪 唐尊淮 于瑾 仇学慧 刘长兰 何兆仪 李金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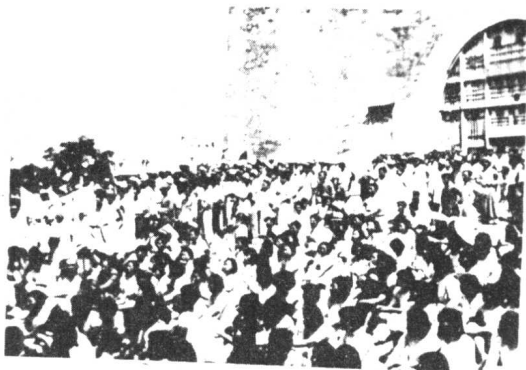
（右起）

北大救亡啦啦队女生队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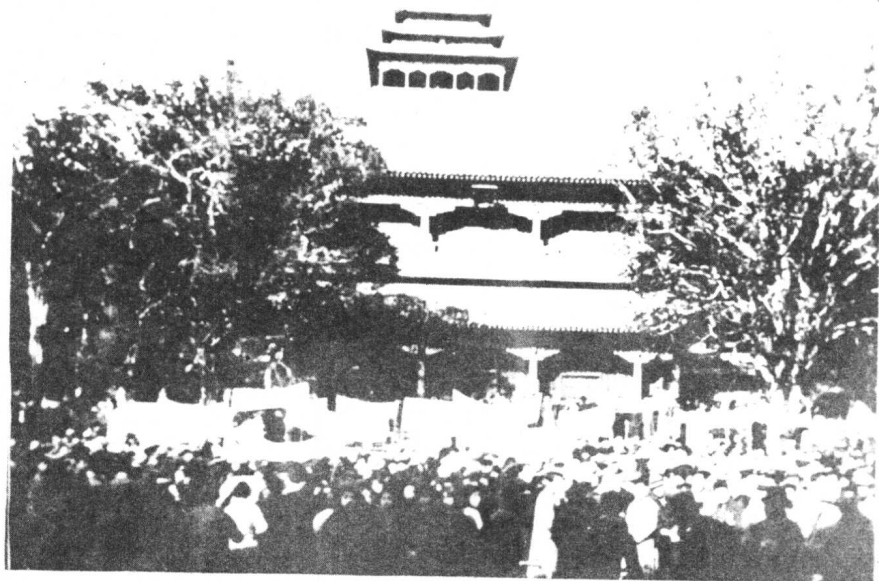


1937年春，北大女生救亡啦啦队合影

1936年“六一三”鼓楼市民大会



1936年12月12日，学生游行队伍在北大操场开群众大会



1936年12月12日，景山大会情景



1937年4月12日，在第二次西山温泉旅行中，北大同学在作救亡宣传



1937年“五四”纪念会上受伤的北大同学



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会编辑出版的部分刊物



1980年8月,在北大临湖轩参加北大“一二九”座谈会的老同学合影

918051

## 重版修订说明

这本回忆录是部分北大老同学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所作的献礼之一（另一本是《红楼风雨》），它的征稿与编印经过，具见于刘导生与刘玉柱分别为本书写的“序”与“后记”中，1985年各印过一版。但那一版的书仅在校友中间与有关方面作了纪念性的分赠，未公开发行；这次是修订重印，公开发行。

为什么第一版书没有公开发售呢？那是由于当时大家的共同愿望是赶在纪念日前见书，以致审编与印刷都过于匆忙的缘故。原来这本集子酝酿发起征稿虽不算晚，但进入审编印刷程序却不早，真正动手编辑的时刻已是1985年2月，交付排印时到了9月以后，距纪念日来临只有两三个月了，其急遽程度，可以想见。但由于共同的奋进与各方面的配合，“纪念日前见书”的愿望，总算达到了，大家都为之高兴！但高效与完备难以同时兼致，等纪念日后，原“汇编小组”决定对它进行修订与重印。修订工作交孙思白负责，并请母校教师江长仁予以协助。在“汇编小组”的领导支持下，

我们对这本初版书进行了历时六、七个月的整理与修补。可说的大致有以下几项：第一，初版收到赠书的同学就内容各自提了些修改意见，对此，修订中尽量作了合理的吸取。第二，纪念日过后的一年内，继续收到老同学提供的稿件，因此，续订中又增补了八篇。这样，全书收录的回忆文章扩大为三十四篇，连同“附编”中从当年《北大旬刊》上选录的五十年前六篇记实的文章，共计四十篇。新增篇目中有了怀念曾昭抡先生与尚仲衣先生两位已故师长的文章。第三，初版“附编”中曾选录了《下乡记》（作者：益非）一文，记述南下扩大宣传团事。此文虽刊于当年北大学生会主办的《北大旬刊》，但察其内容是记琉璃河、高碑店一路，应是南下第三团的事，不属于北大所带领的第一团，故予以删去。第四，大家在回忆同一事件或同一场面上，各篇文章常出现相互重复，或相互分歧。重复处作了有选择的删节；分歧处暂时难以辨明的，就让它并存，如果某说更可征信，对此编者增补了小注。第五，有几篇文章原题目或欠鲜明，或略冗长，修订中，编者酌加了改动。第六，全书收录的文章，在编排顺序上重作了分类调整，现分为“综合”、“片断”、“专题”、“缅怀”四类，另加“附编”共五部分。第七，文中年月日，第一版用的全是汉语数字，今则按照统一规定改用阿拉伯数字。第八，第一版刘玉柱《后记》中提到的《北大“一二·九”运动

大事记》部分，抽出来，把它转移到《红楼风雨》一书之末了。此外，还作了些体例的统一以及文字的润色等末节。

《红楼风雨》那本书中的同学人物姓名，全用当年在校注册时的姓名，后行的今名在其原姓名第一次出现时加注说明。写回忆录有些不同，由于作者多已习惯称谓今名，故未予改动。且旧名已大半注出，当不致发生疑义。

自“汇编小组”为本书发动征稿以来所收到的稿件，几已全部收录，只是尚有四五个短篇，编者原拟合并成一篇，作为“集锦”，但反复剪裁，未能成功；如作为单篇收录，则或过于简短，或牵于体例，或事实难于认定，致未能尽行著录，对此，编者除感到有负于供稿同学的热忱而愧疚外，尚有“遗珠”之憾。

这次修订工作，除得到“汇编小组”诸同志的殷切关怀和支持外，北大领导上委托母校教师江长仁同志协助。一年来江同志在查寻资料、核订史实以及走访调查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给了编者以有效的帮助。北大出版社麻子英社长、编辑何瑞田同志也都为这项工作尽了心力。我想，他们的劳绩会永远为我们大家所铭记。

经过这遍斟酌，初版中的短缺与疏失，可能有所减少，但未及见到的疏误，仍必不少，至希读者诸君与海

内外老同学,续予匡正。

编者: 孙恩白

1987年4月



## 《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序

刘 导 生

---

一二九运动已经五十周年了。

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有定评，也是历史的客观事实。如果说五四运动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启蒙运动，开始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那么，一二九运动，则是开创全民抗战，挽救祖国命运的伟大序幕，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相结合闯出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为抗日战争，争取民族解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准备。这是党的正确路线领导的伟大胜利。

早在六十年代初，北大同学宋应（宋尔纯）同志曾

和几个当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志酝酿过，要为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写出回忆录，我当时因有事未能参加。据说当时大家推荐朱穆之（朱仲龙）同志执笔，穆之同志谦虚，又推给我写，宋应同志并且把刘少奇同志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章给我送来。由于我在北大工作的时间较短（我只在1935年11月到1936年2月这段时间内担任北大中共党支部书记，其后即调出学校工作了），不了解全过程，我仍然认为请穆之同志动笔为宜，结果谁也没动手。可是，这件事在“文革”中反而成了一条罪状，说是为刘少奇同志树碑立传，一些同志被打成“叛徒”、“走资派”等等。

时间又过了二十多年，当事者大都是年已古稀的人了，总感到余年不多，这一段经历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给今天的青年同志留下来，通过前人走过的路，在今天我们进行振兴中华的腾飞过程中，依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经验教训。

写回忆这件事尽管酝酿很久，特别近二年也开过不少次座谈会或个别交谈；但由于不少同志还在工作岗位上，时间精力都有限，再加事隔半个世纪，好些过程的细节，已经忘却，所以现在大家写出的东西难免有错漏的地方。同时，因为都是个人分头写的，互相交叉重复之处也难以避免。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在这里，我们不能忘记给我们启发教育和支持的

进步老师，如：许德珩、马叙伦、尚仲衣、曾昭抡诸位先生。现在许老已九十五岁高龄，马、尚、曾三位先生均已谢世。我们始终崇敬他们，他们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当时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北大同学，除个别人因故离队之外，绝大多数在各条战线上都为革命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有的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刘立贞(刘亚生)同志，当时是历史系的同学，他在解放战争中任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在中原军区突围中被俘，后被国民党押送南京，英勇牺牲。再如李俊明(李光汉)、姜世勋、杨树义(肖杨)、金明、王耀华、孙瑞符、倪学惠(女)等同志，因积劳成疾，都过早地离开我们。这些为革命而贡献出生命的同志，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崇敬！

这本小书所以能够汇编出版，北大党委给我们汇编小组以很大的帮助，特此致谢！

1985年7月

# 目 录

## 重版修订说明(编者)

《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序…………… 刘导生(1)

### 综合回忆

临湖轩座谈“一二九”…………… 韩天石、刘玉柱等十人(1)

北大一二九运动三人谈…………… 曹振之、谢云晖、刘玉柱(38)

回忆一二九运动…………… 孙陶林(60)

我对“一二九”的回顾…………… 谢云晖(83)

“一二九”时代生活散记…………… 孙恩白(112)

### 片断回忆

#### 记忆残片

——忆“一二九”时的北大…………… 朱穆之(146)

从“一二九”到“三三一”…………… 巫省三(157)

“一二一六”大示威亲历简记…………… 顾德麟(166)

## 跋涉在寒冬的原野上

——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刘居英(171)

## 我们也参加了!

——记北大四女生南下宣传经历…………… 唐尊准(192)

## “回敬”了校长先生

——北大学子的反复课斗争…………… 姚震江(206)

南下扩大宣传和“三三一”事件…………… 韩天石(212)

“三三一”被捕入狱记…………… 何兆仪(222)

“三三一”事件略述…………… 葛佩琦(236)

## 参加绥远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的经过…………… 陆平(242)

爱和恨的回忆…………… 何善周(246)

回顾与感想…………… 陈忠经(261)

一段难忘的经历…………… 谢邦治(265)

## 专题回忆

“一二九”前后北大党团活动的片断…………… 刘导生(269)

## 关于“一二九”时期北大党的领导

系统问题…………… 曹振之、刘玉柱(276)

关于北平民先队的一些情况…………… 孙陶林(283)

## 青春的脉搏

——忆北大“民先”的活动…………… 袁宝华(293)

“民先”总队部、北大“民先”分队及其组织系统·····	沈湘汉(313)
记1937年上半年北平“民先”总队部交通工作·····	孙恩白(320)
记忆中的一鳞半爪 ——北平学联、北大学生会和“民先”的几点情况·····	陆平(330)
“一二九”时期北大学生会的更迭 历程·····	葛佩琦(336)
回忆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大周刊》·····	胡昭衡(387)
辛勤灌溉的园丁们 ——北大民众夜校的工作收获·····	宋尔廉(395)
我们为什么要打入青帮? ·····	宋尔廉(405)
“保卫华北”石刻·····	陆平(411)

### 缅怀师友

回忆曾昭抡先生的几件事·····	姚震江(416)
追念尚仲衣教授·····	宋尔廉、刘火(422)
怀念老战友姜世勋同志·····	刘玉柱(428)
缅怀宋应同志·····	袁宝华(436)

## 附编

- “一二一六”以前的酝酿…………… 刘 砥(448)
- “一二一六”记实…………… 谢雁翔(457)
- “一二一六”我在北大的队伍里…………… 寓 尘(464)
- 我们只有一个敌人…………… 济 民(473)
- 读胡适之先生“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陈大觉(477)
- 北大学生会奋斗史…………… 黎 明(483)
- 
- 北京大学学生继续罢课宣言…………… (503)
- 北京大学学生会为不派代表“晋京聆训”  
宣言…………… (505)
- 北京大学学生会《告全国后方民众书》…………… (506)
- 1937年北京大学院系师生情况…………… (508)
- “一二九”时期北京大学校址位置示意图…………… (509)
- 后 记…………… 刘玉柱(510)

## 综合回忆

### 临湖轩座谈“一二九”<sup>①</sup>

韩天石、刘玉柱、孙思白、张震寰、谢云晖  
黄 华、袁宝华、陆 平、朱穆之、蒋南翔

---

**韩天石：**今年是“一二九”四十五周年。老同志、老战友，有的四十多年没见面了。大家都想聚会聚会，叙叙旧。今天我们的聚会不一定有什么重大意义，很难

---

① 1980年8月23日，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北大“一二九”历史座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北大老同学二十三人。还邀请了当年燕大的黄华（王汝梅）、清华的蒋南翔，师大的丁秀（丁发善）三位老同学参加座谈。这份回忆录是根据会上的主要发言整理的，并按发言顺序署名，编入本书时，又做了若干修订和补充。



得就是了。大家都很高兴，愿意有这个聚会。今天中央在开一个会议，有的同志可能晚来一会。这次聚会的发起，应归功于刘玉柱同志，请他来说说。接力赛跑，我是第一棒。

**刘玉柱：**我说说今天聚会这件事的酝酿过程。去年我出差到四川，见到咱们谢云晖同志，就谈起这件事。回来后，春节中老同学见面交谈了一下，以后陆续串联，一直到这次开会之前。有个很好的机会，咱们天石同志一二九运动中曾被北大反动当局开除，（韩天石：我已被平反昭雪了）现在北大做党委书记，有这样一个方便。我和天石同志酝酿多次。经过酝酿的同志都很支持。活下来不容易呀！去年，我见到宋任穷同志，他说，经过十年浩劫，活下来就是胜利。我说活下来还能工作，就是幸福了。这个聚会，旧友重逢，老同志、老战友聚会不容易呀！谈话得有个主题吧，酝酿结果，主题就是1962年那次座谈会的主题。1962年，宋应同志还在世，他在地质部工作，开了个座谈会，主题是北大的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当时说整理个材料，还没整理成，“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有些同志还因为这件事挨整。打倒四人帮后，据我自己接触的，有清华大学的，有政协的，还有出版社的，给我写信，要求写北大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录。一个人也记不全，有些事情

怎么看法，比如“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等。老同志聚会，大家都回忆回忆，交换交换意见，将来整理个材料，供找我们了解情况的人参考吧。这就成为今天咱们聚会的话题。事先和天石同志，还有思白、宝华、穆之、陆平等同志交换意见，需要有个带头发言的，就请思白同志吧。他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学历史、写历史，过去又写过这一段，有这个方便，带头发个言，抛砖引玉或抛玉引砖都可以吧。

**孙思白：**关于一二九运动，过去曾收集一些材料，但在“文化革命”中散失了，考虑了一些问题，没成为一个东西，就抛砖引玉吧，说错了也没关系。

时隔快半个世纪了，我先把过程缕一缕，以引起大家的回忆。一二九运动从1935年12月起至七七事变前后，十几个个月。开头是华北危机，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这个情况大家都记得，1935年的何梅协定以后，河北的局面就不行了。同时发生的是秦土协定，察哈尔的主权丧失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拿咱们北大来说，我记得有这样一个印象，有几个日本浪人，跑到红楼前，喊着要接收北大。有一天，晚报上说，华北局面即将揭晓，日本人明天就到北平来，那天我们历史系有个传说，说明天就要挂五色旗。那种国家垂危，岌岌不可终日的情况每个人都会

记得的。随后同学们互相串联酝酿的情况就有了，我记得宝华和杨雨民跑到我宿舍说，我们应对中国的局势有所表示。这算一段，回头各位老大哥再来补充。这一阶段中，关于党的活动，党如何估计这个形势，怎样发动这个运动，这方面接触的材料不是很多，资料、回忆也都不很多，请同志们多回忆一下。

“一二九”游行那天，记得是别的学校的人先到北大来，一喊，咱们临时扯了几个被单，就当作旗子打出去了。北大组织的晚一点。（刘玉柱：“一二九”前，北大有些酝酿，准备组织学生会，北平学联先组织起来，北大学生会后组织起来。）“一二一六”那天，北大的队伍很严整，几乎是全校同学都参加了。以后不久就是寒假，酝酿南下宣传。北大是第一团，天石是团长。留在学校里的同学进行复课还是罢课的斗争，红楼门前、二院门前，蒋梦麟、胡适骂学生，学生也骂他们。刘居英同志是当年的纠察队长。除学校当局要求复课外，在学生中也有少数人要求复课。如果复课，对南下宣传团在情绪上是个打击，无论如何不能复，在三院礼堂开会辩论。我记得有一个驳复的同学，驳得很好。南下宣传团回来，接着就成立了民先队。同时蒋介石下命令要各校派代表“晋京聆训”，咱们就发表宣言，拒绝派代表，蒋梦麟就收买了三个代表：杨某、李某、徐某，每人三百块钱。学生会组织大家驱逐伪代表，2月18

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有人提议给他们立“遗臭万年碑”，把杨、李的门砸开，把他们“开除学生会籍”。徐某怎么没成为伪代表呢？（《北大学运史》上写了两个伪代表，是杨和李。）他拿了三百块钱后，没到南京去，只到烟台、青岛、曲阜转了一圈，听说校内驱逐伪代表，他就到处贴小条，贴通告，说鄙人寒假到那儿旅行，住什么旅馆，没到南京去，“特此声明”。后来徐某并没逃出蒋梦麟的手掌，他拿了蒋的三百块钱，蒋暗地里叫公安局把他拘留起来了。2月17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紧急治安法，接着对平津爱国学生大逮捕，引起“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三三一”的行动遭到镇压。过去的材料评论说这是一次失败的行动，或者说是冒险主义，（韩天石：还有说是“左倾”路线的残余。）上纲上线很严重。对这个问题，也请大家重点回忆一下。那天和天石同志交换意见，他是直接受害者之一。

“三三一”以后，就转到自我教育阶段了。斗争的方式有很大改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这时才开始懂一点。原来看国民党就是不抗日，都是卖国的。我记得从三院开会回来，袁宝华同志在路上对我说，不能这样看，也得分析分析，国民党中也有主张抗日的，我听了很新鲜。在这以后是“五四”十七周年纪念，在二院开纪念会，一些落后的同学说，这糟了，又要罢课了，但结果贴出通告：“师生联合纪念五四”，第一条是

“不罢课”，第二条是“不游行”。会议开得很好。不久，日本增兵华北，我们6月13日举行游行。宋哲元有个谈话，说这次学生运动没有越轨。“六一三”是比较成功的一次。9月，日军与二十九军在丰台冲突，市学联派代表去慰劳二十九军。11月，日本人在近郊演习，我们通过上层关系发动二十九军，在固安也做了一次对抗演习。学联代表就向二十九军献旗。从这些工作来看，这个时期的做法，与过去很不同了。

双十二事变后，国内又是一个新的形势了，学生运动中的“生活路线”就很显著了。我们搞了许多活动，香山旅行，樱桃沟露营，演出《西安事变》，陆平演杨虎城，吴承明演张学良，一个沙滩学生姓郭的演蒋介石，我扮蒋孝先。从“双十二”到“七七”，中间还有一个新“五四”事件。“七七”前夕，我们6月28日开始，在大觉寺办夏令营，第十天卢沟桥的炮声就响了。

我首先把过程勾一勾，引起大家的回忆，请同志们补充。

我考虑有三个问题需要座谈和交换意见。一是，运动前党的活动、准备和领导的情况，准备用什么方针、政策来领导这个运动，请同志们提供这方面的材料。二是，对“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应怎样分析。三是，如何估计“一二九”的历史地位。在我国学生运动史上除“五四”历史意义很伟大外，一二九运动的意

义也很重要。《毛泽东选集》对“一二九”有过评价。1943年少奇同志对“一二九”也有一个专门讲话。他说：第一，一二九运动开始了一个旧的反动统治的结束和革命高潮的开始，指的是白区。第二，正确地执行了小心谨慎的策略结果，所以能坚持十九个月。第三，一二九运动始终沿着与工农兵结合的方向前进。少奇同志当时总结了这样三点。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学生运动有两次高潮，一个是“九一八”，一个是“一二九”。拿“九一八”和“一二九”来对比，显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和很多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之处，一个是突然起来的，很快结束；一个是不断地延续和坚持下去。“九一八”后全国规模的运动很快起来了，行动是可歌可泣的，但没能坚持下去。从“九一八”到12月17日珍珠桥事件，学生到南京请愿、示威，前前后后有许多团体，几万人，中间有三次高潮。第一次11月初叫人欺骗了，回来了，表示请愿满意，这次也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第二次，11月26日，也是几万人，在国民党政府门前挂了一口钟，一些人在那里敲，但这次也没结果。第三次就是北大南下，别的学校都是请愿，北大是示威，这样带动了全体示威，南下学生的请愿都改成了示威。后来，国民党政府于12月17日施行了屠杀，学生死伤百余人。以后这个运动就停顿下来了，前后不过三个月。而一二九运

动却坚持了十九个月之久。两个运动的相同之点是客观形势很相似。一个是东北的沦陷，一个是华北的危机。国民党阵营的分裂，“九一八”时是这样的，华北危机时也是这样的，不过更加深刻罢了。“九一八”在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一二九”在红军到达陕北，发表了“八一”宣言之后，客观形势很相似。但效果呢，一二九运动显然大，因为时间长。

学生运动的性质毕竟是非武装的，在白区的反抗，主观指导上必须灵活。学生运动中的最高形式就是游行示威，其他形式就低一些。运用游行示威这种最高形式时，必须考虑到许多主客观条件，需要有很好的主题，很好的组织，各方面的配合。具备了这些条件，遭到镇压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一二九”和“九一八”从运动的形式上看，从运动的多样性上看，从运动的策略即利用敌人的缺口、矛盾、争取中上层社会的同情等方面看，都很不相同。一二九运动利用了宋哲元统治区的特殊地位，利用了宋与蒋的矛盾。比如，那时太原的学生运动比较活跃，是利用了阎锡山和蒋介石的矛盾。广西也是比较活跃的地方，因为那时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有矛盾。1936年5月的全国学联，广西是常委，学生运动组织多到七十一个县。利用敌人矛盾，争取社会进步力量，这些方面两次不一样。“九一八”有一次南下打了王正廷，还有一次打了蔡元培，看

来打蔡是不策略也是不应该的。“一二九”中，懂得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后，就不同了。学生运动在白区成了一种对反动统治的威胁，因为学生与大多数中上层社会有些联系，学生很纯洁，很容易博得社会同情，反动派想公开镇压学生总是不得人心的。应当不怕牺牲，但应尽量避免牺牲，这样才能长久。应该清醒地看到白区的学生运动，其作用无非是扩大政治影响，在运动中锻炼干部，不应再有更高的要求，不能违背白区工作的客观规律。“一二九”有这些长处，而“九一八”则有些缺点。

**刘玉柱：**“文化大革命”前，宋应同志召集的那次座谈，谈到一二九运动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南下宣传，在保定成立民先队。当时有个讨论，怎样才能把学生运动巩固下来，坚持下去，认为要在救亡学生积极分子中搞一个骨干组织，这样就成立了“民先”。当时叫什么名称，有各种各样的主张，最后决定叫“民族解放先锋队”。回平后在各大学、中学都发展起来了，因为很得人心，民先一成立我们就都加入了，它实际上代替了共青团。当时我和宝华、姜世勋等同学在西斋住，宝华是我们的小队长。民先的组织生活过得很好，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形势任务。“民先”在北大学生中很快发展到占百分之二十以上。1936年下半



年选举学生自治会前，学校当局要控制学生运动，公布选举法，五个学生选一个代表。“民先”的数量很大，分配了任务，每个人要团结一两个到两三个同学。这样就团结了同学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学生代表中“民先”占了绝对优势。其前后虽有一些曲折，如“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争取抗日救亡自由的正义斗争，虽然遭到冀察当局镇压与北大当局打击，但组织没有垮掉，活动也没有停止。这个组织和地下党联系起来，知道了中央的方针、政策、路线。一直到七七抗战后，民先队员散布在全国各地，起了很大作用。北大一二九运动，党是怎样发动的，刘导生(刘文卓)同志熟悉当时的情况。

1936年“一二一二”那一天，北平市学生举行游行，援绥抗战，援助青岛工人罢工。要求释放七君子。与西安事变在时间上巧合。这次游行取得胜利，和二十九军建立了统一战线，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在景山讲话，对北平学联的十几条要求，宣布接受。散会时他要求大家整队回校，结果来了一次合法游行。走到那儿，二十九军的士兵就打立正，我们就喊“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我们和二十九军的关系开始有了改善。这是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意义重大。西安事变第二天，一早就传来蒋介石被抓的消息，蒋孝先被打死了，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异

口同声地要杀蒋介石。但很快传来了中央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那时只说是上边来的精神，不能杀蒋，而是有条件地放蒋。大家的头脑冷下来后，接受这个主张。北大学生代表大会讨论西安事变时，有争论，民先队内也有争论。学生会执委会提出的意见是要求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意张、杨两将军的兵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另外，建议张、杨两将军在蒋介石答应团结抗日前提下放蒋。尽管国民党分子闹，但在北大没闹起来，一个原因是我们民先队团结，有群众，另一个是他们人少孤立，也没有多少借口。当时北平好几个大学都有国民党新学生会和民先派学生会对立，但在北大他们没有搞成第二学生会。记得1935年下半年就看到了“八一”宣言，是从外国传来的。（陆平：在东斋的告示牌上贴出来了。）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当时青年运动在关键时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西安事变以后，从要杀蒋到有条件地放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起了决定的作用。

**韩天石：**“一二九”之前，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大学生中实际上已有较长时间的酝酿。北京大学有革命的传统，学生中受进步思想影响的面比较大。尽管当时国民党统治很残酷，宪兵三团在北大抓了人，但北大校内国民党力量仍然较弱。北大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虽小，

但影响并不小。“一二九”开始时，校内共产党员只有几人，团员也很少。国民党员在数量上虽比共产党员多，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因为有某些社会的或家庭的关系而参加的；有些则是为了将来找职业；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甘心为国民党效劳的不多。我们班上只有一位同学经常上《三民主义》(必修)课，可是他后来却参加了共产党。国民党员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大，因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学习不好，作风差，其中一些人奔走钻营，同学们很看不起。北大教师中的大多数是爱国的，其中有些教师思想进步，而顽固、保守的只有几个人，如陶希圣、胡适之等。总之，当时北大校内的情況是：进步思潮影响大，反动势力有，但影响小。

在“一二九”很久以前，有些北大同学便参加了一些进步团体和多次革命活动。“一二九”前夕，北大就在酝酿成立学生会。当时我在理学院读书，在几天前，我被推选为代表。

“一二九”当天上午，北大同学之所以未同其他学校同学一起参加行动，是因为事先没有得到北平学联的通知。在当天下午，当部分同学得知消息后，便立即主动地参加了游行的行列。我认为，北大同学参加一二九运动，是有思想基础和一定的组织准备的。有一种看法，认为北大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是在外校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12月10日上午，在红楼大教室里，召开全校各系各年级学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学生会。大家首先推举我为主席主持会议。这是因为理学院早有酝酿，大家在会上举手齐，票数多。假若事先没有酝酿，我也不会当代表，更不会被选为主席。我在学生中活动不多，和各系联系很少，学习比较用功，只是在那个时期才较为活跃。我没有当过会议主席，面对许多提案不知如何处理。后来请朱穆之上台，他善于处理这些事，会议开的很好。学生会成立起来了，并决定对下一次全市学生的行动进行准备，还决定了学生会的组织和其它工作等事项。

10日下午，在新四斋院子里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大会通过了上午代表大会决定事项，宣告北大学生会的成立。

“一二一六”前，北大学生会根据北平学联的决定，作了仔细研究和较周密的部署，在学生中作了广泛的动员，所以这次游行，北大组织得非常好。当日凌晨，三个院和各斋大门都由纠察队把住了，不许进出。晨5时许，各斋即被军警包围，内外对峙，出去不得。后来，由各斋队伍互相策应，都冲出来了。这次行动，北大去的人很多（陆平：“一二九”没搞好，被动了，回来后同学们说“五四”运动北大走在前头，这回太丢人，有很大的气，下一次一定要搞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

参加了，进步的和中间的同学不用说都参加了，有的国民党员也去了。校旗、横幅标语、传单都准备得很齐备。游行中，队伍很整齐，群情振奋，作了冲破一切阻拦的准备。走在前面的是黄敬和学生会的负责人。队伍行至南池子南口，受到军警的拦截，同学们战胜了水龙、大刀，冲开封锁线，奔向天安门。因沿途有许多中学同学参加，队伍不断扩大。当日下午，在家里的同学，也准备了馒头、大饼，支援游行队伍。经过这次行动，激发了全校同学和大多数教师、职工的抗日爱国热情，提高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以及国民党当局斗争的勇气，并促进了广大人民的觉醒，同时也使广大同学受到了锻炼，坚定了革命意志，提高了组织性及组织能力。顿时，校内形势大变，爱国热情高涨，同学们的团结增强了。人们素称：北大学生思想自由，各有主张，三人意见一致就是难的。可是这次抗日爱国的行动，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了。

12月下旬就筹备南下宣传团，原名为“平津学生南下示威宣传团”，因“示威”二字有些吓人，改称为“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出发前，北大学生会发表了宣言。北大是第一团，参加的人不少，东大、师大是第二团，清华、燕京是第三团，其他大、中学的同学分别参加到这三个团里。以后二团同一团合并，第四团是天津北洋工学院和其他天津学校同学。1月3日在农学

院集合。当天下午西直门城门关闭，不准出入，有的同学是爬城出去的，有的是绕道出城的。4日黎明出发，一路浩浩荡荡，队伍很不小，在座的有些同志参加了。随第一团同行的有宣传团的指挥部，是党领导的，有彭涛（辅仁大学）、宋黎（东北大学）、姜文彬（师大），我是第一团团长。出发后一直到固安。在固安开了一个大会，对前一段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下一步工作做了动员。董毓华代表北平学联在会上讲了话。三、四团来了一些人参加了会议，他们是两翼，我们是中间梯队。总结时不是几个团全部队员都在，主要是我们一、二团。会后继续前进，到霸县、雄县、高阳，一直到保定。为什么走这个路线呢？原来想一直走到南京去，以后经过指挥部分析，同学们坚持不了，经费很困难，学联给我们送来一些钱，是后方募捐来的，队员中有很多同学交不起饭费。另外，天气很冷，再走情绪容易低落，这样遂决定往保定靠近，准备乘火车到南京请愿或者回北平。

在保定召开了全团大会，指挥部提出为了保存、巩固和扩大这一抗日救亡的学生力量，应成立一个先进学生组织，记得当时，同学们提出了好几个名称，其中小曹（曹国智）提出“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名字，大会一致通过，并推举了筹备委员，其中有指挥部的同志和我十多人。当时《大众生活》杂志有人写了一篇文章，

说学生运动应过渡到工农当中去，应有一个固定的组织，没有一个组织，学生的救亡力量就要逐渐涣散。这正是当时党中央的主张。这时党中央已作出取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回平后，当年2月召开民先成立大会。《毛泽东选集》中有个注解说明民先是9月份成立的，我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文献编委会，提出更正，到9月份时，队员已经发展得很多了。开始时我是民先筹备委员之一，后来就参加了北平学联的党团，党团书记是黄敬，委员有黄华和我三个人。

2月份我进入党团工作，到燕大开过几次会。当时学生运动处于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行动之后，转入到深入的学习和巩固发展组织的阶段，民先队在大量发展，各种学习的、文化的小团体在巩固和扩大。国民党当局和一些学校当局对学生进行逮捕和镇压，广大学生进行着反逮捕反镇压的斗争。学联党团当时主张要巩固学生运动的成果，在同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暂不举行大规模的行动。这一时期，每次学联开会，各校代表都议论纷纷，他们感到憋气，非要行动不可，说在这个时候不行动，不冲破一下沉闷的空气，学生运动的受压制不知要到哪一年去了。党团同志对各校代表作了耐心的说服工作，请他们在校内多做些宣传和组织工作，团结更多的同学。但他们对此感到不满足。3月中下旬，形势有变化。这时，十七中郭清在狱中牺牲

的消息传到各校，群情激愤。学联召开会议，各校代表坚决要求召开会议追悼郭清。党团遂决定开追悼会，以此来发动学生。原先并没有决定抬棺和游行，只是开个追悼会，冲一下沉闷气氛，振奋一下同学们的精神。很多同学跃跃欲试。会议决定在北大三院召开，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为了加强悼念郭清同学的气氛，引起大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仇恨，开会前，几个同学弄来一口棺材。开会时去了很多人，都是各学校的积极分子，会议开得很好，出乎我们意料。大家的发言慷慨激昂，很多人哭了。校门外的压力很大，军警包围，架着机关枪，不准出去。散会后怎么走呢？我们就研究，如果从正面出去，出去一个会被抓一个。我代表北大学生会去和警察署长交涉，我说你们撤了以后我们就散会。他们说奉命不撤。蒋梦麟、胡适之他们又紧急通知我到校长办公室（可能是军警报告他们的），一定要我解散这次会议，不解散会议就要处分。我说这次会不是北大单独召开的，各校代表都有，我们没有权解散，而且这个行动是正确的。他们叫我回去赶快停止会议。回来后党团几个人研究，没有停止开会。但散会后怎么办？从哪儿出去？决定从后面走，随后把南邻孔德中学的墙推开，那一面军警很少。冲出去后，就抬棺游行。

参加“三三一”活动的积极分子不占学生的多数，



但代表了多数爱国学生的要求。它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也不是党命令群众搞的，而是代表了同学们的意愿。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没有“三三一”，“六一三”也不会这么好。“三三一”给大家很大的教育。“六一三”那次搞得很不错。革命运动总有起伏，这是自然的，有点挫折也是难免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是逐步发展的，是用事实不断教育着群众，应和群众总结经验教训，经受锻炼，以后组织得更好一些，这是正常的。对“三三一”的评价，我认为应该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也有缺点。

“三三一”后我被开除学籍就离开北大了。同时被开除的有巫省三、吴沛苍、叶纪霖共四人。在校同学找蒋梦麟要求恢复我们学籍，在座的许多同志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党叫我到四川，还经常收到北大同学给我寄的许多民先队的资料。在那里我们成立了民先队。四川民先队发展得很好，百分之八、九十的队员后来入了党。一二九运动不仅推动了抗日，推进了革命运动，也培养了很多干部，培养了一代人。各大学和一些中学在“一二九”中都是起到很大作用的。当时一般说有六、七个大学比较突出，如东北大学、清华、燕大、师大、北大、中大、平大法商学院等。当然不止这些，还有辅仁、朝阳、平大女子文理学院等以及一些中学，如女一中、汇文、北平高中等。这些学校中的党团员、积

极分子都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力量。其中很多同学成了党的骨干。

**张震寰：**北大在“一二九”前有一个叫“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的组织，当时刘文卓（即刘导生）给过我一些这个组织的铅印材料，是宋庆龄领衔的。“一二九”头一天，老窦告诉我，中南海明天要发生事，你可以去看看。吃过早饭我就去了，到中南海北门，等了好久还没有事，我就去北京图书馆看书了。下午约四点，我正在北大图书馆看书，听到外面喊口号，大家就冲出去参加游行了。学校里有人打钟，记不得是谁了。（孙思白：现在香港中大任教的王德昭有一次来北京，他说当时是他打的钟。）后来才晓得游行队伍早上到新华门请愿，何应钦住在那里。1935年下半年在北大还看到过北方局的小标语和传单，有党的活动是肯定的。

**谢云晖：**“一二九”、“一二一六”、南下宣传、发起成立“民先”以及“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我都参加了。党组织怎样活动的不知道，我们大家思想上都是受到党的影响的。“一二九”那天，我们正在红楼上课，外边叫口号，我们才出去的，显得有些被动。“一二一六”北大就比较景气了，因为大家好象有点气，本来搞学生运动北大一向是带头的。有这样一股气，于是绝

大多数人都出去了。

“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究竟应怎么看，有人说是“路线错误”，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我同意天石同志的看法，不是党组织强迫群众这样干的，是群众中的一些人要这样干的。群众运动是否都那么正确，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在那个很沉闷的气氛下，找个题目，搞个行动，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那次行动大都是各校的积极分子，中学生较多。在南北池子一带被捕五十四人，北大九人，我是其中之一。老韩也被北大开除了。这件事顶多说那时都是年青人，是学生，思想不那么成熟，谈不上路线错误，那样说路线就太多了。我们这一、二十年来，什么都是路线，什么都要上纲，这个习惯要改一改，一个具体问题不要提得那么高。一二九运动为什么能长时间坚持，除了是领导正确外，就是群众中有一大批骨干分子——民先队等。少奇同志来了以后，在思想路线各方面比较正确。整个运动从头至尾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起码是在党的思想如统一战线政策、“八一”宣言、12月决议的影响下起来的，并不是盲目的，如果说是“左”倾错误路线，搞不了那么久。至于运动过程中的一些缺点错误，那是免不了的。当年的学生搞成那样子就算不错了。不能过分责备。当然不能把学生运动的作用过份强调，它仅仅是具有一定的作用。当时提出到民间去，就是和工农

相结合的体现。民先队在抗战后，在南方，地方上也好，军队上也好，影响是很大的。我在南方碰到的青年大部分都是民先队的。全国各个地方都有民先队，起过很大作用。1937、1938年民先队都在发展。记得1938年有一个文件，民先队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都转党。历来学生运动如果不深入下去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寿命是很短的。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材料，过去有一部分同志搞过，我后来在新四军看到过一份铅印的。我参加的那届学联是第二届了，大概从1936年秋到1937年七七事变。那届学联是由五大学校组成常委，我是代表北大参加常委的，主席是黄诚。常委还有师大的王文彬。那时学联已是北平各界抗日救国会的重要成员，主要的力量仍是民先队以及爱国抗日的教师和学生。亲国民党的少数教师和学生背着各校的广大学生打出了新学联的招牌，同各校学生会正式组织的旧学联捣乱。1937年纪念“五四”十八周年大会上，北大的陶希圣、师大的杨立奎等人在大肆煽动国民党学生用童子军棍棒大打我们的人，许多同学挨了打。1937年上半年华北各界抗敌后援会还召集了几次会议，由杨秀峰等人召集，安排许多活动，学联参加了。直到七七事变第二天还派人去宛平县慰问二十九军。接着就组织了大批学生南下，学联结束。

**黄华：**关于一二九运动，毛主席曾写过一篇文章，我以前看到过，评价是很高的，不低于五四运动。

我觉得一二九运动首先有一个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问题。思想准备方面，事前有红军北上抗日，党的“八一”宣言，号召统一战线，又有直接的支持抗战的行动，古北口啦，察北啦，学生中有一些活动和酝酿。到1935年，准备召开华北各界抗日联合会，张申府、冯基平、徐冰等同志筹备这个活动，我也参加了。从河北省还请了两位农村同志，出去怕暴露，在燕京学生会住了一个多月，天天给他们端饭回来。后来开了两次会，一般地谈一谈。冯基平同志是作为山西太原师范学院的代表来的，还有一些同志记不清楚了。以后，学校里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多了。在思想准备上，一方面有党的影响，党的号召，一方面有自发的群众要求过问国家大事，要求挽救民族的危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雄厚广泛的群众基础。我记得鲁迅先生写过一篇东西，他批评“九一八”时上海的学生在市政府门前“长跪”的行动，鲁迅的批评对后来的学运起了影响。“一二九”一开始，学生就有了联合的组织，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东北大学是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从东北流亡到北平的青年要求收复失地，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对国民党政府强烈不

满。我记得 1935 年夏天在燕京组织了一次军事演习，从东北大学借来了一批步枪、轻机枪、手榴弹，这是他们学校的防空武器，是用大轿车拉来的。东北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也是国民党打击和进攻的重点。

我参加党是 1936 年初，在这以前和东北大学的车向忱、守玉，还有已经去世的张西尧等同志有来往。当时东北大学有党组织，燕京的党组织已经在 1934 年被破坏了。1936 年 2 月份我参加学联党团，当时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得不够经常，也有联系不上的时候。“三三一”以前就联系不上。“三三一”行动没有向上级党联系和请示。这个行动本身，显示了我们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有力量。南下宣传回来以后，如何进一步开辟工作？曾派人到丰台去工作，叫特务打了，各校抓人抓得很多，特别是城里的一些学校，压得很厉害，所以想反击一下，打破这个沉闷恐怖的气氛。郭清惨死狱中，决定在北大三院开追悼会，不是完全有计划的。开会时东北的小王，名字想不起来了，这个小伙子比较冲，弄了个棺材。他有办法，到了棺材店，给老板拿了几块钱，老板说，给你用去。<sup>①</sup>他们就把棺材抬到了会场。以后警察包围，怎么办？究竟游行不游行，还是决

---

<sup>①</sup> 这小子名叫任庸，东北大学学生。

定游行。组织了队伍，排头排尾压阵，但整个的组织计划仓促，所以碰到警察，较量了一下，后面就乱了。队伍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后面一乱，前面就垮掉了，一垮就分散了，警察趁此机会抓了許多人。“三三一”行动达到了揭露当局和宣传抗日的目的。关于当时党的指导思想，我不记得上边有什么指示，学联是讨论过。（韩天石：当时黄敬、你、我三个人讨论过，没有说一定要游行示威，群众当时是很气愤的，但准备不很充分，搞了些传单。会是决定开的，但不一定游行，抬棺也不是预计要抬，是开会前弄来的；已经弄来了，怎么办呢？弄来就弄来吧。）（刘玉柱：在当时的形势下，学联发动与组织追悼郭清，抬棺游行，我认为是及时的正确的，应该肯定。那是一次反逮捕、反镇压、反迫害、争取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自由的正义行动和英勇斗争。反击的很有力，对冀察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使他们认识到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不可侮，迫使他们停止了大逮捕。为此付出一定代价，是值得的。对抬棺一事，也未可厚非。那是为了加浓追悼会的悲壮气氛和加重抗议的强烈气氛。这次行动事先得到了中共河北地下省委特派员李长青同志的支持，得到了中共地下北平市委的同意。当时市委估计到可能受到冀察当局的镇压，但还不致于开枪杀人。所以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说：“只要不死人就行”。市委在组织上作了以防万一的安排，决

定市委和民先总队部的负责人员都不直接参加行动。北大学生会也有一部分执委没参加。)就是有缺点,也不一定要扣上一个“左”倾路线的帽子。参加的多数是各个学校里的骨干,代表了广大爱国同学的强烈要求。当天我是在出去的路上被捕的。

南下宣传回来以后,“三三一”之前,成立了民先。南翔同志和我商量,要搞统一,把其他组织取消了,并到一个里面。我们就把燕京的组织撤销了。1938年中央有一个关于国统区究竟搞什么青年组织的意见,主张根据各地情况搞各种各样多种形式的青年组织,不要只搞一种。我到长江局后,1938年5月在武汉开全国学联筹备会,长江局就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争论,一种意见是在大后方应有各种各样的组织,这实际上是中央的意见,另一种意见是继续搞民先,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继续搞。中央的意见是正确的。王明、凯丰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多种多样的形式,适宜各地的情况,广泛发动群众抗日。

袁宝华:1962年宋应同志召开的那次关于“一二九”的座谈会,是林枫同志委托他开的。去了十几个人,我也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中就不得了啦!说在地质部开黑会。这次韩天石同志召开,在北大学生会时,他原是“首相”,他走了以后刘玉柱是“首相”。这次人



员多,特别是请黄华同志、丁秀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参加,我觉得更好,更全面一些,了解情况更多。

关于一二九运动,赞成刚才黄华同志讲的,开头的思想准备还是比较足的。当时大家的劲憋得很足,尤其是在一次什么宣言上,说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时我不是党员,也感到念不下去了。至于说组织准备,党当时的力量比较薄弱,后来在延安看到陈云同志的一篇文章,说当时在华北一共只剩下二十多党员了。当时,所谓组织准备之一,就是各个学校都在酝酿成立学生会。清华、东大、燕京、中大都成立了,北大成立的晚,是在“一二九”第二天成立的。事后想,虽然当时组织准备薄弱一些,思想准备还是有重要作用的,少数人登高一呼大家就响应了。到处都是干柴,你一点就起来的那样一种形势。我们这些青年学生,过去没有参加过政治运动,象我这样的人在当时有点代表性,还不是党员,政治上也不是那么清醒,可是有满腔抗日救国的热情;游行队伍一到,那就积极参加。我还在我们那个班上号召一番,叫大家都参加去。游行回来以后,人就好象变了,劲头也大了,胆子也壮了,看到一起参加游行的人感到非常亲切。原来我不认识李俊明,他被捕以后出来,就成了好朋友了。“一二一六”后有一段时间,学生会的活动不那么紧张了,好多同学在公寓打麻将。这时,学联提出了南下宣传。

1月3日离开北平。这个作用很大，实际上是一个流动训练班。北大去了几十个人，天石是第一团团长，包括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和一些中学在内。北大那个中队是江之源当队长，后来江不孚众望，就选了刘居英做队长。三团在高碑店被打散，对我们是很有影响的。大家是昼伏夜出，那真是一番锻炼哩！

过去年青学生什么也不懂得，经过这次南下宣传，感到自己一下子长了好几岁似的。回来以后还要向别人做宣传呀。后来那些打牌的牌友都刮目相看，说你出去一趟好象是高明了很多。回校后大家时常聚集在一起学习提高，建立了民先队，还想参加党组织和社联。我很赞成刚才同志们的意见，就是一二九运动发展到南下宣传团，成立民先队，把进步力量保存下来了，没有散掉，这个作用很大。2月我就参加社联了。天石被开除后我入团的。他被开除不是在大家头上泼一盆冷水，不是，大家劲头更大了，总感到不甘心，有一口气，很不平静。经过斗争的考验，一批年青学生慢慢锻炼成了运动的中坚，这是最大的收获。这与“九一八”时很不一样。整个一二九运动过程中党的领导是正确的，虽然有时候可能看法上不完全一样，但没有出什么大的毛病。包括对双十二事变的认识，不少人思想不通，我们思想也不通，就是主张杀蒋介石，党组织一传达，就是要放他，实在不高兴，闷头睡了一天。最

后还是想通了，又去说服别人。

1937年初，选学生会时，我们对每个系，每个班都做了分析，那些人做那些人的工作，一个一个地都做了安排，一定要争取他这一票，最后取得了绝对多数。接着是迎接抗战，我们也做了许多工作。北大的杨雨民多次对我讲过，（他是学日文的，当时是四年级学生了。）根据东北游击战的经验，咱们现在就得演习。那时民先、学联就动员大家到野外做打游击的练习。一个师大附中的学生，叫袁汝镛，河南人，当教官。至于说“新五四事件”，看来那一架非打不行，他们已经做了准备。虽然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可是社会是同情咱们的。“七七”以后咱们还搞过签名支持二十九军抗战的活动。学联和民先党组织还布置大家到前线：到山西前线去了一部分人，搞牺盟也去了一部分人。后来一部分去了大后方，一部分人参加了附近的游击队，杨雨民到冀中。我简单地说一说经过，意思是说一二九运动取得了成功，整个过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办法也是好的，例如训练干部，那时不是上级发个命令就算了，而是开训练班，打通你的思想。开始提出民族统一战线时在清华开了一天会，听听讲，很开脑筋，咱们回来以后再开别人的脑筋。（谢云晖：那时比较民主，因为大家都是学生，没有什么权力，谁也不属谁，讲点道理，不象后来首长一出面就鸦雀无声了，党

员顶起来,可以争吵。)这个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陆平：“一二九”前夕，北大党组织究竟有什么活动，刚才说这方面缺材料，我也提供不出什么来。当时我是党员，是失掉了关系的党员，我在河北省互救会工作一段，后来上面的人跑了，就失掉关系了。当时北大是不是有党支部，是不是有组织关系的党员，这件事我说不清楚。黄敬是，但他不在北大工作，这里有几个可以再查询一下，黄敬死了，阎顾行死了，李俊明死了，杨树义还在不在，刘导生是个线索。据我听说，那时北平的地下党有关系的大概只有十四人，北大有没有，不清楚，提供点线索吧。因为写这一段历史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应有什么就是什么。

一二九运动确实是由东北大学、清华、燕京首先高举义旗干起来的，北大是仓促上阵。我记得当时刘居英跑到东斋，拿出两个床单撕开写上北京大学，用两个竹杆一挑就出去了。关于“三三一”，我同意老韩、黄华和老谢等同志的意见。当时宋哲元正在北平搞镇压，一个营包围清华，城里也抓，郭清死在狱中，群众非常义愤。当时起来反击一下子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无可非议，不能上纲上线，说是什么路线错误。这十年乱上纲，咱们的教训大了，现在还这么说，我看不够妥当。首先肯定当时群众要反击，这是正义

的，应当支持，是合理的。至于不策略呀，组织得粗糙一些呀，考虑不周呀，顶多是策略上工作上的一些缺点，说是路线，我看帽子就太大了。

“三三一”以后，少奇同志到天津，指导北平学生运动的方针是正确的，如提出来反对关门主义，自我教育等。从历史上看，北平的地下党不是立三路线的残余，而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什么飞行集会、散传单，我们都干过的。就那么几十个党团员，非要干一家伙不可，结果弄得鸡飞狗跳，走死逃亡；过几个月，又组织这么一摊，又这么干，屡次这样，周而复始。后来提出积蓄力量，这个方针是对的。本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问题写得很清楚了，但在十年浩劫中都推翻了，把一二九运动弄得好象是投降主义似的。“三三一”以后不是要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吗？我记得在北大干了几件事：学生中有一个“国共”谈判，他们六人，我们六人，有我一个，朱穆之一个，还有谁呀，谈新旧学联怎样统一起来，谈无限期罢课问题；要反对胡适的“读书救国论”，但不能老罢课，不叫学生念书，提出书要念是对的。另外又提出用各种形式组织群众，团结群众。有几个大小姐大少爷都参加了话剧队的演出。在长安戏院公演的一个欧洲的剧本，叫《干吗》，还很叫座。歌咏队、读书会、露营、旅行，都搞起来了，团结了許多人，后来叫“生活路线”。记得我们干纠察队时，闹

罢课，人家到理学院做实验，硬给揪出来了，那样搞得时间久了是不行的，脱离群众，后来就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把“三三一”以后这些正确的做法，说成是投降主义的，把“一二九”运动抹得灰溜溜的。“一二九”三十周年时南翔同志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做得很好，那个报告我一直留着，后来抄家时没了。那次会也是一大罪状呀，叫反革命活动。把“三三一”以后，按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纠正我们过去的一些缺点搞成是刘少奇同志的投降主义路线，从那以后，一二九运动就不提了。我们写“一二九”，须要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一二九运动除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对全国实现统一战线以及“七七”抗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外，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实为迎接抗战给我们党准备了一大批干部。我没到过江南，抗战时期一直在华北，在晋察冀。晋察冀情况我清楚，敌后所以能建成根据地，当然首先是路线正确，另外就是枪杆子，那时是聂老总、老一团，但只有枪杆子就能建成根据地？我看也不成。还有就是从平津出来的这一大批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建设根据地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进城时我很留心观察，那时各省市的常委很大一批是这时期发展的党员。十年浩劫把少奇同志一打倒，把对白区党组织的正确评价也推翻了，好象这些人都是藏污纳秽，走资派的走资派，叛徒的叛徒，招降纳

叛的招降纳叛，白区党组织没几个是好人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到今天没完全解决，不是说从认识上没解决，而是组织上没落实。对白区党组织究竟该怎么历史评价？没有白区党组织，中国革命能胜利？没有白区党组织，中国革命能建立根据地？我就不信。因此，我觉得我们写一二九运动，要记述它给党准备了一大批干部；记述它为迎接抗战、建立根据地所起的作用。我还觉得对白区党组织如何给一个历史的公正评价，这个工作还要继续做。

**朱穆之：**我提供一些素材。那时我不是党员，还带小孩子气，跟在后面嚷嚷就是了。我是1933年进北大的。一进北大，就有斗争，学生会分两派。还建立了许多组织，什么世界语学会呀，文艺团体呀，还有一个“一九三六研究会”，1934年成立，都是进步学生组织的。那一阵很热闹，相当活跃。1934年秋，宪兵三团到北平，大逮捕，白色恐怖笼罩下，什么活动都不行了，非常沉闷，一直到“一二九”前夕。

北大学生会是“一二九”第二天成立的。但在这之前，各班就开始选学生代表，活动起来了。“一二九”那天校园里打钟，东大的同学在外面叫，大家才出去的，是临时组织的。是谁在王府井被打伤了，回来在红楼后边的广场上还介绍了一番。第二天上午成立学生会

时也有争论。天石先上台主持会，后来不知怎么又把我弄上台了，后半截勉强算成立了。记得当时学生会有三个人，天石，我和徐綦燊。学生会一成立就宣布罢课。后来，胡适在一院的一个教室召集学生训话。胡适说，“你们成天这么闹，有什么用？华北的事情，我们几个大学，有我胡适，有蒋校长，有梅贻琦，还有师大的李蒸，我们几个人坚持，天塌下来有我们顶着，你们这么闹……”。大家没有听他的一套。以后又在三院开大会，讨论总罢课问题，胡适在会上舞着一条围在脖子上的长围巾，讲了半截就被轰下来了。后来表决赞成还是不赞成无限期罢课，结果一边倒：罢课。弄得胡适没有办法。宣布罢课后，成立了纠察队，规定文学院的纠察队到理学院站岗，理学院的纠察队到文学院站岗。那天一早，我就到理学院看了一下，正好蒋梦麟来了。他看到学生会贴的罢课布告后，大嚷：“你们这是胡闹！你们这是胡闹！你站岗，我也站岗！”在场的还有文学院的几个人。我们说这怎么办呢？正好有个工友，我对他说：“你给蒋校长搬个椅子来，叫他坐下。”蒋梦麟气坏了，说我不和你们胡闹，撕下学生会的布告，气走了。当时，北大教授会规定，学生站岗，教授也站岗。胡适在文学院门口站岗，他一到就和学生争吵起来。他嚷：“你们这也叫爱国？这也叫爱国？”学生回答：“就是爱国！”“你们胡闹！”“你才胡闹！”胡适又说：



“对你们真是对牛弹琴！”“你才是牛！”“哄！哄！——”胡适气急败坏地走了。周炳琳接胡适的班又站在那里，记得不一会何佶(后改名吕莢)来了，周看了一个学生，以为是上课的，连忙说：“来来来，上课来，上课来。”何佶说：“我是来洗澡的。”周炳琳碰了一鼻子灰。为这次纠察罢课的事，有不少同学记了过，还挂了牌。这一时期，还发生了蒋介石要找学生训话的事情，学生拒绝。后来学校当局私自找了三个人。学生会发了一个通告，是我写的，拒绝“听训”。他们找的三个人是杨西昆、李守权、徐綦梁。这事也闹了一场。

“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我还记得比较清楚。那天我没参加，因为前一天，晚上在红楼后面的广场搞野营，没有灯，我撞到网球柱子上了，大家把我抬回宿舍，第二天我没有参加。那时的情绪很高涨，现在看，那是一次正义的行动，反逮捕、反镇压、反迫害、争取抗日救国自由，大方向是正确的，斗争是很英勇的。方法上可能不够策略，但决不能说是“左”倾路线错误。“三三一”以后的一段时间，我觉得也有一点过激。大概是5月间，又提出无限期罢课，同学不太同意。为什么呢？1936年毕业的同学马上要进行毕业考试，无限期罢课，就要影响他们毕业，这事脱离群众，但很快就改变了。北大没有罢课。

“一二九”学生运动之所以发生，的确有党的工作

和影响。北大那时不管有没有党支部，但党在北大是有活动的，北大左倾是比较明显的。1935年那一段沉闷压得厉害，所以北大不如清华搞得早，但搞起来后，北大左派力量占了绝对优势，每次开大会，国民党的几个学生都要捣乱，但都乱不了。一直到1936年下半年，选举学生自治会时，他们还是不能免于失败。

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搞起来，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一大批具有爱国心的人看国民党实在不象话，都要求抗日，这股力量是很强大的。当时，资产阶级也在分化，蒋梦麟、胡适想把学生运动控制在他们手里，但是对于抗日，他们也觉得不能反对。在警察、市民中对抗日都有反映。虽然运动是学生闹起来的，但不只是学生，而是通过学生总爆发。抗日统一战线自然地形成，人心所向。蒋梦麟他们一方面要限制，一方面也不能完全限制。

“一二九”以后不久，学生中也开始分化。比如，徐綦燊，是理学院的，开始时参加学生运动，还被选为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但后来他很快接受了“晋京聆训”，他说他没去，但他确是离开学生运动了。再如李彬，我和他住在三院一个宿舍，很熟悉。“一二九”开始时，他是交通部长，和我们一起抢水龙头，不久分化到新学联去了。1937年有一次碰到他，他说，“我们分道扬镳了，你们现在讲的这一套道理我认为都是对的，但我认

为共产党在十五年之内不能成功，我要光宗耀祖，不能走你们的路。”1937年时，我们那个班中，原来同情学生运动的同学，为了毕业后找出路，有些被收买了。这些也是学生运动中的一个侧面，绝大部分一直是在党的影响之下的。

**蒋南翔：**1933年我在清华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北大宋劭文同志当时曾到清华参加秘密的社联小组会议。1935年暑假中，我们得到一份“八一”宣言，直接了解党中央的精神，姚依林还拿到燕大去张贴。1936年1月，林枫同志到燕大，开了三天会，清华去了三个人，搞党员训练班，讲民主集中制，林枫同志当时是市委书记。2月，宋哲元派了一团军警包围清华园，抓人，以后我就离开学校了。应该说“八一”宣言对一二九运动是有一定影响的。

1937年，我在山西，在少奇同志领导下编北方局机关刊物《斗争》，记得少奇同志有次曾谈到，一二九运动是大革命失败后第一个成功的群众运动。1927年的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所有群众运动都被镇压下去了，当时的游行示威呀，飞行集会呀，都遭到镇压，没能再起来，而一二九运动没有被打下去，力量还壮大了。

1943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一些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志也受到审查。当时我在中央青委工作，也住

杨家岭，找到少奇同志，问他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说，怎么能把一二九运动看做“红旗政策”呢？他说，把一二九运动视为“红旗政策”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不是中央的意见，一二九运动当然是革命爱国运动。那年中央青委在延安举行“一二九”八周年纪念会，请少奇、恩来同志到会讲话，少奇同志明确地说，“一二九”是革命的来潮。在过去，革命来潮到来以后，很快就低落下去了，而“一二九”来潮后，接着就是抗战，这个高潮就没有再退下去，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估计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刚才陆平同志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肯定了这一点，这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 北大一二九运动三人谈<sup>①</sup>

曹振之、谢云晖、刘玉柱

曹：老谢，你是哪一年到北大的。

谢：我是1934年考入北大的。以前我在上海读高中。“一二·八”时闹学潮，我被捕，坐了几十天洋牢，出来后我不敢说，就说生了病。后来，我考上了北大。先前我为什么跑到上海去呢？1928年在成都读初中快毕业时，国民党的一个中学校长叫杨廷铨，非常坏，专门害学生。大家决定在毕业前教训他一顿。一天，在皇城坝遇到他，把他揍了一顿。有几个冒失鬼，还把

<sup>①</sup> 本文是曹振之、谢云晖、刘玉柱同志于1984年3月8日的一次谈话，由成都科技大学郭蜀生同志记录。

他丢到附近一个水塘里，不料那家伙呛了几口水竟淹死了。他死后，国民党军警宪联合办事处马上抓了数十个人，当天就都给枪毙了。我当时在的中学名叫成都联合中学，就是现在的石室中学（成都第四中学），那是很好的中学。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国民党侦缉队只要盯上你，不管你是不是党员、团员，抓住就杀。我同几个人商量，到哪里去呢？一个同学说，他哥哥在上海商船学校，我们就到上海去考学校。路费也没有，他哥哥写信来介绍了一些关系，从重庆坐日本轮船到上海，在上海读高中，和姚依林同年级。

刘：你们都是高材生，在一二九运动时，骨干一般都是用功的学生。

谢：不用功在同学中就没有威信。我们接受进步思想比较早，但当时入党是不可能的。那时立三，王明路线，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是历史陈迹了。

“一二九”当中我参加了南下宣传团，是第一团的，韩天石是团长，给我安的名义是“庶务”，大概是总务的意思。快回来时，在保定一个同仁中学开大会，讨论南下宣传团回北平后，如何把运动持续下来，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大家七嘴八舌提了好多名字，最后有一个人，好象叫曹国智提出叫“民族解放先锋队”。大家说这个名字好，采纳了这个名字，这就是“民先”最早的发起

了。参加大会的人都是当然的“民先”队员，回北平正式开成立大会。因此，我参加“民先”也算是最早的。

**刘：**现在查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大开“民先”成立大会。由党指定敖白枫（高锦明）任总队长。一二九运动是在党领导下发动的。当时北平地下团委组成北平市委的临委，书记是王学明。<sup>①</sup>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姚依林等，主张发动学生运动，得到河北省委特派员李长青同志的支持。他们和各校进步学生组织有联系，所以就把运动搞起来了。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八一宣言”、红军北上抗日和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号召影响下发动起来的，所以运动一开始就是沿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方向发展的。一二九运动后，1936年1、2月间，是林枫任市委书记。到2、3月间，林枫调到天津北方局，郭明秋也去了。李雪峰继任市委书记。4月初又换上李葆华为书记，一直到1936年底。以后是黄敬，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各届市委都对运动作了正确领导。

**谢：**黄敬好象是从青岛转到北大来的，一二九运动

---

<sup>①</sup> 谷景生、高惠如、郭明秋、姚依林、孙敬文五位同志所写《缅怀“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彭涛同志》一文（1986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记述的情况是：1935年4、5月间先成立中共北平市委，王学明同志任书记，彭涛同志任宣传部长。随后，在负责同志中间意见有了分歧（主要是在彭与王之间），为此，同年11月，中共河北省委特派李长青同志到平主持党的工作，撤销了北平工委，改组为临时工委，由彭涛、周小舟等同志组成了中共临时工委，文中未再提到王学明同志任书记的事。

前好象没接上组织关系。

刘：黄敬是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后才接上组织关系，当了北平市学联的党团书记。在一二九运动开始前是秘密学联，郭明秋是主席，姚依林是秘书长，孙敬文是总交通，彭涛任党团书记。“一二九”以后，学联就公开了，也扩大了。各大中学都成立了学生会，派代表参加了学联。学联的前身是民族武装自卫会发起组织的黄河水灾赈济会。

谢：黄河赈济会是合法的。

刘：在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组成北平市秘密学联，秘密学联领导了一二九运动。运动起来之后，学联公开，各大中学学生都照学联决定，实行罢课，成立学生会。北大是12月10日成立学生会的。由学生会派正式代表参加北平学联。关于北大在运动开始时的情况据刘导生同志回忆，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北大酝酿成立学生会，这时已有地下党支部，刘文卓(刘导生)是支部书记。他当时在等黄敬的通知，没有联系上。孙敬文同志说他通知了北大的两个学生，但是这两个人不太积极，没有作发动工作。所以得到消息比较晚。在12月9日上午，游行队伍经过沙滩一呼喊，北大同学才参加游行。

谢：北大只迟了几个小时，参加的人还是不少的。

曹：北大多数同学的思想基础是好的，只是事前发



动比较晚了一点。

**谢:**思想是动了的,组织上没有抓紧。当时北大党支部只有三个党员:刘导生、薄怀奇、肖敏颂三个人。

**曹:**就我来说,一二九运动之前,我没有入党,也未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只是爱国知识分子。我初中是在河北省正定七中上的。河北平山暴动失败,逮捕了一些人,其中有我们学校的,也有和我关系比较好的。我们一些同学到定州把他们营救出来。这时我开始接触一些进步思想。“九一八”那一年我初中毕业考高中,上了北平市一中,参加了学校的下乡宣传。当时我们学校学潮很厉害。北平市一中校长贺国光,是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他知道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会考名列前茅),在班上有威信,和我讲条件,叫我不要闹了,保证我毕业和考大学。我们高中同学中,韩代望、赵祥铸(赵鼎新)是参加了左联的。我和他们关系不错,考进北大,我和卢荻(陆平)住三院,后来搬到东斋。当时感到北大的政治空气很沉闷,反动政府镇压得很厉害,有一个中学生失踪几天,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刘:**运动爆发前,北平整个政治空气都很沉闷。我在师大附中上学的时候,也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我的级任老师叫卢伯伟,是陕西人。这个人对我很关心。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我的家庭经济来源断绝了,他就介绍我教家馆,来维持自己的学费与生活。这个人告

诉我说：“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我同情，但最好不要卷入党派漩涡。”可是，一二九运动一爆发，我还是接受了共产党领导。“九一八”后，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一度搞得轰轰烈烈，全国各地都一样，曾逼得蒋介石下野。当时形势很好。但当时党的领导是“左”的，没能使运动继续发展下去。

谢：老刘，大事记上怎么讲北大学生自治会是1936年成立的？“一二九”不是就有了学生会吗？

刘：北大学生会“一二九”第二天就成立了，“三三一”抬棺游行之后就被北大当局宣布停止活动。但实际上学生会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不过学校不承认就是了。其后，经同学普选自动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学校当局仍然不予承认。以后由我和葛佩琦出面和课业长樊际昌交涉，要求正式承认和恢复学生会，作了好多次谈判，最后他同意恢复学生会，但要按照国民党教育部规定的组织法，重新选举，要制定选举章程，名称要改为“学生自治会”，我们同意了。他们的思想让国民党分子控制学生会，所以他们订了一条，五个人选一个代表，以班为单位，自由结合，企图防止左派学生控制学生会。这个我们不怕。我们“民先”在那时已发展壮大，队员活动能力强。一个民先队员团结一、二个到三、四个同学是可以做到的。不论你怎么订章程，“民先”派同学有把握占代表大多数。代表大会选举主席、

副主席，另有一个执行委员会，设首席委员，然后是执行委员。选举结果，陈忠经被选为班代表大会主席，葛佩琦被选为副主席，我被选为首席委员，十七名同学当选为执行委员。大部分是左派同学，我们完全胜利了。这是1936年11月的事。大事记讲的是这届学生会。双十二西安事变后，北大当局又宣布停止学生会活动。1937年初又改选学生会，陈忠经当选学生会代表大会主席，朱仲龙（朱穆之）为副主席，我们又一次胜利了。这个时候，咱们为了贯彻中央统一战线的政策，还自动在执行委员中让出三席，给国民党派的学生。但国民党派的重要分子李彬仍没能替补上，于是在班代表大会上又把他选为新北大建设委员会委员兼任该会主席。

谢：1936年下半年，我派到学联去了，是出席学联的代表，是学联的常委。当时学联常委，我记得是五个人，经常在一起开会，黄诚是主席，王文彬、我、还有张亮、杨蕴青。学联不是以人为常委，是以学校为代表，北大是固定常委，分管组织，所以我代表北大任学联常委，分管组织。中大的管总务（主席），代表经常在换。陆平搞了一段，后来不知怎么没有去了。

刘：陆平班上的国民党分子把他的代表罢免了。当时选举学生会，是党领导，民先保证。虽然我们布置的是要选几名国民党派的学生，但他们的候选人得票

少。如上面说的 1937 年初的选举，他们的候选人包括李彬在内，只被选为候补委员，我们的人自动辞职，他们才有三人递补上去。

谢：我记得是“一二九”以后，老韩（天石），李彬，我们经常在一起办公。

刘：“一二一六”出南长街口时，有好几个北大同学英勇地上去抢过水龙反击，李彬也是一个。开始，同学中党派界限还不怎么明显，李彬在同学中的印象还好。

曹：我记得“一二一六”那天我们是在后边，先冲上去几个人就把水龙头夺过来了。

谢：“一二九”那天下午，在景山东街即现在中宣部门口那里有一伙人在喊。我开始以为又是汉奸在搞“自治”游行，再看了看不象，我放下书包就去参加了。

刘：现在听说紧急打钟召集同学的是历史系的王德昭。这个人已病故在香港大学。

谢：这个人我认识，他经常在图书馆搞什么资料，写文章。

曹：王德昭和我们是一个班，他学习比较好。“一二九”那天我们出来从中法大学那边过去的，到了东华门，赶上队伍。

谢：据我回忆，大致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北大参加的人不算少，只是事先没有接到通知。

刘：后来游行队伍被打散了，学联一批骨干转到北

大三院开了个会，决定第二天开始总罢课。12月10日北平市大中学全部罢课。

谢：“一二九”前，北大有一个不利条件，在城内，受到军警侦探的注意。清华、燕京都在城外。但运动进展起来以后，北大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刘：北大沙滩这个地方，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各地没有考上大学的旁听生，各地流亡学生以及政治上找关系的人都住在沙滩。“一二一六”有许多人参加游行，就是在沙滩住的。

曹：“一二九”那天我没有回到三院去，因为我把鞋子跑丢了，我跑到市场上去买了一双鞋子，就回东斋去了。“一二一六”头一天，在陆平房子里，清华大学的人来过，酝酿“一二一六”的学生游行。北大出面与来人接洽的一个是刘文卓，一个刘志诚。另外，咱们同学中有个叫陈大觉的，思想比较“左”，你记得吗？

刘：这个人和我一起办过《北大周刊》，学生会的刊物。

曹：“一二九”以后的南下扩大宣传团，我没有参加。

谢：我参加了，我和韩天石一块，其他的人还有袁宝华、刘志诚等。

刘：这次南下扩大宣传，代表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新方向，与工农相结合，特别是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

合。

谢：那时有几种议论，不是正式的。开始叫“南下示威团”，要到南京示威，后来觉得不好，改称南下扩大宣传团，就是到农村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

曹：当年的五四运动，是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还没有提出与农民结合。

刘：现在查明，南下扩大宣传也是市委发动的，有党团。党团书记是彭涛，但他只到了固安，市委就把他叫回去了。敖白枫（高锦明）继任党团书记。

谢：韩天石是指挥部里的一个成员。

刘：韩天石当时还不是党团成员，因为那时韩天石还没有入党，敖白枫是党员。

谢：当时有四个团，以北大为中心是第一团。到保定时，我们是整队入城的。在那里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一个骨干组织，名字叫“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没有“中华”两个字。

刘：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又简称“M. G. S”即“民族”、“解放”、“先锋”的第一个字母的缩写，“中华”二字可能是后来加的。

谢：~~“三三一”抬棺游行~~我被捕了，关进了陆军监狱。当时黄华也被抓进去了，但是他出来得较早。一共抓了五十四人，包括大中学生。

刘：当时的背景情况是：“一二九”以后，全国抗日

救国运动高潮起来了。国民党政府先是想控制运动，后来控制不了转而采取镇压政策。宋哲元当时也跟着采取镇压手段。在2、3月份逮捕了北平大中学校进步同学二百多人。

进步学生为了反镇压，打破了当时的沉闷局面，就借追悼郭清死难，举行了“三三一”集会与抬棺游行。

谢：“三三一”追悼郭清与抬棺游行不是党组织强迫群众搞的，而是一个群众性的反迫害、反镇压的英勇行为。不能用现在的水平来看待当时的运动，要历史地看问题。

刘：“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应肯定是正义、英勇的行动，是争取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自由的一次壮举。北平学联付出的代价（北大最大）也很快得到了补偿。被逮捕和被开除的同学经受住了考验和锻炼，都是好样的。

谢：我的看法，“三三一”又是一个高潮。运动就是这样一个高潮一个高潮延续下来的，如果没有“三三一”，“一二·一六”以后就可能沉寂下去。一二九运动持续十八个月，就因为不断的运动推动。

刘：中央的政策，也是逐步发展变化的。从遵义会议到会师延安这段，是反蒋抗日；1936年5月以后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改为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才是联蒋抗日。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

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口号也是从“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打倒宋哲元”转到“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保卫华北”的。这要归功于刘少奇同志。他于1936年春天由陕北到达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纠左精神，对宋哲元、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作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认为他们在全国抗日高潮推动下是有可能转到抗日方面来的，要对他们搞统一战线，要作争取工作。北平的各级党组织、民先队和学联、学生会，也都从前一段运动实践中认识到宋哲元不同于殷汝耕，也不同于蒋介石，就很顺当地接受了少奇同志的正确引导。平津的一二九运动，从1936年4、5月起，就由抗日反宋阶段转到了争取与二十九军合作抗日的新阶段，走上了更加健康和顺利发展的道路。我认为不应否定几次大的斗争中任何一次。如几次大游行，总罢课，南下宣传，拒绝“聆训”等都是正确的。

谢：进京“聆训”，我们如果顺从地派了代表，其结果造成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身上。群众如果相信了这一点，我们的力量就散了。喂，老曹，你记得北大民先队队长，前后有几任？

曹：北大民先队，头一任队长是杨雨民，接着可能是宋尔纯（宋应），后来是莫家鼎。

刘：谢邦治搞过北大民先队分队长工作，还听说孙



传文也当过一段分队长，不知是不是？

谢：这，记不得了，因为我主要在学联工作。陆平讲，学联的组织工作，和民先有些重合。我说分工不同，学联发号召，民先是骨干。从一开始到“七七”后撤出北平，都是这样。

刘：从北平撤出来，我们几人在天津上船，票买到上海，途中发生“八一三”抗战，我们在青岛登陆，坐火车到了南京，成立平津同学会。

谢：后来学联的负责同志大部分到了南京，民先的一部分到了太原。

刘：当时以蒋南翔等为代表，主张大部分平津同学南下，开展国统区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文化大革命中，认为南下是右倾，北上才是革命的。其实北上南下都需要。据说当时平津沦陷以后，北方局有个决定，要平津进步学生撤出来，到华北参加八路军。决定上没有写南下。现在有些同志以当时这个决定为根据，认为我们对北上方针贯彻不力，大多数学生南下了，与北方局的决定不一致，这不够实事求是。

谢：其实当时就是有些同学想留在华北，也因为没有组织关系，没有人给安排。不能只根据文件论事，那是本本主义。我们到南京的安排，是由长江局定的，周总理在那里。

曹：我离开北平比较晚，日本人都进城了。

谢：我是日本人进城后第三天走的，二十九军都走了，我们都搬到老百姓家里去了。

曹：我们是化妆撤出去的。

谢：我们也是化妆走的，时间大致是平津刚通车后，坐的英国船。船开出天津走了一段忽然又往回开，船长想把我们交给日本人。我们就把船长、大副、二副押起来，说你们把我们开回去，我们就和你们同归于尽，把你们丢进海里。这才迫使他们又开出来了。

曹：我们离开天津时已经没有大船了，坐的走私船，到了济南。在济南住了一段，我们就到太原去了。我离开济南时，荣高棠还没有走。

刘：今年春节北大老同学聚会，陆平等同志谈到当时北大民先占优势，国民党学生闹不成任何事，没有形成公开对立的两派组织，他们成立不了第二学生会。这与兄弟学校比较是一个特点。

曹：北大国民党派学生人数不多，大概不到一百人。

刘：我们北大没有发生两派学生武斗。我们方面的同学，作风朴实平易，赢得多数人同情，连北大的工友也站在我们这边。红楼里有个地下室，搞印刷，在极困难的时候，我们北大学生会的刊物都照出，排字工人都是同情支持我们的。我们对蒋梦麟、胡适这些人应有个客观合理的评价。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也是反对的，这点和我们有共同的立场。分歧的地方在于我们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他们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政策。

谢：他们是想把学生运动纳入国民党的轨道中去，反对我们罢课。

曹：“六一三”我们游行时，从东斋出来的同学，被警察局抓了一批人，到下午就保出来了，是学校当局保的。

刘：“一二九”前，当“华北特殊化”叫嚷时，北平几个校长有个声明，反对日本在华北搞特殊化，这个声明是蒋梦麟领衔发表的。

谢：胡适曾经讲过，在什么场合我记不清了，叫我们不要盲动，他说北平的问题，蒋先生（指蒋介石）委托梅贻琦、蒋梦麟、胡适三人处理。就是要我们听他的话，不要随便动。这个事情后来又请问了他一次。那是我们后来到南京，蒋梦麟、胡适也到了南京，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胡、蒋当时住在南京 AB 大楼附近。胡适对我说：你们跑得快，你们不是要保卫马德里吗？我说：你那时告诉我们不要盲动，不要闹事，要听你们的话，北平的事蒋先生委托你、梅校长、蒋校长全权负责，那么现在你们的责任负得怎么样了，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他沉默不语。

曹：有一年纪念五四运动我们好象请胡适讲过话，

是不是1937年？

谢：不是！1937年在师范大学纪念“五四”，演成“新五四事件”，这次没有胡适。

刘：对这次“新五四”事件，现在有不同的看法，包括我们方面当时参加这次会的人，有的认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争这个领导？

谢：这个观点我知道，就是说新学联开会你们去干什么？就是去争领导。其实，是“新”旧学联代表事先协议共同召开的。

刘：有人还说我们去参加会议的人身上也带了石头，鸡蛋等作武器。

谢：这纯是无稽之谈，我们号召同学抱着联合愿望参加的。我们的人没有准备打架。更不会带武器，就是他们先动了手，我们也没有打。其实我们的人比他们多得多，不过，他们有准备，我们没有准备。所以受伤的都是我们的人。我在台上，纠察队里刘麻子（刘烈人，也是学联执委）他保护我，是民国大学的，老家四川人，我们在上海就熟悉，他首先保护了我。

曹：他们调集的一批学生，埋伏四周教室里，拿的是童子军的军棍。

谢：那天大会主席台上有陶希圣、杨立奎等人。

刘：陶希圣这个人，在运动刚爆发时，《北大学生》周刊，还向他征过文。这时陶希圣的真面目还没有暴

露。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在民族大纛下”，就是在民族主义大旗下，好象他还同情学生的救亡运动。到后来反动真面目越来越暴露，攻击学联最凶。杨立奎公开骂学联是共产国际操纵的。我记得，杨秀峰在《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名批判了陶希圣。

谢：我对陶希圣的认识要早一点。在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有一场“中国社会史论战”。其中有他的文章。他打着研究社会史的幌子，实际是站在反对历史唯物主义那一方面的。

刘：你修改你在中央党校谈话记录稿时，要把“新五四”事件这一段内幕写清楚。

谢：有的同志对前因后果不是全知道。不是我们硬要去参加人家的会。是事先和他们协商好的。我是代表学联去的，他们先讲话，我们一讲话他们就把喇叭抢去了。我们提抗议，他们马上一大伙人就打上来了。我们是去搞联合，反而挨了打。不能说他们闹摩擦就是我们“左”了。

曹：喂，我想起另一件事。咱们北大还有一个《中国人》刊物，记得是薄怀奇他们搞的。是“北大文化救国会”的刊物吧？

刘：不清楚是不是。只知以前有些秘密社团，如新文字学会、世界语学会（“中国人”社大概也是）在“一二九”后都公开了，并慢慢都纳入“学联”和“民先”，统一

起来了。为了抗日,时代要求联合、集中。一方面是进步力量的联合,这很容易做到,如上述各个小社团的统一就是;一方面是进步力量争取与各种力量的联合,如争取二十九军,争取宋哲元等就是。1936年的“五四纪念”,争取师生联合,“六一三”游行中,“拥护宋哲元抗日”,都是很成功的。这时,我们大家已经初步学会了贯彻统一战线的精神。

曹:为了联合国民党的学生,学生会在四斋的楼上还开过一次会。

刘:陆平也讲过这件事,他笑称是一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会。

谢:我记得还有一次咱们内部会,是为了争取新旧学联合的问题。清华有一个新学联的人,叫穆华璜(音),是我在成都联合中学(四中)的一个同学,是清华国民党派的头头。那个会上决定叫我去和他谈判,做他的工作。我找他去谈了,结果是我讲我的观点,他讲他的观点,不了了之。

刘:“一二一二”(12月12日),那次集会游行也比较成功,和二十九军搞成了统一战线。当时我们不知道已爆发西安事变。游行的口号是支持绥远抗战,要求释放七君子等。那天清华的杨述几人穿上西装,租了一辆车,到处撒传单。宋哲元当时已知道西安事变,到西山去开二十九军秘密会议,路上碰到游行队伍。

学生拦住了他的汽车给了他传单，口号中有“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他很高兴。要求他接见。宋答应。后来学联通知，学生队伍在北大操场集合，进入景山，汇集成一个很强大的游行队伍。等了很长时间，市长秦德纯来了，是吴承明主持的会。

谢：我参加了那次的会，吴承明拿着喇叭讲话，很能讲，我就是在那次会上认识吴承明的。

刘：吴承明现在在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他在清华被开除后转到北大，参加学联领导工作。在这次景山大会上，秦德纯代表宋哲元接受了北平学联提出的十几条要求。要求学生整队回校，二十九军保护。实际上搞了一次合法的游行。学生沿途喊口号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二十九军士兵就给游行队伍打立正。从那以后，学联和进步学生同二十九军的关系就大大改善了，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谢：1937年夏军事集训，和何基沣搞得比较好。淮海战役，何基沣首先起义，就是电影《佩剑将军》里的那位将军。

刘：学联后来不是有个“生活路线”吗？比如西山旅行、露营，参加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和二十九军搞各种联欢活动。这样和二十九军的关系搞得比较好了。通过文娱、体育和军事训练的活动，也团结了许多中间和落后的同学，并且也不轻易罢课了，这些都比较得人

心。

谢：让我们再谈谈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情况吧。记得最初听说抓到蒋介石，大家都很高兴，后来大家冷静下来。

曹：开始大家都跑去吃馆子，后来理智占了上风。

刘：开始大家都希望杀掉他。过几天，中央的精神传下来，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大家都转到主张和平解决，团结抗战方面来了。不过，当时何应钦要讨伐张杨，大家感到有内战的危险。这时，学生会、民先都开会议论过这问题。学生代表大会开会时，有两派意见，国民党分子方面主张讨伐张、杨。我们这方面，主张和平解决。我们的意见是赞成张杨兵谏，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在此前提下建议张杨放蒋。学生代表大会上好象通过了这个意见。通过之后，国民党分子不赞成，纷纷退席，大概有七、八个人。以后又为这个事情，召开了一次全体同学的大会，大会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曹：后来放了蒋介石，国民党分子搞了一次游行，还放了鞭炮。

谢：大致在 23 日或 24 日，他们召开了一次大会，放鞭炮庆祝。

刘：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国民党分子一度猖狂，有些学校停止了民先掌握的学生会的活动，当时北大当



局再次停止了学生会的活动，前面讲过了。不过，不久再次改选学生会，群众还是拥护我们。这说明我们的主张，是绝大多数同学赞成的。

刘：接下来就是七七事变，慰劳二十九军抗日。

谢：卢沟桥我去了的，我代表学联去的，只见了吉星文（团长），没有进城，鬼子的骑兵来了，我们躲到高梁地里面，以后就返回来了。

曹：七七事变以后，在西山还搞了一个游击队，赵什么搞的。北平很多同学参加了。

刘：领导人叫赵侗，当时很有名，他母亲曾被称为“游击队之母”，也是出了名的。后来的情况不晓得了。再有一件事，看出我们同学的工作热情是多么高涨。7月28日，宋哲元部从北平撤出后，我们北大同学还和附近的医院一块组织了一个伤兵医院，设在北大三院，救护二十九军伤兵，一直坚持到最后，这个事情葛佩琦比较清楚。此外，还有个情况，你们二位回忆一下，当时我们学校的党员发展到多少人？

曹：有七、八十人左右。

刘：民先有多少人？

曹：民先更多了，记不清有多少。

刘：我记得北大民先队员好象有二、三百人，共同的说法在二百以上。

曹：有一部分是沙滩的。

谢：参加“一二九”的骨干，基本上都参加了民先，而且大部分坚持下来了。

刘：有的不是民先，也是和民先关系很好的。少奇同志说：“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中国反动势力逐渐后退，而新的革命运动则开始逐渐高涨。”毛主席说：“‘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当时我们北大很多进步同学就是因为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才走上革命道路。其他大中学校进步同学也大都有这类情况。

（本文作者曹振之，原名曹盼之，1934年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谢云晖，1934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刘玉柱，1934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 回忆一二九运动

孙 陶 林

---

### “一二九”

一二九运动，是由北平地下党通过学联发动的。“一二九”前，北平地下学联的主席是女一中的学生会主席“小郭”，实际上是清华大学的姚依林幕后指挥。北平地下学联的主要会员，有女一中、清华、燕京、东北大学、朝阳等十多个大中学校。当时的左倾群众团体如新文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会、新文艺工作者协会、左联、社联，也和地下学联有联系，成了实际上的地下学联的成员。北大当时由黄敬等人以世界语学会的名义

参加地下学联，刘导生和姚依林有联系。

因为据传冀察政委会于12月9日成立，刘导生估计全市学生这天有行动。他在“一二九”的前一天晚上告诉我和王经川（魏伯）、孔令晟、杜庸、何佶等几个人：你们明日早晨六点钟到北平图书馆门前等着参加请愿。我们按时到北平图书馆门前等到九点多钟，还不见请愿队伍的影子，就回校上课了。到下午3点多钟，我在教室里听到景山东街那里有喊口号的声音，知道是游行队伍来了，立即找刘导生等几个同学，一面去敲钟，一面到各个教室大声吆唤同学们出来参加游行。等到游行队伍来到沙滩一院门前，队伍末尾已经有二院的一部分同学，一院的同学就跟在后面。到达北河沿，又有三院出来的一部分同学参加。北大同学参加“一二九”游行的，大约一共有四百人左右。游行队伍，本想越过东长安街，冲到东交民巷日本领事馆去的。但到达王府井南口时，就被军警拦阻打散了。我们一部分同学被赶到帅府胡同。在一拐角的地方，黄敬同志集合了二、三十个同学，有北大的，也有外校的。他就抓住机会，发表演讲，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警察赶来，同学们就分散从小胡同走开。五点多钟，我们才回到学校。

“一二九”游行示威的行动，把同学们被压抑着的抗日救亡的激情，一下子焕发出来了。当天晚上，各系

各年级，已经选出的班代表，加紧筹备成立学生会。我被选为经济系的代表。第二天，召开全校学生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北大学生会，并选出代表，参加北平学联。接着就宣布罢课，投入紧张的救亡工作。

### “一二一六”

“一二九”以后，北平各大中学校，没有学生会的纷纷成立了学生会，并参加了学联。学联的成员由十几个一下子增加到几十个，“地下”学联，也就不再是“地下”，而是公开活动了。“一二九”示威游行，初步震动了民众，但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目的并未达到。听说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16日正式成立，北平学联遂决定16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北大学生会接到学联的通知时，正在二院一个阶梯教室里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参加“一二一六”游行示威问题。“一二九”的行动，国民党当局开始还是支持的，因为它也需要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侵略压迫有点表示，以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当时一些国民党员及其影响下的群众，也参加了游行。蒋介石的代理人胡适之在“一二九”前，在课堂上曾鼓动学生对时局有所表示。蒋梦麟在“一二九”当天下午，还用自己的小汽车，

将受伤同学送去医院。“一二九”的行动已经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再搞一次更大的行动，他们认为“有碍邦交”，就要反对了。所以在代表大会讨论应不应该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要不要参加这次游行示威时，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国民党的小喽罗们坚决反对。我们则坚决拥护。经过两、三小时辩论。最后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参加学联发动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行动的决议。

“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是很严密的。北大的队伍早晨6点在西斋集合起来，准备经过沙滩去汇合东城各校。刚出发到东斋门口，就被阻住，并有两名警察在东斋门口在救火龙头上接上水龙带，准备用水龙喷射我们。谢云晖是纠察队员，他机警地转到警察后面，夺过水龙头对准警察射过去，警察吓跑了。游行队伍安然通过前进。游行队伍在东城汇合了中法、大同、汇文、贝满、朝阳等十几个学校的同学，都没碰上多少阻碍。到了南长街，又汇合了女一中，这时至少有七、八千人。南长街南口有个警察阁子，本来就有三、四十个警察，又临时调来几个侦缉队和消防队，堵截游行队伍，不让到长安街去。游行队伍就把一百多辆自行车交通队组织起来，冒着警察的木棍、皮鞭、大刀、水龙，一下就把警察的阵线冲垮，游行队伍就跟着冲过去。游行队伍过去不到一半，又给警察拦腰截断。军

警们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消防队的水龙。这时，有一位已经冲过去的同学就找到一块石头，在消防队的后面把水龙带砸破，水龙带失去了作用。一个消防队员看到水龙带被砸破，就到救火车上拿了一把大斧子跑过来，扬起斧子想往砸水龙带的同学的头上砍。可他后面，早过来一位同学。当消防队员把斧子扬起来时，这位同学就从后面用双手把斧子夺过来，照着消防队员砍去。消防队员吓跑了。就在这个空隙时刻，被堵截在南长街的游行队伍，便乘机全部冲到长安街。当时同学们对消防队恨得要命，冲过去就把停在长安街上的一辆消防车砸了个稀巴烂。

游行队伍冲到长安街，就向西前进。守卫在中南海的二十九军，看到游行队伍向中南海方向前进，就挥舞着大刀冲过来。游行队伍被他们冲散以后，只好分别从前门、和平门出城到天桥参加群众大会。那天在天桥集合参加大会的，号称十万人，实际上至少也有四万人。天桥大会结束后，本来打算从前门进城游行的。但队伍到达前门时，城门早已关上，城楼上还架起了机关枪。游行队伍坚持斗争两个多小时。交涉结果，当局叫从和平门进城。可到了和平门，又叫从宣武门进城。而到了宣武门，还是不让进城。游行队伍只好在大街上唱歌，喊口号，进行宣传活动，这时天已经黑了。战斗了一天，没吃没喝。附近的小学生及市民就捐钱

买烧饼，送给同学们吃，还送开水给同学们喝。反动军警想驱散学生，就用皮鞭、木棍殴打学生。同学们也用木棍、石子还击。一时，呈现出混战局面。有些同学为了躲避挨打，把店铺的门都给挤坏了。同学们有的哭、有的叫、有的唱着歌、有的喊口号，声震寰宇，十分悲壮和凄惨。一直延续到八、九点钟，斗争逐渐平息，同学们才分散从小胡同绕道返校回家，一场混战遂宣告结束。游行示威从早到晚坚持了十五、六个小时，战斗一整天，这在世界群众斗争的历史上是少见的。

### 南下扩大宣传和校内罢课斗争

“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唤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学生运动不能再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了，必须和工农相结合，发展为工农兵学商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并长期坚持下去，直到全民族的武装抗战。为此，学联发动并成立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扬言徒步到南京请愿，实际是深入河北农村，扩大宣传，发动农民，奋起救亡。当时还要坚持罢课，巩固后方，以避免复课而将宣传团孤立起来。为了解除宣传团的后顾之忧，加强前后方的联系和互通情况，并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持前方，鼓舞宣传团的斗志，北大学生会



当时决定在学生会负责人中，留下一部分专做后方工作。我和刘导生同志等就被留下，没有参加宣传团。

我们留守的任务，第一，就是坚持罢课。以蒋梦麟、胡适为代表的学校当局认为：“一二九”已经够了，“一二一六”就惹祸了，继续罢课，就更不应该了，所以他们坚决反对继续罢课。但如果复课，就是对宣传团的打击。坚持罢课，就成了我们后方工作的头等任务。第二，三、四百人在农村要吃饭，宣传活动要材料，我们要在物质供应上保证支持前方，同时也可借募捐向各方面作宣传，扩大影响。第三，是沟通情况。即把宣传团在农村的活动及时报告给在校的同学、教师和社会各界。也把北平学生运动情况传达给宣传团，以鼓舞士气。宣传团南下后，北大学生会决定继续罢课，一、二院门口都派有纠察队严格监督执行。蒋梦麟听到这个情况，气急败坏。一大早，就坐上小汽车，开到二院门口，怒气冲冲地下来，大嚷大叫：“北京大学是我蒋梦麟的，我蒋梦麟的北京大学，谁敢破坏。”我们二十几个纠察队员站在大门两边，谁也没有理他。他冲进校门，看没人搭腔，又转回来从门里跑到门外，来回冲了两趟，还是没人理他，就好象泄了气的皮球，坐上汽车跑了。二院是校部所在地，所以蒋梦麟亲自出马。一院是文、法学院，蒋梦麟自己没来，派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和文学学院院长胡适去了。胡适在一院大门口和站岗

的同学演了一场对骂的丑剧（“胡适是牛”），已由别的同学写过了，不再重述。

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以后，2月1日在师大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布“民族解放先锋队”正式成立。共青团员、武装自卫会会员、新文学研究会会员、世界语学会会员、左联、社联成员，都参加了“民先”。“民先”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进步青年组织，成立时只有三、四百人，以学校为单位成立分队，按地区划为四个区队，即东、西、南城及城外四个区队。成立大会，我没有参加。北大分队开始有几十个队员。民先队成立后，北平学联有了骨干组织。

### “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

3月9日，为抗日救国的十七中学学生郭清，惨死狱中。为了追悼郭清，藉以鼓动群众斗争情绪，北平学联决定3月31日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郭清烈士大会。会前，编印了郭清烈士的事迹及被迫害的经过，由我负责印刷的。几个同学还在骡马市大街买了一口棺材，于“三三一”的前一天晚上运进会场。那天，参加追悼会的约千人，都是学生骨干。本来计划只开追悼会的，不料会议快结束时，三院前门早已被军警封

锁，出不去。于是学联党团决定抬棺游行，对冀察当局表示强烈抗议。恰巧北大三院和孔德学校中间的隔墙有一小门，长年关闭。于是，就派少数同学到三院大门里边，虚张声势，装做要出去的样子，迷惑和吸引在门外的军警，同时在礼堂旁边找到一段伐倒的大树，几十个人抬起来，把隔墙几下就冲开了。游行队伍从孔德学校的大门出去了。四个人(其中有刘居英)抬着棺材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刚转到北池子大街，就来了大批军警。一阵冲打之下，游行队伍被打散了，棺材丢在大街上，一部分同学当场被捕。这次被捕的一共有五十多人，其中有北大女同学何兆仪和张毓珣。有不少同学当场被打伤，有的被抓到拘留所挨打。许多人身上血浸衣襟，北平学联后来还组织一次血衣展览。被捕同学经多方营救，到5月底被先后保释出来。

“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是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中的一次壮举，是反逮捕、反镇压、反迫害、争取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自由的英勇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

### “六一三”

“三三一”抬棺游行受挫以后，北平学生运动骨干经过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总结经验教训，

并经过组织整顿，民先组织发展到一千多人。4月初，我先被调到北大民先分队部工作，5月又被调到总队部工作。为声援天津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学联和民先总队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6月13日举行游行示威。

接受过去的教训，“六一三”的行动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针，不和警察当局正面冲突，和他们打游击战。布署也是周密的，全城分成四个区，每区都以一个大学为核心。北大是东城的核心。各区先分散行动，最后集中在北大大操场开大会。游行示威指挥部设在鼓楼东大街一个同学的公馆里，下面分设几个指挥点：一个指挥点设在宣武门里绒线胡同的一个咖啡馆里。另一个指挥点设在西四，还有一个设在北新桥。指挥点里都有电话与指挥部联系。指挥部还租了一辆小汽车，作为来回联络、运送宣传品、传达通知、了解情况的工具。指挥部除设交通、联络、宣传、救护各组外，还有个情报组，及时将各区活动情况汇编印成快报，分送各路游行队伍，以传播消息和鼓舞士气。各大中学校，在前一天晚上就被军警包围了。那天，各校同学是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突围出校，并按计划参加游行的。譬如朝阳大学就是把后围墙打个洞出来的。因为采取分散行动的方针，全城各主要街道都是游行队伍。当警察来堵截时，游行队伍就调头为尾，以尾作头；在另一头

又把早已准备好的游行大旗打起来，向相反的方向前进。警察在另一个方向又来堵截时，游行队伍就暂时解散，约定集合地点，分散到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默默前进，到约定的集合点，大旗一打，就又集合起来，继续游行。有时两头受阻时，游行队伍就从中间小胡同钻出去，转到另一条大街上游行。就这样，游行队伍跑遍了大街小巷，没有和警察发生严重的正面冲突，反而扩大了影响。这次游行取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有不少市民也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跟着同学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游行一直到天黑，才胜利结束。

“六一三”的游行是成功的，它不仅有周密的计划，严密的组织，集中的指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争得军警和社会的同情。

### 老虎洞夏令营

1936年6月底，北平各校放暑假。内地各省的同学大多数回到了家乡，留下的和家在北平的同学，需要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过点有意义的集体生活，并乘机进行军事政治的训练。当时由清华分队倡议，在西山老虎洞举办夏令营。夏令营分两期进行，每期半月左右，第一期不到二百人，第二期人数多

些。帐篷借自清华、包括一些行李、生活用具、粮食、蔬菜等等，都是自己运上山的。我们除了开座谈会、讨论会，还请了几位进步教授上山作报告。作过报告的有施复亮、吴觉先、程希孟等。报告内容，从国际形势、中日实力的对比到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等问题。后来，还有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同志来介绍东北抗日情况。另外，我们还由“民先”总队部的军事教官王英同志给上军事课，讲点军事常识及游击战术。还组织过几次夜间军事演习，即把参加夏令营的同学分成两队，一队是袭击，一队是防守；一队行军，一队埋伏；或两队在行军中遭遇，按照计划，作对抗演习。演习结束，王英同志作讲评。这个活动，大家最感兴趣。虽然仅十多天的时间，但大家增添了不少军事知识。

### “一二一二”游行

为了支持绥远抗战和支持青岛日纱厂工人抗日斗争，争取爱国自由，北平学联于12月12日又发动一次示威游行。这次游行是得到宋哲元默认的。游行遇到警察阻挠，我们采取散而复合的方针，不和警察发生正面冲突。原定游行结束时在鼓楼集合开大会，但因鼓楼集中警察太多，故临时改在北大一院操场集合。下

午两点，游行队伍在北大一院广场集中开大会。主席团做了形势及游行的总结报告。会还未结束，四区警察署长跑来传讯说：宋哲元要在景山接见同学们并讲话。我们当时认为，宋哲元要对学生讲话，不论讲什么，客观上都是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是正当的。这在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领导这次游行的北平学联。所以，我们立刻把游行队伍开到景山去听训。到了景山等待三个多小时，到五点多，宋哲元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代表他来讲。秦鼓励了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全部答应了学联提出的要求。散会后，我们整队游行回校，我们这次完全胜利了。

双十二游行了一天，大家都很累。13日，就都起得迟些。八、九点钟正要到小铺吃早点。忽听大街上卖报的吆唤：“号外！号外！蒋介石西安被扣！”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都跑到大街上，急着买了一份“号外”。一看，果然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蒋介石被扣。当时，我们都高兴得跳起来。连早点也不想吃了。吃了早点的连早点钱也忘了付。等小伙计跟出来要钱，才清醒过来。我们立即召开“民先”总队部会议。研究这一事变可能引起的问题。以及我们要采取的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对抓到蒋介石高兴到什么程度！

西安事变在同学中引起严重的思想混乱，也引起

了北平学生运动的严重分裂。大多数左派学生对蒋介石恨之入骨，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把他抓起来，大快人心，主张通电拥护西安事变。右派学生，包括一部分虽然积极参加救亡运动，但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和迷信的同学，则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我们“民先”及学联负责人理智上认为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待12月25日突然地把蒋介石放了，而张学良竟然送他回南京，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右派学生则欢天喜地地放鞭炮庆祝，并乘机成立了新学联。

## 军 政 训 练

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我们认识到，需要对党的路线政策进行很好的学习。同时，“民先”也需要学习点军事知识，为即将来临的武装斗争作好准备。于是，“民先”总队部，就有计划地对队员进行政治军事培训。政治教育从1936年下半年就开始了。第一次在燕京大学由我讲民族问题。1937年上半年开始有计划地开办培训班，地点在东北大学南北校和中国大学，每次都发听讲证，凭证入场。讲课都是聘请当时的进步教授，有吴觉先、程希孟、杨秀峰等。讲课内容，有国际形势、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心则是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杨秀峰同志讲的统一战线。他根据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这本书当时已经翻译出版,内部发行),讲时经常引用原文,引用时总是要说明从第几页第几行到第几页第几行。有带书去听讲的,打开书来查对,一点不错。这证明他学习非常严肃认真,对问题一丝不苟。培训班每个星期天都办。有段时间,同时办几个班。经过培训,民先干部及学运积极分子的政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有了初步的基本的了解。

军事训练,从夏令营就开始了。后来,组织上让王英同志走了,又派来了袁也烈同志。他是湖南人,在旧军队里当过团长。我在前门外的一个公寓里第一次和他见面。他交给我一本小册子,是介绍苏联红军游击战术的。我们把它翻印出来发给民先队员阅读。到七七事变后发动游击战争,这本小册子还起过重要作用。军事训练是在星期天以区队为单位到西郊,采取军事演习的形式。各区队排开时间,事先勘查地形,自带午餐,以分队为单位到指定地点集合。一般是先开大会,由总队部派人做形势报告,接着由袁也烈同志讲军事课(即游击战术,演习的计划布署)。有时也组织时事讨论和文娱活动。一般下午进行军事演习。结束时,还做讲评或总结。因为这种活动,既生动又新鲜,大家

很有兴趣。每次演习，都有三、四百人参加。回来时，都在西直门上电车。因为全车都是青年学生，于是电车上响起了救亡歌曲。电车在大街上行驶，引起市民们的惊奇与敬佩。

### “我们的生活”

我到民先总队部，先后担任过秘书长、宣传部长、训练部长的职务。后北平队部成立，我又担任北平地方队部总队长。大概是1936年秋天。总队部为加强组织建设，决定出版一个内部刊物，取名为“我们的生活”。开始为不定期，一般半月一期，铅印，八开版，一直是由我编，我送印，我校对，我发行。稿子大多是我们总队部的几个同志写的。印刷费由队费开支。一直到七七事变。

### 西山春游

西安事变以后，为了巩固组织，提高民先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广泛团结同学，争取群众，我们做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组织民先队员及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学

好功课。一年来他们忙于救亡工作，不能不影响学习，成绩有所下降，他们在同学中的威信就受到影响。因为学生的根本任务，除了抗日救国，其次就是学习。短时期影响一些还可以，时间长了就要影响他们的情绪。为了巩固组织，提高他们在学生中的威信，我们就发动民先队员，在组织生活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求民先队员既要搞好工作，又要搞好学习，采取集体互助的办法，合理安排时间，改进学习办法，学好功课。通过学习，团结同学，结合学习，进行工作，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民先队员的学习成绩，很快就提高了，不仅团结了同学，而且得到了师长的同情和支持。同学们认为，这些人不仅热心救亡，而且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很多中间同学，都团结在他们的周围，民先队也有很大发展。到七七事变前，全市已有三千多名民先队员，北大也发展到二百多人。

另一件事是组织西山旅行。青年学生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不能天天只是“救国”、“开会”、“游行”。尤其在春季，大中学校的学生都有春游的习惯。同时也为了和“新学联”争取群众，我们发动了两次西山春游。头一次到香山，第二次到温泉，均由学联出面，租了几十辆卡车，按人头准备午餐，面包香肠，每人一袋。到了旅游地点，就组织大家搞些集体娱乐活动。崔嵬、张瑞芳等还编排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活报剧是第

一次演出，以后流行全国，对启发群众觉悟、发动武装斗争起了很大作用。这两次活动，参加的有几千人。主要是团结了中间状态的同学，还有一部分曾因西安事变而一度离开我们的人，也被我们团结过来了。这就使“新学联”处于相当孤立的地位。这两次春游，是我们活动方式转变的开端。通过这两次行动，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单一的开会、喊口号、游行示威是不行的，青年运动必须适合青年学生的特点，活动方式要多样化，光搞单一的政治是不行的。

### 输送革命青年

红军入晋以后，阎锡山为了抵制共产党，笼络人心，一面搞什么“土地村公有”，一面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薄一波同志帮助他搞牺盟会，被待为上宾。我们就利用牺盟会这个合法组织，进行抗战工作。根据北方局的指示，需要从北平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去牺盟会工作。民先就动员一百多人，大部是民先队的干部。后来，这些人都成了牺盟会的骨干。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驻军西安。想把东北军改造成真正的抗日军队。在我党推动下，张成立了“学兵队”，培养抗日军官。我们也从北平学生中（大部是民

先队员)，动员一大批人到“学兵队”去。西安事变时，营长孙铭九带队去抓蒋介石，大部分是从北平去的“学兵队”员。

1937年上半年，中央决定为全面抗战准备干部，要北平输送一批革命青年去延安学习。邓力群同志就是这时去延安的。

除此之外，为了开展工农兵的工作，我们还抽调一些同志，派到工厂、农村、军队中去。刘志诚（刘居英）同志也一度离校去做军队工作。

## 杂 牌 队

北大周围有很多公寓，专供失学青年居住。当时北大有“五公开”：一、课堂公开。教室可以随便进去听课，没有学籍的青年去早了，可以坐到位子，有学籍的学生去晚了，反而没有座位，要站在后边。讲义，只要付钱就可以买到。二、图书馆公开。阅览室可以随便进，书橱里的书，可以随便看。三、浴室公开。莲蓬头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可以进去洗，无人过问。四、运动场公开。体育器材随便借，运动场上北大学生还没有校外学生多。五、食堂公开。北大的学生食堂，都是外边商人开的饭馆，进去用膳和在外面饭馆一样。

宿舍可以说半公开，社会青年住在里面的就不少。因为有的北大学生觉得住学校宿舍，两人一间（三院还有四人一间的）不自由，于是在外租公寓住。空下的床位，可以随便让给同乡同学或朋友住。有这些方便，就吸引了不少失学青年在它周围的公寓里居住。尤其在“一二九”以后，南方各省的进步青年，在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下，呆不下去，北平是国防前线，军阀统治比较薄弱，到北平可以自由些；有些共产党员，因组织被破坏，失掉关系，也到北平来找关系。这样，北大周围的公寓里住的大都是革命青年。民先队的组织，就由北大发展到住在附近公寓里的社会青年中去了。别的地方也有公寓，也有民先队员，因为人数少，都是编到附近学校分队过组织生活。唯独北大附近社会青年中民先队最多，单独成立一个分队。这个分队的成员流动性大，分队部负责人变动也大。在西山春游时，要按分队集合发午餐，这个分队当时没有负责人。因这个分队没有名义，大家就叫沙滩分队为杂牌队。

### 民先队总队部的成立

民先队 1936 年 2 月 1 日成立时，叫“民族解放先锋队”。到 1937 年初召开全国代表会修改章程时，才

加上“中华”二字，叫“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民先队原是北平地方组织。领导机关叫“总队部”。1936年暑假后，发展成全国性组织。1937年初召开全国代表会，才分别成立全国总队部和北平地方队部。

民先的组织，日益发展，民先队的工作也逐渐繁重。总队部需要一批人专做民先工作。李昌、李哲人、刘导生、李声簧和我，都先后脱产，专门从事民先工作。于光远、顾德欢、杨雨民也先后半脱产从事民先工作。为了加强民先队的工作，党组织还先后派一批不是学生的党的干部到民先总队部工作。1936年暑假前，为了建立武装部，市委就派来军事干部王英同志担任武装部的工作。1936年秋王英同志调走了，又派来袁也烈同志。为了开展妇女工作，民先建立妇女工作部，市委就派来左秀权同志来担任妇女部工作。1936年秋，市委又派来杨克冰，“大老杨”（杨维）、“大老李”（贾丰，1939年在山东堤岸干校肃托冤案中被杀）。杨克冰调来后，左秀权就调走。大老杨及大老李分别在组织部和训练部工作。后又派来朱则民、黎明同志，也在组织部工作。1937年，负责组织工作的邓力群同志去延安学习，市委就派来乔××来换替他。这些同志，在民先工作期间，都做出了一定贡献。除了以上同志，还有谌相汉、李平、齐语、张震寰、孙兴诗（孙思白）等同志，也

都在总队部担负过一定工作。

### 撤离北平、坚持地下斗争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宋哲元和他的二十九军撤退到保定去了。不等天明，我们北平队部和全国总队部就召开紧急联席会议，研究应变办法。根据市委指示，当即决定全国总队部由于光远、北平队部由杨雨民负责，带领两个队部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作先遣队，当天即出西直门，经门头沟沿平汉路撤到保定。因为北方局已撤到那里，所以全国总队部也要撤到那里。北平队部，主要由我负责，组织家不在北平的队员撤退（但由于日军封锁，大部分没能沿平汉路撤退），并组织家在北平城的队员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

七七事变后，从北平开往天津、绥远、保定的火车都不通了。二十九军夜里撤走。8月6日平津开始通车。李昌和学联负责人蒋南翔、黄诚等同志，带领第一批同学撤退到天津。在天津民先队和天津学联的协助下，安排撤退同学的食宿，北平同学才得以分批由天津再乘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分别到山东青岛、烟台、虎头崖到济南汇合，然后分赴各地。

这时北平市委决定要我撤离北平，到石家庄北方



局分配工作。我就指定女二中的刘志兰和中国大学的首弟模两同志负责北平队部的工作，并把她们交给市委。我于8月24日离开北平。以后，“民先”组织就转入地下了。

（本文作者孙陶林，原名孙传文。1935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 我对“一二九”的回顾

谢 云 晖

---

1935年在北京大学，我同大家一起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及以后的一系列活动。1936年下半年我代表北大参加北平学联常委会，直至七七事变。

这一段历史已有许多同志写了，并且出有专门的小册子。我现所回忆的只是个人经历过的一些片断。

###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

“一二九”那天，北大的行动开始的稍晚。当时我们正在红楼上课，听到外边喊口号，我们不约而同地冲

出教室参加了游行。“一二九”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在四斋前的广场上召开了学生大会，成立了“学生会”。会后成立了执委会，主席是韩天石。我以经济系代表资格被选为执委会成员之一。在“一二九”至“一二一六”的一周间，各校纷纷成立了学生会。当时学生会的中心任务是酝酿第二次示威游行，即“一二一六”。“一二一六”北大就组织的比较好，绝大多数人都出去了。记得当时市内的学生分三队，另有城外的一队。市内三队，一队以东北大学为首；一队以中国大学为首；一队以北大为首。

我们北大这个队是四个人一排，肩并肩出南长街到天安门。出南长街时有一场激战，到新华门时遇上大刀队拦击，有许多人受伤。最后游行队伍斗志昂扬地来到天桥，召开了市民大会，顿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当时黄敬在天桥广场一辆破旧电车的扶手上向市民大会发表了演讲。

对“一二一六”的几点看法：首先，组织的好，全市六十几所大中学校的学生都组织起来了，商界、市民等好些人也纷纷参加了。其次是影响大，不仅把北平闹得满城沸腾，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而且影响了全国。天津叫“一二一八”，全国其它各大城市纷纷响应。第三，斗争比较策略，这时已抛弃了脱离群众

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 南下扩大宣传团和“民先”的诞生

“一二九”、“一二一六”大示威以后，抗日救国运动如何坚持下去，成为当时大家热烈争论的中心。有的想把运动中心转为武装斗争，袭击派出所，夺取武器。有的主张打入地主武装联庄会，同日寇打游击。还有人想进京请愿，扩大抗日影响。更多的人不同意上述主张而又想不出很好的办法。正在大家思想比较混乱的时候，国民党下令解散北平学联，宣布其为非法组织。教育部紧接着宣布放寒假，并收买了一部分学生去南京接受蒋介石面谕。各校救国会是在平津学联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反对了各种错误思想，特别反对南京聆训的意见，最后确定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工农群众中去。

“扩大宣传团”共四个团，北平三个团，天津一个团。我们北大是第一团，包括东城各大中学校，共百余人，团长是北大同学韩天石。于1936年1月3日按计划出发，途经大井村、青云店、礼贤镇于八日到达固安县城。四个团先后到达固安会合。三、四团因为在东西两翼距离较远，只派了部分团员参加了固安会议。

从南下宣传起就不断有便衣跟踪监视，当学生向农民演戏或演讲时，这些家伙就不断扰乱秩序，进行各种捣乱。随着宣传影响的不断扩大，破坏更加猖獗了。到了四个团在固安会合时，国民党县长干脆把城门关闭了，并诬蔑学生是“土匪”，在城墙上架起了机关枪。这更加激起了大家的义愤。同国民党县长反动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沿途人民对宣传团的爱护和支持。固安城里居民、学生把钱、粮、棉被用绳子送出城墙来表示支持。固安师范学校王校长冒着极大危险深夜来慰问团员们，表达民众的抗日决心，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大家。其他类似行动还很多。因进不了城，只好在城外召开群众大会，在演出“打回老家去”之后，大家齐唱：

“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  
走出田庄课堂。  
到前线去吧，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

这个歌在平津学生中是人人会唱的，但这时却有它特别的意义，无形中他变成了南下宣传队伍庄严的进行曲，表达了大家慷慨悲壮的激情。

另外，针对固安县长的行为，大家编了一首小调：

“一路风霜到固安，  
城门关了整三天，  
县长王八蛋。  
……”

在固安有个问题留下深刻的印象。总指挥董毓华在全体宣传团员大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提出了“当前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还是集中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呢？”这一策略问题，要大家讨论。这当然是党组织有意识地向团员们进行抗日总方针的教育。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应该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个问题在我思想上是个长期思索的问题，于今才得到了解决。这里请允许我追述的远一些，因为它有一历史过程，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记得在1926—1927年北伐战争时，我在成都读初中，那时大家热血沸腾，组织街头宣传队，欢迎北伐军。因为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实在深恶痛绝，以为北伐军一到什么都好了。当时就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我跟着喊，还张贴很多标语。那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打倒列强就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我不仅不反对，而且认为很革命。“四一二”政变后所谓国民革命军，包括北伐时改旗易帜的旧军阀，一齐暴露

了本来面目，在全国进行大屠杀。在成都，1928年反动军阀就以学生“闹学潮”为由于2月16日逮捕了学生百余人，枪杀了袁诗尧等十四人，最小的才十五岁。那次学潮我也参加了。这时大家失望极了，把上面那首歌曲戏改为“大饼油条，大饼油条，脆麻花，脆麻花，三个铜板一只，三个铜板一只，顶呱呱，顶呱呱！”用它来发泄内心的愤闷。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时，我在上海读高中，也参加了抗日反蒋的大示威，并参加捣毁上海市党部，组织民众法庭缺席公审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陶某和公安局长陈某，拥护十九路军继续抗战，反对上海撤军。但我们跟着叫的口号仍然没有特别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要一致进攻苏联，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要一致进攻中国，因而继续主张国内外都要“打倒一切”。不久，在上海斜桥体育场开群众大会，我是宣传员，带了许多传单，会未开成，我同大陆中学学生四人就被捕了。在上海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地下室关了一个多月后才释放。出狱后国民党军队撤退了，十里洋场，一切如故。黄浦江上尽是各帝国主义的军舰，中国则一只都没有。那时想“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好象还是对的。但我们拿什么来打倒一切？是不是一切都能被打倒？什么时候能打倒？对于这种口号我们开始深思了。比

较熟悉的少数同学就悄悄议论了，打倒一切，打倒一切，搞得不好，一个也打不倒，反而要把自己打倒了。那时我们只是十几岁的中学生，既非党员，又非团员，仅仅是凡“闹学潮”必参加的反帝反国民党而又倾向共产党的爱国分子，我们只能跟着跑，别无他法。

1935年看到“八一宣言”，心中忽然开朗。南下宣传到固安讨论当前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还是集中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时，立即拥护后一个口号了。

在固安住了四天，总结了工作，整顿了组织。由原来的四个团改组为三个团。我们第一团由固安出发后，经霸县、雄县、任邱、高阳，最后到达保定。南下任务主要是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推动抗日。所以我们采取各种方式尽可能使农民能够接受。如组织宣传小队，有几个听众就宣传几个群众，哪里人多就到哪里。散发宣传抗日救国的小传单，小标语，演出话剧“打回老家去”等。较普遍的是住在农民家里同老乡交谈国家大事和日寇在华北各地杀人放火的暴行，要大家团结起来打鬼子。开始不免有些学生腔，老乡听不懂。慢慢就学会用最通俗的语言来同群众谈话了。在宣传中自然进行了一些调查，比较具体地了解到农民的疾苦。那时农民生活很苦。在阴暗冰冷的小土屋里，我们亲眼看到了农民苦难生活的情景。屋里是空



荡荡的，炕上铺了张破芦席，几个人共用一条又破又黑的薄被子。许多人家吃的是稀薄的糠菜粥。有的小女孩只围了一块单布片。农民们说糠菜只能吃到阴历年底，往后就揭不开锅了。地租奇重，是“倒二八分粮”，连“倒三七”都很少见。“二八分”地主拿八，农民得二，这二份中又要交纳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剩下了，所以许多农民经常断炊，靠草根树皮勉强维持生活，再加上高利贷，地主、豪绅的巧取豪夺，官兵、土匪的骚扰、劫掠，呵，中国农民真苦呵！在灰黄的大地上，泥墙破屋，枯树寒鸦，全是一片萧疏的景色。我生在农村，1929年离开四川时，四川的田租已收到四十年代了，农民颠沛流离的景况，我是亲眼见到的，华北农村原来也是一样的。

我们宣传了农民，农民也教育了我们。我在北大虽然是读经济系的，那些“大部头”的理论书只是装了一脑袋概念，对农村的阶级剥削了解的很肤浅，这次上了很好的一课，真是胜读十年书呵。

宣传团员不仅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生活上也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艰苦锻炼，大家啃窝头，吃咸菜，睡冷炕，因临行仓促，带的衣服也不多，而且昼夜工作还要夜行军，数九寒天气温常在摄氏零下十多度，那正是北方最冷的时候，过惯大学舒适生活的同学们，确是感到很苦了，但大家都能咬紧牙关，积极工作，毫无怨言。

我在一团是分管“庶务”的，就是除宣传工作之外还要管吃饭、睡觉、走路这些事。因为我们临行时学生会只筹措到几十元钱，途中写了几封断炊告急信，学生会虽然尽最大努力也只能募集数十元派人送来。同学们自己钱又很少，所以吃饭成了决定能否行动的大问题。有时候老乡把仅有的一点窝头和咸菜拿来支援我们，我们怎样能吃得下呢。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南下的。

沿途同军警和便衣特务的斗争，也初步学到一些办法。他们前堵后追，两翼包抄，好在冀中平原地域广，道路多，便于机动，我们声东击西，你来我往，时而集中，时而分散，行动飘忽，敌人捉摸不透，等他找到驻地时，我们早已又转移到另一地了。我们把这叫做“打游击”。

在1月15、16日得知二、三团受阻后，我们一团就改为昼伏夜出，白天宣传，夜间打游击。原来三团在高碑店被阻，受到军警围攻，被押回北平。第二团一月十四日到达新县的辛立庄镇，15日当夜晚被层层密密地包围起来，他们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一部分同学与赶去支援的第一团汇合了，其余被解散。

第一团全部同第二团突围出来的部分团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1月21日下午到达保定。有人提议再沿平汉线南下，但已腰无半文，再南下事实上不可能

了。进城时为了阻止反动派对我们各个击破，所以整队高呼口号入城，当时我们叫它为“入城式”。进城后在城门上贴上了“打倒傀儡政权”的大标语，在“省政府”门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等口号。并在街头巷尾进行抗日宣传工作，第二、三天曾与当地青年举行联欢会，并召开了群众大会。河北省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阻止我们进行宣传。千方百计把我们软禁在同仁中学（我们驻地），不准外出。恰在这时，一团接到北平学联要宣传团撤回北平的决定，于是决定返回北平。在1月23日晚，第一团全部和第二团部分团员联合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大会。讨论了很多问题，我只提“民先”是怎样发起这一件大事。当时大家表示：“我们要奋斗到底！”“我们的组织要永远存在下去！”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讨论中大家提出了十几种组织名称。最后有一位同学提出“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名字，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名称好，经过大会一致通过。大会并决定第一团全体和第二团到达保定参加大会的团员都是第一批当然的“民先”队员，同时选出九人为筹备委员（韩天石是筹委之一），负责尽快筹建“民先”组织，散会时已是深夜了。

第一团1月3日出发，24日全师而回，南下二十二天。

在北平经过党组织和北平各校学生的酝酿，采取了具体步骤，将清华组织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同“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于2月1日在北师大召开了第一次各校代表大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正式成立。

### “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

从“一二九”到南下扩大宣传团归来，时间将近两个月。在这充满暴风雨的日子里，同学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从课堂走上街头、农村，更好地锻炼了自己，获得许多极宝贵的斗争经验和实际知识，政治上迅速地成长起来。

北平学联考虑到罢课时间不宜过长，于2月7日发表了“复课宣言”。同时又拟定了《非常时期教育方案》，提出一系列具体改革教育的意见。

这些措施受到了广大学生的热烈拥护。北大同学一方面展开了争取实施非常时期教育的斗争，一方面积极进行各种课外活动，组织歌咏队，举办各种研究会、座谈会、讲演会，进行时事讨论。有的学校还搞了军事训练。

随着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而深入的开展，反

动派使出了反革命的两手，外部加强武装镇压，内部加紧阴谋分裂活动。关于在内部搞分裂，早在我们南下期间，国民党学生乘大批进步学生不在校，曾声称要拼凑一个平津保学联与北平学联相对抗，并发表了宣言，由于受津贴的少数特务学生名声太臭而胎死腹中。但分裂活动并未停止，各校内国民党分子对抗日救国同学始终在寻衅而挑起斗争，有些学校斗争很剧烈，而北大则因支持“民先”和学联的学生占绝对多数，所以国民党分子在北大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始终未成气候。

2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并转令教育部取缔学联。在这两个反动命令宣布的前后，整个2月份到3月初，北平当局对各大中学进行了大搜捕，被捕者即达二百余人。

3月16日，为集中营救被捕同学，北大、清华、东大、中院等各校学生会发起组织“北平各校被传同学后援会”，发表宣言并通电全国一致援助。

白色恐怖持续了一个多月。3月9日，北平第十七中学学生郭清在狱中受到了严刑拷打惨死狱中。消息传出后，北平学生群情激愤，要求学联立即采取行动。学联的党团决定召开追悼郭清的大会，揭露并抗议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

3月31日上午9时，北平学联组织的民先队员和

各校积极分子一千人，在北大三院举行追悼会。会前几位同学从前门外购来棺木一口，放置礼堂中央，棺木前面用白布画有郭清速写像，周围布置各校送的大批挽联及花圈。参加者每人臂缠黑纱，很多同学以为是装着郭清的尸体，顿时悲愤得泣不成声。11时正式开会，宣读了祭文，更加激起全场的哀痛。当时党员需要隐蔽，不能暴露，不在台上，由群众积极分子主持，大家的发言很激昂。会上散发了大批“告各界同胞书”、“告警察及士兵书”等宣传品。

北大校长蒋梦麟闻讯后，借口学生运棺入校，侮辱北大，极为愤怒。他严厉训斥学生会负责人，勒令停止活动。这时大批军警赶来，架着机枪封锁包围了三院，不准学生出入。韩天石等代表北大学生会和警署长交涉，韩说：“我们悼念爱国的郭清同学，是完全正当的行动，你们不应干涉！”警署长要大家立即散会。韩说：“你们撤了以后，我们就散会。”警署长说：“奉命不撤！”双方僵持着。片刻，蒋梦麟、胡适之等紧急通知韩天石到校长办公室，一定要韩解散追悼会，不解散就要处分。韩理直气壮地说：这次会不是北大单独召开的，各校都有代表，我们无权解散，而且这个行动是正确的。他们叫韩赶快回去说服停止，韩到会场，党团几个人研究，没有停止开会。这时北大当局立即在三院礼堂布告牌上贴出开除北大韩天石、巫省三、吴沛苍、

叶纪霖四人学籍的告示，是用墨笔写在布告纸上，大家出来围观，我也是亲眼所见，印象很深。后来学校说是当日下午四时学校召开紧急会议，晚上才决议开除的，把时间推迟了六七小时，并且在第二天（4月1日）见报，这完全是对报纸和舆论的欺骗，因为当天中午已举行过抬棺游行，许多人被捕，事态已扩大，他们这样说开除人就振振有词了。布告贴出后会场沸腾了，突然有人提议举行抬棺游行，立即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由于北大三院大门被军警机枪封锁，队伍无法外出，大家便将南院墙（孔德中学后墙）推倒，手持标语旗，并由各校二人轮流抬空棺一具，从孔德学校冲出。清华、燕京在前，北大押后，经东华门大街，转往北池子，计划到地安门大街河北高中门口游行示威。当队伍行至北池子时，被反动军警的摩托车队追上，截住去路，向游行队伍冲击驱打，学生奋起反抗，很多人被打伤，队伍被打散，当场被捕者五十四人。北大、清华、燕京、中大都有，还有一些中学生。北大被捕的男七人、女二人。侦探说我是主席，所以报纸上登载被捕人名单时，我居然名列前茅，押到陆军监狱后我又受到特殊优待，不仅带上了脚镣，而且还加了手铐。其实那天我并未主持会议，只是站在主席台前罢了。

我们被送进了陆军监狱，一进门就被套上了镣铐，这种野蛮行径激怒了全体同学，当天就进行了绝食斗

争，反动派不得已免了女生的脚镣。我继续绝食了几天，他们要我吃饭我不吃，他们责问为什么不吃？我说带着手铐，我吃不来，过去没有习惯，现在也没有学会，于是我的手铐也解除了。

在很小的一间牢房里要挤上十几个人。我们的东边住了一批“老政治犯”，在我们每日两次放风时（出房上厕所）虽然有人监视，但和他们很快就能用各种暗语互相交换情况了。大家并不通姓名，但彼此熟悉起来了，那真是患难之交啊！

我们在狱中吃的是带砂子的窝窝头和混浊不堪的菜汤，酸臭难闻，再加上镣铐的折磨，真是非人的生活，但革命乐观主义鼓舞着我们，我们经常高唱救亡歌曲，歌声满牢房，斗志高云天。我那时准备作长期打算，认真读点书，所以托北大来探监的同学捎带一些经济学的书进来，其中还有《资本论》第一卷。我们还利用“土电报”传递消息，如敲墙壁多少声就说明有什么事情，还办起了“手抄本”的“刊物”，许多打油诗、革命歌、短小精悍的政论文章都抄在上面。在放风时背着牢禁子相互传递。这个刊物对斗争起了很大作用，直到出狱时还有人把它带出作为珍贵纪念品保存起来。在狱中我还学会了一件小技术，大概二十天让我们在一间又小又臭的浴室里集体洗一次澡，但是仍然要带着脚镣，我开始无论如何脱不下棉裤，后来老政治犯教了我，很



快就能脱裤子带着脚镣洗澡了。

在狱中只审讯过一次，是几个人一起出堂。在牢房一个过道的一大空房里进行的，房中挂满了被军警抢来的学生游行时用的标语、传单之类，其中有一幅很大的横标，叫做“全国青年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除了讯问姓名、年龄、籍贯之外，还问参加过什么组织以及为何要抬棺游行之类，这些问题随便就答复了。他们无可奈何，然后就把那条大横幅两头卷起来当中留出“青年团”三个字，问我们是不是青年团，我们说不是，他们说你们明明打着青年团的旗帜，怎么说不是呢？他那笨拙的行为使我们心中十分好笑，我们说请你把卷着的两头摊开让我们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无可奈何地打开了，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他弄得十分狼狈，呆了一会儿说你们今天不说总有一天会说的，下去吧。就这样以后只把我们关着再也无人过问了。

在我们被捕后，学联就四处奔走，进行营救，两个星期后才打听到我们被关的监狱，派人前来看望，送来衣服、食品，并把外面情况用拉丁化新文字传给我们。同时，各校学生会也不断向学校交涉，要求保释，全市很快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宋哲元那时日子也不好过，日寇进逼，国民党又企图把丧权辱国的责任往他身上推，他处于夹缝中，也怕再得罪共产党，所以对被捕

的人先是只关不管，后来逐步释放了。我是在5月中旬最后一批四个人一起出狱的。

我们入狱的五十四人，其中有学联的党团成员王汝梅(黄华)。出狱后大家在燕大的未名湖畔举行了一次难友集会。

十年动乱，造反派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大案来抓。1969年底，总政几个干部到南京军区找我核对事实，然后又盘问了一些问题，我都如实回答了。过了许久，他们才说：“你们五十四个人的案子全部弄清了，今天是最后找你核实一下。”

其中一个说：“你就是谢云晖？这名子好象很熟。”

我说：“我是普通一兵。恐怕你记错了。”

另一个补充说：“我们调查你们所记录的材料很多，在整理材料中你的名子好像好多人都提到。我们印象你是挺硬的，大概是这样熟的吧。”

我说：“谈不到，不敢当。你们审查我们五十四人收获不小吧？”

他们都笑了，然后一本正经地说：“谢政委，我们正式通知你，你们五十四个人没有一个发现有问題，事情就算了结了。”

我说：“谢谢，不过我倒想知道是怎样搞清的，你们现在就能这样做结论吗？”

他们说：“五十四人绝大多数都找到了。你们互相间不认识，更无联系，但所谈事情的具体经过基本都是一样的，这是一。

其次，当时陆军监狱的牢禁子、典狱长和全部原始档案记录都查到了，同五十四人中的调查所得是一致的。这是二。

北平当时所有报纸我们都一字不漏的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是三；不瞒你说，我们是花了很大的力量，很长的时间，才得出这个结论的。你总该相信了罢？”

我点点头。

他们又说：“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今天不妨告诉你一下。我们事实虽然完全搞清了，但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还要干点什么。所以，又找到了邓哲熙（解放后民主人士，当时是宋哲元的军法处长），问他，‘抬棺游行你们既然抓了五十多人，为什么没有一人判刑，难道一个都没有自首的吗？’邓说‘一个都没有’。我们紧逼邓：‘为什么？’邓说：‘当时我们日子很难过。日本人逼我们撤出平津冀北、退到冀南，蒋介石三令五申要敦睦邦交，避免事端，事实上他是默认了日本人的要求，以便集中力量打内战。我们如同意撤出，那么将寄人篱下，无立足之地，而且蒋可以把辱国之罪，加在我们头上。像九一八事变后的张学良一样。如不撤

出，日本人又步步进逼。蒋介石一个劲的要我们镇压抗日运动。老实说，开始我们是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的，以便取得他对我们确保平津冀北的支援，但后来逐渐醒悟到完全不是这回事。在两大压力下，我们感到很孤立，这时才想到利用平津学生和华北民众的抗日救国高潮，对两方面都说你们不能操之过急，否则要演成重大的事端。果然还有一些效果。但我们根本没有信心能长期确保平津，这样做也无非是拖延时间，以观事态发展。所以我们在蒋日的压力下不能不大张旗鼓地抓学生及一切抗日分子，但抓了以后我们又悄悄地一小批一小批地放了。判刑？判爱国罪？自首？自首他们爱国的事情？如果爱国有罪，我们将何以对国人，何以能够再运用华北爱国运动来对付日蒋？当时主要是出于利害关系，但不能说我们一点爱国心都没有，那也不符合事实。’”

我静静地点点头，回想了许多往事，但只说了一句：“原来如此！”

“三三一”游行是一次英勇的斗争，它坚决地反抗了镇压，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的残暴，冲破了白色恐怖，打破了学生运动逐渐沉寂的局面。当然也有那样那样的缺点，从领导角度看，是有经验教训可总结的，对群众也要提高他们的斗争艺术。但如果拿今天的水平来看待将近五十年前青年学生的行动，那就不是历

史地看问题，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实事求是。对追悼郭清、抬棺游行这一行动，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

## 援 绥 抗 战

1936年11月，绥远军民在全国人民热烈声援下，起来抗击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收复百灵庙。这一局部抗战的胜利振奋了人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捐输和慰问。北平学生特别兴奋，要求国民党政府扩大绥远抗战局面，实行全民抗战。学联决定大力支持绥远抗战，各校组织了几千名学生进行街头宣传和募集慰劳品，并发起了捐献万件皮衣活动。北京大学学生会要求学校当局自16日起至18日止停止炉火三日，以所省之款援助绥远守土将士。北大教职员捐献一日薪金一千三百五十六元，学生亦捐募千余元，两项共二千余元，向协和医院全数购买医药品。由化学系主任曾昭抡等组成劳军代表团携带药品离平赴绥劳军，并考察前方防毒设备，因那时日军已使用了“毒瓦斯”。劳军代表中还有化学系教授孙成谔及学生六人。我是其中之一。

大约是11月下旬，我们坐平绥车，途径平地泉（集

宁)到达归绥(呼和浩特)。受到傅作义将军及其部队的热情接待。在平地泉及归绥让我们参观了工事,不仅有战壕、步兵掩体,还有炮兵阵地以及一些地下工事。那时看了觉得了不起,好兴奋,其实那不过是一些土木结构的野战工事罢了。当然,那时能做到那样也就不错了。平地泉和归绥驻军举行了集会。傅作义、汤恩伯(十三军军长,国民党嫡系)亲自到会致欢迎词。曾昭抡致了慰问词,递了慰问信,献了慰劳品,并演讲了简易的防毒知识,在场军官热烈鼓掌,气氛很好。会后举行宴会,傅作义、汤恩伯一一介绍了他们手下的将领,如傅的旅长董其武、孙兰峰等,汤的师长只记得一个王仲廉了。在归绥遇见北大同学范希天(范长江),那时他是大公报的记者,随军采访。他约我到他下榻的招待所,详细介绍了前线情况,并问了我一些北平学运情形。在场的还有另一个大公报记者。临别还特意送了我一枚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军功章。

从归绥经武川到百灵庙这段路途,我们是坐敞篷卡车去的。塞外草原的隆冬季节,气温经常在摄氏零下十几、二十度。我只穿通常的棉衣,冷得直打寒战,又晕车呕吐。车在茫茫草原上驰行,好远不见人家,这时真体会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诗的意境。

百灵庙只有几座低矮的木结构旧庙宇,旁边有几

排小土屋，算是街道，周围还有几十个蒙古包，十分荒凉。这就是曾一度被日寇和蒙奸德穆楚克栋鲁布所侵占，后又为我绥远抗日将士所收复的当时内蒙北部著名的战略要点。在那里同最前线将士见了几次面，进行了几次慰问，并详细了解了前线实况。他们对我们十分热情，抗日决心很强，对我们谈了许多战斗故事，让热炕给我们住，并请吃了牛羊肉。在那里还碰到另一起慰问团，其中一位教授大约是音乐家，一个早晨在蒙古包外教我们唱他自己作的新歌，歌词至今只记得一句“哈尔红河刮来小尖刀子风”，其余全忘了。

回到归绥我们向傅作义将军汇报了情况并向他告辞，由于曾昭抡是有名望的学者，既代表北大又代表文化界，所以主人是比较重视的。

### 新“五四”事件

1937年2月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争取民主的斗争反映在北平学运中就是学联为争取民主联合和伪学联搞分裂破坏的斗争。学联一方面通过庆祝和平统一大会，表示拥护和平统一，一方面又提出了两个学联统一的问题，主张联合行动，而伪学联则不顾大局，始终坚持分裂破坏，企图夺取运动的领导权，把学运纳入国民

党轨道，扼杀真正的群众抗日运动。学联曾发表过呼吁学生运动统一的宣言，并不断派人与伪学联谈判。我知道的黄诚同志就曾亲自同伪学联代表谈判过多次。一次他曾对他姊妹黄珮说：“今天我演了一出单刀会。”原来他一人曾到伪学联去谈判，要大家各自摆出主张和办法，伪学联竟然说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敷衍搪塞，最后被黄诚驳得哑口无言。我也同伪学联的人谈过几次，记得清华有个叫穆华璜的学生，自称是伪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又是清华国民党学生的小头头，他原是我在成都时的初中同学，比较熟悉。我们也激烈争辩过多次，他的道理都是国民党老一套的大一统论。我们力求争取联合，并主张在民主选举的条件下，双方民主合作，但他们最怕民主选举，因为他们是孤立的。所以他们顽固地坚持国民党的法统论，我们虽然做了很多让步，但仍无结果。

1937年“五四”十八周年纪念大会，是我们主动实行联合而伪学联力图制造分裂的典型事例之一。学联经过多次讨论，提议同伪学联联合举行“五四”纪念大会，但他们拒绝了。我们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邀请他们共同主持大会，而且把大会场定在北师大。北师大是反动教授杨立奎和伪学联主要负责人的所在地，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之所以把会场定在北师大就是表示对他们的让步。而且明确提出共同主持会议，



双方各自发表演讲。这是符合三中全会后抗日联合战线的精神的，也是比较能为伪学联所接受的。他们再也无法推托了，只好表面上接受。开会那天他们又变了卦，不让学联参加主席团。那天去参加大会的几千人，大部分是我们的群众，他们人数少，只不过拼凑了三、四百人。由于他们人数少，临时又不得不同意我们参加主席团。我那天是代表学联去主持会议的，所以上了主席台，我们的代表上台的还有史立德（中国大学）。台下有我们的纠察队，其中有我四川同学刘烈人（民国大学出席学联代表）。会议一开始伪学联司仪叫唱国民党党歌，应者寥寥无几，接着进步学生唱救亡歌曲，几乎全场响应，声威震地。伪学联代表讲话，除了老一套的反共叫嚣以外，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道理，可是大家忍耐着并没有轰他。他讲完后，我接着讲话，说了国难当头，实行联合抗日的必要以及今后共同合作的希望等。因为只想把纪念“五四”作为合作的开端，并未讲任何刺激性的话。这时会场秩序很好，情绪亦高涨。我的话还未完，伪学联代表就把我的话筒抢走了。接着来了个暗号，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带着该校早就埋伏在风雨操场的童子军，挥舞着军棍疯狂向我方代表乱打。正在我们制止混乱时，台上的国民党教授陶希圣、杨立奎、熊梦飞等人均破口大骂，鼓动暴徒继续猛打。我们不得已一面自卫，一面撤退。我们的纠察

队保护着我们主席台上的代表安全撤离。由于我们不愿对年幼的中学生还击，所以受伤二十余人。接着就到法商学院继续开会，部分进步教授在会上讲了话，支持学联与反动教授和伪学联的斗争。事后学联发表了小册子，揭露事实真相，还向法院对杨立奎、陶希圣等起诉。这次事件使伪学联陷于空前孤立。从此伪学联这个反动组织也就销声匿迹了。

### 七七事变与南下北上

1937年7月7日夜，日寇大举进犯卢沟桥，并向中国军队进攻。二十九军奋起还击，由此全面抗战爆发。

整个北平沸腾了。学联、民先、华北各界救国会、东北抗日联合会，作协以及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成立了各界抗敌后援会。7月13日发表了市民拥护二十九军抗战宣言。学联是后援会主要成员之一，我代表学联出席过几次会议，讨论各种抗战后援事宜，杨秀峰（秀林）主持会议。学联发起捐献一万条麻袋运动，市民踊跃响应，很快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麻袋堆积如山。接着又发起为抗战官兵捐献一万件背心以及一万包茶叶、“一大枚”（铜元）运动。在学联和民先组织下，

各校先后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下设救护、宣传、劳军等机构。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医学院组织了联合救护队，并将北大三院改为伤兵医院，许多经过短期训练的女同学都成了护士，昼夜为伤员服务。

学联还组织了劳军大队，扛着红旗，带着募捐来的钱，买了水果、饼干、背心和其他日用品去长辛店、门头沟、宛平等战斗前线进行慰问。我曾代表学联去宛平县慰问，见了守宛平的二十九军团长吉星文和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献了慰劳品和表示全市人民对他们的期望和支持。他们十分感动，表示一定要为国争光，誓死收复失地。归途中遇日军骑兵队，我们避入高粱地才幸免。提起吉星文后来我们还有一段遭遇，那是令人遗憾的。1947年夏，我所在的华野四纵队（军）在山东沂蒙山区孟良崮参战歼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最精锐的整编七十四师之后，奉命外线出击，实施战略反攻，由费县南下进入鲁西南国民党区。守费县的就是吉星文旅长，我同纵队几个同志讲了，最好能尽量争取他起义。所以围攻两日后，我曾亲自到城下派人同他交涉，他也派人出城表示愿意起义，并讲好了条件。但是二十四小时后仍无音讯，而敌人的援兵快到，只好一个猛攻将费县拿下，吉星文负伤逃走，我们也未追赶。

7月28日，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北平学联最后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北平学生迅速疏散，主要是化装南

下，有关系的也可到广大农村同地方党联系，进行武装斗争。北平学联遂告结束。我在日寇进城后化装到天津，在天津，北平学联、民先部分领导人讨论了北上南下问题，认为北上是最重要的，南下也需要。于是兵分两路，各自奔赴革命征途。这时天津某中学已集结了数百人，由于学联负责人已分散，当时只有我一人在场，于是大家推举我带队由天津乘轮船去上海。夜航中，英轮船长企图掉头开回天津，把我们交给日军，幸被纠察队早发现，立即组织人监视了船长，并明白告诉他，如果船不南下，我们就将他投入海里，英船长不得已只好南开。在途中，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只好靠山东烟台登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复派大兵阻截送回船上，于是又驶往掖县虎头崖，经多方刁难才得以登陆，随即到了济南。在那里已到了数百人，在济南开会决定平津同学一部去山西找八路军，一路去南京找中共代表团。这时平津学生已大批南下、西去投入了新的斗争。8月20日左右我们到了南京，在南京也早到了一批人。9月中旬，蒋南翔、黄诚、王文彬等先后辗转到了南京。我们很快同中共代表团（长江局）接上了关系。在南京曾经组织了平津同学会，我记得有刘玉柱、袁心湖等人，我虽当选执委，但因另有筹划四川之行的任务，没有参加什么具体工作。

那时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早到南京。

我们几个北大同学约好去探望他们，一方面是礼节性拜访，更主要的是了解一下他们在搞什么名堂。见面后胡适态度十分冷淡，并说：“你们怎么不保卫马德里跑到南京来了？”（“保卫马德里”是北平学生喜欢唱的一首歌。）我们也冷淡地回答：“胡先生在北平经常说，北平各大学的事，‘中央’已委托你和蒋校长、梅校长（清华）几位先生全权办理，不知现在胡先生办得怎样了？”他听了勃然大怒，完全抛去了绅士风度，把我们训了一番。他这副样儿，我们早就见过；在一二九运动中北大罢课时，他曾和沙滩红楼大门口站岗的同学对骂过，今天见了我们又发作了。他讲完后，我们平静地说：“今后究竟如何办，请先生有以教我！”他听了后直摇头，我们就告退了。

在党组织安排下，通过沈钧儒先生以“全国救国会”的名义介绍黄诚、朱光、刘烈人和我四人去四川见刘湘做川军统战工作，并组织了特别支部，由黄诚任书记，我任支委，直接同长江局联系。刘湘那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战区在河南郑州一带，我们去主要是党要输送大批平津同学去那一带做战地工作。后蒋介石把刘的战区改在南京一带。那时上海已将不守，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刘湘当然无法守住南京，所以又气又急终于病死武汉。但我们仍由长江局派了一个大约二十余人的宣传队带往南京、芜湖一带刘湘部队附近，进行战

地党的工作。1938年1月左右陈毅同志到皖南岩寺，召集两个特支联席会议（另一个特支在薛岳集团军内，主要有陈国栋、朱凡等）。报告了形势，确定了任务，由于三战区顾祝同合并了七战区，并通缉我们，所以我们的关系即由长江局转到新四军。以后我就一直在新四军工作。黄诚在新四军政治部任秘书长，于皖南事变后在上饶集中营壮烈牺牲，刘烈人亦已去世，朱光原是天津学联负责人，现尚健在。我从1937年秋穿上军装一直到现在，戎马生涯大半生，真是读书不成去学剑，学剑不成复读书。但愿有生之年能为四化贡献余热，于愿足矣。

1984年8月

（本文作者谢云晖，1934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 “一二九”时代生活散记

孙 思 白

---

“一二九”时代，我是北大的学生。记忆中还保留着一些自己见闻的人和事。让这些零散的片断史实留下点痕迹，似乎尚有意义，故特写此文。对于这一伟大运动的一般过程，为免与已有的记述重复，就尽量不讲或少讲了。

### (一) 蓦然间的憬寤

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从政治上唤醒了一代青年，我也算听到召唤的一个。在这之前，同学们对时局的危

险，虽然也感到忧闷，但不知道出路何在？拿我来说，虽然对那时的现实有某些不满，但幻想当时的国民政府有朝一日，会一声令下，出兵抗日，甚至联想到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自己能干些什么。我受《大公报》言论的影响，曾认为只要国民党三巨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合作，中国就有希望了。自己也明白“敌强我弱”，但“弱不弱”不管，盼望能豁出去与侵略者拚一拚，吐吐这口气！可是这一天总不见到来，而危亡却迫在眉睫。这结果是苦闷，再苦闷。“一二九”、“一二一六”，象一声春雷把自己惊醒了！好似在一夜过后，忽然地悟出了：“唔，原来抗日不能依靠国民党，要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当然不是一个人，是群众。“谁能领导群众呢？是共产党！”认识就这样逐步推演，道理越懂越多，渐渐构成了一个系统。该摒弃什么，向往什么？哪边是黑暗，哪边是光明？清醒了。把寄托于国民党的希望一下子转到另一边来了。这在我的认识历程上，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界限。

## （二）“一二九”前夕种种

1935年下半年，在北大西斋阅报室里，记得看到一份主张全民抗日的油印品。以前，我想那大概就是



《八一宣言》了。现在仔细回想，那应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因为印象里清晰地记得油印品的末尾署着“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个伟大的名字。第一次见到有这两个名字的文件，留有深刻的印象。<sup>①</sup>

上说的《抗日救国宣言》与《八一宣言》的精神内容基本是一致的。那时，对我来说，还谈不上理解它的伟大意义，只是感到惊异。不过从暑假开学后，同学中间议论华北危机的渐渐多起来。这时已在“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已答应日本把中央军与宪兵三团从河北撤退，河北省政府主席与平津两市市长已经撤换。但10月前后，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风，说：“津浦、平汉车辆向陇海路集中，国民党政府准备抗战。”西斋里有我在内的少数同学，为之兴奋了一阵。但接二连三出现的不是什么“备战”、“抗战”，而是一件件让人沮丧、屈辱的国耻：汉奸横行、日军演习、青年被捕、伪自治运动等等，这对我们曾“兴奋了一阵”的几个人，无异从头顶上浇下了一瓢冷水。

到11月，冀东伪自治政府出现，华北特殊化的消

---

<sup>①</sup> 《八一宣言》的正式标题是《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末尾署名是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署领导人的姓名，它发表于1935年8月1日。《抗日救国宣言》发表于同年11月，末尾署有领导人姓名。

息越来越紧。一天，外语系学生杨雨民等几人到我房里来和我及同屋的另一个学生商量说，我们北大学生应该对现在的大局有点表示了。商量一阵就走了。

11月2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二十多人由蒋梦麟领衔发表宣言“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的特殊化举动。我们几个同学曾就这个宣言议论说，他们敢作这样的表示，还是差强人意的。但不久，就有日本人来北大约蒋梦麟校长到日本领事馆问话的事发生。<sup>①</sup>接着，又听说有日本浪人来红楼门前，喊叫“我们要接管北京大学了”。

自11月末到12月初，从报上可以看出，冀、察两省的特殊化已是呼之欲出了。只是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之间还在“踢皮球”。蒋介石对宋哲元说，望他“力撑危局”；宋哲元对蒋介石说“盼中央早定大计”，两边心照不宣，讲的是一码事，都希望由对方的嘴里说出真实意图。

记得一天晚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晋阎、鲁韩明日来平，华北局势即将揭晓”。随着这震撼人心的报导，传说从明天起，平津要改挂五色旗了。这晚，北大史学系的阅览室里，围坐着几十个同学，还有教授钱穆、姚从吾、毛子水等人。记得是等待一件什么重大消

---

<sup>①</sup> 有的说，约蒋梦麟的是日本宪兵司令部。

息（大概是等待各大学校校长开会讨论再一次对华北问题表态）。在等待中大家心情沉重，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钱穆、毛子水等教授也讲了些不着边际的话。姚从吾却讲了蒋梦麟校长那天被约往使馆的经过。记得他说：那天蒋校长在二院正开校务会议，忽然有个日本人闯进二院，持柬约蒋往领事馆一谈，意在威胁，以为蒋不敢来；蒋校长回答说“随后就到”。会后，蒋果然驱车到了日使馆。日本领事没想到他敢来，毫无准备，临时出来一人与蒋接谈，不知该说什么好。静默片刻之后，才问蒋为什么领衔反对“华北自治”？是否出于自愿？蒋率然承认，理直气壮，日人张口结舌，无辞以对。日本人又无话找话，说想商请蒋先生到“满洲国”去考察考察教育，也被蒋拒绝云。姚边讲这段故事，边流露着“自豪感”。事后我们几个人议论，觉得姚讲的这情况可能是真的。因为凭蒋的社会地位与名气，日本人也犯不上给他更多的难堪，而蒋的舌辩之才，也是有的。

过了这晚，第二天到街上看，没见有五色旗挂出来。淡淡的阳光依旧照射着人们沉郁的脸。当天报上发表了“中央派大员（指何应钦）北上，处理华北问题。”何应钦一到北平，特殊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就在“合法”的襁褓中呱呱坠地了。汉奸们弹冠相庆，而人民的胸中怒火却到了爆发的时候了。

### (三) 大示威中点滴

一二九运动的发动及其以后的发展壮大，与党的领导分不开，现在是人所共知的了。但当时，有着自发愿望的群众开头大半还不会意识到。我进北大头一年认识史学系杨启哲（后改名唐守愚），曾感到他的见解与众不同，但“一二九”前他已被捕了。校内有无党团员以及谁是，我好象一张白纸，全无所知。

“一二九”那天下午，我在宿舍里看书。北大西斋的房舍是纵深的，我的住房离大街甚远，外边发生了这样大事，竟然一点也不知道，到傍晚才听说。“一二九”那天的外校队伍是从哪条路出现在红楼前面的？还没听人讲清楚。北大的学生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在图书馆，红楼和东斋的同学。关于把红楼的课钟敲响的是史二的学生王德昭这一说法，是近两年前，我与王相遇，偶然听他本人讲起的。

“一二一六”那天起得很早，因为事先已组织起来，我和许宛乐（许东明）、杨志玖、李书箱等四人一排，随着西斋的队伍冲出来。在前进的路上我注意到李彬这个人，他当时骑着车绕着队伍前前后后的转动，带领大家喊口号，情绪激昂。

南长街夺水龙是一关。过了这关之后，到新华门前第一次遇到大刀队的冲击。队伍被打散了，我们几个人进入西长安街路南边的小胡同里去；猛地见到一个同学的鼻子被大刀劈开一道豁口，鲜血直流。刚好胡同里有一家裁缝铺，我们从裁衣匠手里抓到一片新棉花，给这个蹲在墙角上的同学敷上，是谁保护他走开的不记得了。这个受伤的北大同学名叫蒋峻峯，后来同学们给他个绰号，叫“死不了”。

天桥是预定的集合点。我们从小胡同南行。出胡同口后，打散的同学越聚越多，重新结队沿前门大街前进。“第三大队”和“北京大学”的旗帜仍在前面打着，但人数少了，有“孤军”之感。正在这时，迎面来了一队学生，当头一面黑布白字的横幅旗帜上写的是“东北大学”。他们来接应我们了。双方望见立刻欢呼起来，有些同学高兴得把帽子扔到空中。两队会合后再奔天桥，参加那里的集会。

天桥大会后，全部示威队伍出发，向前门方向前进，到大栅栏附近时，第一次听到一阵枪声，队伍又发生了一些混乱，但很快就又编成行列了。前门箭楼前大会后，队伍被分截成两队了，前队进了城；我随后队到了宣武门去，守到黄昏时分。

#### (四) 蒋梦麟与胡适的表现

我们考进北大的时候，北京大学可以说是“蒋、胡的天下”。胡适虽然只是文学院院长，但他的地位与名气，远非理学、法学两院院长所能比。蒋梦麟与胡适无论在统治北大或对付学生运动上是沆瀣一气的。有的学生，曾由于他们与群众趋向的背谬，私下里骂他们是“汉奸”，这只是一时的激愤，未见恰当。但他们忠实地按照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意图来对付学生，却不能不引起进步青年人对他们的憎恶。不过，蒋、胡两人的表现，留给我的印象还略有差别。胡适爱讲演、写文章、出风头；对付学生上更直截了当。他好象早已有“过河的卒子”那股子拧劲。“一二九”刚发生，他就发表了《为学生运动进一言》（12月13日《大公报》），劝学生回到课堂里去，不要干预国事。青年们发表了《为胡先生进一言》和他文章的“读后”（见《大众生活》、《北大旬刊》），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但胡适对别人的驳斥装作视而不见，他总是继续喋喋不休地讲他那一套。到12月31日，由蒋梦麟以校长名义召开的全体师生谈话会上，讨论是否复课和提前放假问题上，同学们的绝大多数持否定的态度，趋势是明摆着的。但胡适不

顾学生对他的“哧”、“通”的驱逐表示，反复地高喊“北大的民意不只是你们的，还有我们(教师)的一份”。他硬要来个民意测验，最后大家同意了，结果全体同学一致反对放假和复课，胡适只能恨恨而去。到1月4日早晨，为了继续罢课还是复课，红楼门前发生的“对牛弹琴”的骂阵，也是这位胡院长挑起的，姚震江同学已有回忆之文，兹不赘。

蒋梦麟的表现和胡适有所不同。他讲话不多，但讲起来一口浙江官话，要言不烦，颇有章法。除了1月4日在理学院和文学院门前与纠察队发生争吵(那天，我在理学院门前站岗)，有失常态外，一般是保持着他那“高等华人”的斯文状态。我两次听到他标榜北大的传统(一次在景山，一次在大操场)。他说，北大是培养领袖人才的地方，这里出去的学生多半都有“单枪匹马、独往独来”的精神，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在他举例说明一串知名人物姓名中，竟然两次都讲到“毛泽东”三字。我想这大概有意显示他的某种风格吧？但在“一二九”过程中，从他对付学生的几手看，有软有硬，深沉而机变，确乎厉害。具体的例子是他对驱逐伪代表事件和抬棺游行事件用的手法，是截然不同的。

## (五) 蒋校长的两种姿态

1936年1月，蒋梦麟为首的北大当局违反全体同学公意，私下指派三个学生作“晋京聆训代表”。这件事他们只能秘密进行，不敢公开的。不久“春光外泄”，同学们群起谴责此事，其中姓徐的同学赶紧张贴声明，说他寒假中去外地旅行没有冒充代表的事。这事，我在1980年8月于北大临湖轩的座谈中，已经谈过（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回忆录》第一集），不再重述。姓徐的把领到当代表的三百元津贴变成了旅费，又发这样的“声明”，让学校当局白白吃了一个“哑巴亏”。以后的内幕虽然不清楚，但不久之后，姓徐的被关进了公安局的监牢，蹲了四十天，才又被保出来。当时人言啧啧，似乎与那三百元钱事不无关系。当然这只是人们的揣度。

且说当年春季开学后的2月18日下午，全体同学在三院礼堂举行大会（陈忠经当主席），一致决议开除杨某、李某伪代表的学生会籍，并“驱逐”他们出校。事件发生后，2月20日，蒋梦麟校长通告召集全体学生讲话。不问可知，是为伪代表事件而发的。这天会场安排和蒋校长的讲话，《世界日报》曾有较详的报导，说



他讲到末后，“泣不成声”，不是事实；而且原文也不完全，仍值得补叙。

记得那天我们一进三院礼堂，就看到主席台上坐满了学校领导人和一些能说善道的教授，如平时少见的傅斯年、陶希圣等人，都一字儿排坐在台上。我想今天可“有戏”看了，且看他们怎样为“私派代表”的不光彩行为作辩护。一开始蒋校长徐徐站起，他从多少年前西方某国一只铁达尼邮轮沉没的故事讲起（过去商务印的小学语文课本上曾有这一课），说当轮船呼救无望，船身逐渐下沉的时候，船上乘客仍然是那样遵守秩序，并唱出了“上帝乎！吾将近汝”的悲凉歌声云云，然后他把今日的祖国比作将沉的轮船，要求我校同学“遵守秩序”、“遵守校纪”。但接下去，他并没斥责同学不守校纪，而是话音一转点出了主题：“今天，我要来和大家谈谈所谓伪代表问题。”于是，展开了正面的论述：“我奉教育部命令，要你们选举代表，等了好久，你们拒绝，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校长是教育部任命的，你们设身处地为我着想，我不执行上面的命令能行吗？迫不得已，我请出两位同学帮我的忙。他们帮助我解除了困难，今天他们两人有了困难，我有责任为他们解除。如果我对他们的困境坐视不顾，我还配作你们的校长，配作一个人吗？”若不深思，听来真是娓娓动听，颇具有“人情味”。讲到这里他并没停顿，接着说：“前

天发生的这件事，我想是少数人所为，不是多数人的意愿。只要你们不再和他们为难，我决定既往不咎。”

“不咎”两个字刚刚出口，他迅速把手一摆：“散会！”这篇讲话，真是“起承转合”，妙极了！尤其妙在迅速收场的“散会”两字上，因为一听“散会”，有些同学已经纷纷出场。原来台上那些并坐的大人先生们，并不讲话，不过虚张声势。有些准备起立对蒋校长讲话进行驳辩的同学也来不及了。于是蒋校长的面子得以保全而圆满收场了。在这一事件上，学校当局是理亏的，这件事激起了全校同学公愤也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所以蒋校长不得不表示出一副“宽容”的姿态。但是“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一发生，他的态度完全不同了。他赤膊上阵，按照蒋介石镇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反动政策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行事。他给同学们扣上“异棺入校”、“侮辱北大”、“引起军警干涉”等“罪名”，立即贴出布告停止了学生会的活动，并把四位无辜的同学开除出校。当时学生会、各班级接连地派代表去见他，要求他收回开除成命，被他断然拒绝。开除的四人中有我们班上的同学巫省三。记得我和余文豪、王德昭、赵春谷等几人受全班同学委托去见校长，我们向他说明那天巫省三虽然参加了追悼会，但并未抬棺，准备向他据理力争。我们刚一开口，他立即打断了我们的话，他说：“你们几位的来意，我已

了解，收回成命断不可能。我完全知道，他们四位并无过错，被开除是冤枉的，但开除他们是为了让北大还能继续下去。这就非牺牲他们四人不可。你们如果说这件事我做错了，我可以承认，但我辞职！”我们见此情况，觉得对这位校长已经是无理可说了，只得快快而退。

#### （六）学运新风——师生联合纪念“五四”

罢课或游行示威，在白区的学生运动中是紧要关头时的最高形式。学运的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三三一”运动之后，学运领导机关已总结了经验，有了改变。群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也逐步有所体会。例如过去曾认为学校领导层中有些人是很“反动”的，现在学生会对他们有所分析与区别对待。觉得应以争取为主，能争取的尽量争取。

“五四”十七周年快要到来时，北大学生会已酝酿采用新的方式来纪念。可是当时北平市当局与各校当局还惟恐发生事故，事先严加戒备。北大历来是“五四”放假一天的，今年学校布告宣布“照常上课”，不放假了。我认识的同学中有几位平素比较拘谨的同学，也表示了对罢课游行的厌倦情绪。但纪念会的《通告》

发布出来，标题是：“师生联合纪念五四”，“一、不罢课，二、不游行，三、自由参加，四、请名人、教授讲演。”这消息一宣布，那些平素不爱活动的同学都欣然参加了。这天的会场是在二院大礼堂，到会人多，礼堂里很拥挤。台上坐着好多位请来的教师，记得的有樊际昌、周炳琳、马叙伦、曾昭抡、许德珩等。主持人是史二同学曹盼之。会场正面有副白布黑字对联，可惜写的什么已经遗忘。讲演会一开始，马叙伦、曾昭抡、周炳琳、许德珩依次讲话。周、许两人是五四游行的参加者和火烧赵家楼的在场人，所以他们都先讲“五四”当天的经过。周讲：在赵家楼起火时，他遇到军警抓人，由于他外衣的灰褐色成了他的保护色，飞落到他衣服上的烟灰没有被军警察觉出来，他逃脱了。他身旁的另一位穿了浅色衣服的同学，就被抓走了，被抓的人是谁，他已忘记。他讲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时，把他自己后来出国留学也罗列进去。这说法似欠妥当。许德珩最后讲话，音调昂扬，气势磅礴，博得一阵阵的掌声。他正面阐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汉奸卖国贼才是五四运动的积极意义。他附带提醒周院长说：“你身旁那个满身烟灰而被捕的同学，不正是我吗？”会场里顿时活跃起来。他末后慨叹地说，当年那些曾经勇猛的青年，后来却有的变坏了，有的当官发财了，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在最后勉励今天的青年要对准目标，奋

斗到底。

这次纪念活动标志着“一二九”学生运动策略变化的开端，是成功的。

### (七) 1936年下半年中的片断

“六一三”是一次成功的游行。自那之后，学生与冀察当局之间的关系有了明显的缓和。“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的口号，已普遍开来。

北平发行的报纸中有一家《北平新报》，记述学生运动最详，同情学生主张的倾向显著，至今似尚未见到有谁了解这份报纸的背景。这期间，天津《益世报》的社论，常有与官方报纸不同的议论，对什么“攘外安内”、“读书救国”、“最后关头”之类的论调，持批评的态度，而且文章流畅犀利。它的言论曾引起了胡适的攻击。由于胡适指责他们“不合逻辑”，该报社论立即给胡适以有力的回击（原题是《我们的逻辑》）。听说主持社论的是罗隆基。

援绥开始时，学生会捐献绝食一餐的饭金，我们民先小组的成员都积极响应了这一号召。

10月，鲁迅逝世的消息突然见报，大家心情惘惘有说不出的况味。我赶忙向袁宝华的住舍走去，见他

不在，留条一张，告诉他这一噩耗，等我转回自己住房，见门上塞一纸条，打开一看，也正是宝华来通知我这一不幸的消息。鲁迅追悼会上挽联甚多，只记得有一副是“呐喊前进，岂能而已；热风正炽，且莫徬徨”，另一副是“先生既去，谁再是中国高尔基；遗文虽在，更无人唤醒阿克尤”（即“阿Q”）。

大约在11月底前后，西斋门外路边上有人摆书摊卖书，其中有一本书名是《救国领袖张学良将军言论集》。见到这本书，证实了近日传闻的张学良的政治态度起了变化的传说。渐渐听到杨虎城将军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这些都是在西安事变之前的事。当我从报上看到张学良迎接蒋介石率随员到了西安的照片时，自己心想：“他趁此时机把蒋扣起来不好？”但又觉得不大可能发生这种事。谁料我们在“双十二”那天游行之后，第二天一觉醒来，果然就发生了扣蒋的大事，当时那种兴奋心情，真是难以形容！至于“后果”如何，一时是不去考虑的。

在那几天里，我见到传来的一张西安的报纸，社论是《组织人民法庭，审判蒋介石》，看后当然也是非常痛快。

但是只在三、四天后，同学中就有不少的人冷静下来。在讨论北大应如何表态的班代表会中，学生会执委会的意见，就是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方针，即一方

面蒋应接受张、杨主张，一方面张、杨保证蒋的安全。但少数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学生，则坚决认定张、杨叛国，应下令讨伐，反对用“和平解决”字样。这样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班代表会以多数表决，通过了执委会的意见。几个国民党学生代表退席表示反对。又提交全体学生大会讨论，还是一场纷争。由于少数国民党派学生顽固坚持讨伐张、杨，仍未取得一致意见。所以，北大学生会未能对西安事变公开表态。

#### (八) 陶希圣与“新五四”事件

三十年代初，陶希圣的名字在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我刚进北大时，对他很崇拜的。他标榜是用“唯物史观”治学。他先后开设《中国社会史》与《中国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都选修了，讲堂上听课的人常是满满的。

“一二九”发生后，北大学生会曾约他和曾昭抡教授于12月19日来校讲演，曾先生如约而来，他却回避不到。对他的这一失约，曾使同学们大失所望，并引起些议论。不久有人传说他与汪精卫派系有些瓜葛。但出于传闻，人们也还不甚注意，他的课堂上听课的学生仍然是很多的。他的真实面目，是通过“新五四”事件

才完全暴露出来。

1937年“新五四”事件发生时，陶希圣是被“新学联”邀请的讲演人之一。

预定在和平门外师大举行的“五四”纪念会是新学联主办的。“双十二”后，国民党少数学生为分裂学生运动另成立了一个北平市学联，习惯称“新学联”；原领导一二九运动受大多数同学拥护的学联称旧学联。旧学联主张学运应该统一起来，建议与新学联联合举办“五四”纪念会，并号召同学们主动去参加，以实际行动表示联合。我当时是民先北平队部总交通，曾让交通员送发到会通知。那天，我下午到师大，见主席台搭在露天操场南沿，面向北。<sup>①</sup>我一瞧大操场上黑压压的人群几乎全是旧学联的群众（新学联的群众基础本来很小）。台上正中挂着孙中山像，台两旁坐着邀请的讲演人，有以反共闻名的北师大教授杨立奎、熊孟飞、北平市府秘书长马乘风、志诚中学校长吴葆三等；陶希圣竟然也在其中。我当时站在台下靠前的群众中，身旁熟人不少，记得有北大宋尔纯。正式开会前，场内救亡歌声此伏彼起，接连不断。这时，台上为主席团人选问题，新、旧学联代表互相发生了争执。在台上的新学联的头头有李彬、罗梦赉（都是北大的）等人，旧学联领

---

<sup>①</sup> 报纸上当时有的记载说在风雨操场，是误记。



导人有中大史立德、北大谢云晖等人。台下的群众不断地高呼：“史立德！”“谢云晖！”表示对旧学联领导人的拥护。停一回，台上司仪宣布开会，第一项唱国歌（即国民党党歌），勉强唱了，不过声音微弱；接着群众唱起了《救亡进行曲》，顿时显得雄壮激昂。李彬先讲话，一套反共滥调，台下无人鼓掌；谢云晖接着讲话，台下掌声雷动。正在这时台上又吵起来，陶希圣、杨立奎也大声叫嚣。此刻，忽从操场后面，有一伙学生舞起童子军木棍向到会群众劈头打下来，石块乱飞，场内顿时混乱，台上的桌子也被掀倒，有人飞起一条板凳对着台下群众砸下来，我方台上代表已被推下来，陶希圣站在台中间高喊“打得好”！由于到会群众都是赤手的，而对方则准备了木棍、石块、小刀子。到会群众纷纷向大门外撤退。我也正在向外走时，一个人从背后抱住我的两肩，我还没看清是谁，他头上的鲜血已滴到我白色衬衫上。受伤者原来是北大政治系学生王官豹。我赶紧用手帕护住他的伤口，雇了两辆人力车驰往协和医院急诊。王官豹躺在病床上，他还不断地手挥口讲，向医生、护士控诉行凶者的罪过。

这场行凶动武的指挥者是志诚中学校长吴葆三，而陶希圣那天确实起了煽动教唆的作用。但陶希圣信口雌黄，说那天台下学生不唱国歌，而唱《保卫马德里》，他在报上发表文章叫嚣“反对西班牙残余主义”，

攻击旧学联是“分裂主义者”。他的文章遭到杨秀峰同志的驳斥。同时受伤的学生向法院控告了陶希圣教唆伤人罪。第二天，他的课堂顿时空荡荡，听课的没有几个人了。还听说他本来在朝阳大学兼课的，因为那天朝大有受伤的同学，他怕受报复，也不敢去那里授课了。

《保卫马德里》这支歌曲(吕骥作谱)是当时流行的进步歌曲之一。歌词的第一句是：“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佛朗哥”，这时学生们改为“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造谣中伤的陶希圣……”而唱起来了。陶的名声从此大臭了。

杨立奎、陶希圣和新学联的人还造谣说我们中有人上台摘掉了孙中山的挂像。但有位有心人恰好用照相机拍下一个摘中山像者的镜头，这个摘像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新学联头头罗梦赉。这张照片后来公开刊布出来了。<sup>①</sup>

### (九) 在生活路线下

“生活路线”的提出，大约是在1936年暑假前后。

---

<sup>①</sup> 照片刊布在《新五四事件真象》，当时编印的一本小册子上。

在这一口号下，北大学子的活动大为活跃起来。各种名称的社团：歌咏团、戏剧社、读书会、壁报社等等，如雨后春笋。各种方式的活动，如早操、军训、座谈会、植树运动等在各处开展着。全面的情况我无力说得全。我只记得袁宝华独立主编一份壁报，名叫“炮火”，我是投稿人之一。王德昭、李书箱、余文豪和我共同组织了一个“新哲学研究会”。黎明歌咏团拥有大量的成员，请崔嵬来教唱过“打回老家去”。另外有个别具一格的“救亡啦啦队”，我参加了。这个啦啦队在1937年春季温泉旅行时，曾颇为哄动。<sup>①</sup>

“救亡啦啦队”的队长兼指挥是李涛，啦啦词以及曲谱，是他亲自编写的。啦啦队员都有一顶自糊的彩色高纸帽。温泉旅行时，北大啦啦队头戴纸帽一出场就引起全场喝彩。“罗罗罗，北大不老！”四周围群众就先喊起来。那天，我们表演的几首救亡啦啦歌，也颇精彩。旅行结束，在回来的路上，走到西四时，十来个啦啦队员，临时凑钱，到一家饭馆楼上吃晚饭，竟然在饭桌前戴起五彩的纸帽啦啦起来，引得饭馆伙友们前来围观。借此机会，大家向老板及伙友们作了抗日宣传。

---

① 1937年春学联号召全市学生旅行有两次：第一次在香山，第二次在温泉。

## (十) 西郊露营

露营这种活动方式，很有吸引力。乍从书斋里走出来，到野外搭起帐幕过集体生活，感到非常新鲜。我所知道的北平民先队发动组织的露营共有四次。第一次是1936年暑假。第二和第三次是1937年春末与夏初。第四次是1937年暑假。前三次都在卧佛寺樱桃沟，末后一次是在西郊大觉寺。第一与第四次规模大，人数多；第二、三次人数少。我参加了第二、三、四次。

1937年清明节前后，这次（即第二次）是东城区民先队组织的，同年夏初，小麦半黄的时候，又一次（第三次），是“沙滩大学”杂牌队组织的。这两次都是一百多人，大部分是东城区各校学生。北大学生参加清明节这次的最多，我能记得的北大学生有杨雨民、卢荻（陆平）、刘志诚（刘居英）、袁宝华、朱仲龙（朱穆之）、薄怀奇、周文光、吴承明、宋尔纯、孙传文、何兆仪、唐尊准、陈纯英、倪学慧等人。杨雨民任总司令。北大以外的各校同学以及活动内容，这里不多讲了。<sup>①</sup>我着重讲一下第四次大觉寺的夏令营。因为过去记述这次的文

---

<sup>①</sup> 这次活动中，由卢荻、吴承明等同学第一次把西安事变中捉蒋一幕，用京剧形式来演唱。

字比较少。

1937年大觉寺夏令营，对外说是北平学联主办的，实际是民先总队部委托五个大学的民先队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筹备的。我听说五人小组有北大的杨雨民、师大的丁发善(丁秀)、中大的高元贵，还有东大、平大法商学院的。原定计划是从6月28日开始，十天一期，连续办几期。单是第一期报名参加的就有三百人左右。杨雨民原是民先总队部武装部长，由他任夏令营部司令，大家叫他“杨司令”。营部下有政治部，主任是北大宋尔纯，副主任是中大吕世隆。后勤部主任是中大高元贵。此外还有交通联络部、宣传部等。营部聘有军事指导员，由袁也烈担任。全营共编成三个大队，辖若干小队。第一大队队长是师大丁发善，第二大队队长是我(当时名叫孙兴诗)，第三大队队长是汇文中学学生边疆(李文)。军事活动按大队编制活动。其他活动又划分为若干组：有时事研究组、军事研究组、话剧组、歌咏组、新文字组等。营地用十几座帐篷搭在从大觉寺上山一里多远的山半腰。这里有一块平地，周围树木很多。黎明吹号起床，列队升旗，第一项活动是爬山比赛，争夺山顶上的一面红旗，旗上写“东北失地”。早饭后，宣布一天的日程。或练歌，或座谈，或分组活动，或请名人讲演。一次，请来高崇民同志作西安事变的报告，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与事变中的一

些细节，最受欢迎。晚上，点起营火，与当地驻军、老百姓联欢。有位曾隶赵登禹部下的二十九军军官讲他自己参加喜峰口夜袭日军的经历，也是很动人的。营地周围的山谷、树林中，终日回荡着救亡的歌声。师大的赵启海是位歌唱家，他最爱唱，也善指挥。另外，女子文理学院的唐仪慧、鄢仪贞也教大家唱歌。“看吧，同学们，战争开始了，冲出你们的课堂，走上前线去……”这首歌，反复地唱，可以看出青年们多么渴望抗日战争的到来。这次夏令营以学习军事，学习打游击为主，比起春季的两次露营作了更多的军事演习。演习拂晓攻击，演习夜间偷袭。有一次演习夜间攻守，我指挥守，丁发善指挥攻，从黄昏开始行动，演习到深夜，末后由袁也烈总结评判，指出攻守两方面的正确与错误的地方。

这一期夏令营应于7月7日结束。7日黎明，隐隐听到西南方向有炮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司令”派丁发善骑车下山与市学联联系，打探情况，与此同时，当地驻军也派人来告诉我们今日不要外出活动，两方面得来的消息知道了卢沟桥我军与日军已经干起来了。于是吹号集合，杨雨民向全营传达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并说夏令营本期结束，不再续办，号召大家回城后投入支援二十九军的抗战工作。当日杨雨民先回城里，由丁发善带队准备回城的事。这天大家全守在营

地上，不再四出活动。筹备就绪，到7月8日早餐后，由丁发善率领全营离开营地，向城里进发。为了防止路上可能发生意外，除派出前哨先行外，还宣布了行军纪律，作了些必要的准备，一路之上，不唱歌，不说话，以急行军的步伐向前走。只是到了红山口时，与二十九军的部防岗哨进行一次接洽，就顺利地回到城里，各自返校了。

### (十一) 7月28日一昼夜的变化

“七七”后，北平市学联立即号召同学们投入宣传、募捐、慰劳、救护各种抗日工作中，口号是“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虽然比以前明朗了，但好象还留着“和平”的后门。卢沟桥头断断续续地打着，这星星之火能否成为全面抗日的起点，大家还摸不准。

北平街头、十字路口都用麻袋包堆起了堡垒(守城士兵持枪进入到堡垒中)，城门半闭，古都确有些奋战气氛。但听说天津方面妥协活动正在进行。是战？是和？冀察当局似乎犹疑不定。一天，忽然街头的堡垒又撤除了，传说是宋哲元自山东原籍(乐陵)回来下令撤除的。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是他路过天津时受了

汉奸的包围。

时局的乍阴乍晴，使许多人感到苦恼。

拖到 27 日的傍晚，我在西斋院内忽然听到叫卖“号外”之声，赶紧跑到门外，从报童手中买到一张，在马路的电灯下，赫然出现的大字标题是：——

“民族抗战正式揭开

宋委员长下令限三小时内肃清平郊日军”

这一下可真把人鼓舞起来了！宿舍内、校园内立刻纷纷议论起来。到晚九时以后，城外的炮声一阵阵地传来，大家无法入睡。我和几位同学架梯爬上房顶，希望能望见城外的炮火。

28 日一早，刘玉柱把我拉到学生会办公室（在北大旧图书馆院内）内协助工作。学生纠察队在各院门口设了岗。学生会办公室内人来人往忙碌极了。报馆电话，不断传来捷报，什么“我军已攻下廊坊”，“丰台激战，敌军不支”；什么“我军坚守南苑”，“我军已攻下天津东站，庞炳勋部加入战斗”，“中国空军已出现在天津上空”；什么“通州张庆余部保安队反正，殷汝耕下落不明”，等等。随着电话的传音，学生会内一阵阵欢呼，油印机不停地滚动，把收到的捷音立刻印成传单到街上散发；街上的警察也帮着分送宣传品，真是一片欢腾气氛。

傍晚前后，我在红楼门前，听到远外一片欢呼声、



鼓掌声，经久不息。等一会，听一个骑车前来的同学说是守南苑的二十九军一部退进城来，市民们为欢迎守军发出的欢呼。他自己看到战士们浑身沾满了泥土。

总之，这一天我们在紧张、欢乐中度过，幻想着明天迎接更大的胜利。夜深了，我们还在红楼后操场上谈着，笑着。那天晚上，我没有回西斋宿舍，睡在新四斋杨雨民的房里。

第二天(29日)早晨，我和杨雨民还在睡梦中，朱仲龙推门进来道：“快起来，外面的局面变了！”我们一翻身爬起来，问“怎么了”？“大概二十九军夜里撤走了！”朱说。跑到街上一看，昨天欢快的警察今天变成无精打彩，带枪的保安队变成徒手兵。市民们的脸上罩上了一层愁雾。急忙买当天的《北平晨报》看，冀察首脑宋哲元、秦德纯退往保定，另外由宋哲元指定的人组织了维持代理机构。一夜之间，北平已经沦陷了。只是日军还在四郊，没进城来。

民先队总部通知出西直门往保定撤退。关于这次撤退没有撤得了、走出西直门又折回城内来的情况，我在另一篇回忆民先总交通工作的文章中已有记述，兹从略。

## (十二) 陷在围城中

29日下午，我们从西直门火车站折回之后，校园内还有一些同学。其后，有些同学已分别投亲靠友，隐蔽起来，失去联系了。当时的情况是日本兵暂时还没进到城内来，但是平津、津浦、平汉、平绥铁路线均已切断，火车不通。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还暂时坐守在校内。怎样才能脱离这座围城，大家除等待外，一时还想不出办法。第三天或是第四天午后，郑天挺先生召集留在学校的同学约有五、六十人，在西斋食堂里讲话。他除了把近几天来的消息告诉大家外，宣布学校还可给每人发放三十五元钱，劝大家自己设法脱身出走。

日本兵会几时开进城来，又将会发生些什么情况，无法预料。西斋和五斋的大门都已封闭，只开二院的大门；内部的隔墙上打开了几道豁口，住西斋的男生上街穿过五斋进入二院，然后出大门。后来听说日本兵快要进城，担心会有捕人的事，散住东西斋的同学就夜宿到新四斋灰楼里去。灰楼夜里关上前门，打开后窗，必要时可以跳窗逃走。

葛佩琦和宋尔纯曾骑车出城转了一圈，发现高粱

地里还有些二十九军的伤兵。他们回来后号召大家救护伤兵，临时在三院礼堂里设立救护站，安排下床位，分遣同学到城外去抬伤兵回来。在他们的号召下，不仅留校的北大同学，还有附近各中学的男女学生多人，也参加了救护工作。但只办了一周，听说日军将入城，又赶紧设法把伤兵转移出去，这个临时救护站就结束了。

日本兵是8月8日开进北平的。当天的报上有大字报导，好象说还通过一个“入城仪式”而开进来的。接着，在街头上就见到日本侵略军的岗哨和汽车了。这时，大家提心吊胆，格外小心了。

在日军进城的前两天，即8月6日，平津之间恢复了通车，有的同学已开始出走。目的地是先到天津租界，然后坐船去塘沽出海，回到未沦陷的国土上去。但伴随而来的传说则是：天津租界挤满了难民，出海的船只很少；租界中的物价昂贵，一瓶汽水要两元，一个面包要三、四元。这些传说使大家对走的问题颇费踌躇。刘玉柱决定8日走，那天早上天还不亮，我骑一辆单车送他上站，站上已有日本兵，但尚不阻止出走的旅客。返回学校后，我也开始下决心作出走的准备。

### (十三) 流亡途中

出走准备的第一件事，是把我的被褥衣服连同几个箱子送进当铺，居然还当了二十多元钱，加上从学校领的那笔钱，路费就算够充裕的了。第二件事是几年来自己的书籍、笔记本等一些什物装进柳条包，从西斋宿舍送到三院的临时储藏室。这件事想来可笑，当时好象觉得过不多久，我们还会回来的。其结果是经过八年抗战，原物皆荡然无存，最可惜的是“一二九”学运生活中几十张照片全丢了。

我决定乘8月11日车出走，当时的想法是身边什么也不带，不表露自己是学生。出走前夕，新四斋里几乎已是空空荡荡，见不到什么同学了。但10日下午在沙滩街上遇到东北大学一位女同学名叫郭宜佳的，她在夏令营中是我们大队的。她听说我明天走，愿和我结伴同行，当天下午就把她的两只皮箱送到我住的新四斋来，约定了明晨会见的地点。她走后的当晚，又有避居在朋友家中多日不见面的李书籍找我来。我认为他正患肺结核吐血，无法走。他表示留在这里会闷死，也决定同我一道走。11日一早我们三人会齐，直奔前门而去。上午8点火车徐徐开动，车内十分拥挤，但还

勉强能找到座位。车的滚动很慢，而且每到一站就要停下来，等到对面开来的日本运兵的车过去，才能再前行。每一次停车少到半小时，多至一小时。对面开来的车有客车，也有“闷罐”车，都是满满的日兵。闷罐车内用木板架隔成上下两层，日本鬼子在里面仅能坐卧，站不起来。天气酷热，我们车上无水供应。对面车上的日本兵，好多是脱光了上衣，每人拿着把涂着红“膏药”的白纸扇，不停地挥动。这样走走停停，直到夜里九点了，才接近天津。当时心境异常烦乱。“下车后会是什么情况？到哪儿去落脚？”心中无数。车停下来后，大家纷纷下车，我替郭宜佳扛起一只大皮箱，另一只手提些小零碎物件下了车，郭与老李跟在我后面，随着人流向站口涌出。站口内外有两行上着刺刀的日兵，我们从中间穿过。我出站口没遇上阻拦，一口气扛出三十米远的地方放下来休息，却只有郭宜佳在我身后而不见李书箱了。回头走了几步，遥见李书箱正被两个日本兵挟持着搜身。李是个病号，除了一把纸扇、一生长衫外，什么也没带。可能正是因为他什么也不带，摇摇晃晃，才引起日本鬼的疑心。好在搜查过后，放了他，我才松了一口气。对照之下，我的顺利通过也许是我扛着行李，又有小郭紧随，倒象个“携眷”的难民模样，才没遭到检查。

我们三人会齐前行，一转弯就到了“法国大桥”的

外边，桥下就是海河。如果能穿过大桥，进入法租界，就有安全感了。但时间已晚，桥门已封锁，只得在马路边道上停下来等待。一天之内，滴水未进，口渴如焚！迫不得已，我跑到海河岸下，用茶缸装了一缸水上来，在暗淡的灯光下，看不出是清是浊，试喝一口，腥臭之极，赶忙吐了。正在这时，有红十字会送来几桶开水，大家分到半杯，才略润渴喉。等了多时，法国桥门是不开了，人们都已疲倦不堪，于是就地和衣睡倒在路边上了。夜半醒来，睁眼一看，明晃晃的刺刀，在我脚前摇动，吓了一跳，仔细一瞧，是几个日本兵在我们脚前巡逻。我轻轻推了一下睡在我身旁的李书箱说，“你瞧！”这样，许久不能合眼。刺刀的影子仍然晃来晃去，望着天上的星星，听着海河的流水，第一次感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

第二天醒来，太阳已经露面。一看左右睡起的人，好多是北平学生，而与郭宜佳并睡在一起的有师大女生杨延莼，也是西郊夏令营中的队员，彼此相对无言。接着法国桥门打开了，大家一拥而入，这才好象自己的生命暂时保存下来了。

进入法租界后，就听说由北平出来候船的同学都住在广东中学。我们找到那里，洗脸吃饭之后，立即出去打听船票消息。我到了太古公司的码头售票处，遇到一位三十多岁的青年人，对我非常客气，他告诉我明

天(13日)就有船开往塘沽,到塘沽后换乘大船去烟台。我买到了三张票回来。但郭宜佳要买去上海的船票。临时,我又转回码头替她换票,并代其他同学买了几张票。遇到的还是那位青年,他告诉我“这几班船就是为帮助大家逃难而专开的”。他那彬彬有礼的态度,主动热情的帮助,使我得到一份意想不到的温暖。13日晨我们上船时,他又在码头上照料,频频向我挥手,简直象老朋友送行一样。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然不时的浮现着他那硕长而俊秀的身影。

郭宜佳去上海的船要晚开两天。我与李书箱从离开广东中学就和她分手了,从此再没见过她。

开往塘沽的船是太古公司的一艘货船,人们都在甲板上。这时我遇到了“沙滩大学”的彭金波,他是我们民先队的总交通队员,和我很熟。船还没开,就听说上海已经打起来了(是“八一三”!)我和老彭正在议论上海开仗的形势,忽然看到从上游飘下来一件东西,愈飘愈近,渐渐看清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喊出“浮尸!”——海河的浮尸,我们亲眼看到了。

船沿着海河弯曲的河道东行,迎面而来的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型号的日本汽轮,满载着日本侵略军。一只快艇破浪逆流而上,艇上有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家伙,手提着武器,傲然地站在船头上,从我们船旁急驰而过!

傍晚，我们到了塘沽。改换海船，须在这里等候几天。三天之后的下午5时，换乘入海的航船。几小时后船进了渤海湾，正是黄昏时分。夜幕降临，大家仍站在甲板上了望。半个月来沦落在敌人的铁蹄之下，憋了一肚子闷气，到这时，总算逃出了虎口，全船上激昂的救亡歌声顿时激荡起来，直到夜深。翌日下午3时，烟台上岸，有游子归来之感。始终结伴同行的李书箱和我一道，经烟台而昌潍，而最后达到济南，他一路之上吐了不少的血块。济南是我的故乡，当时成了平津流亡学生汇集转运的枢纽。好些人从这座有名的泉城分赴太原、延安、南京、武汉等地区，也有一大批民先队员、平津学生留在山东当地。从此各自走上了以后的征程。

1985年4月26日

（本文作者：孙思白，即孙兴诗，1934年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 片断回忆

# 记忆残片

——忆“一二九”时的北大

朱 穆 之

---

“一二九”过去五十年了，记忆在时光长期的冲刷下，象碑刻一样，有的不可认了；有的还有痕迹，但模糊了；有的却还很清晰。记忆常常是奇怪的：一些似乎应该记得的重要的大事，却完全忘记了，而一些很琐碎，

不值得记忆的事情，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记下的是那些还记得、或多少还认得出的痕迹。

我想起“一二九”前夕北平和北大的一些情景。

“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北平可以说是风雨飘摇，一日数惊，越来越萧条冷落。

1934年宪兵三团到北平以后，白色恐怖迷漫。学校里、公寓里常常是黎明抓人。我在中学的同学被捕了，在北大经常相处的同学被捕了。古城一片死寂，简直使人憋得透不过气来。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显得空空荡荡，可以在东西长安街的中间踱步。王府井算是最繁华的地方，也是行人稀少。甚至东安市场也冷落得象一座古庙，白天阴沉沉的，即使最热闹的傍晚，摊铺上耀眼的灯光，也只使人感到空寂清冷。

学校里，学生什么活动都停止了。传来的只是什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成立了，华北要“独立”了；一些日本浪人横行霸道，寻衅闹事；鸦片、白面公开贩卖；日本货充斥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处店铺、摊贩……。

国家是不是就此灭亡？个人是不是真要当亡国

奴？是不是听任国民党当局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而加紧打内战？

弦紧到极限了，于是崩裂了。

北平一二九运动象闪电、惊雷一样，划破了乌云低垂的夜空；也象闷着的一堆火，猛地窜起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北平这座古城发生了大地震，震动了全国。

## 二

“一二九”的前一些天，北大就准备成立学生会，各班已经选出了班代表。“一二九”那天下午三四点钟，红楼后面的钟激烈地响起来。大街上人声沸腾。我到楼下，看到当时在东北大学学习的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召唤着大家去游行。似乎他也敲了钟。但这时队伍已经过去。不久，游行的同学回来了，说在王府井南口队伍被军警打散了。有位同学被打破了头，包扎着。大家簇拥着他，就在红楼后面的操场上开了一个会，这位同学站在一张桌子上报告了经过。当时天已将黑，参加的人不多。

“一二九”后，学校一下就沸腾起来了。学生会立即成立了，准备“一二一六”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一二一六”大多数的北大学生都参加了，队伍很

整齐。我住在西斋（即现在景山东街教育出版社的西侧），头天晚上，我就非常兴奋，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大家集合要出发时，门口已被上着刺刀的警察堵住。正在相持的时候，东斋（现在沙滩红楼的西侧）的同学列队来接应，于是内外呼应，西斋的同学一下冲了出去。大队由西斋向东走到东斋门口时，见到警察正用小车推着水龙带跑过来，但是，他们来晚了一步，同学们迎上前去，把水龙头抢下，在地上把它砸弯了。这时，听到有人叫喊：“有人被捕了！”是大队到警察署去要人？还是继续前进？大队没有停下来，继续前进。一路高呼口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和《救亡进行曲》等，大家又激昂又悲愤，同时团结得紧紧的。

队伍经南长街北口到南口，队伍突然站住了，原来这里有一个警察圈子，一批警察一字排开，拦住了去路。有的警察手持水龙，对着队伍喷射，几位走在前面的同学，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从头到脚都被浇湿了。警察没有料到这一手，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同学们奋力把水龙夺了过来，反过来对着警察喷射，警察连蹦带跳地狼狈奔逃（当时，有人摄下了这一动人的情景，曾登载在报刊上）。这时，队伍也乘势冲了过去。以后，军警又手持木棍疯狂地反扑过来，把抢夺水龙的同学打伤了，夺走了水龙，但同学们已用小刀扎破了水龙带，水射不起来了。有同学又跑到南长街口外，向守着

接水龙头开关的两个警察冲去，他们一见同学上来，抱头逃跑了。

### 三

“一二九”的大火烧起来了！北大当局慌了手脚。学生会成立后，宣布罢课。胡适在红楼的一间办公室召集学生会的一些同学开会，他告诫学生要安心上课，说什么华北的事，北平的几个大学校长正在向北平当局交涉，学生不必过问。

胡适是很自负的，他讲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关于华北大局，有蒋校长（梦麟）、梅贻琦……和胡适在顶着。”他说自己当时是不说“我”，而是以第三人称谓“胡适”。以前，我曾听说过，他在上课时说：“近几年来，称得上学术著作的是胡适的《说儒》。”我原来只是听听而已，这一次，我亲耳听到他这样讲自己，真是“如雷贯耳”。这时学校当局的立场，应公平地说，也是不满日本侵略的，但是他们害怕和反对人民起来斗争。胡适的劝说当然无效。

学校当局并不了解学生的情绪和觉悟，他们总认为罢课是少数人在操纵，因此，决定自己召开学生大会，动员学生上课。会议是下午在三院礼堂（现为民政

部)召开的,胡适自告奋勇上台讲话。他刺刺不休地讲着,一手拽着挂在脖子上的长围巾的两端,一面说,一面舞,学生就在下面捅他,叫喊着,要胡适下来。无奈,他提出表决。结果使他大失所望,赞成复课的只是极少数。于是,他灰溜溜地走了。

学校当局并不因此罢休。学生会贴出继续罢课的布告之后,布置了纠察队。理学院的同学在红楼的文法学院站岗,文法学院的同学在理学院站岗。学校当局也布置各院院长站岗,以为会有同学来上课,被纠察队挡住。

早上,理学院二门的大红门上贴着学生会的大字布告,蒋梦麟一下汽车就气呼呼地和纠察队站在一起说:“你们站岗,我也站岗。”站了一会,没有人来上课。纠察队的同学有意奚落他,要工友搬张椅子给校长坐。蒋梦麟看一直站下去也没有意思,便嘟嘟囔囔着,怒冲冲地跑了进去。

在红楼,理学院的同学在进门的楼梯下站岗。胡适夹着皮包走来,斥责同学说:“这是爱国?简直是胡闹!”同学们也毫不示弱地说:“这就是爱国,你才是胡闹呢!”胡适一看不对头,回头就上楼去了,一面走,一面说:“真是对牛弹琴。”同学们大声地说:“你才是

牛。”<sup>①</sup>

过了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同学夹着一个包走来，站岗的周院长立即走上前去，招呼他快来上课。那同学笑嘻嘻地说：“我是来洗澡的。”大家哈哈大笑，弄得那位院长十分尴尬。结果，因为同学顶撞了胡适，在红楼站岗的十二位同学，受到挂牌警告的处分。

“三三一”在北大三院开会抗议政府“杀害”被捕学生郭清，学校当局更用高压手段开除了四位同学，但是，并没有吓住同学。以后，在1936年下半年，学生会领导机构改选时，学校当局派课业长来监督，即使这样，投靠国民党的右派学生，还是没有选上；相反，进步同学为了团结大多数，有意让了几个位子给他们。

#### 四

从“一二九”到七七事变，学生内部也是有变化的。

北大的风气，一直保持着自由的传统，学生中有十分进步的共产党左派，也有很反动的国民党右派；有埋

---

<sup>①</sup> 总罢课中，“红楼”门前，纠察队员与胡适院长的一场对话，当时流传甚广，辗转传说中，难免互有出入。本书姚震江所写《“回敬”了校长先生》一文，追记了此事，可与本文所记相互参证。

头读书的，也有整天游逛的；有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的，有的甚至只是在开学时来报个到，期末应个考，平时根本不到校。课堂是公开的，本校学生与非本校学生都可自由来听课，因此，沙滩周围住着许多非北大的但在北大上课的青年学生。

同学之间关系也很奇特。大一些的宿舍，每个人各自用布围起来，自成一个小天地。和我同房，脚对脚住的一位同学，就围在这样一个帐子里。我们相处两年，见面没有说过一次话，甚至没有点过一次头。也有一个同学，中午起床，下午找朋友，晚上看戏，两年间，除了应付考试，没有见他正经地读过书。

在 1933 年，我进北大时，学生还是相当活跃的，有各种活动：选举学生会，举行各种座谈会、讨论会，成立各种文艺团体，办各种刊物等等。当然，也有各种斗争。1934 年国民党宪兵三团到北平之后，大肆镇压逮捕，各学校就陷入了恐怖之中。但是，共产党的影响，却反而在暗中逐渐扩大，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屈膝媚外，勇于内战，腐败黑暗，特务横行的情绪越来越普遍。

“一二九”后，进步力量在北大占绝对优势，学生会一直为进步学生掌握着。1936 年国民党操纵一批学生在各大学寻衅闹事的时候，只有在北大他们没有敢动手。当时，进步同学都在房间内，准备着棍棒，防止



突然袭击。

但是，也有少数人投到国民党方面去了。1936年初，蒋介石要各大学派代表到南京去“聆训”，遭到同学们的反对。当时，北大学生会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派代表去“聆训”。当局无法，就私自指派了三个学生。这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后来，学生会在三院开大会，决定把这些学生驱逐出校。其中有一个住在东斋，会后，同学们一起到东斋宿舍，把他房中挂的墨索里尼像和铺盖都扔到街上去了。

到1936年下半年后，分化就更明显，特别是要毕业的学生，在毕业即失业的威胁和国民党的利诱下，有的动摇了，转了向。有的人加入国民党，找到了“门路”，忽然一时神气起来了，穿着绸袍子，戴上黑眼镜，两眼朝天，趾高气扬。

当时，宋哲元也拉拢大学生，在南苑招考，不少失业的大学生去应考。宋哲元亲自到考场，宣布一律录用，每人每月十元。

有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典型。有一位同学原来和我们朝夕相处，十分亲密，“一二·一六”时，曾一起抢过水龙。但没有多久，他就加入了国民党，参加“新学联”，成了主要人物。有一次，他找我解释，他为什么加入国民党。他说：他相信共产党将来能成功，但是，十五年内不能成功。他已经二十五、六岁了，他要光宗耀祖，

等不得了。有意思的是：七七事变后，他也流亡到南京，后来大概在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医院里，当了一个小职员。南京陷落，我们恰巧又在武汉的街头相遇。他神色暗淡，定要找我谈谈。他原来是学政治的，他说，他不能当政治家，只能当政治学家，因为政治家必须“狠毒”，必须能踩在别人的头上往上爬，显然，他不行。他虽然只当了一个小职员，也受了别人的打击和排斥。以后，听说他在西安干了一个小差使，但是，被以贪污的罪名，受到处罚。更有意思的是：恰恰不到十五年，我们党取得了胜利，人民取得了胜利。

## 五

回忆“一二九”，还不能不想到在学生周围的一些人。北大宿舍的一些工友都同情和维护着进步同学。有特务到宿舍去蹊蹶，门房挡驾。有特务曾想到东斋去抓人，门房就配合学生把大门关上，狠狠地教训这些特务一顿。

沙滩有不少小饭馆，主顾是学生。红楼对面有一个饭铺，我常去那儿吃饭，伙计常常为学生放风。有两次，他就悄悄地告诉我：有人盯梢。七七事变，日寇进城，铺子关门闭户，这个饭铺也半掩着门。我仍然推门

进去吃饭，伙计说，只要有吃的，你尽管来吃好了。平津通车后的第三天，我就和同学们走了，我还欠下饭铺十七元钱，没有还。北平解放后，我进了城，就去找这个饭铺，但是，一切都已改变了。我一直怀念着这些人，总觉得亏欠了他们些什么，不只是钱。

（本文作者原名朱仲龙，1933年入北京大学外文系。）

（江长仁根据录音整理）

# 从“一二九”到“三三一”

巫 省 三

---

## (一) 参加“一二九”游行

1935年12月9日下午，我们正在红楼上课。突然，听到外边大道上高呼口号的声音。我们冲出教室，直奔楼下，加入了游行行列。队伍四人一排，手臂挽着手臂前进。

那天无风无尘，但寒气刺骨。队伍到王府井南口，天色渐暗。商店闭门歇业，灯光模糊。反动军警用高压水龙对准队伍喷射，许多同学满头满身都是水，冰冷

澈骨。手无寸铁的同学不得不避开。反动军警趁势挥舞木棍、皮鞭，见人就打。我亦挨了一棒，后躲在一个洋行的铁栅门里。

## (二) “一二一六”被捕和狱中斗争

16日这天，天刚破晓，我就抱着昨天朱仲龙（朱穆之）同学交给我的一包标语和传单，走出西斋，骑上昨晚租就的自行车，急急忙忙地向东骑去。

这包宣传品，今晨就要派用场，是送往崇内船板胡同汇文中学的。我到那里，传达室已有四、五位同学在等着。我转交了宣传品，并交待了要遵照规定的出发时间和游行路线，就回头了。待我回经沙滩时，见附近有三五成群的头戴毛皮帽、身背盒子枪的侦缉队在逛来逛去。这时，军警紧盯着东斋紧闭的大门。景山东街散布的侦缉队更多。西斋的大门敞开着，门外也有侦缉队监视，只准进，不准出。我回到了西斋。

七点多钟，西斋的游行队伍从大门向里排成长长的一条，但冲不出去。我这人一向比较有冲劲，见此情景赶忙跑到队伍前头，和另一位同学，举起游行横幅，就向外冲。跨出大门未走几步，侦缉队一拥而上，挡住了后面的队伍，把我和另一位同学，由他们每两人挟持

一个，挟住就走。一路上，巴掌和拳头猛向我脸面打来，我的唇鼻被打得鲜血直流。我们被押到内六区警察署，还被用手铐锁在走廊的木柱上。

警察署的电话铃响了。听到接电话的问：“怎么？东斋的冲出来，向景山东街奔去。”

我心里想，大概是东斋的游行队伍冲出来，去迎接西斋的队伍了。我向身旁的同学点点头，接着问他贵姓，他说：“我叫葛佩琦，物理系的！”我也告诉他，我是史学系的。两个互不相识的同学，今天手铐在一起熟了。

巡警过来拉着我朝北屋走去。一个留着“仁丹”胡子的胖警官见我来了，开口便训斥道：“你们共产党就想破坏华北特殊化，破坏睦邻关系！讲！你们游行想干什么？！”

我不由得怒从心头起，忿忿地回答说：“要是我们游行的都是共产党，早没有你的今天了！”

“嗯？你胡说啥？跪下来！”

一听到这“跪”的字眼，我更加怒不可遏，大声疾呼道：“我是北大学生，抗日救亡的学生！你是什么人？只有你，向日本军阀跪下吧！”

“仁丹”胡子猛然站起来，咆哮着：

“你、你、你……”

突然一个巡警匆忙跑进来：“报告，您的电话，要您

亲自接。”

“仁丹”胡子把手一挥，巡警又把我带到走廊，依旧把我锁住。

“怎么？游行队伍到了长安街！有几千人！水龙、大刀也抵不住？再派人？我这里全派出去啦。”

只见那“仁丹”胡子焦急地走来走去，几个巡警进进出出。电话铃又响了，还是他接：

“实在派不出去啊，我这儿还逮来了不法分子，总得有人守家呀，万一这儿被冲进来，那……那……那。”他慌了，躲到一边去了。

日近黄昏，我们又被押解到前门内北平市公安局。这时，公安局里已关满了被抓来的学生。我们被搜了口袋，交了自来水笔、钥匙和钱钞等，然后就给分开了。我被推进一间大而阴暗的监房。

监房没有灯。进门靠北墙第二个砖石的睡位上，有一位背倚北墙的同学。我隐约见他手帕上全是血迹，再仔细一瞧，他就是我的同学李俊明。我坐在他脚头，他告诉我：“黄淑生同学背上给砍一刀，大衣都给砍破了。”

监房南角有只便桶，中间有只小煤球炉。二十多人挤在一起，混杂的气味叫人作呕。我们都来自各学校，不问姓名，比兄弟还亲。我们手拉手，胆大气壮，什么都不怕。我们唱救亡歌曲，未见有人来干涉。我们

谈论着国内形势，有同学说：“想登场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下该垮了台了吧。”另一位同学说：“我们爱国者受苦，决不让卖国贼手舞足蹈！”又一位同学说：“华北当局以萧振瀛为最坏，他是蒋介石的代理人！”我想起过去，接口说：“提到蒋介石，我讲件他‘九一八’后的事。那时，我们上海学生近千人去南京请愿抗日，在总统府门前坐了一夜，第二天被押送到中山门内中央军校大礼堂听训话。来训话的就是蒋介石。他操着一口宁波话，发誓说：‘三年内不驱逐倭奴，收回东北，杀我蒋介石的头！’而今不是三年，而是四年了。现在东北未收回，华北又要变颜色了，可蒋介石的头仍在发号施令。他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我们能容忍吗？”一位同学激昂愤慨，大声疾呼道：“对这帮家伙早就绝望了，打倒投降派！”一位美术专校的同学把竹筷插在煤炉里烧焦，在墙壁上画投降派的傀儡嘴脸。

在校同学不止一次地送来慰问品。第三天，各学校派车把所有关押在公安局的同学接了回去。我们高兴的是第二次大游行示威击破了投降派的美梦，进一步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涨，也为我们越过古城向河北省广大同胞宣传抗日救国铺平了道路。



### (三) 南下扩大宣传纪略

1936年初，南下宣传团先一日出发。我和谢云晖两人从西直门乘长途汽车赶往固安，到霸县途中才追上队伍。当时，路上遇到商震的三十二军一个团向南撤退。这支部队对同学颇有好感。我们唱“打回老家去”，他们也随声跟着唱。他们默默地向我们点头，表示同情。

行进途中，一日我们息宿在一个小学校时，何兆仪、唐尊准、张毓珣等女同学唱“国际歌”。团长韩天石跑来向她们说，你们唱得低一点，别予人以口实。

当我们团救援另一团在辛立庄被围时，我们星夜赶路。真冷呀！天是漆黑的，只有西垂的弯月和星星在空际闪烁。队伍摸索跑步前进，每个人呼出的水气在衣领上结成了一层冰。那结实的小个儿叶纪霖，眉毛鼻涕连结成冰钟乳了。

北大这一团抵达保定时，住在教会学校——同仁中学里。原和当局谈判宣传三天回北平，但当局不答应，并包围我们。我们被监视回平。回到北平那天是除夕，我们仍象在河北平原宣传的日子一样，和衣同榻而眠。

#### (四) “三三一”被开除前后

“三三一”那天，我被分配监守大门。8时左右，反动军警突然聚集门外，大门边门紧闭了。大会正在进行，我怕军警冲大门，跑到庶务室向管事务的牛胖子<sup>①</sup>要把锁，想把大门锁牢。牛胖子似理不理地翻翻眼睛说：“没有！”大门虽未上锁，军警也未冲大门。他们徘徊在大门外，似乎在等待什么。出乎军警意外的是：大会结束，同学们穿墙上街游行去了。等到我们把边门打开，一个军警也没有了。

下午4时许，谌湘汉同学跑来告诉我：学校贴出布告，把我和韩天石、吴沛苍、叶纪霖四人开除，交公安局逮捕法办，学校不再负责我们的人身安全。他要我快快躲避。我随即离开西斋，住到后海我朋友曹姓家里。

对于被学校开除，我想：我的“中彩”，可能是牛胖子的“贡献”。我又想：我们四人分属文理法三个院，一二三四年级各有一人，由此可见学校当局破坏学生运动的良苦用心了。这时，很多同学请学校收回成命，但学校当局对爱国学生却毫无同情心，甚至以辞职反向

---

<sup>①</sup> 北大总务处有一管事务的姓牛，是位五十岁的胖子，留有八字胡，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同学们要挟。我对学校死了心。

北平的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不能让我在古城长此隐蔽。当我和韩天石、吴沛苍在西单商场一个咖啡馆会晤之后，知道韩决定到四川去，于是我也只有回南方了。启行前，葛佩琦、谢云暉、何兆仪等同学，在东安商场森隆西餐馆为我饯行，并送我到正阳门车站上车，还送我铜尺、铜墨盒等纪念品。我心如刀割，无限痛苦：同学们的兄弟情谊，犹如骨肉。我依依不舍，禁不住声泪俱下。

永别了，红楼，我亲爱的北京大学！

后来，我到了上海，同田间、宋之的等文艺界朋友生活在一起。9月，何兆仪来沪，中秋之夜在黄浦江游船上，我们回忆过去，畅谈当前形势和奋斗目标。她谈到她要到苏联大使馆工作的事，我钦佩她求进步的勇气。她劝我继续求学，我因前在光华大学读书时（1933年冬），由于参加“左联”，早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布告通缉有案，现在我不能在淞沪地区，公开名姓，自投网罗，暂时仍只能追随在几位文艺界朋友之后，做些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工作。10月上海文艺界举行鲁迅先生殡仪游行，我参加了。仍然像“一二一六”一样，是手举横幅的人，从万国殡仪馆一直到虹桥公墓。<sup>①</sup>

---

<sup>①</sup> 鲁迅先生墓原选在虹桥公墓，解放后，才迁移到现在的虹口公园。

下葬前，在宋庆龄主持的大会上，听了沈钧儒等人抗日救国的演说。次年，七七事变以后，葛佩琦、谢云晖等同学来到南京，我们重又见面。我们又在南京街头宣传抗日救国。

1984年5月20日

（本文作者巫省三，1934年入北大史学系）

（本文由张泉田根据作者的三篇回忆文章综合整理而成）

## “一二一六”大示威亲历简记

顾 德 麟

---

1935年的寒冬，北平人们的心情是空前沉重的。日寇已侵入关内，蚕食冀东，平津危象环生。一天傍晚，我曾在东安市场遇到日本浪人，高举皮鞭，向拥挤的人群，乱抽乱打，造成一片混乱。我也曾在后门内，看到日本浪人从人力车上抢走座垫，反而向车夫勒索赎款。我又听人说，在天津“河北省政府”的大门外，八字墙边，竟有日本兵蹲下大便，旁若无人。敌人对中国人的欺侮，无所不用其极，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对内制造白色恐怖，压制一切爱国力量，禁止一切爱国行动；对敌则屈辱无耻，卖国投降，任其宰割！四亿中国人民谁不感到民族危难的深重与亡国惨痛的将临？在北平危

城中的数万大、中学生深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可恨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使我们陷于“报国有心、抗日无路”的最大苦闷之中！

一二九运动爆发了，星星之火为千百万青年照亮了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光明道路。一二九运动是中国青年奋起抗日救亡的号角，“一二一六”大示威是“一二九”的继续，是北平大、中学生爱国行动的总动员。五十年过去了，不少的往事，恍然如在目前。仅就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参加“一二一六”大示威的一鳞半爪，笔录如下：

“一二九”游行的第二天，即12月10日，全校各班推选出的代表，在二院（理学院）小礼堂集会，选举产生了北大学生会执委会。学生会执委共十余人，分文书、交际、庶务……等几股办事。我被分配到文书股，与徐綦榮、刘玉柱在一块。在大示威前的一周内，工作相当紧张，晚上，大部分的干事要在一块开碰头会。

对于学生会的成立，北大校长蒋梦麟伪装不干涉，实际上想控制。他的目的是企图把青年的爱国运动尽可能的削弱，要把学生会改头换面，以避免触到卖国政府的伤痛处。他曾召集过学生会执委谈话，允许给学生会拨一点办公费（为数甚微），但主张用“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名称。谈话后，执委会中没有讨论过究竟是否加“自治”二字，可是不久学校当局就向每一个学生会

执委发下一枚证章，圆形，中间“北大”两字，完全与校徽相同，只是边上加了一圈小字，为：“北大学生自治会执委会”。实际上，无人佩戴。

12月15日晚饭前，刘玉柱同志告诉我：即刻坐人力车到北海养蜂夹道大石作胡同里一家印刷所，找一个人（名字回想不起来了）取印刷品（即次日游行时散发的宣言）。我带一只旧箱子，按地址找到了。印件已经包好，很快就装在箱子里运回我们办事的屋子（大概在红楼内一个教室中）。

1935年12月16日的黎明，北大西斋的大门紧闭着，走向大门口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白纸的大字标语——“哀莫大于心死”。大门外已被持枪的反动警察所包围。我匆忙地吃点馒头，就跑到前院等候集合出发。这时，前院已挤满许多同学，后来者接续向后院延伸，大致已形成一个长队。当领队的同学吹哨整理队伍时，征询哪两位同学愿意打校旗？生物系郝天和与另一位我不熟识的同学走到排头，接过校旗（白布横幅上写“北京大学”四个大字）。全队即刻出发，开了大门，向外冲出。门外，数十个持枪实弹的反动警察在门台下摆开一个包围圈，阻止通过。警察们身后站着一个留小八字胡的反动警官，他高喊捉人，有几个警察拥向前来，抢走校旗并捕走打旗的两位同学。这时，靠前的同学们奋力冲突，警察反击。在混战中，双方暂时形

成拉锯式的对峙局面。恰在这时，居住东斋和其他宿舍的北大同学组成一支队伍，自东向西跑来接应我们。反动警察在前后夹击下，狼狈溃退。在西斋的队伍里，又打出一幅事先准备好的校旗。两队合成一股洪流，大家高呼口号通过马神庙东口，直奔北河沿东岸去迎接中法大学与其他两个中学的队伍加入游行行列。

北大示威队伍走到南长街南口，反动军警在西长安街严阵以待。他们开放水龙猛烈喷射，阻拦西进。当天，气候严寒，滴水成冰。冷水粘衣，立即变成冰块。走在前列的同学们，奋勇夺取水龙，抢到手后转而向反动军警扫射。大队同学，趁机冲过街心，跑步向西，直奔新华门前。抢水龙的同学十分勇敢，拼命搏斗。我认识的同学中，表现最勇敢者，为朱仲龙（朱穆之）和李彬，及今记忆犹新。

到达新华门时，反动军警排列几层，最前面是手持大刀の保安队。他们密集布防，守卫新华门，不让游行队伍越雷池一步。双方一逼近，大刀队即向学生冲锋，反动警察持短棍从两侧乱打。在混战中，受伤较重的同学有我的同班蒋峻峇（现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教），他满面流血，鼻子被刀尖劈开一个深口，由同班姚昌学（已故）护送，到协和医院住院。其他尚有受伤较重者数人：西语系有一位男同学（陕西人），遭警察群殴还被捕走；其余已回忆不出姓名或特征。负轻伤和被



警棍打着的人较多。

经过混战之后，我们化整为零，分散绕道至前门外集合。我从六部口走向宣武门，又遇阻拦，折而穿小胡同向东南方走，到达前门外，重新加入大示威行列。这时，参加游行的大、中学校同学们，已汇合成一股洪流，直指天桥广场。

我随队到达天桥大街时，广场上已人山人海。估计参加人数近万人。会场中央放有一个木台，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由一位女同学拿扬声筒讲话，慷慨陈辞，声泪俱下。群众高呼口号，震撼古城。会后，又经过前门外继续游行示威。队前有一些西方记者，沿途摄影。到前门外大街中段，又停下来，大概是前队又受阻拦。约下午三时，我离队到东侧胡同内吃饭，又向东绕路回校。

（本文作者顾德麟，1933年入北大化学系）

## 跋涉在寒冬的原野上

——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刘 居 英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伸向华北，国民党南京政府步步投降，激起了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爱国热忱，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革命运动。“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以后，北平市各大、中学校相继罢课，抗日救亡运动向深广发展，波及全国，推动各界。对这样的形势，人民是振奋的，反动派是惶恐的，他们软硬兼施，力图扑灭革命烈火，于是在学校里展开了一场罢课与复课的斗争。

“一二九”示威游行的次日(10日)，北平市社会局就发表了华北教育三方针，要求学生“尊重政府一再宣

布的睦邻令”，并给学生爱国运动扣上了“红帽子”，企图吓跑中间状态的同学。10日下午，北京大学当局发布布告，宣称“有人煽动学生罢课”，劝“学生安心上课”，并称“如有不听劝诫鼓动罢课者，一经查明，即予开除学籍。”12日，北平市公安局布告“严禁学生集会、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和标语”，并说否则“依法分别究办，决不姑宽”。他们除了使用威胁的手段以外，还用软的办法，即名为“劝导”的办法。12月17日，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电示北平各大学校长，要求他们“劝导学生早复常态”。于是，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为首的北平各大学校长，多次集会，两度发“告同学书”，劝导学生“认清救国目标，即日复课”。

但是，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是不能扑灭的。广大学生拥护北平学联和各校学生会，坚持罢课斗争，使得当局的威胁、劝导等等，一一落空。

反动当局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们看到革命烽火越烧越旺，就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了提前放寒假的通知，宣布各大中小学校于1月提前放寒假。因怕学生发动赴京请愿，蒋介石遂于12月23日又下令各地派出学生代表同校长进京“聆训”。

针对这种情况，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讨论并决定：一、反对学生派代表去京听训；二、组织平津同学南下宣传，使学生运动与工农兵结合起来。

北京大学学生会，为贯彻学联的决定，召开了第四次班代表大会。会议赞成南下宣传活动，决定动员同学参加，并决定组织北大南下宣传设计委员会筹备南下宣传事宜。会后，除班代表向同学传达学生会的决定、号召同学报名参加外，北大共青团支部也要求团员参加这一活动。

### 分散集合，连夜出发

学联事先通知：南下宣传的一、二团同学于1月3日下午在阜外平大农学院集合。“一二一六”以后，当局严密注意学生动态，时刻防范城内外学生联合行动，校门口、城门口时时有军警游动。所以，南下宣传的同学，都是三三两两零星出城的。下午，同学们纷纷来到农学院。根据学联的决定，参加南下扩大宣传的平津同学编为四个团：以北大为骨干的东城各学校同学编为第一团；以师大为骨干的西城各学校同学编为第二团；清华、燕京大学的同学编为第三团；以天津北洋大学、法商学院为骨干的天津同学编为第四团。第三、四团将另日或另路出发，到农学院集合的是一、二团的同学。我们第一团的团长是北大的韩天石，北大同学和沙滩同学被编为第一中队，中队长是江之源。编队时，

北大同学约四十余人，现在能记起的男同学有韩天石、肖敏颂、江之源、谢云晖、金明、袁宝华、董大年、叶纪霖、佟常义、吴磊伯、刘志诚等；女同学有何兆仪、张毓珣、王骥卿（王季青）、唐尊准四人。另有两个中学女生王琦、李玉华（绰号摇一摇），共计六个女同学。

同学们因为过惯了城市生活，对下乡长途行军准备不足，许多同学大包小包带得很多，无法行动。所以团里动员轻装，把大行李留下后送，并在衣着上作好行军的准备。

一、二团的同学虽然是秘密分散出城集合的，但二、三百人背包罗伞地陆续出城，引起了军警的注意。下午四时以后，农学院门口出现了骑自行车的探头探脑的便衣，继之，又有身穿制服的警察出现。团领导决定当日黄昏整队出发，到农学院南约十里的大井村宿营，未做完的工作到那里再去做。

3日黄昏（大约下午5时左右），南下的队伍从农学院出发奔向大井村。因事先作了简单的行军动员，路程又近，所以队伍很整齐，行军秩序良好，无人说话，象“偷渡”一样，离开了军警注意的目标农学院，来到大井村宿营。

来大井村后，除了安排同学住宿外，团部召开队长会，布置次日行动计划（突破封锁，走出北平）和注意事项。各队传达了次日任务，讨论了注意事项（行军的肃

静、勿掉队等等),强调了走路时要强弱互助,并组织了几个身强体壮的人,夜间放哨。

由于转移仓促,所以住所不足,几十个同学挤在两、三间小屋里,为了照顾女同学和体弱同学,让他们挤在炕上,其他同学则坐卧在地上。环境虽然艰苦,但大家心情特别兴奋,许多同学都睡不好觉。中、小队长们更是睡不着,担心次日行动是否能搞好? 是否会有掉队的? 是否有坚持不了的? 是否能顺利地突过丰台(驻有日军)、南苑(驻有二十九军)这一线? 在有六位女同学的这个小队,尤其令人担心:她们的身体是否支持得了? 走不动怎么办?(事实证明,她们是一直坚持到保定的,一个也没有掉队,不次于任何男同学,真是好样的)……

### 绕过丰、苑,百里行军

1月4日凌晨4点钟,南下宣传团一、二团在大井集合,整队出发。队伍都在左臂带上了写着“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白布袖标。经过动员,同学们情绪高昂,队伍整齐肃静,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当接近丰台时,前边传下口令:“跟上队伍,不要掉队、不许说话”。队伍从铁路桥洞里通过,丰台站的电灯,闪烁可

见，离日本兵营也不远。快步越过丰台以后，向正南绕过南苑。不久，天亮了，队伍还是那么整齐，没有一个掉队的。到达黄村已是中午了，略事休息。大家紧张的心情放松了，都暗暗高兴：“我们胜利地通过了丰台、南苑”。休息时唱了歌，喝了水，都在议论这一夜行军的感受。同学们虽然很累，但初次过军事化生活，都觉得新鲜有趣。大休息以后，队伍转向东行，直奔青云店。途中路过几个村庄，队伍唱歌，呼口号行进，散了些传单。老乡见到这么个队伍，有些莫明其妙。有的说，真不象话，东洋鬼子又把洋学生赶出北平了！有的对学生表示同情说，三九天（那天是腊月初十）学生出来宣传，这是叫东洋人逼的！对于队伍中有女同学，他们尤受感动。直到天黑后七、八点钟，才到达宿营地青云店镇。是日行程九十多里。

百里行军，实在太疲劳了，尽管住处狭小，一到宿营地，同学们都纷纷入睡了。虽然因为行李未到，大家还是挤在一起和衣而睡，但是，突破了封锁，走出了北平，大家的情绪是非常高涨的。次日（5日），在青云店休整一天，还作了些小的宣传活动，主要是整顿内部。百里行军，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衣着不适，腰腿疼痛，脚打泡了，鞋子坏了，都要在这一天中休整。热水烫脚，挑脚泡，都得有经验的同学去教；剪衣（如剪大褂、旗袍的开切）、修鞋，都得自己去

做。有一位女同学的一只高底鞋跟行军时跑丢了，又买不着新鞋，只得把另一只鞋的高跟敲掉，把鞋脸和后跟剪开缝好，变为平底鞋。以后她就穿了这双鞋，一直走到固安。

从城市走到乡村，从舒适的学生生活变为艰苦的军事生活，从出门坐车到日行百里，对同学们来说，都是个突变。以高度爱国热情作为精神支柱的学生，战胜了这个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坚持南进宣传，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 礼贤宣传，初获成效

1月6日上午，宣传团转向西南，向礼贤集进发。经行程四十里，过午到达礼贤集，队伍住在一个小学校里。下午即进行小规模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群众听到宣传之后，对学生下乡宣传表示赞同，对日寇侵占华北表示义愤。许多人来打听局势，有的问“日本人是否占领了丰台？”“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抵抗？”等等，我们都一一做了答复。老乡们听到宣传后，有的拿吃的，有的送开水给我们。

1月7日，在礼贤集召开了群众大会，到会数百人。总团的一位同学作了讲演，他口才很好，说了日本



侵华的野心，华北的危机，当局的投降等等。当讲到东北沦陷后人民的惨状时，声泪俱下，群众深受感动。会上，有一个青年农民登台讲话，表示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日本人来，就和他们干到底，他讲得心情激动，非常感人。会上，宣传团员还唱了救亡歌曲，散了些传单。

这个会开得是成功的。会后，许多老乡跑到宣传团驻地来和团员谈话，对于这些洋学生不怕艰辛跑到农村来宣传，表示同情和钦佩。许多团员对农民的认识有了变化，觉得他们是诚朴可亲的，他们的爱国心，不次于学生。当离别继续南下时，老老少少许多人来到路边送行，希望再来。

### 固安会合，分路南下

1月8日，宣传团从礼贤集走到固安，行程五十里。固安是个县城，原拟进城宣传、休息。没想到反动的县太爷边某，宣称有土匪来到，下令封闭了城门，城墙上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不得已，宣传团在北关宿营。第一团宿在一个大车店里。

总团决定，四个团在固安会合。一、二团到后，三、四团还未来到，8日下午，派人到安次去接天津的四

团。9日，四团由庄金林（庄林）、朱纪章（朱光）率领来到固安；三团也派了几个代表（大队在平汉线上南进）来到固安。这样，四个团在固安会合了。

由于天津学校当局，按照教育部的指示提前放了寒假；北洋大学的同学二百来人出津后，即被军警打散返回天津，所以第四团到固安会合的人数不多。总团决定把四团合并到一团内，由一团抽出点人给二团，这样调整了组织，南下宣传团变为一、二、三团三个团了。

10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固安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专程赶到固安来的北平学联代表董毓华同学讲了话。他肯定了前一段宣传团活动的成绩和经验，指出了今后行动要点。他的讲话很有鼓动性，受到大家的赞扬。总团决定今后的宣传路线是：第三团继续走西路，沿平汉线向高碑店、徐水、保定方向行进；第二团走中路，即从固安往西南，向新城（旧）、容城、保定方向行进；第一团走东路，即从固安向南，向霸县、任邱、保定方向行进。下一步，三个团在保定会合。

整编后的第一团，不到二百人，北大同学仍是一中队。为了提高认识，召开了宣传团员会，讨论当前应提什么口号的问题，即：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还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热烈讨论，大家统一到后一个认识上。这对于同学们理解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有很大提高。团领导叫大家深入到农民家中去访问。通过家

访，同学们深受教育，知道农民在受重重压迫和剥削下，过着非人的生活。有的说：“以前我以为吃窝头是最苦的了，可是看到农民连玉米糊都吃不饱，才知道我们的生活和他们相比，是天上地下呀！”通过家访活动，提高了大家的阶级觉悟。

我们一团的同学，在固安期间，普遍学唱了《九一八小调》(又名时事打牙牌)。这个歌很有鼓动性，也是宣传工作的一个好手段，歌词很有感染力，我们一直唱到保定。这个歌共约二十多段，从东北沦陷说起，说到当亡国奴的痛苦：

“中华民国 20 年哪，9 月 18 日那一天呀，关东起狼烟，唉咳唉咳哟，关东起狼烟”。

“侵略成性的小日本哪，发兵进攻沈阳城呀，炮轰北大营，唉咳唉咳哟，炮轰北大营”。

“南京政府死老蒋哪，下个命令给张学良呀，不准他抵抗，唉咳唉咳哟，不准他抵抗”。

“二三十万中国兵哪，他妈拉个巴子太稀松呀，逃跑一溜风，唉咳唉咳哟，逃跑一溜风”。

“大好河山东三省哪，拱手让给日本人呀，苦了老百姓，唉咳唉咳哟，苦了老百姓”。

“东北同胞三千万哪，国破家亡真可怜呀，妻离子又散，唉咳唉咳哟，妻离子又散”。

歌中也号召大家起来救亡，歌中唱到：

“全国工农兵学商哪，大家齐心来救亡呀，赶走小东洋，唉咳唉咳哟，赶走小东洋”。

歌里又宣传了社会主义是我们奋斗目标，歌中唱道：

“苏联本是共产国哪，自由平等新生活呀，人人都工作，唉咳唉咳哟，人人都工作”。

宣传团员们边学边用，也教会了北关一带的许多学生和青年，大家都唱，把宣传搞得热气腾腾。固安的边县长非常顽固，住了三天不开城门，宣传团员按照《九一八小调》，也谱编了一首歌唱了起来：

“一路风霜到固安哪，城门关了整三天哪，县长王八旦！唉咳唉咳哟！县长王八旦！”

北关的宣传活动，影响到固安城里。一些进步人上，在城内募捐，买了些东西，做了些大饼，用绳子吊下城墙，送给宣传团。城里师范学校的王校长，跑出城来，带些东西到宣传团来慰问，他在大会上讲了话，表示固安人民支持平津同学南下宣传，他们也要在城里搞抗日救亡宣传，两相呼应，发动民众。他的讲话，鼓舞了宣传团同学们的斗志。

对城墙上执勤的二十九军官兵，我们在墙下也向他们进行了宣传。希望他们发挥在喜峰口抗日（1933年）的光荣历史，反对日寇侵略，保卫华北。当说明我们是平津学生来下乡宣传后，有的士兵说“当官的净骗

人，说你们是土匪”。当我们要他们打开城门时，他们说“你们好好在城关宣传吧，开城门不行，我们不敢违抗命令”。看来，许多士兵对我们的抗日宣传是听进去了，他们在城上已不是枪上膛刀出鞘的样子了，有的还在城上和城下的同学谈家常话。

### 昼伏夜行，甩掉军警

1月13日，我们第一团由固安出发，一路向南，奔向霸县，当日宿于牛驼村，行程四十五里。经过四天休整的队伍，重新上路，精神焕发，边走边唱。住宿后，本来预备第二天在该地宣传一天，但14日上午得知第三团在高碑店被军警围困、第二团在辛立庄又有军警阻扰的消息。辛立庄离牛驼很近，袭扰二、三团的军警是北平冀察政委会派出、由高碑店向东来的。所以，团部决定：用夜间转移，白天宣传的办法，甩开追扰的军警。14日黄昏前出发，进驻霸县，由霸县到咎岗，由咎岗到雄县，都是黄昏出发夜间到达的。行动路线是先向正南，又转向西南，甩开由西向东追扰的军警。

14日下午在队伍出发前，团部给我们一中队一个任务，叫我们组织几个人在队伍出发后，向西探听消息并收容队伍。如遇上二、三团被冲散的同学，叫他们到

替岗找队伍；如遇上便衣、军警，则想法叫他们向东追寻。这个任务由一中队的刘志诚、金明等四个同学去执行。

队伍夜里出发后，15日拂晓，这四人小组从牛驼向西活动。在辛立庄南边，遇上四、五个同学，他们说自己是二团的，我们问他们是那个学校的，从哪里来到辛立庄的，他们都一一答出，而且从穿戴、行动上看来是宣传团员。我们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要向东走，去找一团的队伍。我们告诉他们不要向东走了，要向南到替岗去找，这四、五个人向南走了。我们顺着去高碑店的大道向西游逛。过午，走到一个大庄。这个庄在河边上，我们买点东西在一个小屋前休息。这时，从高碑店过来几辆自行车，带着一些货物，一看就是跑买卖的。碰巧，他们也下车休息。我们向他们探询高碑店情况时，他们说北平来些洋学生叫军警打散了，都抓起来了，你们别去高碑店了，快回家吧。不一会儿，又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很象便衣，他们也来休息。在和他们谈话中，我们顺着话随便地对他们说：听说北平来了宣传团，都在固安驻着呢，听说要奔天津。这两个人后来向东走了。他们到底是不是便衣队无把握，但我们把宣传团由固安向东这个风散出去了。下午四时以后，我们就回头找队伍了。离开了大路，向东南方向走小道奔替岗，人生地不熟，只能各庄打听走着走。天黑

后,更是困难了,只能把住大方向,到庄后再敲门问路。那一带是沙土地,很荒凉,有些枣树,夜里刮北风,非常冷。后半夜,无法敲门问路了,而且走了一天路,又累又困,四个人只好偎在一块,在一个庄头休息。拂晓(16日)时,向一个拾粪的老头一问,原来晷岗就在前边,大家高兴地赶路,到晷岗找到了本队,即躺下入睡了。

黄昏时,队伍从晷岗出发到雄县,走了三十里路。雄县城内气氛和缓,没有军警阻拦。大家分析认为,这里归河北省管,不是冀察政委会的势力范围了,我们终于甩掉了冀察政委会派来追拦的军警了。大家的心里无限愉快,也下定决心:二、三团都被阻拦了,只剩下一团这一股子了,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 抗日救国,军民同心

1月17日晨,宣传团的大队,沿白洋淀东岸,向南进发,直奔任邱。

到任邱县后,又遇上城门关闭,城墙上有人放哨。大家都很奇怪:“难道又遇上第二个固安?”后来一打听,知道城内驻军是商震的三十二军的一个团。商震刚接替于学忠当河北省主席,和冀察政委会有矛

盾，为什么关城？宣传团团部派代表前去交涉，见到部队的那个团长，才开城放入。原来，这个团并不知道平津学生南下宣传的事，他们的部队奉上级的命令要调防（受《何梅协定》的影响），调到石家庄以南去。他们怕部队撤走时城内骚乱，才关了城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人向部队作抗日宣传，宣传时先表彰这个部队 1933 年在冷口与日寇作战的功劳，说明何梅卖国协定的内容，华北的危机，他们南撤的原因等等。三十二军的官兵听到这些以后，非常愤慨，表明他们是抗日的，对学生南下宣传表示支持。下午，这个团给宣传团送来半口猪，表示慰问。

真巧，宣传团向高阳进发，这个团也向高阳行进。两支队伍走到一块了，在一条大路上扭在一块走。宣传团员情绪高涨，边走边唱《救亡进行曲》和《九一八小调》，歌调明快，歌词鼓动性很大，句句深入士兵的心。边走边谈，士兵们问了许多时局的事，团员们乘机作了宣传。有的下级军官说，他们是不愿撤离任邱，调到石家庄以南高邑县的，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撤，原来是日本人要求何应钦换河北省主席、南撤中国军队，真气人！一路上他们大、小休息时，我们也休息，有说有笑，军民一心，打得火热。傍晚，到了高阳县。本来听说他们的行军路线也奔保定，谁知次晨起床后，他们早已无影无踪了。



## 周密准备、平安入城

1月21日，我们从高阳到达板桥村，行程约四十里。住下以后各队召开会议，研究和准备进入河北省会保定的问题。明天就要进保定了，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当时的保定，是全国有名的大城市，是河北省的省会，是平汉铁路的要冲。我们这群学生，列队到保定去点抗日救亡之火，会影响到全国。这是令人振奋的事，也是令人担心的事。统治当局会怎样对待我们？会不会发生惨案？大家估计发生惨案的可能性很小，但象宋哲元对付二、三团那样，把大家绑架上火车的较大。当然，也可能用软的办法，因为宋哲元在平津镇压学生已名声扫地，新上任的河北省主席商震还要那么干吗？不管怎么说，我们要做被阻拦、被绑架的准备。团部要求大家在明日行动中，要不断清查自己的队伍，防止坏人混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听指挥，要集体抱团。为了应付明天情况，还组织了先遣队，由几个同学骑自行车，先进城探听情况和打前站；并把身强力壮的二十来个同学调到队伍前头，名为纠察队，把十几个女同学调到队伍后面名为救护队。纠察队员找了些棍棒作旗杆，救护队打上一

面红十字小旗。这些标志也是给对方看的，叫他们知道这些学生是有准备，是有坚定决心的。

1月22日，这支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保定行进（约三十多里）。当接近保定时，同学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原来保定城在望，东南方向却又发现有疏散开的军队在游动。于是紧缩了队形变为两路纵队，挽着臂膀、呼着口号、唱着歌前进。不久，看到东南方向那些军队纷纷撤向保定城。大家很感奇怪。这时，回来一个先遣人员报告说：“保定城门开着，有几个官员象是要迎接咱们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团领导说，不管他们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咱们进城再说。接近城门时，看到城门口站着一群人，内有几个穿长袍戴礼帽的官员，有些还手挥小旗表示“欢迎”。队伍到达城门口时，一个穿大褂戴礼帽的人拍着手说：“欢迎！欢迎！”他说他们是保定的各界人士，并说，一路上同学们辛苦了，已经准备好了吃住，在同仁中学，请大家快去休息。我们的团负责人说：我们要游行宣传，要经过省政府，经过中心大街。那个人说：如果大家不累也好，咱们一块走。于是，有四、五个戴礼帽的加入到前头我们的纠察队的队伍里，进了城门，走向大街游行。保定城里并未戒严，马路两旁挤满了人群，我们边走边喊口号，边散传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废除何梅协定！”、“收复东北失

地！”……。喊口号时，这些戴礼帽的也跟着举手，实在有趣。沿途我们反复唱《救亡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许多市民跟在队伍后边走，也可能是看热闹的，也可能有参加一起游行的。标语贴满了省政府门口，省府许多人也出来观看。队伍走完了大街，又经几条街，才转向同仁中学。把一个死气沉沉的保定城，弄得热火朝天。到同仁中学时，已经是下午了。大家很振奋，有的同学说，“这回可过了瘾了”。

一个戴礼帽的人，自称是河北省府的秘书，到同仁中学和宣传团商量，他希望大家明天回北平过大年。我们团负责人说，那怎么成，到保定还没宣传呢！于是，第二天（23日）我们分组到城内进行宣传，有的讲演，有的表演、唱歌，有的分头谈话，有的散传单、贴标语，一伙一伙地进行宣传。这天也没遇到什么明显的阻拦，保定城里的气氛热起来了。下午，那位省府秘书又来劝说返平。我们说，次日还要宣传。他说，你们宣传了两天，再在保定闹下去，我们也吃不消了，无论如何，请回北平。团领导研究后，答应明天我们不在保定了，他才走。这天的晚饭，吃了他们“各界”送来的猪肉，大家很高兴。可是，黄昏前后，同仁中学的校门口增加了军警了。

## 座谈感受、发起民先

团部决定次日返回北平。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绝大部分团员想回北平了。

23日晚饭后，在同仁中学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先谈南下宣传的感受，大家纷纷发言。

“我们突破千难万险，胜利地达到了目的地，我们胜利了！”

“南下宣传打破了我们学生生活的小圈子，要想救亡，学生非得和工农兵结合起来不可。”

“咱们都变了，变得革命了，变得坚强了。”

“一路上行军、放哨，军事生活，纪律严明，这比受一次军训锻炼都大”。

“我们是把抗日救亡的烽火点向农村了，点向全国各界了。”

……

座谈非常热烈。虽然时已夜深。大家还是依恋不散，觉得这些同学一同战斗了二十多天，实在依依不舍。这时有人提出，咱们这伙人到北平后得保持经常联系；有人说，保持这样一个组织不更好吗？大家纷纷赞成，主张发起一个团体组织，叫什么名由大家给起。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凑名字，各种各样的名字纷纷提出来了：“抗日救国先锋队”、“救亡先锋队”、“青年救亡队”、“民族解放救国团”……。凑来凑去，有位同学凑出“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名字，大家表示赞成。并且议定：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的团员都是民先队的发起人，都是当然的民先队员。为了保证在回北平后，把民先队组织起来，会中推举了九个筹备委员负责进行组建民先队的筹备事宜。我记得这九个人里有韩天石、宋黎、敖白枫，还有二、三、四团的同学。这个会议开到夜十一点以后才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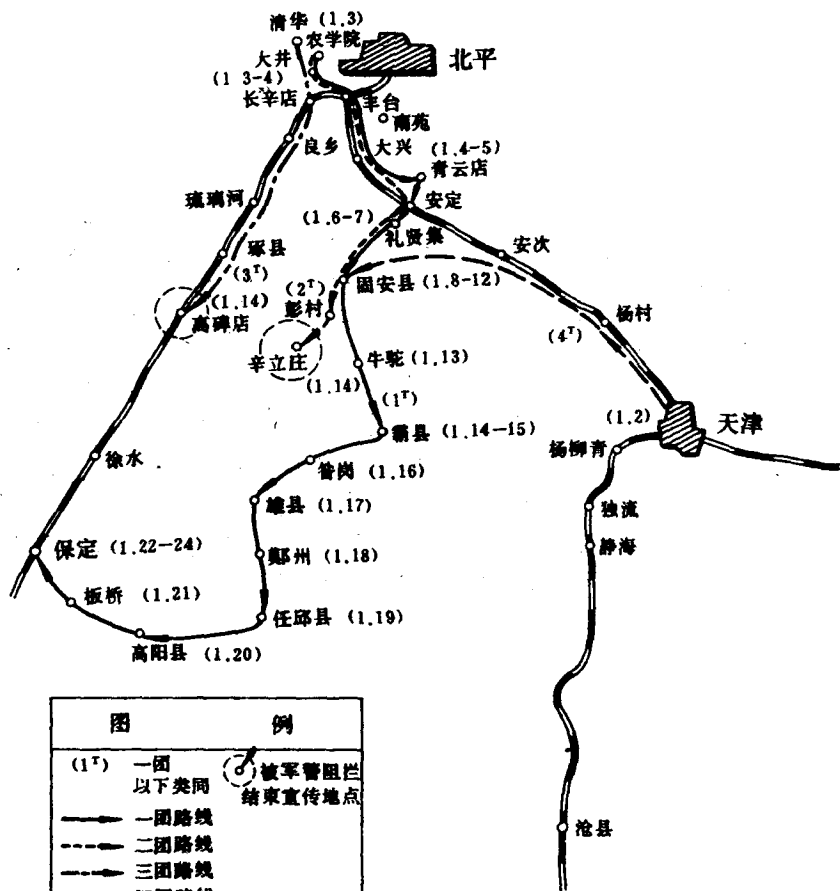
1月24日早饭后，宣传团员们带着行李到保定车站乘火车(闷罐车)返回北平。同到车站去的还有那些“各界”人士，是护送？是欢送？各自心里都明白，但双方表面上还比较客气。中午火车到北平，同学们纷纷返校，欢渡古历乙亥年的胜利除夕。

民族解放先锋队于1936年2月1日正式成立了，并于2月16日发表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宣言》。她在推动抗战培育青年方面起了伟大的作用。

(本文作者刘居英，原名刘志诚，1934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

#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南下宣传路线图

(1936.1.3—1936.1.24)



# 我们也参加了！

——记北大四女生南下宣传经历

唐 尊 准

---

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反动统治者妄想用木棍、大刀、皮鞭和水龙扑灭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怒火，但“一二九”播下的抗日火种却已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引起南京政府惶恐不安。他们一方面召集各校当局和学生代表进京“聆训”，所谓“一心一德共商救国大计”，妄图在全国青年学生中散布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另一方面提前放寒假，其目的是想使学生运动丧失群众基础而陷入瘫痪。这时，的确有一部分同学被家人唤回家了，但更多的同学都留在学校里，日夜思虑着祖国的安危和学生运动的前途。大家认为：反动政府

本性难改，决不再受欺骗。为使已经发展起来的运动能够巩固起来和坚持下去，并加速向全国推进，扩大影响；为把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保存下来并提高大家的觉悟，能更自觉有效地进行斗争，党指出：“到农村去！”“青年学生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党的号召立即变成了革命青年的行动。12月下旬，平津学生便着手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

1月3日，正是北平最冷的日子，天寒地冻，北风象刀削似地刮在脸上。南下宣传团各团（共分四团），避开了反动军警预先设下的埋伏先后出发了。这天傍晚，我们四个女同学（王骥卿、张毓珣、何兆仪和我——唐尊准）随第一团出发。北大为第一团第一中队，中队长初为江之源，后换戚刘居英。我们没有按预先约定的到西郊农学院集合，因一路上军警密布，所以我们化整为零，天黑时，借着微弱的星光，穿过荒芜的旷野，直奔第一集合点——大井村。是夜宿于大井村。

当晚，我们四人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茅草房里。房里除有一个土炕和一张破桌，桌上放着一个粗磁碗外，全屋空荡荡的。一进房只觉得寒气逼人，一般令人难以忍受的潮湿发霉的气味迎面袭来。显然，我们到来以前已有些时无人住过了。我们被照顾，没有去放哨，就躺在那既无垫絮又无盖絮的炕上休息。为了暖和一点，我们不得不把身子蜷成一团，腿一直不敢伸



直，只感到自己的上下牙齿不停地在打架。当腿脚蠕动着感到难受时，我下炕来活动活动，只见桌上碗里的水早已结成坚硬的冰块了，估计室温大概在零下 20℃左右。我们一夜未曾合眼，虽然身体很疲倦，但头脑却特别清醒，一心盼着早点天明去“战斗”。这是我经受的南下的第一次考验。

次日，天还未大亮，队伍又分散出发了。奔丰台，绕南苑，经黄村，到青云店（北宁线上）时，已是天黑很久了。4 日夜宿于此。

一昼夜间，我们大军没有休息地走了一百多里路，创造了我自己从未有过的“长征”记录。大队走过的地方都荒无人烟，哪里去找吃的？大家忍冻受饿，经常还要“急行军”，警惕地避开反动军警的阻拦。由于精神时刻处于紧张状态，身体更感疲乏，但大家还是精神抖擞地坚持前进不掉队。我呢？因临出发前没有什么准备，穿的是不适合走路的半高跟鞋（好在一路上没有掉后跟），脚和腿都磨破了，肿得麻木，僵直地不能坐下。快到目的地时，头痛得厉害，幸得我们的队长刘居英同学的照顾和鼓励，终于经历住了第二次考验。

青云店这个小村镇突然来了我们这一百多人，没有地方安置住处。大家发扬了互助、互爱、互让的精神，男同学主动地背靠背坐在冰冷的土地上打盹，把炕让给女同学和某些体弱的男同学睡。男、女同学分占

一边，大家只能和衣而卧。炕小人多怎么办？只好侧着身子睡，可以多睡点人，腿还得伸得直直的，全炕挤得满满的。要翻身时只好先叫“一二三”一起行动，否则难以动弹。睡了些时候，疲劳虽有些消除，但胸部被压迫，憋得喘不过气来，两腿长时间挺直着也不好受。再看见坐在地上的同学，觉得该让他们上来休息休息。当自己坐在冰冷的地上时，身体虽比较自由，但深夜的寒冷驱逐了睡意，清醒了头脑，只得眼望着窗外茫茫无边的夜空和远处极微弱的星光，来度此漫漫长夜。这时，人们低声地哼着抗日救亡歌曲，心里想着白天经过的一切，深深地体会着同学们之间的友爱和集体的温暖。

当我们刚在农村出现时，我们的装束是长袍、大衣、航空帽、旗袍、卷发和高跟鞋，这些与老乡的穿着毫无共同之处。我们讲演、唱歌和呼口号，老乡大都听不懂。他们以为我们是他们曾看见过的传教士和修女。我们呢？一些在城市长大的学生，又哪里懂得农民？“地主剥削农民”，“农民的疾苦”等，都是从进步刊物上看到的一些。今天要自己去宣传，对农民真正疾苦体会不深，用词又不通俗易懂，显得与他们格格不入，对此自己感到苦恼。我内心十分钦佩有的同学很会工作，特别是流亡到关内的农村长大的东北同学。他们用亲身体会，宣传东北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屠杀的惨

况和目前华北的危机和北平学生运动被镇压的事实，慷慨陈词，激发起老乡们的愤怒。当时，我只能配合宣传，站在高高的土墩上唱救亡歌曲。台上台下的群众情绪激昂，学生和农民的感情开始融汇在一起。

回到队部以后，由于有了一点收获，同学们情绪高涨，嘴里唱着学会不久的《毕业歌》。唱完歌，队部组织学习。因为，同学们虽怀有满腔热情，如不懂封建剥削，不懂得农民最关心和最切身的问题，仍难以和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于是组织大家围绕“农民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进行讨论，使大家提高了政治水平和阶级觉悟，产生了改造社会的愿望。当我们走访调查时，走进农民们阴暗潮湿和矮小的草房，亲眼看到了自己难以想象的中国农民的艰苦生活：在这数九严寒的冬天里，农民和他们的孩子身上穿着多处“开花”破烂的棉袄，下身则穿着一条单裤，一家不管几口都挤在一个炕上，炕上放着没有里子的“棉被”；吃的是稀薄的菜汤和不足量的煎饼或窝窝头。他们终年脸朝黄土背朝天，仍不得一饱，连临产前的孕妇还得拖着百十斤的碾子劳动。能说他们不勤劳吗？这是为什么？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农民们血泪的控诉深深地震动着同学们的心。大家开始认识到，不推翻压在广大农民身上的封建的大山，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懂得反帝必须与反封建相结合，认识

到革命的主力军是工农群众，在他们中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反动当局从南下宣传团出发时起，一直派便衣、侦探跟踪着。我们演戏，开会，唱歌宣传时，他们时常发出怪叫，给我们喝倒彩。但他们的行动，立即受到群众的怒斥。1月8日，南下宣传团到达固安时，城门早已关闭，并有全副武装的保安团架着机枪守在城墙上，不让宣传团进城。我们只好在城外召开大会，演戏，宣传和唱革命歌曲。当南下宣传团到来的消息很快地传遍全城时，城里展开了募捐活动。钱粮和棉被用绳子从城墙上送出来。城里师范学校王校长还深夜越墙来慰问，这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同时，正当大家冻得双脚麻木时，城里东北籍的同学又送来毛袜，穿上它们，一股暖流流遍全身。这时，北平学联也送来钱、慰问信和食品，给了同学们极大的鼓舞。

在固安住了四天，总结了工作，整顿了组织（将四个团合并成三个团），并决定分头出发。第一团往霸县、雄县、高阳方向，并约定十天后再在保定会合。

第一团沿途历尽艰辛。我们随第一团终于在1月21日到达保定，同学们在省府门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打倒汉奸卖国贼！”随后进行宣传，与当地青年联欢，开群众大会。后来，反动当局设置种种障碍，使宣传活动难以开展，

加上经费困难极大,天气又很冷,于是指挥部决定带队回校。为了保存、巩固这一批救亡力量,大家提出建立一个先进青年学生组织。经过酝酿讨论,有的同学提出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受到全体同学的热烈支持和拥护。大会通过全体团员都是当然队员。我随第一团24日返回北平,离校南下宣传共二十二日。我们四个女生自始至终坚持到最后回校,回校后受到同学和学联的关怀和慰问。

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与工农相结合,是一二九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的深入和发展。我和有的同学一样,经历了一个从不很自觉到较自觉的认识过程。同学们能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的形势下,毅然放弃了平静的斋舍生活,踏上漫天风雪,天寒地冻的征途,接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不同程度地树立了改造自己成为革命者的良好愿望。

1933年进入北大时,我是一个无忧无虑、年幼无知的青年,发生什么事时,跟着别人后面嚷嚷就是了。后来,在党的培养和教育、进步同学的思想感染下;经过“一二九”,“一二一六”和南下扩大宣传的实际锻炼,我不断地提高了爱国热情和思想觉悟,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和青年团后,我时刻记住:我是第一批民先队员,我是共产党的人。每次救亡运动都少不了我,组织上决定的工作我一定照办,绝不走样。我性格比较顽

强，有毅力、有勇往直前的精神，群众关系也好。1937年我毕业后来到后方，因病在沅江与战友失去联系。但毕业时战友们的临别赠言我一直保存到现在。热情和衷恳的词句，长期以来一直是我生活和工作中的座右铭和动力。现将部分同学的赠言照录于下，以飨广大青年读者，或可以从中汲取一点教益。

(1)唐瓜：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我重复地写下鲁迅先生的名言，赠给你。

——元宝(袁宝华)于西斋 1937

(2)唐瓜：

“不留恋，不畏惧，  
保持着镇定的态度，  
鼓起永恒的勇气，  
继续不断，  
推动着时代的巨轮，  
前进，前进，  
向着合理的境地！”

——刘玉柱

(3)唐瓜：

“你要用全力反抗妇女的命运——  
不同奴隶结婚，

不做奴隶儿子的母亲，  
不要服从奴隶一直到进棺材。”

——陆秋(即陆平)

- (4)“在沙漠里和海滩上，有一种地方叫做‘哈汤’的，人一走到那里就陷落下去了。它不容你挣扎，先只是一只脚，继之一条腿，过一会半身，再一会儿只露一个头，终于什么也没有了。一只蛙，放在热水里，它不会立刻就死的，它挣扎，它纵跳；但它在优游自在的冷水里，加上一滴一滴的热水，过一会安安静静晕过去，终于没有挣扎一下的死了。

在人类的社会里，也正有着不知多少人陷落在‘社会的哈汤’里，象安静死去的蛙一样地无声息地在炎热的生活里故去。一个女孩子，尤其，她会被家和孩子所迷晕、牵累，忘记了她自己在社会里的存在，她自己的任务，以至她向自己悲惨的生活的挣扎。这真是人生的悲剧。糖瓜儿，千万记住。”

——小珠子(即朱穆之)

- (5)“你到走啊！  
走出闺房，跑出厨房，  
勇敢地迈开脚步，  
去掀起民族的巨浪！”

不要作空虚的幻想，  
不要在享乐上彷徨！”

是诗吗？只有诗人知道，我也摸不清，不过这确是值得我们记住的几句话；这是我俩共同的作品，你三句，我三句。这六句话代表着六个不同的时期，也象征着六段不同的故事，这故事是你生活的记录。希望你记着，并且希望你们要在累得气喘喘的时候，时常对你自己大声疾呼：“你到走啊！”

书此以别糖瓜！

萍果(即刘居英)敬书 1937年

(6)“要把人生看作一个战场，不断的和人斗争，和命运斗争，和大自然斗争！”

——李欣(即胡昭衡)

(7)糖瓜要走啦，毕业的同学都要走啦！眼看着几十员猛将脱离我们的队伍，我真忍不住那又伤感又恐怖、又兴奋的矛盾心理。伤感的是朋友们要离开我们啦，害怕的是我们的队伍不再广大强壮，兴奋的是光明的种子又得去传播了。

糖瓜有许多优点，使我最感动地是她的‘群’性或说她适于过‘群’的生活。真的，‘群’是天底下最神秘的东西，她含蓄着无限的能力，能够使一个人再造，能够使一个社会再造。



糖瓜！去吧！去跟随着它走成功的路子。

——沙丁鱼(即陈纯英)

(8)糖瓜：

别了！在隆隆炮火之下我们别了！虽然我们都希望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那一闪的光明是愈来愈微弱了。我们焦急，我们愤慨，我们更要努力燃点这颗星火去普照全世界的光明。朋友，我们一定会再见的，我们再见于胜利之中吧！

朋友，我们的友谊是建筑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如果我们的共同基础没有崩溃，我们的友谊是永远存在的。我以此自誓，更以此相信朋友。我们当各自勉而共勉之！

二年的相处，我深深的认识了朋友，你有许多人所没有的优点，尤其是我没有的。你热诚，你坦白，你有坚强的自信心，你有勇敢负责的精神，你有不屈不挠的意志，最可贵的是你有孩子一般的傻气与一颗赤子之心。现在你开始走入这座罪恶的烘炉，我希望你不是一块被融化的铁，而是熔炉的巨焰，把这个罪恶的烘炉——社会——毁灭！愿朋友好好运用你这优越的天赐吧！

我羡慕你那富有生气的生活，快乐的人生

观，你每天都是含着希望的微笑工作着，生命对于你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的……

——往里拐(即王骥卿)1937.7.25

- (9)眼看你就要离开这古老的学府，走入社会的熔炉，令人感触是当然的。这一群比较坦白、真诚、热情的朋友都要分手了，有的走入更艰苦的人生战场，有的依然守在那座红楼里。

人们天天嚷着的“现实”，这一下便真的逼在眼前，想逃避也不可能。如何去“面对现实”呢？这儿便有了分歧：遵守社会的成习，作一个不识不知的人有福了，因为“现实”会给她们以生活的方便；但历史上并不缺乏叛逆的女性，永远和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站在一起，何去何从，你将来自有事实答复，现在写上一套公式也是徒然的事。

在这将走未走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若有所失，又仿佛若有所得；失去的是几年来共尝辛酸苦辣的一群朋友；得到的则是更坚实的人生！朋友是可宝贵的，人生更是可宝贵的。

古人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朋友，珍重你的人生吧。

一九三七谢七(即谢云晖)敬题

- (10)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苦难的时代，我们必需能

站立起来，顽强的生活着；这样，我们生活日程里必须要坚强的意志，永存的热情，不断的学习和努力。

——何 吉(即吕荧)

(11)我们同是幸福被剥夺的一群；

我们的生命受着一种共同的压力，  
这压力使我们这一群的心连系起来，  
向着一个方向前进。

转眼我们将分散了，这当然免不了  
一种人生别离的伤感，将来我或者在天涯海角，那时我们这一群兄弟姐妹们，在默默的工作中会增添我无限的勇气。

——敬之(即王敬之)

(12)献给糖瓜

我们是救亡阵线上英勇的一群，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我们有着深刻骄傲的称呼；  
该如何认清我们光荣的历史任务？  
该如何锻炼我们钢铁的意志和健壮的身躯？  
踏进人生的战场向着我们的压迫者作无情的斗争。

最后，我也希望你：

第一，不作花瓶；

第二，不作少奶奶；

第三，不回到厨房去！

永远作一个卫护中华民族的战士！

1937·6·15 鼎(莫家鼎)

(本文作者唐尊准 1933 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 “回敬”了校长先生

——北大学子的反复课斗争

姚震江

继“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北平学生游行示威之后，北大同学决心继续罢课，组织各种活动以扩大宣传，而学校当局则千方百计企图瓦解学生运动，使学生返回教室重新过起“两耳不闻天下事”的书院生活。斗争是尖锐的。

1936年元旦，学校放年假三日，并乘机贴出于元月4日恢复上课的布告。学生会于3日，在二院（理学院）某教室召开了各班代表会议，作出了继续罢课的决定，并决定成立纠察队劝阻老师、同学上课。文学院（沙滩红楼）由理学院同学去把守，理学院（马神庙）由

文学院同学去把守，以免人熟拉不下脸来。队员主要是部分班代表和一些自愿参加的同学。临时推举了召集人。用白布制作了袖章，上写“纠察队”三字（也许还有北大学生会字样），并加盖学生会印章（好象是大方印）。当时我是化学系三年级的代表之一，参加了把守文学院的纠察队。约定次日清晨在沙滩红楼后门集合。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到了红楼后门（对着操场）。门还没有开，已经有两个同学先到了那里。一个同学爬上了钟塔，把打钟的绳子盘了上去。那时北大红楼后门旁边有一个钟塔，类似现在架高压线的铁塔，大约是两层楼高，上悬一钟，下坠一绳。上下课及预备铃均由工友牵绳敲钟为号。约六时许，后门开了，又来了一些纠察队同学。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这时也来了。他一来就盛气凌人地责问同学：“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同学们告诉他，学生会决定继续罢课，并向他讲述了继续罢课的理由。他说学生应当服从学校的命令去上课，抗日不是学生们的事，自有政府去管；又说你们罢课有什么用，等等。同学们则列举“九一八”东北沦陷以来，蒋介石不抵抗、节节退让，致使山河变色、大片国土沦丧的种种事实，指出敌人已经到了北平城墙根下（1935年，汉奸殷汝耕成立的伪冀东自治政府就设在通县），不可能再安心读书等着做亡国奴，必须奋

起高呼、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等等。周炳琳说不过同学们，只是大发脾气，说什么“看学校到底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这话意味着什么，我们那时不甚理解，只猜想可能是要采取什么高压手段。心想那就等着瞧吧，也就不再理他了。随后，周炳琳去叫工友，把钟楼绳子解了下来准备敲钟，我们也没有拦阻。

大约7时许，我们纠察队大部分同学转到红楼前门口两边站立。周炳琳也去和我们一起站着。学生会关于继续罢课的决定，各宿舍已经通知到了，但是还有一些住在外面的同学没有通知到，所以陆陆续续有一些同学到校来上课，不过为数不多。总是一来人，周炳琳就招呼他们进去上课，我们则告诉他们学生会继续罢课的决定，结果来人都回去了。

约8时许，文学院院长胡适来了。他先上了楼。拿了一张英文的《北京时报》，下楼走到离楼梯口还有四五级处停下了。他问同学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于是一些同学向他讲述国难严重、必须唤起民众团结抗日的道理。他却似乎是拿着报纸在看，对同学们不理不睬，只是不时用嘲讽的目光向同学们扫视一下或者用鼻子哼一声。同学们都很气愤。于是问他：“胡先生对这些问题怎么看？”胡说：“我么，不对牛弹琴。”同学们大叫：“你才是牛！”也有人责问他“你是不是要做亡国奴？”就这样吵嚷了一阵。胡只是看他

的报纸不理不睬。同学们也就算了。

大约8时半，校长蒋梦麟坐着汽车来了。当时我是站在楼门前的一侧，周炳琳站在另一侧，其他同学则靠里或在楼道里。蒋梦麟怒气冲冲地向我们走来，并挥着手说：“走、走、走，快都给我上课去！”我告诉他学生会决定继续罢课。他根本不听我讲完，就一边动手撕我的袖章一边说：“这是什么东西，拿下去！”我就推了他一下说：“这是代表学生会的，不能动！”蒋竟然耍起赖来，说：“你打人！”我说：“我没有打你，是你扯我的袖章！”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是那一班的？”我告诉了他。他竟骂起人来说：“混帐！”我当时急了，也回敬了一句“你混帐！”他说：“你骂人！”我说：“是你校长先骂人的！”蒋气得浑身颤抖。这时，胡适赶紧过来把蒋搀扶上楼去了。这个官老爷，大概是第一次遇到有人敢与他对骂的吧。

大约只过了10分钟，蒋梦麟、胡适走下楼来，拉着周炳琳（一直和我们一起站着）一起，坐上汽车到二院开会去了。

我们几个人到楼上各个教室查看了一下，发现只有一个教室里，中文系罗常培先生在给两个学生上课。我们进去说了一下，他们也就走了。我们回到二院，听那里的同学们说，也曾有两个班有几个人上课，后来也散了。



大约 11 时许，学校贴出了两张布告：一张，大意是“查有学生姚震江等十余人，自称纠察队，阻挠上课，应予警告”；另一张大意是“决于 6 日照常上课”。第二天，北平各报都登载了这两张布告。

随后，北大及北平各大学又都宣布提前放假。他们想用放假来瓦解学生运动。一些同学回家去了，但是大多数同学却留校坚持斗争；还有许多同学参加了学联组织的南下宣传团，进一步扩大了一二九运动的影响，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为后来的全面抗战作出了贡献。

有人后来问我：“你当时为什么敢于骂校长？”“学校当时为什么没有开除你？”我想，除了其它原因以外，主要是因为我感到我是群众运动中的一员，我不是孤立的，同时我又是正义的，理直所以气壮。学校当时不敢开除我，主要是当时正处于学生运动的高潮，怕开除我会激起群众的义愤，引起更大的反响。他们当然不敢在火上浇油。

周炳琳那时说：“看学校到底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我们当时还很幼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历史早已做出了回答：学校终将是属于人民的。一解放，学校不是就已回到人民的怀抱了吗！

无论是蒋梦麟、胡适他们使用高压、讽刺、谩骂，以及随后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实行收买、分化和开除、逮

捕、镇压的办法，都不能阻挡一二九运动蓬勃地向前发展。这是因为，一二九运动代表着亿万群众的意愿和历史发展的方向。

（本文作者姚震江，1933年入北大化学系。）

## 南下扩大宣传和“三三一”事件<sup>①</sup>

韩 天 石

从“一二九”到“三三一”游行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知道的人很多，材料也不少。我在这里只讲有关南下宣传和“三三一”的一些简要的情况。

“一二一六”以后，北平大中学校学生继续罢课。北大同学自动组织起来，捐献礼品和金钱，慰问校内外被捕的和在游行中受伤的同学。学生会组织同学讨论示威游行的意义和感受，同时，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及进步小团体，在校内外开展学习和宣传活

---

<sup>①</sup> 本文是1984年6月24日北大老同学借袁宝华住处开座谈会请韩天石作专题发言。后由张泉田整理，并经韩天石修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袁宝华、刘王柱、刘居英、谢云晖、孙思白、葛佩琦、佟常义、王季育、宋尔廉及庄金林等同志。

动。不久，学校宣布放寒假。国民党当局和学校当局企图以此分化同学和分散学生集体的力量。有些同学也想回家度假。这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同学团结起来，如何把运动继续深入下去。在党的领导下，学生会组织广大同学进行广泛酝酿，讨论和总结“五四”、“五卅”运动的历史经验。普遍认为：学生打先锋的革命运动要想深入下去，并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就必须把学生运动扩展到工农群众当中去。也只有把学生运动深入到工农中去，革命才能取得成功和胜利。这时，中共北平市委决定通过北平学联发动学生下乡去搞宣传，并徒步到南京请愿，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他对内实现和平，对外进行抗日，也可以向沿途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学生会进行了研究，同学们作了酝酿和准备，学生会并委派我写了一个宣言，号召同学参加南下宣传、请愿。开始定名为“平津学生南下示威宣传团”，后来考虑“示威”二字太刺激，会给军警镇压以口实，于是就取消了“示威”二字，成为“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当时，一共成立了四个团：以北大为主和其它学校为第一团；以东大、师大为主成立了第二团；以清华、燕京为主成立了第三团；天津以北洋大学为主成立了第四团。

第一团于1936年1月3日下午在西郊农学院集

合。当天下午，军警发现大批学生出城，随即关闭了西直门，有不少同学是翻城墙出来的，有的则是绕道出来的。军警知道动静后，想包围农学院。第一团指挥部发现了军警的企图，遂于当日黄昏指挥队伍转移，夜宿大井村，并决定翌日凌晨三点半出发，天亮前绕过丰台和南苑，以摆脱军警的围堵。

指挥部有：彭涛代表市委，是主要负责人，还有姜文彬、宋黎。党的领导是他们三人。我任第一团团长。第二团后来和一团合并了。

第一、二团到固安后，队伍进行了休整。三团在高碑店被国民党军警打散，大部分回北平了，小部分与一团取得了联系，其中有于光远、赵德尊、李昌等。在固安，一、二、三、四团联合召开了大会，约二百多人参加了会。会上，由董毓华代表学联作报告，我也讲了话。董毓华并没有同一团一起行动，他这次来固安，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钱，作为生活和活动的经费。

团指挥部考虑到顺铁路走可能会遭到军警干扰，于是一团便沿着霸县、雄县、任邱、高阳一线走向保定。这时，宣传团经济发生困难，吃饭成了问题，加之，天寒地冻，同学们衣着单薄，旅途疲劳，再坚持下去确有困难，于是我们便决定到保定，然后坐火车去南京。如果这一愿望能够实现当然很好，因为我们可以到南京请愿；如果军警阻止我们去南京，我们也可从保定直接回

北平。假若继续徒步南下，很可能会受到反动武装的镇压、抓人、杀人，也可能会遭到土匪、地主武装、汉奸的袭击，那样，损失就大了。因此，决定去保定是正确的。

当时我们搞宣传，也提出了组织群众的口号。在我们经过的地方，帮助群众建立了抗日救亡的组织，如在固安即帮助他们成立了各界救国会；有的还建立了教师的爱国团体。同时，和当地的一些进步分子及组织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其中有的是中小学教员，有的是学生和农民，还有的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团员。我们向他们讲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如何开展工作等等。回北平后，有的人仍同我们有书信来往。

到保定后，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并在市内做了些宣传工作。1月23日晚，军警包围了我们的住地。我们愤慨万分，向军警提出严重抗议，令其撤退，同时要求乘车到南京向政府请愿，敦促蒋介石对内实现和平，对外出兵抗日。由于我们事先已经做了动员，有了思想准备，不能去南京即回北平，因而大家心里很平静，没有感到惊慌。当天晚上，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会上，群情激愤，斗志高昂，同时夹杂着依依惜别的情感，大家不愿就此分别。会议分析了形势，发言激昂、热烈。一致认为：应该用一种固定的组织形式把大家团结和联系起来，以宣传团团员为骨干，并吸收更广泛的

进步学生,形成一个坚强的进步学生团体,以便更有力地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更广泛、更深入的阶段。这批人是非常重要的宝贵力量,他们有着进步思想,又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锻炼,行动一致,纪律严明,给老百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路上,大家看到广大农民受着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终年不得温饱。同学们接受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同时,还了解到一些进步分子,为着解救民族的危亡,和劳苦群众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同学们的革命觉悟大大提高了,斗争意志增强了。在党的教育下,明确了党在当前的方针政策,了解了红军北上抗日的胜利,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大会总结了这一段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及如何把大家进一步组织起来的问题。会上提出:以到会的团员和其他二、三、四团的团员为骨干,成立一个永久性团体。正好这时《大众生活》上也有这类文章,提出抗日救亡运动应该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建立固定组织,把抗日救亡力量、先进分子团结起来。因此,大会一致同意并决定发起成立一个永久性团体。当场提出了好多名字,我记得是曹国智等同学提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大家一致鼓掌通过,随即推举筹备委员,成立筹备委员会。我记得有彭涛、宋黎、姜文彬、敖白枫、庄金林和我等十多

人当选为筹备委员。当时确定一条原则，凡参加南下宣传团的同学都作为当然队员。新参加的队员一定要经过老队员的介绍并经小队批准。还决定返回北平后扩大征集队员。大会自始至终气氛热烈，唱了许多进步歌曲，把庄严的大会变成了联欢会，直至深夜才散。凌晨三、四时，军警进入校内，三、四人架一个同学，强迫押上火车，送至北平。

“民族解放先锋队”是1936年2月成立的，《毛泽东选集》注释说是9月成立的，我认为不准确，就写了一封信，请求更正。我虽然是民先队筹备委员，但回北平后，党就通知我到北平学联党团工作了。成立大会我没有参加。有的同志讲在师大开的成立大会，会上决定了队长人选，敖白枫被推选为负责人。关于南下宣传的经过，刘居英同志写的材料很详尽，我回忆起来的情况就这些。

下面，我想谈谈“三三一”追悼郭清同学和游行的情况。

2月间，组织上通知我到学联党团工作。黄敬同志是党团书记，委员还有黄华同志。我们一起开过几次党团会议。那时，各校学生已开始上课，抗日救亡运动多在校内活动。整个学生运动在经过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行动之后，转入到深入的学习和巩固发展组织的阶段，民先队在大量发展，各种学习的和生活的小团



体在巩固和扩大。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学生到南京“聆训”以后，国民党当局加紧分化学生运动，企图把学生运动纳入国民党轨道，建立国民党控制下的学生团体，同时，对参加抗日救亡的进步学生采取镇压政策。军警不断到学校搜查，逮捕爱国学生，打击抗日救亡力量。广大同学进行了反逮捕反镇压的不屈斗争。在此情况下，学联召开了会议，分析当前形势，并讨论了当前的学生工作。会上，多数代表认为：应在学生中开展深入的学习和宣传活动，用各种政治色彩不浓的形式，团结同学，提高广大同学的思想，而不宜于组织大规模活动，以避免遭受损失。对于少数主张大规模行动的代表，则进行了说服。至3月下旬，形势有所发展和变化：各大中学校都建立起民先队组织，成为学生会的骨干，党团员也有发展。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势力的矛盾扩大。学校当局对学生的压制，激起学生的反抗，进步同学跃跃欲试。十七中学被开除的同学住进北大，北大同学护送他们回校，并和校方进行了斗争。各校同学都感到受压抑，很想借题发挥，冲破抗日救亡活动的沉闷空气。这时，正巧在北平市公安局关押的一批学生中，有一个名叫郭清的同学，因受到残酷迫害而致死。这一消息，激怒了广大学生。学生代表义愤填膺，强烈要求采取行动。党团很难再说服同学保持缄默了。3月下旬，经党团研究，并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学

联在华北大学召开了会议，决定：为追悼和纪念郭清，反对国民党迫害、镇压学生，争取抗日救国自由，召开北平市学生追悼郭清同学大会。会址在北京大学三院，会场设置灵牌和花圈，并在事先准备好祭文和挽联。有的代表坚持要在会场放置棺材，以加强沉痛气氛，激发同学感情，增强教育的效果。他们自报奋勇解决棺材的问题，大多数代表同意。

3月31日上午，追悼大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当代表到会后，军警把会场包围了，机枪对着大门，不准进出。警察署长要求见学生会负责人。党团（当时党团成员都在会场）决定由我代表北大学生会去谈判。警察署长提出要马上解散会议，否则要抓人。我说：首先要撤退武装，我们开完会就解散。要马上解散会议，这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北大所能决定的。代表是从各校来的，追悼会是无可非议的，郭清因抗日救国而死去了，悼念他有什么不应该？警察不撤，我们也不撤。这时，蒋梦麟派人通知我到校部去。我来到校长室，在场的有蒋梦麟、胡适、郑天挺、樊际昌等人。他们要我立即解散会议，否则不能保证安全，还要开除为首同学的学籍。我说：这是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召开的会，我无法也无权解散会议。悼念因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而受关押、而又被迫害致死的同学，有什么错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警察要包围并用机关枪对准学生呢？

我要求校方和警察交涉，要他们撤退，他们撤了，追悼会开完自然也就解散了。校方不同意，坚持要我们立即解散。其实，当时即使散会，也无法走出大门，因为一出去他们就要抓人。谈判没有结果，我回到会场，向党团作了汇报，会议继续进行。

下一步怎么行动，如何离开三院？需要马上决断。会前，党团并没有决定游行，但也准备了一些宣传品。如何出去？如果一个一个出去，警察就会一个一个地抓；排队出去，可能会好些，损失小些。有人说三院后墙有一个缺口，那里没有警察，可以出去，并建议出去后游行一段，表示向冀察当局抗议，再解散，以扩大宣传和影响。这个建议得到大家赞同，就立即行动了。但队伍一出去，就遭到警察拦截，把队伍冲散了，有些同学被捕。我和巫省三、吴沛苍、叶纪霖四人，被北大当局开除了学籍。

“三三一”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使反动当局受到一定的震动，此后再未发生对学生进行大逮捕的镇压行动，并被迫陆续释放二、三月份被捕的北平同学二、三百人。它对广大学生来说，也是一个振奋，打破了沉闷的空气，使群众在加深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的认识方面，起了一定的动员、教育作用。这一次，使参加会议的同学，也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使我更加坚强了。被捕

的同学不久即被释放，党的组织和民先队组织并未因此而受到破坏，学生会也没有被破坏。这次行动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遭受了一定挫折。但这是属于运动前进中的缺点。北平学联和北大学生会总结了这次经验教训，三个月后的“六一三”游行，就搞得比较好了。

我们应该从积极的方面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要实事求是，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事，不能把有缺点的、造成一点损失的革命行动，都归之曰路线错误。党成立以来，在历次学生运动中，青年学生热情很高，有些过火的行动是很难避免的，党也不能强制群众必须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三三一”时我们得到了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当时，连一些警察也同情我们。在游行队伍被打散后，我曾和警察打个照面，他明知我是个被打散的学生，但并没有抓我。这是党领导下的一次群众的革命行动。这里有个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

（本文作者韩天石，1933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 “三三一”被捕入狱记

何兆仪



## 一、被 捕

1936年2月份，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回校以后，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了团结大多数同学参加持久的、艰苦的救亡斗争，学联决定寒假后复课。开课后，救亡工作更加紧张起来。此时，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开始采取高压手段对付学生。从此，有些同学去校外开会或者去办事，因而失踪的事，时有所闻。不久，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的

学生郭清因爱国罪被捕，受尽残酷的折磨，3月9日死在狱中。激起了北平学生无比愤慨，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冀察当局的血腥镇压，学联决定北平的大、中学生在3月31日上午9时，在北河沿北大三院礼堂举行追悼郭清大会。我们按时到了会场，映入眼帘的是一副棺材，睹物伤神。会议主席北大同学韩天石宣布开会，十七中的同学叙述郭清入狱受害的经过及死后遍体鳞伤的惨状。临死前，他说“我是中国人，我要救中国！”此时，抽泣之声四起。郭清只不过是一个十多岁的中学生，在这个爱国有罪的黑暗国家里，竟死在严刑之下，多么令人心痛愤慨！会散时，三院门前已被反动军警包围，同学不能出去。为了表示抗议，大家决定抬棺游行。三院有一个小旁门，通往孔德中学，平时是堵死的，此时有同学砸烂小门，推倒围墙，队伍由孔德中学冲到街上。一路上同学们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争取爱国自由！”“严惩屠杀郭清烈士的凶手！”“郭清精神不死！”“铲除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失地！”当队伍拐到北池子，密密麻麻的军警已挡在前面，如临大敌。同学们改呼口号“欢迎爱国军警参加！”队伍离他们越来越近，他们便持枪过来横冲乱打，我们队伍躲避不开了。我随一些人挤进路旁一个小纸烟店中。这商店里已有十余个学生在内，其中有北大女同学张毓珣。我们相互

望了一眼，心照不宣。约半小时，军警已走远了，学生们陆续走出店厅。张毓珣已走出去，可是她又回店中找我，不料这时过去了的军警又折了回来，我与毓珣一起被抓，带到内六区警察署（现在的沙滩银闸胡同）已是下午1点多钟了。看到院内已有被捕的学生数十人。女生约二十人。我认识的北大男同学有谢云晖。在院内坐着一个穿黑布大褂的“便衣”老头，相貌奸诈，但用极其和气的声调对站在靠近他的女同学们说，“……你们不是自己愿意去的，没有你们的事，回头问你们的话，你们就照直说是谁叫你们去的，就放你们回去……，”但没有人理睬他，敌人开始对我们施展分化、利诱的伎俩了。不一会，从门外带进了另一个学生、是北大男同学叶纪霖，他已化了装，头上戴一顶呢礼帽，身穿一件不合适的长袍，象一个买卖人。这时天色已晚，开始感觉凉了。一天滴水未进，又渴又累。这样一直站到深夜，来了一辆大警车，六区的警察动手把我们每两个人的各一只胳膊捆在一起。捆得很紧，有一个女同学用手摸了一下捆痛了的地方，那个原先装着很和气的便衣老头，凶相毕露，扑向前来，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喊叫：“看你敢动它！看你敢动它！”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们上了车，车开动，弯弯曲曲不知走了多少路，一天的折磨又经车子的颠簸，我几乎呕吐出来。最后车停在荒野地方的一个大铁门前。在微弱的

灯光下，隐约可看见四个阴森森的大字“陆军监狱”。进去之后，先到办公室内，被搜去了身边所有的东西。然后到一座高墙前，进了小门，是一间阴暗低小的屋子。我们一个一个被带上了铁镣，用钉子钉死。再往里走，就是正式的牢房。一迈步只觉沉重的锋利的铁棱角在脚蹠上磨来磨去，痛彻心腑，寸步难行。我们一个跟着一个扶着墙壁艰难地向前移动。只听到一片拖在地上的唧当之声。在阴惨的微弱灯光下，看清楚这是一个长甬道，两旁都是装有铁栏杆的牢房，里面黑漆漆的，但也传出唧当的声音。在这个牢房里，只有斥骂、体罚、苦刑和死亡；我们已走进与世隔绝的人间地狱了。

我们进入最后一个房子，里面没有灯，一切都是漆黑的。摸一摸房里一无所有。我们实在太疲倦了，便倒在地上休息。早上去开会时，想到可能要游行，便把棉衣脱了。此时没有棉被盖，身底下是冰凉的土地，只觉阵阵寒气透骨，不能入睡。我们坐起来又倒下，夜越深，天越冷，这长夜真是难以熬过，周围只有此起彼落的唧当声。我们又侧面卧倒，我的脸贴在毓珣的胸前，她的脸对着我的胸前；弓着身子，象套起来了一样。突然间，我发现了一个奇迹：我的胸前竟能感觉到她呼吸出入那点微弱气息的温暖。她也有同样的感觉。她高兴地说：“我们发明了一个睡觉的好办法，回去得告诉



她们……。”这样，我们度过了“三三一”之夜。在这漫长的黑夜里，思绪万千。我想，我是没有罪的。我不应该坐牢。我只是不能坐视国土沦丧，我只是不愿做亡国奴。谁能相信，在这个文明古国之中，人民竟不能有爱国的自由呢？！我极其痛恨这种强暴的统治，与之誓不两立，我渴望黎明的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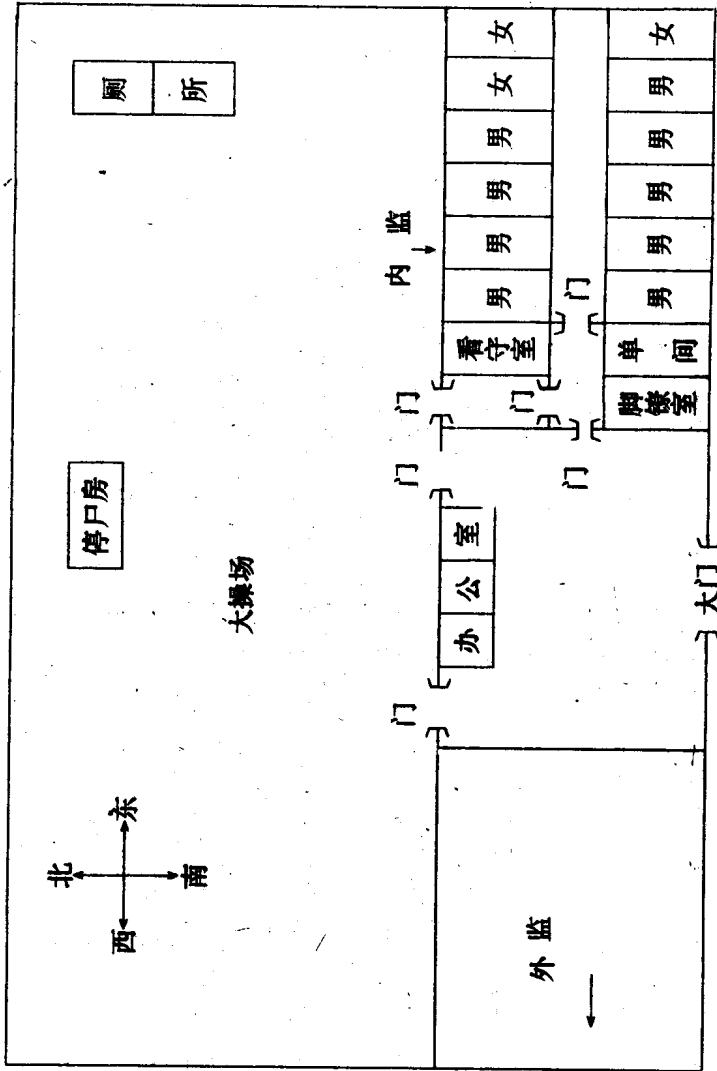
## 二、狱 中

4月1日天还未亮，看守在外面喊叫：“放茅啦！”就是叫“犯人”上厕所。我们忙起身，从昨天进来的甬道走出去，由旁侧小门走到大操场。这操场比学校的操场大的多。四周都是高墙；高墙上装有铁丝网。在右远方靠墙是厕所。去完厕所之后，可以在操场散步十多分钟，但不允许我们之间相互交谈。操场的中央有一间极其矮小的房屋。以后听看守说，这是停尸房。吉鸿昌将军当年就是关在这个陆军监狱里的。死后即停放在这间小屋子里（见附图）。

男女“犯人”在不同的时间放茅。女的先放；男的后放。在放茅时，知道了除我们这批新的“犯人”外，老的“犯人”有四个，其中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妇女。

回到牢房之后，我们彼此互通姓名。记得有清华、

附：陆军监狱草图



燕京、女六师、女二中、女附中等校的约十多人。8点钟，开饭了。每人两个窝头和一碗菜汤。菜汤是放在一个大木桶中抬进来的。远远就散出一股泡烂木头臭味和泔水臭味。盛在碗里象泥汤一样，又黄又浊，使人作呕。我们十余人挤在约十平米的屋子里。这一整日，我们谈着各人被捕的情况，并且互相勉励说，无论受到什么折磨，决不吐露任何真实情况。大家越谈越高兴，已忘记自己是身陷囹圄之中了。到了下午3点多，吃第二顿饭，这顿饭是含砂子的黑馒头和含泥的菜汤，饭后又放茅一次，因为没有灯，天一黑只好睡觉，漫长的黑夜，真是难以度过去。这晚看守扔来几条破棉被和破草帘，说是老的“犯人”借给我们的，我们又在地上过了一夜。但是这一夜比前一夜好得多。在狱中，不认识的难友互相友爱，使我们免于冻坏，心实难忘。

次日，当放茅回来，突然发现那个单间里锁着一个人，是叶纪霖，我们大吃一惊。旁边的看守指着叶对我们吼道：“他是主犯！他是主犯……我们找出来了，决饶不了他。”敌人无法从同学口中探知被捕人中谁是学联负责人，只有在此设下圈套，对我们进行分化、讹诈、威逼和利诱的诡计了。

不久，燕京大学送来了不少东西。据说送了铺盖来，因为看守感到难于检查，拒绝收下。只有食物拿了进来，从食物中夹带进来一个消息，北大开除了同学，

其它不详。由此反映出，三个大学（北大、清华、燕京）之中，以北大校方当局对运动的态度最为恶劣。

这座牢房内是两排房子共十余间。我们这次进来的女同学约二十人，关在最末端的两间房子里。我们旁边的一间住的是老的女“犯”，其余都是男监。以后知道这些老的“犯人”都是政治犯，有的是共产党嫌疑犯，也有的是思想犯或爱国犯。差不多都是证据不足，又无人保释，既不能判刑，又不敢释放的人。因此，长期关押在这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复自由。

由此可见，国民党反动政府“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滥捕滥杀的政策了。老的男犯中有清华大学的教授张申府和中国大学教授刘侃元，还有一个清华的工友也牵连入狱，听说表现很好。不久，张申府慷慨解囊，捐赠给我们一些棉被和铺板。那位四十多岁的“女犯”就是刘清扬。在放茅时，得有机会与她接触。她很健谈，说话富于煽动性。她很关心我们，常给我们分析一些情况。与她时常交谈，对于我的情绪确实起到了鼓舞与稳定的作用。当时，我曾感到学生运动再搞大游行，作用也逐渐不大了。究竟应该怎样做下去，我很疑惑。有一次请教她的意见，她对“三三一”游行中有这么多的人被捕，也感到损失较大。她总结教训，并满怀信心地对我说：进步的组织应该注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不要再有一点力量便急于行动而轻

易暴露给敌人了。

我们十多人挤在这间监牢里，大家互相关心，互相鼓励，患难与共的友谊，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整日畅谈，总结教训。国民党反动政府企图用监狱迫使我们放弃抗日救亡的主张，但是，适得其反，反而促成我们坚定不移的决心，奋斗到底！例如，我们谈到一年前，汉奸坐着汽车，一车一车驰赴新华门向何应钦请愿，要求“自治”。何应钦亲自热情接待。我们这些一直过着书斋生活与人无争的女学生，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抵抗主义，国土沦丧一日千里，国破家亡之痛，使我们抛弃平静的生活，走上救亡的道路，以尽中国人民一份的天职。谁知，今日竟遭到这样的摧残。对于汉奸要求卖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待如上宾；而对我们要求救国，则横加镇压。真是“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是非颠倒竟至于此！血的事实深刻地教育了我们。要想免于做亡国奴的噩运，必须打倒这个横在我们面前的障碍——卖国残民的统治者。我们还谈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贯对外投降政策是有其阶级根源的。其阶级性质和利益决定他必须投靠帝国主义，镇压人民来苟延残喘。这时，我们有点豁然开朗，从以往的单纯的爱国主义，进而初步探索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也谈到，自己出了课堂，下乡宣传几天，自以为就很能吃苦了。其实与广大劳动

妇女的艰苦生活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监狱是个大课堂。在艰难的现实斗争中，使我头脑清醒，去思索许多问题。我想，出狱后，应该痛下决心，努力学习，加紧锻炼，为完成民族革命奋斗到底；并改造自己，使之进一步符合于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狱中，很多时间我们用在互相教唱革命歌曲。每个人会唱的歌都教唱一遍。我们每日低声歌唱，用歌声激励自己；也用它传送我们的心声，告诉在其他监房所有难友们，让我们一起勇敢地坚持斗争下去吧。放茅时，经过男监各门口，通过铁栏杆，彼此点头微笑，这简单的动作中，包含赞许、信赖和鼓励的深意。这一切一切都使我们忘掉了当前的磨难：没有人身自由，难以下咽的饮食和铁镣的折磨。不久，男监办了一个小型刊物，用废纸抄写，在各监间传阅，交流消息，鼓舞士气。内容丰富多采，有评论、消息报导、诗歌、杂感等等。有一位多才多艺的同学用章回小说的体裁，叙述了从“三三一”前后的纪事，引起热烈的争论。后又有人提出打“电报”传递消息。用拉丁化新文字，以每个音标敲墙壁几下和间隔的长短来表示，拼成新文字，写成电文。这样一来，狱中空气更加活跃起来。在狱中，我们生活得十分紧张，也相当愉快。

陆军监狱是关押陆军的军事犯的，但是“一二九”前后，因为学界被捕的人太多了。普通的监狱已容纳

不下，所以送到这里。狱中一部分划分“内监”专门关押知识分子之用。其余部分仍作关押军事犯用的取名“外监”。按狱中规定，一经入狱，按军事犯处理，必须带上脚镣，所以我们一入狱便带上了它。张申府为知名教授也未能幸免。

狱中有监狱长，内监设主任一人，看守班长二人，看守多名。有一个班长姓高，是天主教徒。常喜欢在放茅时召集我们“训话”。满嘴上帝仁爱，语无伦次。他对“犯人”最狠。常寻隙对“犯人”进行体罚折磨。有一次他“训话”，说我们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对的，不符合天主的教导。应该“当人家打你左脸时，伸出右脸给人家打。”看守们都是最低的士兵待遇，生活极苦。同学们经常对他们进行工作，以后他们对同学们的态度逐渐改变，十分同情我们。他们其中有人后来竟冒着危险，为同学带信出来。叶纪霖不久能从单间回到一般牢房里，可能就是通过这一渠道而达到目的的。内监主任每过两三天来巡视一次。他有时暴露思想说，他怕学生中间有有来头的，所以他不愿意得罪人。这时，有一位燕京的女同学生病了。狱中只有一个卫生员，看不了病。内监主任有些惊慌。他说：“出了一个郭清，你们就闹得这样，如果我这里再出一个郭清，就更不得了啦。我也别当这个主任了。”由于敌人有畏惧群众运动的心理，在同学们强烈要求释放生病

的同学的斗争中，几个病号终于未经审问，就提前释放了。

两个星期过去，冀察政务委员会派来一名法官“提审”“三三一”被捕学生。我们得知此信后，大家作好准备，要在答话中尽量把自己说成是无意中走去开会或参加游行的；并且话中决不牵涉旁人，随后，那间单间作为临时的“审讯”室。同学们一个一个被叫了进去问话。轮到我时，他先问了姓名、年龄、籍贯之后，开始问参加了追悼会和游行了没有？是怎样去的？为了避免牵涉到旁的人。我说，我早晨在校园散步，看见学生会的布告，我闲来无事走到礼堂去看看，就这样去的。以后他又问些学生会的负责人是谁？学联的负责人是谁？一律回答“不知道”。问完话后回到监房，大家一对“口供”，大多数人都是说“旁人拉了去的。”法官追问“是谁拉了你去的？”回答说：“忘记啦！”但是，法官并没有一直追问下去。毓珣也说：她回答的是：“别人拉去的，是谁拉的也忘记了。”她说我的口供较妥当，因为在话中没有提到旁人。这一次法官也与刘清扬等谈了话。事后，刘清扬对我们说，南京与宋哲元有矛盾，统治者间的矛盾，对我们有利。据她所知派来的这个法官是冯玉祥的人，因此，她估计我们的问题的处理不会严重。

又过了约十余日，监狱长召集“三三一”被捕全体



学生“训话”。话中无非是“政府”要宽大处理释放，出去好好读书，不要再闹事；再进来就要严办……等等。接着宣布释放名单。其中有毓珣，没有我。毓珣感到意外，她连忙去找内监主任、看守班长，要求留下她，换我出去。他们听了冷笑着说：“这事由不得你！……你不愿意出去呀？！”毓珣整日在室内徘徊，坐卧不宁。在学校内及这次隔绝的二十多天中，我们两人形影不离，相濡以沫，谁也不知道前途怎样，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自由，所以在心理上我们都想到彼此相依为命，生死与共。现在突然她先我而出去。她宁愿牺牲自己，安全让给别人的意愿，使我终身难忘。我连连劝她说：“能出去一个就快点出去一个。外边有许多事在等着你做呢。我现在留下，不正是给我一个锻炼的好机会吗？”

在她们走后，女同学留下的只有我和女二中等三个女同学，日子显得过的更慢了。我们初进来的时候。从操场看到墙外的树梢还是枯枝，而现在已是葱绿满枝了。又过了两周，5月7日我们四人无任何手续被释放。

5月中旬男同学也都陆续出来了。我们全体“三三一”被捕学生五十多人，在燕京大学聚会一次。我们这些曾患难与共的战友们紧紧热烈握手，激动地说：“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为抗日救亡而奋斗了。”

### 三、后 记

“三三一”抬棺游行已过去四十八年了。在这期间祖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卑辱屈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已跃为世界上的强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以来，亿万人民同心同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切都是四十八年前我们青年时期所梦寐以求的，而欣幸的是今天全国青年们过着幸福的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条件下，奋发图强，一定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983年5月4日

(本文作者：何兆仪，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1937年毕业。

1984年病故于北京。)

## “三三一”事件略述

葛佩琦

.....

1936年1月下旬，赴南京“聆训”的各大学校长返回北平后，立即发表宣言。表示“绝对拥护中央政府”，“制裁罢课和一切破坏纪律之行动”。伪学生代表返校后，气势汹汹，鼓吹要“绝对拥护政府”，并要求政府严惩“闹事学生”。2月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其中规定：军警可以枪杀抗日群众，逮捕爱国分子，并解散救亡团体，钳制救亡言论。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许多大中学校的学生成批成批地被逮捕或被开除！

2月11日，设立在北平地安门外的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简称河北高中）当局，强行改组学生会，并开除

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康世恩、张行言、刘耀宗、王亢之、丁辛(马子卿)等十人,强迫他们立即离校。在校学生要求学校当局收回成命,遭到拒绝。高二、高三班的同学六十人,激于义愤,和被开除的同学一起,携带被扔出校门的行李,走上街头,投宿于北京大学第三院学生宿舍。北大同学给予这些在抗日救亡战线上的战友,以深切同情,热情接待。

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三百多人,按照学联的布置,于2月13日护送河北高中被开除的同学返校。该校大门紧闭,无人接待。学生们越墙而入,遂与该校的一些工作人员,发生剧烈冲突。学生们在激愤之下把校长及部分训育员住处的用具捣毁了。早已闻风躲出校外的该校校长,于下午6时,伙同军警返回学校,将高二丙班学生郭清逮捕,五花大绑,押送监狱。

郭清是一位普通的爱国学生。但反动当局却把他看成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是“大闹”河北高中事件的“主谋者”。于是就对他严刑逼供,残酷折磨。可是,他们并没有从郭清口中得到半点他们妄想得到的东西。

3月9日,爱国同学郭清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噩耗传出,北平学生悲痛异常,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北平学联,对郭清之死,要有所行动。3月30日,北平学联党团(书记黄敬,委员黄华、韩天石)决定:3月31日上

午9时，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郭清大会。3月30日夜，北大学生会和民先队个别通知了一些同学：明天上午9时到三院参加追悼郭清大会。被通知的都是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未通知一般同学。

3月31日上午9时左右，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一千多人，集合到北大三院礼堂，参加追悼郭清烈士的大会。会前，有外校的王庸等几位同学，从骡马市大街棺材铺，用汽车运来一口空棺材，放置在大礼堂的中央。在棺材前脸挂的白布上，画着郭清的速写像。棺材周围放置着各校学生送的大批挽联和花圈。很多参加追悼会的学生见到棺材，认为里边装殓着郭清尸体，不觉悲从中来。特别是一些女同学泣不成声！会上散发了“郭清烈士及被迫害的事迹”（孙陶林同志印的）、“告各界同胞书”和“告警察及兵士书”等宣传品。

北大校长蒋梦麟闻讯后，以外校学生潜运棺材入校，系侮辱本校为理由，制止大会召开。他亲赴会场，严厉训斥学生，勒令停止开会。学生们置之不理。他把当时北大学生会总务、大会主持人之一韩天石叫到北大二院校长办公室，一定要他解散追悼会，不解散就要处分。韩天石说：“这次会不是北大单独召开的，各校代表都有，我们无权解散。”理直气壮地把他顶了回去。但他们仍然要韩天石赶快回去，停止开会。

韩天石回到会场，向学联党团汇报了情况，经党团

的几位同志研究决定：不停止开会。上午 11 时，追悼大会正式开始。主席致悼词之后，各校代表纷纷发言，慷慨激昂，悲愤气氛达到高峰。其时，北大三院门前已被军警封锁。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喊道：“我们连开追悼会的自由也没有了！”同学们更加愤怒。于是，有人提议抬棺游行，立即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赞同。但北大三院的大门早已被武装军警封锁，出不去了。北大三院的南邻是孔德中学（现名北京第二十七中学）。两校之间有一条隔墙，年久失修。同学们把隔墙拆开一个豁口，将棺材从北大三院抬到孔德中学。出孔德中学的大门，就是东华门大街，游行队伍由东华门大街到北池子大街，正在前进时，被摩托车队追上，拦住去路。反动军警向游行队伍横冲直撞，驱打学生。结果有很多同学被打伤；有五十多名男女学生被捕，关进警车，押送到陆军监狱。

此次被捕学生中，有北大同学九人，即谢云晖、张毓珣（女）、何兆仪（女）、赵祥铸、卢英士、叶纪霖、张肇敏、林根、陈玉玑。

当天，北大当局贴出两张布告。一张宣布：“本届学生会，着即停止一切活动。”另一张宣布：“查本校学生巫省三、吴沛苍、韩天石、叶纪霖四人，破坏秩序，危害全校安宁，应即开除学籍。”

4月1日上午，北大学生会发布声明：“学生会是

由全体同学推代表组织而成，学校当局不能任意摧残。”在未经全体同学议决停止本会活动之前，“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并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和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

北大同学和北平的学生一起，又开展了营救被捕同学，反对开除爱国同学的斗争。

“三三一”抬棺游行，虽然受了一点挫折，但面对当时学生运动所处的险恶环境，我认为这次斗争，还是很有意义的：（一）显示了中国青年的骨气。自1936年2月，国民党南京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以来，反动派对平津以至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了疯狂地镇压，大批爱国学生被逮捕、关押以至屠杀。“三三一”抬棺游行，向国民党反动派及日本帝国主义显示了：中国青年是吓不倒的，是有骨气的，是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战斗到底的！（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青年的欺骗和残暴。1936年2月4日晚8时半，蒋介石在向全国发表的题为《今日青年之责任》的讲话中说：如有“牺牲青年学生，损害其生命者，即为汉奸”。“三三一”抬棺游行，以事实揭露了蒋介石口蜜腹剑、残害青年的真面目。（三）有利于争取宋哲元参加救国统一战线。一二九运动以来，宋哲元一直是按照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指示，用高压手段对付爱国学生运动的。但高压了三个多月，却压出一个“三三一”抬棺游行。这次行动显

示了群众力量的不可抑制。这就使宋哲元不能不重新考虑,应如何对待学生运动,才对自己有利。这就为尔后我们争取宋哲元加入救国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回顾“三三一”前后的那段历史,正是这样发展的。在“三三一”以前,宋哲元对付学生运动的方法是“狠打,不杀,抓而不判”。通过“三三一”抬棺游行的现实,使他看到:打,会遭到强烈反抗;抓,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三三一”之后,在刘少奇同志的指导下,学生们喊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之后,宋哲元很快就点头示意,表示欢迎。所以,在“六一三”学生游行时,他没有让军警打学生、抓学生;在“双十二”学生出景山大门时,站岗的士兵向学生敬礼。如果没有学生的强烈反抗和在逆境中的坚持斗争,宋哲元转变得不一定这样快。以上的三点,是我个人的看法,供参考。

(本文作者葛佩琦,1933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 参加绥远抗日阵亡将士 追悼大会的经过

陆 平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满蒙政策”，进而灭亡全中国，1935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纠合蒙奸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汉奸李守信、王英等积极做进攻绥远的准备。日寇付出巨款和大量武器来扩充伪军。1936年2月，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由德王和李守信任正副总司令，又委王英为“大汉义军”，麇集在绥东之伪军达七十多个团。日伪经过周密计划与多方准备后，在这一年的11月15日发动了侵绥战争。傅作义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下，在全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强烈要求鼓舞下，率领所部奋起抗战。11月18日击溃了进攻红格尔图之日伪军，取得了初战胜利。24

日，乘胜收复百灵庙，全歼日伪守军。12月4日，又收复了大庙，伪军两个旅反正，二十九名日本顾问全被击毙。绥远抗战的胜利，挫败了日寇侵绥计划，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忱，也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性。绥远抗战胜利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在绥远抗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地、各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援绥远抗战运动。北平学联领导全市大、中学校的学生积极参加了捐献“万件皮衣”运动，慰问前线将士，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

绥远抗战胜利后，于1937年3月15日，在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举行“绥远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北平学联派我作代表参加。在行前三、四天，民先总队长李昌同志和我商量，民先总队部不另派人，由我代表，以两个团体名义写一篇祭文。他还对我说，北平市委文委还要派文艺界几位同志前去，希望同行以便关照。我表示同意。3月13日我们从西直门火车站登车出发。我们一行有广西大学学生会丁克辛（女），文艺界有吕骥、崔嵬、张瑞芳等五人。作为学联和民先总队这样的团体，公开参加国民党当局主办的如此高级的大会，还是前所未有的。我当时是怀着一种既兴奋又担心有可能被拒之会外的心情前去的。14

日抵归绥，住在绥远省县志馆。负责招待我们的是该馆一位老先生，他文质彬彬，待人和蔼，颇为健谈。吃饭时，我们和他谈论一些抗日救国的问题，并借此机会宣传我党政策，这位老先生表示赞同。在归绥的三天里，几位文艺界的同志抓紧一切时间到学校、军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街头剧。他们的工作十分繁忙，有时搞到深夜才回来。我则忙于同当地学生会和民先队的同志们交谈，互通情况，交流经验。当时归绥抗日救国的空气颇为浓厚，我们的活动没有受到干涉，初来时的担心逐渐消除了。

3月15日举行追悼大会，由傅作义将军主持。国民党中央派中政会主席汪兆铭（汪精卫）主祭，山西省主席阎锡山及各地各军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场设在烈士公园。在烈士祠堂前搭了一个大席棚，棚内挂满了挽联，置放着许多花圈，十分庄严肃穆。当大会司仪宣布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代表致祭后，我登台致哀，朗读了祭文。千言祭文，字字铿锵，饱含着爱国青年对阵亡将士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哀悼，强烈地表达了青年献身抗日救国的决心，充满了青年人的豪情壮志。朗读中，我百感交集，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读罢，将祭文交给了司仪。接着到烈士祠堂瞻仰烈士灵牌，祭案后摆放着几百个小灵牌，上面写着每位烈士的名字及生前职务。我们绕行一周后

退场。

3月16日在小校场举行了阅兵，汪兆铭、阎锡山讲了话。我们一行也被邀请上阅兵台观礼。

3月17日早，我们乘专用列车回北平。因乘车人多，我们只好坐在为随员准备的一辆简易客车上，没有厕所，不通暖气，靠一个火炉取暖。条件虽差，但我们并不感到苦。车厢里除我们之外，别无他人，这倒成为我们尽情谈论的方便条件。大家一路上谈笑风生，流露着顺利完成任务后的喜悦心情。最使大家高兴的是被国民党当局定为非法团体的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居然与国民党党政大员同堂悼念阵亡将士，发出自己的声音，使我们的组织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在争取合法地位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列车到达大同，艺术界的五位同志下车了，我与丁克辛返平。

1985年8月，我因公到呼和浩特市，特意到烈士陵园一游。园内绿树成荫，烈士祠堂已经修葺一新，当年的绥远抗日阵亡将士墓碑仍巍然屹立。此情此景，唤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我沉思：愿这些历史文物使人们永远记住中华民族过去的苦难，永远记住革命烈士抛洒的碧血，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1986年6月22日

（本文作者陆平，原名卢获，1934年入北京大学教育系。）

## 爱和恨的回忆

何 善 周

---

1936年8月，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起初念的外文系，上课一周之后，又转入了中文系。这时，我距二十五周岁只差三个多月，以年龄论，全班三十一人中我是第二。年岁既长，又多年废学，读书心切，立志入校以后埋头读书。

但是，少年时代的爱和恨的记忆压迫着我，目前的罪恶现实更痛苦地刺激着我，使我埋不下头去。我经常记念着：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被国民党特务追

捕，跳火车惨死的英文老师冯品毅<sup>①</sup>；政治上是我的启蒙教师，在校时经常带领着我们斗争，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在浙江的老同学刘英<sup>②</sup>；被国民党宪兵在汉口大街上剁成肉块的同学许适存<sup>③</sup>；更有头被挂在山东曹州城门上，尸体不知下落的我的最亲密的同窗钊克俊<sup>④</sup>；还有前往广州投奔革命，而始终没有消息的同学熊长春<sup>⑤</sup>。他们的可亲的面影，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在深夜，无数次地，我眼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流下哀痛的，然而饱含着满腔义愤的怀念的泪。国民党反动

- 
- ① 冯品毅，河北省人，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毕业，河南第一师范学校英文教员兼训育主任；教学认真负责；在训育主任的工作中，对学生关怀备至，深受同学们的愛戴。五卅运动期间，带领学生走遍去开封各教会，向帝国主义分子提出抗议，进行说理斗争。时任中共地下党河南省委委员，一师学生思想进步，和冯老师有极大的关系。1926年春辞去一师的职务，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专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之后，在京汉线列车上，被特务追捕，跳车牺牲。
- ② 刘英，河南固始县人，河南第一师范学生，在校时宣传、组织同学参加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去鄂豫皖苏区工作，曾任师长。后闻在浙江牺牲。
- ③ 许适存，河南南阳人，1924年夏考入河南第一师范学校，与我同班，在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去武汉参加革命，1927年“七一五”以后，被惨杀在汉口街头，听说死后尸体被反动派剁成肉块。
- ④ 钊克俊，河南邓县人，1924年夏入学与我同寝室、同自习室、同“伙”吃饭。一年级时即参加共青团，勇敢机智，工作能力强，学习成绩也好。1928年被惨杀在山东曹州，死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的头挂在曹州城门上，一为示众，二为诱捕前来收尸者，头骨和尸体都不知下落。
- ⑤ 熊长春，河南开封人，城市贫民，我们同时入学，同班上课。1926年去广州参加革命，后来听说去苏学习，以后无消息。

派所欠下的这一笔笔的血债，这深刻的仇恨，使我的头脑发胀，心胸绞痛，我怎么能够只坐着啃书本呢？

现在，国难当头，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依然张牙舞爪，手持屠刀，继续捕杀工农和青年，调遣大兵包围陕北；而对日本帝国主义却奴颜婢膝，步步退让，继续出卖土地和人民；对人民是凶残的刽子手，对敌人却百依百顺，犹如奴仆和儿孙。

无耻的国民党的御用报纸，天天把平津的国民党官僚们奉迎日本主子的丑闻，当做“喜事”来宣传。

冀东和内蒙的卖国贼们，在无耻地吹嘘着他们分割国土，鱼肉人民，反共反苏的“业绩”。

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魔爪已经伸到北平城外。

想着过去，看看眼前，仇恨和愤怒塞满了我的胸膛，我感到无比的气闷和痛苦，我怎能静下心、埋下头去读书呢？

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察绥的抗日战火的点燃，“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强劲的风，更是鼓舞着我，催促着我，我怎能死下心只去埋头读书呢？我不是一条“死尸”！

正在我的苦恼难以排解的时候，一位历史系的同学<sup>①</sup>来约我，希望我参加学生会班代表的竞选，我毫不

---

① 北大历史系赵存谷同学，当时为地下党员，现在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

迟疑地答应了。我决定争取参加校学生会，跟着同学们做一些抗日救亡的工作，于是我便和同班向远宜<sup>①</sup>投入了中文系一年级班代表的竞选活动。经过相当激烈的斗争，打败了反对派，选举的结果，我们二人以绝对优势当选为班代表，接着我又被选进了学生会的理事会<sup>②</sup>。

这一届的学生会代表大会主席是陈忠经<sup>③</sup>，副主席是朱仲龙<sup>④</sup>和李彬。李彬是个国民党员。理事会首席委员是刘玉柱<sup>⑤</sup>。

陈忠经做学生会主席，可说是北大学生所公认的最合适的人选了，就连右派学生在大庭广众之中也说不出反对的话。一年之中，在他主持的大会上，我没发现过一次“噤通”主席的情况。这不仅是由于他外表的威仪和端庄，说话机智得体，既有吸引力，又有镇服力，能在右派学生吵叫哄闹的会场上，神色自如，指挥若定。每逢大会上辩论激烈的时候，他都能够极为智巧又极为威严地遏止住右派的猖狂，给左派学生腾出发言的机会，态度又总是那么从容、那么公正。四十多年

---

① 向远宜，湖南人，今名肖离，作家，原任北京出版社主任编辑。

② 理事会等于执行委员会，是班代表大会闭会后学生会的常设办事机构。

③ 陈忠经，经济系四年级学生。解放后曾任外交学会秘书长。现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④ 朱仲龙（朱穆之），外语系四年级学生。现任文化部部长。

⑤ 刘玉柱，物理系三年级学生，现任二机部副部长。



过去了，过去的学校生活旧事大半都已记忆不清了，而老同学陈忠经主持大会的艺术，至今还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副主席朱仲龙，每逢学生会工作紧张的时候，他便和我们日夜在一起，我们工作他工作，我们唱歌他唱歌，从推油印碾子到扫地、烧“废纸”<sup>①</sup>，他都和大家一齐动手，经常一直忙到深夜。那时我住在北大东斋，走出学生会的大院隔着一道墙就是我的寝室，每逢夜深，东斋宿舍的大门上锁之后，我便爬墙过去。只要有人帮我爬上宿舍东北角的墙头，我便抱着墙里面的一棵老槐树滑溜下来，不几步便到了我的房间。但是，在“一二九”周年纪念的前夕，北大学校当局，为了阻止北大学生象头年一样爬墙出去参加游行，预先把一院和东斋的墙头上都扎上了玻璃碴子，从此，每到宿舍锁门之后，我便不能爬墙回寝室睡觉了。一次，我们工作完了之后，大约已是深夜两点，朱仲龙说四斋的老工友回家去了，便把我们领到四斋老工友的房间里去睡觉。一张小床几个人睡不下，大家便横着身子头顶着墙，腿上搭着老工友的薄被，几个人肩并肩半躺半坐地一起到了黎明。他是四年级生，就住在四斋，本来可以随时回寝室安安稳稳地睡觉去的，但是他还是和我们在一

---

<sup>①</sup> 指油印过的废蜡纸、废传单等，为避免反动派的搜查，都随时烧毁。

起“同甘共苦”。

回忆起刘玉柱，我总是把他和我少年时代的老同学刘英的形象混同起来。刘英同学也是同样的沉着少言，刻苦俭约，而且质朴坚韧。那时，我以一个乡下孩子，走进师范学校，政治上只知道“孙文”的名字，还有保皇党把“文”改做“汶”，诅咒似地说他是洪水猛兽。是刘英教给我们许多革命的道理，指导我们那班孩子们怎样开好小组会。当时我们对刘英同学是尊敬的，爱戴的，就象北大的进步同学都亲切地称刘玉柱为“首相”一样。到了1930年春天同学间传说刘英担任了鄂豫皖边区的师长，我们都认为他一定会带着红军打胜仗的，想不到后来竟牺牲在浙江，永远成为我的一个哀痛的记忆。

1936年初冬，我以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初次参加北大学生的理事会工作，许多事情都很生疏，是刘玉柱帮我熟悉学生会的情况，教会我处理一切事务，更在日常工作中，随时给我指出原则、方向和方法，因此，我很快地学会了很多东西。<sup>①</sup>

---

① 本文作者自记初次参加学生会情况，未说明是哪一届。按本书所收葛佩琦记述“一二九”时期北大历届学生会情况的文中，指明作者是第四届学生会的执行委员之一。作者举出的该届学生代表大会正副主席人选也确属第四届的。但文中所涉及的内容时间范围（如“1936年初冬”、“一二九周年前夕”等）则尚在第四届学生会成立（1937年3月25日成立）之前。追忆印象，容有舛误，可与葛佩琦文，互相参证。

解放以后，刘玉柱担任我的故乡开封市的市长，他仍然是那样刻苦俭朴，一年四季身上一套旧制服，冬天不穿棉裤，木板床上只那么一条旧军毯，一条薄棉被，开封人民都亲切地称誉他“铁屁股市长”。那时我正在清华园，故乡来人给我报说这一喜讯的时候，我刚听过周恩来总理给清华全体师生讲的第一堂政治课。这时我心里真是喜上加喜，全身轻快。我想：开封的严冬，也是滴水成冰的，我在那里上学的时候，大教室里虽然生着一个炉子，还不得不时张嘴哈着墨盒才能写字，自习室、寝室都不生火，晚上要披着被子上自习。一个市长能够忍受人民所认为水平以下的苦，这在自古以来也是少见的，理当受到人民的赞誉。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践踏和洗劫，满目残破和贫困的古城，它的人民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铁屁股市长”啊！

我在北大学生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也许我已成为他们眼里的一根刺了吧？国民党反动派对付革命者惯用的两手，是收买和捕杀。他们为了拔掉我这根刺，第一步是设计来收买我，主其事者便是马乘风。

1937年“五四”纪念日以后，马乘风已经闻名于北平学生界。他是收买、拼凑新学联的幕后人物之一，也是收买组织志成中学的“童子军”，在“五四”那天，开到师范大学操场大打出手，凶殴参加纪念会的旧学联的

代表的指挥者。新旧学联在谈判桌上达成的协议，双方共同纪念五四的诺言，在他们这班国民党人身上都是空文和谎话。

马乘风，本名马龙图，原是河南第一师范学校我的上一届的同学，在校时喜欢和同学们打闹戏谑，有时甚至到了猥亵轻狂的地步。北伐军打到武汉之后，他去武汉进了黄埔军校，加入了汪精卫的改组派，由于汪精卫的提携，很快地当上了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委员。1930年5月，第一师范举行校庆纪念会，校长孙云浦邀请校友马委员来校“训话”，布告一贴出来，同学们便议论纷纷，有的鼻子哼了一声，说：“新贵！”有的则轻蔑地说：“爬的真快，会爬！”

纪念大会开得很隆重，是在大操场上搭了台子举行的。开会之前，校长叫我上台去作记录。当马委员“训话”的时候，我望着台下，同学们有的笑一笑，做个鬼脸彼此捅咕一下；有的故意咳嗽一声。在马委员“训话”的时候，台下始终没有静下来。我坐在台上右边的一张小桌子旁边，垂着两手一动也没动。第二天上午，校长向我要大会记录，我把依然是空白的本子还给他，借口我头一天打篮球伤了手，写不成字，校长狠狠地训斥我一顿了事。我们已经临近毕业考试了，可能因此没有开除我。

后来听说马乘风罢官以后，来到北平投在北大教

授陶希圣的门下，研究起中国经济史，并且当上了私立中国大学的讲师，更兼任了北平市政府的秘书主任，新“五四”大打出手以后，竟成了北平全城的“名人”。不料“五四”过后不久，他来到北大东斋“访”我，我没有见。第二天便送来一封“北平市政府马乘风”的大信封，里边装着一张大红的请柬，请我第三天上午十二点前往马公馆“赴宴”。“啊！真的找上门来了，这必须认真对待呢！”

第三天的正午我并没有去“赴宴”。中国有句俗语说：“吃了人家的嘴短”，再说这种饭我是咽不下去的。但若置之不理，这类恶棍和流氓，便会横生枝节，暗下毒手。好吧，权且周旋一下再说吧！下午三点，我穿上当中学教员时出门才穿的、在我来说是最阔气的夏装，在东斋门口挑选了一辆车身发亮的黄包车，登上车到了西城马公馆。我预料这时客人已散，果然只马乘风一个人在家。他迎接的很是亲热。

“老弟，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我们等了你很久！”马乘风面带笑容，让我坐在沙发上，他站在斜对面的一张圆桌子旁边。

“真是对不起，我向来怕见人，尤其怕见当官儿的，你请的都是大官，我一个学生，拘拘束束、畏畏缩缩的，说起来是你的老同学，只怕有失你的面子。”

“今天请老弟来，想跟你谈谈。听说你在北大学生

会干得不错呀！”不出我所料，马乘风开门见山地提出北大学生会的事。

“什么错不错的，同学们把我选了出来，我就应该给同学们跑跑腿，办点事”。

“不是这个样子吧？听说老弟很是进步，参加活动很积极呢！”

“你是说的抗日活动吧？是的，抗日活动我是参加的。我是个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不应该参加抗日活动吗？我不干学生会，也要参加这些活动的。”

“今天老哥找你的意思是，北大学生会你还继续干。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以后帮帮老哥的忙，有什么事来给老哥谈谈。”马乘风异想天开地说出本意来了。

“啊！我在学生会干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可以公开的，现在就可以给你谈。”

“老弟，你错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你们学生会里有什么情况，你就跟我谈谈。你帮了老哥的忙，老哥绝对会对得起老弟的。我每月奉送老弟六百元。”想不到这个特务党棍竟妄想收买我来当奸细，我感到莫大的侮辱，怒火从我的心底里烧起来，我忍不住大声狂笑起来。

“哈哈……！六百元真不少！可惜我没有地方花它！再说，我不是对老兄说过了吗，北大学生会的事随时随地可以向任何人谈的，用不着花这么多钱！”

“前天中央(指国民党政府)汇来了三十六万元,只要老弟肯帮忙,有什么用项随时还可以来拿。”马乘风继续说下去。他又给我加身价了。一切反动派总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他们完全把“人”和“狗”等同起来,还妄想通过我的手收买其他的人呢!当时我气愤得有点发抖,站起来抖了抖我的纺绸大褂说:

“小弟有的是钱,老兄的钱再多,在我用不着!”

“你们北大的一些同学,每月才三、四元,最多的也不过三、四十元,咱们是老同学,老哥特别关照你!”

“多谢老兄,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

“老弟!你不要不识抬举,你要知道我的脾气!”马乘风显然是老羞成怒了。

“老同学十几年了我还不知道,你还能怎么样?把我抓起来?好吧,不必抓,今天我就留在你这里啦!”

正在二人谈话陷入僵局的时候,帘子一揭,进来一个大个青年,黑红脸,白衬衣,白西装裤,笨头笨脑的象个打手。马乘风介绍说他是中国大学的学生。这个大学生进得门来就站在那里,向马乘风报告他们新学联的“灾情”:中国大学,四存中学还有几个中学都出了纠纷。这个笨头笨脑的大学生一定认为我是他们的“自己人”了,而马乘风却显得很尴尬,用笔杆直敲桌子,可是那个笨家伙却一点不理解。马乘风最后有点发急地说:“好啦!好啦,我知道啦!不用说啦!”制止那个大

学生再说下去。我就趁这个机会告辞出去，坐车回到北大东斋来。

第二天我便把和马乘风交锋的经过向学生会讲了，并把北大那班小喽罗们每月拿四块钱津贴的丑闻传播了出去。北大的正直的同学们对这类“出卖灵魂”的行为向来是极端鄙视的。

过了两天，在天津铁路职工学校当校长的一个一师同学<sup>①</sup>来东斋找我，他说是来北平办事的，顺便看看我。他和马乘风在一师是同班，早期同属于改组派。我们二人过去也有过“朋友”关系。我们谈了很久，他谈话的中心不外是：“马乘风的话不要听，但是马这个人是翻脸不认人的，北大学生会顶好不要再干了，免遭马的毒手。”我认为他是马乘风收买不成继而要我辞职的说客。为了避免意外，理事会允许我暂时辞职，另担任学生会新近组成的“四省赈灾演出委员会”主任的工作。我接受新的任务的当天，就开始了赈灾演出的筹备工作。学生会的工作虽然照旧做了，但被窒息、遭迫害、受侮辱的感觉，斫伤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自尊心。

1937年5月川豫陕甘四省大旱，灾情严重，北大学生会为了赈济四省灾民，计划演戏，并借赈灾公演的

---

<sup>①</sup> 在校学名赵永昌，出校后改名赵寿，又名赵守志，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叛变后加入国民党改组派，这时任津浦路局天津职工学校校长。



机会，演出一些抗日救亡的戏，用来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扩大宣传效果。计划一定，同学们便分组筹备，当时各组工作的同学，都是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工作积极热情，坚定一致，智谋多，办法广，大家一齐动手，办事效率之高是惊人的。当时每一件事都是从无到有，几天之内一切大致就绪，只有一出话剧里一个老太太的角色没有合适的人担任。我们讨论结果，认为教育系的严绮云同学<sup>①</sup>最适宜，她在一部分同学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是严绮云向来没有参加过学生会的活动。我们为了提高演出效果和扩大团结面，想了不少办法邀请到严绮云同学参加演出。戏排练好了，公演的日期定了，票也卖出去了，而剧场还没有着落，剧本还没有被检查通过。国民党特务机关威吓各剧院，不准租剧场给北大学生会。北平市政府检查处不通过剧本，我们便不能演出。于是我们决定在北大三院自搭舞台。计划一定，两天以内台子便搭了起来，只剩下剧本检查通过的问题了。演出没被检查通过的戏，届时特务匪徒一定会来捣乱的。问题一直拖到演出日期的前两天。事迫眉睫，于是决定由我来闯关，给马乘风写信。

一个同学给我找来一个印有“北京大学×械”红字

---

① 严绮云，北大教育系三年级学生，科学家严复的孙女，现侨居美国西雅图。

的大信封，由我用毛笔给马乘风写了一张“八行书”，说明这次演出是四省赈灾的“义演”，请他协助通过剧本。向远宜同学抱着剧本一连去市政府两趟，下午才见到马乘风。向远宜回来说，马乘风看了信便命令检查处即刻开了张“准演证”，检查处并没有打开剧本的包。第二天，即演出的头一天，下午4点，马乘风还坐车去北大三院，在剧场内外巡行了一周，并装着关心的样子。同学们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我说：“在乡下，地主的恶狗是厉害的，但你从地主门前走过时，如果地主和你说两句话，那批恶狗便不会上来咬你；明天晚上我们只管放心演戏吧！这是同一的道理。”可是我想：我们在合法的斗争中，有时是可以利用反动派的关系和矛盾的，但是，这如同走钢刀一样，必须小心提防自己受伤。马乘风千方百计地向北大插手，给我这么大的“面子”，给北大学生的演出开了绿灯（一方面我们是“赈灾义演”，他也没有理由拒绝。），这其中必有阴谋诡计，我们必须仔细地考虑，认真地去对待的。

我们这次演出很成功，舞台是简陋的，但表现抗日战争的戏是感人的，是符合观众的愿望的；演员们的演技也发挥到尽致，严绮云同学扮演的老太太，更给剧情增色不少。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政策，控诉反动派压迫人民的罪行，为争取得到一次宣传的成功，那些参加筹备演出的同学——这批埋头工作的

无名英雄们，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当时我们想到：未来的斗争还会是复杂的、艰苦的……，不料一个多月以后，“七七”抗战的炮火打响了，我们跟着学校南迁长沙，随着形势的转变，我们在学校中的斗争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979年9月初稿，1982年改写

（本文作者何善周，1936年入北大中文系）

## 回 顾 与 感 想

陈 忠 经

“一二九”时期的北大学生运动，一晃已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比起一些老同学来，当时我做的事情太少啦，所以可说的也就甚少。有些片断回忆，现在偶尔想起来，也还挺有趣味的。当时全体学生大会多在北大三院举行。每开大会，学校内部的政治斗争也就集中地表现出来。由于党的政策路线的威力，抗日爱国的人心所向，党的影响占有显著的优势，所以主持那样一个大会，并不很费力气，只要冷静沉着，掌握有理有利有节，就可以取胜，把会开好。有一次大会，国民党学生的一些骨干分子预先把前几排座位占满，自始至终敲椅跺脚，鼓噪起哄，也有几个能说会道的人抢先发

言，质问诘难，不一而足。但是原定的议案一个一个顺利通过，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些人最后噤若寒蝉，大会终于胜利结束。这时应邀参加大会坐在“来宾席”上的校长蒋梦麟、胡适博士等人都趋前和我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可是，另外一次大会，一开头就看出来到的同学不那么踊跃，而蒋梦麟早早就来了。又等了一段时间，最后因到会人数不过半数决定“流会”。一个运动有高潮有低潮，原不足为奇。而这位蒋校长这次不仅不来握手了，而且悻悻然快步出场，并喃喃自语：“这种会，本来就不应该开，本来就不应该开。”使我们不禁哑然失笑。还有一次我们发动罢课，在北大二院（校长办公室所在地）大门口布置了纠察队，婉劝同学们不要去上课。这时蒋校长气冲冲地进大门了，瞪圆了眼睛，暴跳如雷，对着纠察队员们大声喊叫：“北京大学是我办的，不是你们办的！”另外在北大一院（红楼）门口，也布置了我们的纠察队。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跑来，向纠察队员“苦口婆心”地“开导”，说“蒋委员长”不是不要抗日，而是如何如何。这时，胡适博士也来了，一把将这位周院长拉走，嘻皮笑脸地说：“嘻，老兄，你何必对牛弹琴呢！”是的，就是这一群“牛”，老黄牛，现在

都是花甲古稀之年了，<sup>①</sup>在祖国大地的各条战线上辛勤耕耘了大半辈子，为党和人民做了不少事情。

至于我个人，虽然1936年2月参加了社联，担任过两届北大学生会主席，虽然更早在1932年至1933年在中学时代的师大附中我也担任过学生会主席而被开除，但是实在的政治觉悟较迟。在做学生的整个时期，理论多，实践少。到了抗日战争期间，长期地下工作，实际较多，而理论又太少了。两下子长期是脱节的。现在已经年近古稀了，才稍稍真正有点觉悟，就是一定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局部的实践要与党的全局实践密切结合，服从于、服务于全局的实践。我想，八十年代的学生运动，青年运动同样应该恪守这个根本原则道理吧。这是我写这样一点回顾的时候的感想之一，也是一点自我批评吧。还有一点，就是“统一战线”的确是我们的“主要武器”之一。我回想当我们在北大做学生的时代，我的一些老同学们，对“统一战线”这一政策的认识、素养和运用，虽然也还不那么很成熟，但比我就要高明得多。对于国民党或受其影响的一些同学，也还

---

<sup>①</sup> “一二九”后大罢课中，在“红楼”门前，纠察队员与北大当局的一场争执对话（包括“对牛弹琴”一语），大家所记互异；其实，这在当时辗转流传中已经是互有出入的了。化学系姚震江同学是当时在场人，他的回忆（见本书《“回敬”了校长先生》），应更近于真实。不过某些异词的传说，也曾是发生和存在过的“事实”。

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一些争取团结的工作。我们现在都老了。当时一些国民党的老同学，除在大陆的以外，不少现在台湾，或在海外。我们在北京的老同学们聚首时，常常谈及甚至惦念他们。祖国统一大业是我们共同的大任；独立自主是极大的幸福，仰外人鼻息总是痛苦不堪。几十年前我们曾经不得不争斗过一番，但是于今实在应把过去恩仇忘却，早日欢笑相逢。

（本文作者陈忠经，1934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 一段难忘的经历

谢 邦 治

---

我 1935 年秋季入北京大学，不久，就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投身于运动中，受到革命的洗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二年春夏间我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秋冬间，我担任了一届北大民先分队长。关于运动中的一般情况和在校中的生活，好多老同学多有回忆之作，我不再讲了。我想讲的是抗战刚刚开始后一段难忘的经历。

1937 年“七七”抗战爆发。8 月 8 日我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撤离北平，经天津由海路去济南，然后去太原。在太原时，我被分配到山西民先队部工作。9 月间，太



原第一次遭受日机轰炸后，山西省民先队部迁往太谷，住在铭贤中学内。大概在10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全国民先总队部一位负责同志的通知，要我去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去见周副主席。这个消息使我意外高兴，感觉到要看见党中央一位重要领导同志了。在北平时，在北方局印发的党的秘密刊物《火线》上就曾看到过署名“伍豪”写的文章，我们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同志的化名，这次要亲眼看见他了，多么令人向往和兴奋啊！另一方面，我又感觉到有点惶恐。叫我去干什么呢？我才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学生，不懂什么事理，见这样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中央军委副主席，能说什么呢？我心里一直有点忐忑不安。

10月的一天（具体日子记不清了），一个晴朗的上午，我见到了周副主席。在一个不很宽大的平房里，一张办公桌的旁边，周副主席站起来和我握手，然后让我坐下。他微笑着问我姓名、年龄、哪里人、在哪里读书、几年级、学什么专业等，我都一一作了简单的回答。这时副主席从桌上水果盘子里拣出一个苹果，用小刀削好后，放在我的面前，说：“年轻人，吃吧！不要拘束啊！”我不知怎的，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总理（还是借用后来人们习用的这个敬爱的尊称吧）是多么慈祥，多么平易近人啊！还给我削苹果吃。我的那种紧张不安的心情顿时消失了，也就更自然、更大胆地说话了。我

向总理谈了“一二九”以后北大学生救亡活动的情况；日军进入北平后，北平学生和民先队员在党的领导下，如何有组织地撤离北平的情况。我特别谈到平津流亡同学（当时是这样称呼从北平、天津撤出来的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在济南分成两路：一部分人南下去京沪，到国民党首府地区去宣传和动员抗战；一部分人经陇海路去山西，准备转入华北敌后，直接参加抗战斗争。总理听得很认真。当我说到平津流亡同学时，总理紧接着说：叫你来就是想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到南方去传达这个意见，动员一批平津学生到北方来参加华北抗战工作。首先到临汾八路军办的学兵队短期学习，然后再去执行这个任务。目前，日军已占领了华北几个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广大农村是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急需大批干部去参加工作。总理接着说：“你主要去南京和武汉，到那里会见到叶参谋长和董老的。你可以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了，一会儿给你办个手续。”接着总理问：“你愿意去么？”我立即表示，我非常愿意去，只是耽心做不好这件事。这时一位穿军装的青年人（大概是秘书或副官）进来，交给我一个信封，并说里面有副主席的三张名片，到南京、武汉时用，一张八路军的护照和一百元法币（国民党时的货币）。就这样，我这个年轻党员，第一次见到了周总理并领受了总理交给我的这样一个具体任务。这件事对我来说

是终生难忘的。

南去之行，还有点曲折也值得提一提。我是跟八路军高级参谋边章五同志(当时称他为中将)一道从太原出发的，他是去河北邢台第一战区司令部见程潜长官，我是准备从郑州转车陇海路经徐州南下的。可是火车从太原出发过娘子关后，保定吃紧了，日军南犯，石家庄不能通过了，于是我又同边章五同志乘国民党的军用专列返回了太原。总理指示，我还应南去，改乘潼蒲路经风陵渡过黄河，再从潼关乘陇海路南下。我就这样大概在10月底到了南京，在傅厚岗见到了叶帅；11月中乘船去武汉，在汉口前日租界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见到了董老。董老让我留在长江局青委工作，我就再没返回华北了。

五十年过去了。今天，我写这个片段的回忆，是想从一个侧面，反映那时党是如何关心、培养、训练“一二九”时期的青年一代，给予他们高度的重视和信任。他们是参加敌后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毛主席曾评价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我想这个“准备”首先表现在干部准备方面。历史事实不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吗？

(本文作者谢邦治，1935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后转入数学系。)

## 专题回忆

# “一二九”前后北大党团 活动的片断

刘 导 生

---

我是 1933 年秋考进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原名刘  
文卓。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一二九运动爆发前的斗争  
形势,我想就自己的记忆所及,先简单介绍一下三十年  
代初期北平学生运动的一个概貌。

1929 年我考入北平师大附中高一,同年秋参加反  
帝大同盟,1930 年春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八

一”，因参加“反帝日”游行被捕入狱。这一年经过“四一二”游行、“红五月”的几次飞行集会等“左”的活动、到“八一”游行，北平的左翼团体，如反帝大同盟、左联、社联、妇联、艺联、音联、教联等团体，几乎破坏殆尽。这是立三路线时期的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激起北平广大群众的愤怒，北大组织南下示威团，向南京政府举行示威。本来这是又一次革命来潮，但由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脱离广大爱国群众的觉悟，结果又一次遭到残酷镇压。

同年秋我出狱后，参加社联和语联（世界语者联盟）。1932年，我在师大附中毕业，即被北平文总（文化斗争总同盟）派往外地工作。因工作暴露，同年冬返回北平。1933年春，北平革命互济会为李大钊同志举行送葬，遭到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的枪杀和逮捕。我不得不暂时出走。同年夏，才返平考入北大。当时，我参加社联和语联的活动。1933年冬，北大党的组织和北平语联被破坏。因为我当时是北大世界语学会的发起人，在红楼开办世界语学习班，1934年夏，我又一次被迫出走。1935年5月北大左联被破坏，当时被捕的有杨启哲（唐守愚）、罗震寰（罗竹风）、顾麟生（顾凌生）等五、六个人。1935年夏，民族武装自卫会在北大建立，当时经我介绍的有孙传文（孙陶林）等几个人参加。直

到1935年11月，我才找到党的关系，中共北平市委指定我担任北大的支部书记。接着，把共青团支部建立起来，由刘志诚（刘居英）同志任团支书。在“一二九”前夕，北大有党、团员约五、六人。

以上说明，北平的地下党及左翼团体由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是屡遭破坏，又是前仆后继的，总的说进步力量还远远没有组织起来。

这时北大的学生组织只有世界语学会、新文字研究会、读书会以及跨校的刊物社等等，基本上是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状态。北大已开始酝酿筹备学生会，但成立学生会的条件尚不成熟。在华北日益危急的形势下，广大爱国同学总感到憋气、沉闷和愤怒，“于无声处听惊雷”，北大同学正处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夜。

1935年秋，黄河决口，大片农村被淹。北平各大学进步教授和同学这时组织黄灾赈济会，并争取公开合法。此时日寇步步进逼，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签订了一系列屈辱投降协定，但这并满足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本军阀进而又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妄图吞并华北。北平学联准备成立了。

当时，北大同学俞启威（黄敬）、刘松云（刘江陵）是参加赈济会活动的。俞启威同志回来后和我商量：学联要成立，北大又没有成立学生会，我校代表名义怎么办？我说：北大世界语学会是公开的，你们可代表世界

语学会参加。有一次，他回来告诉我：学联将要举行请愿，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至于行动的口号、时间和路线，以后再通知你。但一连几天都见不到俞启威回校，也没有接到学联的通知。所以，北大也就不能做具体的行动准备。

我估计12月9日可能行动，因为据传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这天宣布成立。上午，我在宿舍里等电话；下午，我又去一院红楼后边转游。我和张震寰同学刚从图书馆出来向红楼走时，史学系同学王德昭听到大街上高呼口号，他马上下楼打钟，动员正在上课的同学参加游行。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仓促上阵的。当游行队伍沿东华门大街走到王府井南口时，遇到大批武装军警，以大刀、水龙向学生阻截。他们生怕冒犯了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大使馆，便进行了血腥镇压。这时天色将黑，北大同学怀着激愤的心情返回学校。

当晚，北大学生沸腾起来了。这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立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决定罢课和成立学生会，迅速展开救亡运动。可是，既未见到市委有什么通知，也未见学联有什么布置，如果先召开党团支部会研究，实在也来不及了，我只好找了朱仲龙（朱穆之）、孙传文、刘居英、肖敏颂等八、九个同学到杨雨民房间里开会。因为进出四斋不引人注意，杨的房间又在四层，关起门来外边是听不到动静的。

当时，我们分析了学校的形势，认为罢课和成立学生会都必须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才能取得合法，但北大当时在校的学生共九百多人，马上通知也难保证过半数，乃决定：由到会同学对有把握但又未到会的同学代签名；对罢课的理由要讲充分；提学生会候选人时，要注意提那些和同学联系广、不太红（即大家不认为和左派有关）、而又有组织能力的学生。当即列出十人左右的名单。同时，还决定准备若干人在会上发言；发言人分散着坐，这样彼伏此起地相继发言，容易把会场造成热烈气氛。果然，第二天大会开成了，以压倒多数通过立即罢课、成立学生会的决议，并成立纠察队。

11日起，我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为“一二一六”更大规模的游行作准备。这一次，北大成了东城区各大中学的主力。北大也有正式代表参加学联工作了。当时，市委和区委似乎还不健全，北大支部未收到市委的指示，整个行动便由学联党团领导进行了。

以后进行无限期罢课，反对学校当局指定伪学生代表杨西昆、李守权等晋京“聆训”，一致决定开除其学生会籍，并赶出学校。我们都是在杨雨民同学宿舍召开的积极分子会上作好准备的。由于学生已经充分发动，所以每次大会，我们总是以多数取得胜利。

南京政府为对付各大学无限期罢课，打击学生的救亡运动，通令提前放寒假。北平学联遂决定组织学



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当时，我们决定党团员报名参加，同时动员同学们自动报名，以经受这一次考验和锻炼。谁知市委通知我和孙传文同志做后方工作，进行募捐支援南下宣传的同学。当时我们曾向同情我们的教授去宣传，并得到了一些支援，详情已不记得了。但是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是我去见燕大文学院院长黄先生（名字忘了），我们俩谈得很投机。他介绍我要读一读英文译本的《列宁主义基础》，我感到很惊奇。当时我只能读到英文版的《国际通讯》，要去买国外出版的这本外文书，是难以做到的。另一件事，是塔斯社通过许德珩先生找我写一篇有关北平学生运动的通讯，我大概写了万把字。和我接头的人是个中国人，名叫王挽澜。我如期完成了这一宣传任务。

这一段时间，学校的工作很多，我根本无力顾及武装自卫会、世界语学会、新文字研究会等工作，我经常出席的是时事座谈会。我认为，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引导同学走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时事座谈会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当然，事前我也认真做准备，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南下宣传团从1月3日出发到24日在保定被押送返平，在北国的风霜中，经过二十多天的奔走呼号，他们胜利地返校了。这对一批生活比较优越的大学生

来说，也是一次小小的“长征”演习。当留校同学欢迎他们时，感到他们完全变了。过去西装革履或长袍礼帽或旗袍高跟鞋的学生气质，现在变成了心胸开朗、充满信心和富有活力的战士了。过去男女同学很少交往，互称“米思”或“米思特”，现在突然改变了，不但直呼其名，而且大多数人都有了“外号”（昵称），增加了彼此的理解、信任和友爱。这一次行动的感受和教育是课堂上无法得到的。这也就具备了党团发展的好机会，党团开始有了发展。

南下宣传团准备返平前就酝酿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大多数人同意叫“民族解放先锋队”。回平后，市委就叫我参加民先的筹备工作，2月1日宣布正式成立，3月初要我租民房建立民先机关，统管民先交通系统及印刷机关。同时决定我调离学校，割断与北大党支部的联系。以后，由谁接替我的工作，也就不了解了。因为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是不允许打听的。在我调离前，我最后处理的一件事，就是根据市委的指示，宣布团员无后补期转党（当时团市委还存在，而且团员以后还有发展。北大老团员转党可能比其他学校早两个月）。以后北大的党团活动，我就不了解了。

（本文作者刘导生，原名刘文卓，  
1933年入北大史学系。）

## 关于“一二九”时期 北大党的领导系统问题

曹振之 刘玉柱

---

刘：一二九运动时期，党在北大的领导系统，组织的变化，随着运动的发展，领导的更替，这一段情况现在还没有弄清楚。今天，请老曹就这个问题多谈一谈。当然也不限于这个问题。

曹：我这段时间大体上想了一下，有个眉目，但也不是想得很清楚。我考入北大是1934年的暑假。一二九运动以前和1935年的北大党组织情况我不了解，只是听说那时党的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当时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也没有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我在北平市立男一中毕业后，考入北大的，当时我接触了一些人，略听到一些团的活动，但也记不清了。

北大教育系同学韩代望(韩振庭)和我是河北正定第七中学的同学,后来在北平市立一中也是同学。我知道他早就参加了左联。在市立一中,因为住房子,闹了一次学潮,那时同学很拥护我,我是当头的。学校当局和我讲条件,不开除我,并保证我毕业考大学。校长贺国光当时是国民党市党部的宣传部长,他和我讲的条件。我在初中(1925—1927年)就接触过组织,那时的河北平山暴动,被捕的人有我的好友,是我去营救的。从那时接触过些进步同学。后来因为我还想上大学,就没有参加组织。

1934年在北大,我和卢荻(陆平)先住在三院,比较接近,在一二九运动时又一同搬到东斋。一二九运动之前的形势非常沉闷,大家有点读不下去书。当时接触的人中有韩振庭、赵祥铸(赵鼎新)、阎颀行(胡全)、李俊明、孙兴诗(孙思白)、李书箱等,我当时读的是史学系。

“一二九”那天的情况是这样的。头一天,汉奸游行,第二天下午,下了课,我从红楼往东斋走,看见一伙人,我去看是不是汉奸游行,后来看不是,我把书本放下就参加去了。我们从中法大学,到王府井大街南口,被警察挡住打散了。我那天把鞋都挤掉了,我跑到市场上买了一双鞋,天黑才回东斋的。

12月10日以后,罢课那一段我记不清楚了。只

记得我和陆平在沙滩一院红楼担任纠察队把门，一边一个，不准人进去。

“一二一六”，我知道那一天要行动，当时已有了组织。那一天我和陆平、李俊明在一起。我们的队伍比较整齐，四个人一排，手拉着手。在南长街南口左侧上有一个警察所，把水龙头摆在前面，把学生挡住。陆平、朱仲龙（朱穆之）等跑到水龙头跟前去抢水龙头，我在大队前头冲到长安街，遇到一辆警车，用石头砸了警车冲过去。后来在新华门又被大刀队挡住了，有些同学负了伤，其中有李俊明。后来通知到天桥集合。天桥开了会之后，大队往前门大街上来，我和宋尔纯（宋应）一块，当时旗帜都丢光了，我们又跑到前门大街的商店里，买了一条布，上头写上“北京大学”字样，打上就走。走到前门被大刀队挡住了。后来门打开了，进了城。那次闹了一天，直到天黑。我那天晚上没有回东斋，跑到中国大学一个同学家睡了一晚。

“一二一六”后到年底这一段时间，和刘文卓（刘导生）、刘志诚（刘居英）在一块。经过刘文卓介绍，我给四个住在公寓里的妇女补习英文，都是放脚妇女，大概三十岁上下，我想大概是哪里出来的地下党员。其中我还记得有一个叫王奇的。

南下扩大宣传团，我没去。那一年寒假我回到我们村子里，组织了一批青年搞抗日活动。我的老家在

河北省束鹿县通土营村。我走后这一批人就成了种子，后来都出来了。寒假后我回北大，大约2月初，正好南下扩大宣传团回来了。不久，经过刘志诚介绍我参加民先，我也不知道党的关系。我们搞了一个“新文字报”，和清华大学一个同学一块搞的，在长安街东方杂志的印刷所出版。这个“新文字报”一直发行到河南。2月份，经刘志诚介绍加入共青团。我当时就和刘志诚、刘文科联系。后来听说刘文科是第一任书记。当时不知道。还有卢荻（陆平），当时他和刘志诚两人从东北来，经常无钱吃饭，我家里寄来的钱三个人用，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使，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到4月份，当时团支部有三个人，一叫许德富，是山西人，还有一个于经海（于眉）和我。4月份党有一个通知，党的活动方式改了，团员转成党员，团撤消了。后来党支部组织起来，有阎颀行、宋应和我，阎颀行是书记，宋应是组织，我是宣传。另外，陆平和宋尔廉在二院办了一个民众夜校，学生有拉洋车的、挑花女工等。这也是一个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场所，走出学生圈子了。后来许德富、于经海调走了。这时一个名叫王德的从监狱出来了。他是东城区学委领导人，住在北大东斋。那时开会多半在北大新宿舍，因为四年级一人住一间房。到后半年，阎颀行调走了，宋应是书记，我是组织，袁宝华是宣传。袁宝华入党大概是9月份。我当了支部书

记，我们支部有袁宝华、佟常义。我记得党的组织就是这样的。

北大支部管的范围，以前我不清楚。我那时北大支部是中心支部，由东城区学委领导（刘玉柱：据李雪峰说，当时北平市委直接领导北大支部），王德任东城区学委，王骥卿（王季青）是支部交通。北大中心支部联系的有中法大学的樊西曼（女），后来和我们一起出来到山东。还有一个是精业中学的张××，是个男的，想不起叫什么名字，樊和张是一个支部。沙滩和我们没有直接联系。

我担任支部书记一直到七七事变。后来一撤退，就分散了。七七事变时每隔几天来联络一次。我走得比较迟，是8月二十几号了，我们到天津时，其他人大都已离开那里。我和陆平、樊西曼、宋尔廉，还有东北一个女的，名字想不起来了。那时已不好走了。我们化装到天津，住在我舅父租的中央饭店里。几天后，搭上一个走私的小轮船。在山东虎头崖上岸，转到济南的。在济南时碰到了孙兴诗、袁宝华。以后，到了9月份，情况有了变化，山西太原和湖北武汉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我和陆平、宋应先后都往太原去了。往太原去的途中敌机轰炸，飞机跟着火车跑。到太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接关系。进了城，吃了饭，天就黑了。我们大概是住在太原师范，晚饭后要睡觉的时候，北大政治系

的杨树义（肖杨）来了，他是北方局的交通。他叫我：“小曹，走。”我说：“往哪走？”他说，“你跟着我走。”我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在路上他跟我说：“你改个名字，叫曹振之。”我就由曹盼之改成曹振之了。到了太原北方局办事处（太原成成中学校内）。当时林枫、刘少奇、肖克都在那里。

我在那里参加了一期训练班。接着的一期训练就让我在那里办。我用黎明训练班这个名字登记学生。这个时候，太原成成中学的校长刘庸如来了。郭明秋在成成中学当教员。她在那里作学生党的工作。后来她调回北方局。我去接替她的工作。北方局打算把成成中学师生组成一支武装。当时，成成中学已经从太原搬到清源县，我到这里当政治教员。

\* \* \* \*

根据曹振之同志的谈话，初步整理北大党组织情况如下：

#### **北大中心支部**

**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刘文革（刘导生），“一二九”前后。**

**团支部书记 刘志诚（刘居英）。**

**团支部书记 曹盼之（曹振之），1936年4月，支部成员还有许德富、于经海（于眉）。**



第二任：党支部书记 阎顾行（胡全），1936年4、5月—1936年暑假前后。

组织 宋尔纯（宋应）。

宣传 曹盼之（曹振之）。

第三任：党支部书记 宋尔纯（宋应），1936年暑假—1937年初寒假期间。

组织 曹盼之（曹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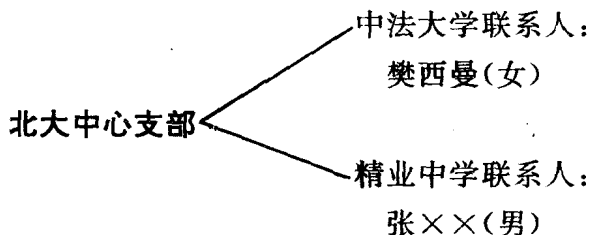
宣传 袁宝华

第四任：党支部书记 曹盼之（曹振之），1937年寒假—一七七事变。

组织 袁宝华。

宣传 佟常义。

北大中心支部管辖范围：



（本文作者曹振之，原名曹盼之，1934年入北大史学系。

刘玉柱，1934年入北大物理系。本文是曹、刘两同志于1984年2月的一次谈话，由成都科技大学郭蜀生同志记录。）

## 关于北平民先队的一些情况

孙 陶 林

---

### (一)

“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伟大的行动，点燃起抗日救亡的烽火。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就是要掀起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推动全面抗战的实现。要实现这个神圣的历史使命，一要深入工农兵群众，把学生运动和工农兵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各阶层的群众救亡运动；另一个就是把群众的爱国运动变为全民抗战。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是五分钟的热度，必须把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持久地坚持

下去，不断推向前进。抗日爱国的救亡运动，是属于民族革命斗争的范畴，而民族革命斗争，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总是从学生首先发动。

学生运动与工农兵运动相结合，“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就是这个结合的有益尝试。学生运动只有和工农兵运动相结合，才有前途。但只要学校还继续办，学生总是要上学的；离开学校，走进工厂、农村、兵营，只能是少数人，只能是短时期的，如到绥远参战，到山西“牺盟会”，进东北军学兵队，去东北参加义勇军，到北平附近的工厂、农村和二十九军去进行工农兵工作等等都是。大多数或全体学生长期和工农兵结合，只有当学校关门之后才出现，如平津沦陷以后的学生发动才能到华北、华中、华南各地和工农兵战斗生活在一起，实现了真正的结合。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是在党领导下，有组织地实行学生和工农兵相结合的开始。宣传团结束时，在宣传团的基础上产生了青年学生的骨干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它是革命运动的需要，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产物。民先队一产生，就在学生运动中起了骨干作用，把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了下去。经过无数艰苦地斗争，一直到七七事变。没有民先队的组织，“一二九”以后的北平学生运动是不可能持久的。

## (二)

“一二九”以后的北平学生运动，在民先队成立后，党、民先队、学联，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1936年春，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以后，大力开展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党十分重视群众运动的独立性，发挥学生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民先队、学联领导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彭真同志担任北平市委书记以后，更加注意贯彻这一方针。党对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只是革命大方向的领导，方针路线的领导，并不是每个行动，每项工作都具体指挥。民先是由市委直接领导的，学联也是由市委通过学委直接领导的。根据两个组织的不同性质，市委对它们的领导，是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重大的行动，市委分头布署，民先、学联分头贯彻。一般活动，都是由学联发出号召，民先发动群众支持，组织保证。如砸河北高中、西山春游、“五四大会”、西山老虎洞露营、抵制日货、西郊军事演习等。需要团结同学一起干的，就通过学联或各校学生会，打起学联或学生会的旗帜，吸收广大同学参加；需要联合行动的，如“六一三”、“双十二”等，就由民先总队部和学联共同讨论、

组织和指挥。只是属于民先内部的组织活动，如军事演习，政治训练，才由民先单独组织进行。自从有了民先队的组织，学联就有了群众基础，当时民先组织曾号召，一个队员至少要团结两个同学。三千多个队员行动起来，就有上万人参加，使学联发动任何行动，都有可靠的群众保证。整个“一二九”运动，是靠党的正确领导。不适当地夸大民先组织在一二九运动中的作用，或过低估计民先队的历史作用，都是不恰当的。因此，写一二九运动史，除党的领导作用外，民先和学联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要从不同的角度估价它们的不同作用。

### (三)

民先组织是在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基础上建立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到达保定，被押送回北平的前一天晚上，宣传团在同仁中学召开了最后一次团员大会。据说会上，大多数团员都表示这个团体回北平后不要散掉，希望能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团体。1936年2月，这个组织正式成立。我是5月份到总队部工作的。当时，民先队的名称是“民族解放先锋队”，前边没有冠以“中华”二字。到1937年2月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时，修

改民先组织章程，考虑到民先组织，既然是遍及全国，是全国性的组织，理应冠上“中华”二字，遂把“民族解放先锋队”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民先成立之初，就确定组织机构为四级：即总队、区队、分队、小队。最高的领导机关是总队部，总队部下按地区划分若干区，设区队部，区下以学校为单位成立分队，分队下划分小队。根据人数的多少，一到十人左右为一小队。校外少数中小学教员，下级职员、失学青年及市民，成立街道小队，分别附属于附近的学校分队。1936年下半年，因北大附近公寓的队员比较多，就从北大分队分出来，单独成立一个沙滩分队（又名“杂牌队”）而不叫小队。这是唯一的一个街道分队。

民先队初成立时，队员只有三、四百人，二三十个分队，全市划分五个区队，城里四个区队，即东西南北城区队，城外一个区队，即西郊区队；到1936年下半年，队员人数多了，分队也多了，就扩充为九个区队，按1、2、3、4……的次序排列。1937年上半年队员发展到三千人，近百个分队，为了便于领导，又把高等学校分出来，成立四个大学区队，将中学分成十个区队，一共十四个区队。<sup>①</sup>

民先队刚成立时，天津民先队是以天津为范围自

---

① 1937年上半年，交通系统送达文件，仍按四个区分送，参看本书孙思白记1937年总交通工作的文章。

已独立活动。北平地区的民先队的领导机关称总队部。1937年2月，召开全国民先代表会议，成立全国总队部，领导全国各省市地区的民先。原来北平的总队部就改成北平地方队部。从此，民先的组织机构就成了五级，即全国总队部、各地方队部、区队、分队、小队。全国多少民先队员，有哪些地区和城市建立了民先组织，因我不在全国总队部工作，就不清楚了。

民先总队<sup>①</sup>下设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总队部有总队长、秘书长，各部有部长，开始只有部长，后来因工作需要，配有一两个干事。民先是个半军事性的群众团体，为了对队员进行军事训练，北平市委派一名军事干部，称他为军事教练。为了加强妇女工作的领导，北平市委派一名妇女干部。后来北平地方队部还特别成立了妇女部。秘书工作繁重了，后来在秘书长领导下，成立了秘书处。主要任务是管文书、交通，它并没有固定的办事机关，而是依附在北大，因为北大地点适中，联系方便，负责人也较多。区队部的活动都在队员家里。开始还想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机关，曾由党派了一对夫妇担任民先的印刷工作，设在西城，后来觉得民先是个群众组织，设立秘密印刷机关不合适，就取消了，文件印刷通过各校学生会。交通是个庞大的系统，

---

<sup>①</sup> 作者这里讲的“民先总队”，是指北平市民先总队部初建立时的情况。

文件运送很繁重，除了送民先的文件：队刊，还要兼送学联的东西，如《救国时报》、《华北烽火》、《长城》等。总队部有总交通，把文件分头送给各区；区队有区交通，分头送到分队；分队有分交通，送到各校。

民先总队部建立党团，党的领导通过党团来实现。各地的民先组织，实际上由各地方党领导。民先全国总队部，对各地方队部主要是起号召作用，也起某些指导作用，但没有象行政组织那样的上下级服从关系。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只好发动地方队部独立自主地活动。全国总队部实际是经常和北平地方队部在一起，党团也是一个，因此，两者的工作界限不是截然分开的。全国总队部帮助北平地方队部工作，而全国总队部也是不断吸收北平地方队部的工作经验，指导各地民先工作的。

民先既是群众团体，本来是应该公开的。因为当时爱国有罪，受环境所限，开始一段，不得不在组织形式上或工作方法上都采用秘密方式，直线联系；除本小队外一般不发生横的关系。同学们互不问谁是民先队员。民先队是群众组织，不应因袭党团的一套办法，而且事实上，各种群众活动，不能不吸收群众参加，不能不由区分队干部出面组织，怎么能严守秘密呢？等学习了统一战线和刘少奇同志关于反对关门主义的文章后，1936年上半年就确定了要争取公开的方针。到暑



假后，首先就从实行队内民主开始，区分队部进行民主选举，打破了队员之间、区分队干部之间互相隔离的状态。通过西郊军事演习，使队员和同学，干部和队员融成一片，作风大大改变。但一直到七七事变，还只能做到政治上对外公开，组织上只对内公开，对外还不能公开，即处于半公开状态。

民先队的组织生活是很严格的。小队会每星期开一次，会议内容，首先是汇报工作，然后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分析，再是布置工作，最后是工作检讨与批评自我批评。这种组织生活虽然有些呆板，但对队员的教育是很大的。后来组织生活会的内容也稍有改进，不那么死板，能够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研究些有关同学生活和学习等问题，比较活泼一些了。

#### (四)

我是1936年5月初调到总队部工作的。我到总队部时，总队长是敖白枫(高锦明)，总队部其他同志有刘文卓(刘导生)，听说还有王仁忱，可是我到总队部，他已经调走了。7月里敖白枫调去做东北军工作，总队长换了李昌同志(雷骏随)，刘导生同志也调离民先去搞华北学联、全国学联工作去了。总队部就增加了

于光远、顾德欢、李声簧。后来(大概是1936年下半年),顾德欢回燕京负责西郊区工作。1937年2月全国总队部成立,全国总队长是李昌,组织部长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李哲人,宣传部长是于光远,后来刘导生又回到北平做民先工作,担任总队部的秘书长。接着北平地方队部成立,队长是我,组织部长是邓力群,宣传部长是李声簧,训练部部长是杨雨民,妇女部长是杨克冰、秘书长是李平。先是1936年秋,市委先后派大老杨(杨维)、大老李(贾丰)、朱则民、李明、乔×到民先总队部工作,分别在组织部、训练部。成立北平地方队部后,他们都在北平地方队部做干事。1937年4月,邓力群去延安学习,组织部长由朱则民代理。关于设立妇女部开展妇运工作,先是1936年春,市委派左秀权到民先总队部来做妇女部长,1936年秋,左秀权调走,杨克冰来接替了她的工作。军事教练1936年上半年市委派王英担任,秋天,王被调走了,换了袁也烈,一直到七七以前,还是袁也烈。<sup>①</sup>军事训练由训练部负责,并没有成立武装部。1937年上半年,不知从几月起,总队部和北平地方队部的秘书处就混为一个,秘书长是中大的李平,秘书处负责人谌湘汉。总交通负责人从学联、民先总队部成立时起,更换频繁,最早是孙敬

---

<sup>①</sup> 1937年春,还有位叫朱明的来指导学习游击战术。

文、其后周文光、齐语、沈湘汉，最后一学期是孙兴诗（孙思白）。张震寰也在北平地方队部工作过，但具体做什么，记不清了。民先初成立时，总队部党团书记是敖白枫，成员有刘导生、王仁忱，我入党后即参加总队部党团。敖调走后，书记是李昌，成员有于光远和我，全国总队部和北平地方队部分开后，党团还是一个，书记是李昌，成员有李哲人和我。好象后来又增加了于光远和刘导生。

1986年6月

（本文作者孙陶林，原名孙传文，1935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 青春的脉搏

——忆北大“民先”的活动

袁 宝 华

---

北大“民先”在南下宣传团的基础上，吸收留校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在1936年2月1日“民先”总队宣布成立的时候，北大“民先”也同时成立。成立时，队员大约五十人左右，组成北大“民先”分队，属于北大区队。

北大“民先”，在北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同学和教职员工，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大“民先”活动，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

## 一、从“一二九”到“三三一”（“民先”成立前后）， 即“民先”的酝酿和开创阶段。

首先，青年学生进步的传统从五四运动开始。北平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而五四运动又是从北大开始的。在这期间，北大进步学生，不只是埋头读书，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我进北大不久，就参加一个校外的文学团体——“曙社”，由清华、中大、朝大、平大法商学院和北大等学校学生组成。每月都有活动。

另一件事是反对国民党派来的反动军事教官，被学生们把他轰跑了。当时范长江写过一篇反对军事教官的“檄文”，以传单形式散发和张贴，“檄文”中形容教官拿着马鞭子上课，是“视学生为牛马，等课堂为牧场”，引起同学们的愤慨。对于学校当局，不关心学生的生活，大家也都很不满意。如浴室倒塌一周年时，有一个姓叶的同学写了一篇回忆录，登在报纸上，文中有一副对联，上联忘了，下联是：“负责有人，职员无数，同学两伤一死，是谁之咎”？对于国家大事，同学们十分关注，北大西斋阅报室经常挤满了人，宿舍里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图书馆阅览室有一份“九一八”南下示威专刊，上面刊有千家驹等人的文章，同学们争相传阅，深受感动。所有这些都说明“五四”后北大青年学生

的进步传统在不断发扬。

第二，1935年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党的号召，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体现了党对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就是北平学生首先响应党的号召的结果。当时西斋墙上就贴了油印的“八一宣言”，宣言中的主张，立即为大家所接受。尤其是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激励着同学们。范长江曾经写过《成兰纪行》、《徐海东果为肖克第二乎？》这两篇文章，从正面介绍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情况。

我们虽然年轻，但是，大家都很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我们在西斋，组织了一个没有名称的“时事小组”，有许宛乐（许东明）、王令冰、郝天和、董觉民、孙兴诗（孙思白）、李书籍等同学，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内外大事，“八一宣言”对我们影响很大。那时，大家还有些国际主义精神，拥护苏联的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叫嚣，反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里亚（即埃塞阿比亚），对弱小民族满怀同情。

第三，华北时局的急剧恶化。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步步进逼，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香河

事件”、“冀东自治”、“何梅协定”的签订，“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华北政权特殊化”等一系列丧权辱国事件的发生，1935年夏，国民党军队从北平撤出，蒋介石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北平的青年学生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以上三点，是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

“一二九”的呼唤：1935年12月9日，北平各校同学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当队伍经过北大一院，在红楼前高喊：“欢迎北大同学参加！”时，我当时正在地质馆做实验。先是在午饭时，就听说城外同学已经进城，大家议论开了。这时，一、二百名同学纷纷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宿舍出来，迅速汇入了革命洪流。游行队伍到王府井南口，与军警展开了搏斗，一个女同学被打得血流满面，我是直接目击者，怀着十分激愤的心情回到学校。

“一二一六”举行第二次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一天北大同学，全体出动了。游行中有一批同学被捕，经常和我们一起讨论时事的郝天和，就是在西斋手执大旗冲出去时被捕的。还有李俊明（李光汉）、蒋峻岩、黄淑生、蒋昌声、朱仲龙（朱穆之）、董大年等被打伤了。“一二九”的呼唤，“一二一六”血与火的锻炼，更坚定了我们抗日救亡的信心。

南下宣传：“一二九”后，全市大中大学生一致罢课。蒋介石企图把各校当局和学生代表召到南京去“聆训”。党领导下的平津学联决定：到农村去，不去“聆训”。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这是积极分子队伍的自愿结合，明知有风险，大家敢冒风险上；下去会吃苦头，大家也心甘情愿。我们深入农村，接触了劳苦群众，访贫问苦，了解了他们的疾苦，受到了很大教育，更使我们亲眼见到农民饥饿贫困的根源，就在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确实是教育者受到了教育。

在南下宣传队伍中，我们的民主生活也是很好的。大家认为江之源当中队长不合适，一开会，就把他选下去了，推选刘志诚（刘居英）任中队长。大家的组织观念也很强。我们晚上行军，有些同志掉队了，都不顾疲劳连夜追赶队伍。革命情谊也在南下宣传中建立起来了，即使素不相识的人，一说是南下宣传团的，大家都很亲热。走西路的三团在高碑店被打散后，有一部分人跑到东路来找南下宣传的其他队伍。我们是押送行李的，也一夜未找到队伍。第二天，一直到黄昏，碰到了三团的杨学诚，互相一问，得知是南下宣传团的，大家感到分外亲热，心情激动，一起欢呼起来。

南下宣传团，一方面是播种抗日的火种，另一方面，也是流动的抗日干部训练班。使青年学生在斗争



中得到锻炼。除了宣传之外，大家在一起讨论革命的道理，议论过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何兆仪、江之源等对华岗的《大革命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个天津学生叫朱光，教我们唱国际歌，大家怀念大革命，总结大革命的经验。同时，谈论和向往北上红军长征的斗争，也向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南下宣传是学生运动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结合了，学生运动也深入了，这是革命运动的规律。最后，建立了“民先”，这是大家的愿望，也是这次运动的必然结果。

民先队的成立：南下宣传团的团员回校后，很快和留校的一部分同学结合起来。本来这些留校同学留下来就是为了支援南下宣传团的，所以回校后，很自然结合在一起。南下宣传团，北大有将近三十人参加，有韩天石、刘志诚、江之源、董大年、陈润霖、佟常义（佟诚）、吴磊伯、杨隆誉（杨赓）、张毓琦、张毓珣、何兆仪、唐尊准、王骥卿（王季青）、谢云晖、巫省三、周××、孟广一、肖敏颂、王纶宇、叶纪霖、张倬、孙瑞符、金明、袁宝华等人。

北大“民先”队成立时，大约有五十人，队长是杨雨民。北大分队是按宿舍分片的，一个宿舍有几个小队，有一个组织干事或组织员负责。一开始，我是负责西斋“民先”组织工作的。“民先”成立后不久，就开展驱逐“聆训”伪代表的斗争。每一次斗争都提高了队员的

觉悟，队伍也随之扩大了。接着，组织了新文字研究会。当时，很多队员都参加了这个研究会。有一部分“民先”队员进一步参加了“左联”或“社联”。我当时参加了“社联”，由陈忠经接头谈话后，参加到李俊明、许德富小组活动。

1936年2月是白色恐怖的二月，反动当局对爱国青年学生实行镇压和大逮捕。江之源和北大的一位工友在中国学院被捕。2月29日，北大三院被军警包围搜捕，韩仕中等被捕入狱。但是，“民先”队员和一部分积极分子还在圆明园举行了“三一八”纪念活动。3月31日为追悼死在狱中的中学生郭清，在三院举行了追悼大会。由于反动军警的包围，我们只好推开后墙，抬棺游行，参加的基本上是“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这是一次对反动当局迫害、镇压抗日运动的抗议和控诉。

## 二、从“三三一”到“六一三”(遭受挫折之后)， 即“民先”积蓄力量的阶段。

“三三一”抬棺游行队伍被打散后，全市有五十四人被捕入狱，其中有北大的谢云晖、赵祥铸、叶纪霖、何兆仪、张毓珣等九位同学。吴沛苍、韩天石、巫省三、叶纪霖等四位同学被开除学籍，学生会被迫停止活动。当时“民先”队检讨了前一阶段的工作，首先就是“民

先”工作要深入，要注意团结群众，注意加强教育。一方面，我们注意团结积极分子。每天早晨在红楼后面操场上，总有五十一七十人一起出操，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卢荻、宋尔廉等教育系同学，积极办民校，注意与校外学生、群众联系。这时，民先沙滩分队也建立起来了。我们还组织了“黎明歌咏团”，由杨隆誉任团长，赵超任指挥。“读书会”、“剧团”也相继成立了。我和孙兴诗（孙思白）等同学在西斋一进大门的东墙上办了一个“炮火壁报”，这个壁报每星期出一次，一直坚持到七七事变前夕。每期都得到同学们的支持，我主要负责画报头、写社论。同学们有的写文章，有的写诗歌，有的画漫画，大家踊跃投稿，“炮火壁报”办得有声有色，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这一段工作深入，是与党的领导，与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刘少奇同志这时已经到北方局来领导工作。5月初，我参加了共青团，可以看到《火线》，《救国时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贯彻，是通过民先的骨干作用和学生会的公开活动来实现的。肖敏颂用“薄勉克”的笔名，写了一个小册子，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他在文章中，讲了一句至今我还印象很深的话：“不能吃一个馒头，吃到半个馒头也好。”他的意思是说，做统战的争取工作时，不能对人要求过高，过急。因此，有人开玩笑说

“薄勉克”是“半个馒头主义”。这时，党还在清华开办了一个训练班，北平各校都派人去参加了，有四十一五十人，这是一个民先骨干训练班，吴承仕、黄诚、肖敏颂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但是这个班后来没能继续办下去。不过总的说来，从“三三一”以后，在党的教育下，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策略思想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

民先还出版了《我们的队伍》，报头是我写的。我还为《解放之路》写过报头，它把党的刊物中能公开的文章，都转载上去。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的贯彻，各种社团也有了发展。“社联”这时有了发展，唐尊准、万仲寅、马同骧（马乃庶）、莫家鼎等都加入了。“左联”也发展了。我参加共青团以前，由韩振庭（韩代望）接受我加入“左联”，王经川（魏伯）是北大“左联”负责人。当时参加“左联”的还有何佶（吕莢）、董大年和女子文理学院的张晋媛（亚苏）等人。“左联”出版了《浪花》半月刊。我发表过一首诗。“民先”也有发展，北大“民先”已发展到一百多人，西斋就有三十多人。这时，北大分队长是宋尔纯（宋应）。“民先”的活动得到同学们的同情，我们在宿舍里开会，不是“民先”的同学就主动让开。

6月初，成立了学生会救国委员会，二十一个委员中，“民先”占了大部分，有刘玉柱、葛佩琦、姜世勋（姜

纪常)、石蕴华(杨凡)、宋尔纯、朱仲龙、兰铁年、陈大觉、曹盼之(曹振之)、薄怀奇、刘志诚、傅安华、谭菁华等和我。我和傅、谭负责宣传工作。救国委员会的产生,也是统战工作的结果。选举前,我们就和学生中的国民党分子谈好了,因为当时学生会已经被停止活动。

学生会救国委员会成立前,“民先”就开展了五月份的宣传活功,印发了“五一宣言”,“五四”、“五七”、“五九”标语口号。接着开了“五四”纪念会,许德珩、周炳琳讲了话。还在“五四”广场举行了营火晚会,大家唱歌跳舞,吸引和团结了很多同学。救国委员会成立后,出版了《救国快报》,我负责编写、刻印和发行。

“六一三”游行是响应天津“五二八”,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抗议海河浮尸而举行的。“六一三”后的一天晚上,在四斋新宿舍的院子里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宋尔纯主持会议,要在大会上通过罢课的决议。这时,发生了分歧,一部分同学不同意罢课。只好举手表决,但一举手数数,就说数错了,大会决议很难通过,最后采取赞成的站在左边、不赞成的站在右边的办法,左边的同学使劲鼓掌,把右边的同学拉过来,右边的人所剩无几,罢课决议通过了。“六一三”抗日示威游行进行很顺利,“六一三”后,学校宣布提前放假,一部分同学到夏令营去了,一部分同学则利用假期回到各地去开展“民先”工作。

这一段党的方针、路线、策略，在群众中得到了贯彻。策略思想提高了，工作深入了，组织也发展了。应该说，这一阶段“民先”是一个积蓄力量的时期。

### 三、新学年开始到“双十二”，整个学运包括“民先”工作开展比较顺利的阶段，也叫大发展阶段。

新学年开始首先是共青团转党。早在 1935 年 11 月 1 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由于抗日高潮的到来，共青团的比较狭小的组织形式和秘密的工作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取消国民党统治区共青团的组织，大批吸收共青团加入共产党。北平市委贯彻得较晚，1936 年暑假后回校，曹盼之找我说，“团取消了，团员能够转党的就转党。”同年 9 月我和不少同志都由团转党，党组织大大发展了。曹盼之原是北大共青团的领导人之一，这时，他也就成为北大党的负责人了。后来北大党组织又成立了学生会党团，成员有曹盼之、宋尔纯和我。

“民先”的领导从本学年起也加强了，“民先”的主要负责人清华的李昌、北大的孙传文（孙陶林）、杨雨民、刘文卓（刘导生）、吴承明等人，他们的活动都在北大。

新学年开始，学生救国会与“民先”特别注意团结

新同学的工作，专门出了《北大学生·迎新专刊》。过去学生会的《北大旬刊》，改称《北大学生》。在《迎新专刊》上，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介绍地质系，一篇是介绍西斋生活。还有，新学年开始后，为了便于工作，好多“民先”骨干如王骥卿、莫家鼎等，从理学院转到文学院。刘志诚和金明则分别调到河南和西安去了。

10月鲁迅逝世后，北大文艺研究会在三院举行了追悼会，这个会开得很好，“民先”事先做了布置，参加的同学很多。

11月在支援绥东抗战活动中，“民先”和学生会专门开大会动员同学捐献。政治系同学周文光（周克刚）主张少吃一顿饭，大家辩论了一番，通过后把一顿饭的钱捐献出去。另外，杨隆誉以黎明歌咏团名义请来王西征教授在二院教唱“百灵庙战歌”，这个歌是他自己写的，歌唱起来，有点象念经似的。我记得有这么两句：“可不是吗？哈尔红河吹来小尖刀子风。”“民先”还用歌咏团的名义欢迎吕骥和陈波儿率领的上海文艺界赴绥东前线的慰问团，他们经过北平时，我们在地质馆二楼开欢迎会，杨隆誉和吕骥讲话，吕骥还唱了一首追悼聂耳的歌。

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时，“民先”队员和部分同学一起在平大工学院集会，吴觉农教授在会上讲话。他简要回顾了一年来的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号召师生团

结抗日救国。这次会开得比较成功，他的讲话生动有力，同学们深受鼓舞，最后由师大学生赵启海指挥高唱救亡歌曲。

上述6月成立的学生救国委员会(第二届学生会)一直没有得到学校当局的承认。本学年开始后，几经向学校交涉，始得允许重组学生会。12月11日，按照学校限定的“法定程序”，选出第三届学生会(改称北大学生自治会)。这届学生会仍是进步学生占绝对优势，委员中多是民先队员当选。由民先队员的现代表提出，班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新北大运动十大纲领》。这“纲领”曾得到《大公报》的著文赞扬。根据这“纲领”开展的各项工作，如修整校园内道路，开放男女生宿舍门禁，受到同学们的拥护，也得到学校的支持。但可惜这届学生会存在时期甚短(双十二后又被学校当局勒令停止)，新北大建设方案到1937年第四届学生会才得到充分开展。此是后话。

却说本届新学生会成立后，立即领导同学投入“双十二”游行，当时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发生，后来队伍集合困在景山院内，吴承明代表学联讲话，动员大家坚持团结斗争到底。

西安事变发生后，我们在二院礼堂开了一次会，座谈“双十二”的意义。樊际昌代表学校当局参加了会，李俊明作了东北军反对内战、要打回老家去的讲话，讲



得娓娓动听，很有说服力。这时，党内已经传达了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对于释放蒋介石，当时大家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但是组织上还是服从的。

为了讨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学生会决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在大会前夕，我们班也开了一次班会，会上意见不一致，我们主张“放蒋”，释放救国会七君子，接受张、杨的八项抗日主张；只有一个同学坚决反对，他主张讨伐张、杨。最后，我们的提案通过了。可是，第二天，在三院礼堂开全体学生大会，经过激烈竞争，陈忠经、朱仲龙和一个国民党分子当选为执行主席。<sup>①</sup>当我代表我班宣读提案时，那个同学硬说提案没有经班会通过，于是担任执行主席的国民党分子就借机把这次会议搞散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学校开大会庆祝蒋介石释放，并乘机解散了成立不久的本届学生会。蒋梦麟把刘玉柱、陈忠经、葛佩琦和我找去，大骂一顿，他说，按你们的主张，不是天下大乱吗？他宣布学生会解散。

这一阶段，“民先”队有了大发展。北大“民先”队员有二百多人，队长是谢邦治。据谢说，他当过民先总队部组织干事，当时“民先”在大、中学编了区队，有十四个中学区队，四个大学区队，地区相近的组成区队，

---

<sup>①</sup> 这次全体大会三个执行主席是陈忠经、朱仲龙和国民党分子李彬。

一个区队下面有四至五个分队。当时，我们作了估计，即使在最困难时，北平“民先”也能动员五千学生出来示威游行。北大“民先”及其影响下的群众，在全校同学中是居于多数的。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共青团和“社联”、“左联”取消后，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组织和“民先”都发展壮大，学生会的工作也比较顺利，团结同学，团结教职员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党的核心领导、民先的骨干作用和学生的群众活动配合得很好。

#### 四、“双十二”到“七七”（北平学运分裂之后）， 即迎接抗战的阶段。

这个时期，北大党支部书记是曹盼之，我和许德富是支委。1937年春新的学期开始，“民先”分队部改选了，新的队部由莫家鼎、我和王惠兰三人组成，莫任队长。当时在二院生物系阶梯教室召开“民先”队员大会，那次到的人很多，有一二百人，整个教室坐得满满的。我们三人组成分队部是经过党内事先酝酿，又经过大会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的。

新的“民先”队部成立后，立即投入了1937年3月间第四届学生会的选举活动。这是一场非常紧张而激烈的战斗。因为北平学运分裂了。北大虽然一直没有

出现组织上的分裂,没有出现对立的学生会,但是思想上、行动上存在着实际的分裂,与过去联合选举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次要动员全体队员进行战斗,要求每个队员团结二至三人,北大共有十三个系,五十三个班,对每个班、每个人,逐一作了分析。各系都有“民先”队员,都要做工作。这样,我们紧张地工作了半个多月。然后,详细计算了一下,全校连研究生在内不过千人,我们在这次选举中可以得到半数以上约六百多张选票,可以说稳操左券了。当时,我的小本子上写满了许多人的名字,作了各式各样的记号,记录着队员的心血、战斗的功绩。每个“民先”队员都很关心这次选举。万仲寅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建议采取几条有力措施,争取选举胜利。

这一届学生会(第四届北大学生会)选举的结果,我们方面大获全胜。陈忠经、朱仲龙当选为班代表大会正、副主席。执委大多数是“民先”队员。但为了团结右派学生,经过我们布置,主动让出了几席给国民党学生。“民先”经过学生会选举斗争的锻炼,考验了每一个人,提高了每一个人的觉悟。大家认为不论什么事情只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齐心合力就一定能干好。学生会选举之后,更加注意团结“民先”以外的同学。我和一个大胖子河南老乡何鹏毓同住在西斋“黄”字号的一间宿舍里,他的哥哥是国民党正太路特别党

部的负责人。对这人，我们也争取、团结他，后来参加了我们的“啦啦队”，态度很好。北平学联和北大学生会组织的几次春游，如去香山、温泉、动物园，他都积极参加。在党的领导下，“民先”还组织了北大女同学会，团结了很多女同学，女生中的“民先”队员也不少。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局势，“民先”十分注意组织队员学习军事知识。北大“民先”在西郊进行多次军事训练，都由杨雨民负责指挥，有一次还请师大附中的袁汝镰担任指导。同时，还组织队员参加在老虎洞、西山大觉寺等处举行的夏令营。请有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的人讲授游击战术。这些活动给大家以军事生活的锻炼，为迎接抗日战争作了一定的准备。

这中间发生过一次“五四流血事件”，这是国民党方面的学生预谋制造的。北平学运分裂了，双方都要召开纪念五四的大会，为了寻求团结，北平学联号召大家去北师大参加国民党方面召开的大会，北大民先动员队员和同学们去参加。参加大会的各校进步学生遭到预伏在师大风雨操场的暴徒袭击，不少人被打伤，北大学生王官豹被打破了头。他满头血，一下扑到孙兴诗的身上，孙立即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包扎，在医院里一面包扎，他还一面宣传。

最后是七七事变，支援二十九军抗战，组织慰问团、救护队，“民先”队员很多都参加了支援二十九军抗

战的签名运动,和护理伤兵的工作。七七事变以后,在党的号召下,很多同学离开北平到各地去了。

这一段,通过组织整顿,加强了领导,开展了群众运动,“民先”工作局面大大打开了。虽然经过“五四”事件加深了学运分裂,可是,“民先”加强了统战工作,团结了大多数同学。北大学生运动的一个特点,学生会没有分裂,对立的学生会没有成立起来,原因就是北大“民先”的力量很强大。

北大“民先”根据党支部的通知,陆续撤离北平。一部分同学经西山,沿平汉路南下;大批同学是经天津坐怡和公司和太古公司的船走的。“太古”原要到香港去,后来在青岛上岸,“怡和”原要到上海,最后到烟台上岸,我和一些同学坐怡和公司的船,八月十三日离开天津。

北大“民先”队员分头奔赴抗日前线和后方,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大体分布情况是:

- 去冀中的有 杨雨民、周文光、李洪年等;
- 留在山东的有 孙传文、刘志诚、张震寰、刘昭训、于经海(于眉)、朱国平、韩仕中、孙兴诗等;
- 去晋绥的有 宋尔纯、阎颀行、曹盼之、李欣(胡昭衡)、刘耀宗、金明、周怀瑾、王骥卿、刘立贞(刘亚生)、杨树义(肖杨)、许德富、谌湘汉、常振誉等;
- 去太行山的有 杨维、宋尔廉、朱仲龙、刘祖椿、韩振庭、

薄怀奇、倪学惠、孙瑞符、汪洪文、刘继勋(刘火)等；

**去晋察冀的有**

李俊明、卢荻、王耀华、董文羲(董越千)等；

**去淮北的有**

谢邦治、刘玉柱、刘松云(刘江陵)等；

**去中原的有**

姜世勋、顾瑞芳(顾大椿)、吴成高(吴若岩)等；

**去苏北的有**

石蕴华、谢云晖等；

**去国民党区的有**

莫家鼎、杨隆誉、何兆仪、黄劭显、李年、关士聪、陈忠经、吴磊伯等；

**去延安的有**

邓力群、何锡麟、王俊升、张毓洵、王经川、吴文熹(吴文焘)、马同骥、李书箱等。

离开北大时，大家都恋恋不舍。一天晚上，何兆仪、倪学惠约了我和汪洪文、刘志诚、唐尊准等八九个人夜游中南海，回顾往事，瞻望前途，畅谈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临别时，大家互相题词，赠言鼓励。

在党的教育和培育下，我们分头南下，奔赴各个抗日战场，忘我地工作和战斗。一些同学在战争期间牺牲了，如李俊明、姜世勋、杨树义、金明、王耀华、刘立贞、倪学惠、孙瑞符等，我们永远纪念他们的不朽业绩。更多的同学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已经成为我们事业的骨干力量。

“民先”生活是我终身难忘的，“民先”队队歌至今

仍鼓舞着我们前进！歌词是：

前进，前进，向前进！

我们勇敢、活泼、坚定，

大家一条心，为了争取民族的天明，

主张民主，反对侵略，掀起解放的战云！

前进！祖国的孩子们，

我们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高举起我们的队旗，

向着解放的路上，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向前进！

（本文作者袁宝华，1934年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35年转入地质系。本文是江长仁根据录音整理的。）

## “民先”总队部、北大“民先”分队 及其组织系统

沈 湘 汉

我原名叫谌湘汉，住北大东斋。1936年11月调到“民先”总队部搞秘书工作，直到1937年6月我到西苑受军训为止。<sup>①</sup>

---

① “民先”队初成立时，最高领导机关叫“总队部”（下辖区队、分队等），但这只是北平地区的组织。半年后组织发展到全国各地，遂于1937年初召开“民先”队全国代表大会，“民族解放先锋队”改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最高领导机关改称为“全国总队部”。原来限于北平一地的“总队部”改称为“北平地方队部”。（其他各地区的同称地方队部）。但当时实际情况，全国总队部与北平地方队部的干部配备与任务安排又常常是分不开的。



当时“民先”总队长是清华大学的李昌，我听说前任总队长叫敖白枫，师范大学学生，1936年6月到西安东北军去了。

我到总队部是领导我的阎顾行（胡全）通知我的，我当时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党小组长，也是北大“民先”分队部的宣传干事。阎说：北平市委决定调你去“民先”总队部任秘书，你愿不愿意？我同意后，就调我到总队部和李昌接了头。从此，李昌一直在东斋我的宿舍办公，他的一些党内文件也常常藏在我的书架的书堆中。记得他去陕北参加苏区党代表会议时，可能由于走的很急，他留在我书架里的几期《火线》仍压在我的书堆里，直到我去西苑受军训清理书架时才找了出来。我翻了一下，比我们在北大党小组看的早好些期。以后我都交给胡全，由他转交给北平市委了。

1937年2月前（即全国总队部成立前），组织部长是杨维（解放后任包头钢铁公司总经理，六十年代病逝），妇女部长是杨克冰（现在辽宁省），秘书刘文卓（刘导生）。

1937年春全国总队部成立后，组织部长由天津来的李哲人担任；宣传部长好象是于光远，我们很少见面；妇女部长仍是杨克冰；训练部有“大头李”（贾丰，抗战后被误杀）。由于全国总队部主要做北平地方队部的工作，在我的印象里，全国总队部的秘书长是李平。

但他从来没有管过我。最近，刘导生说：李平是北平地方队部的秘书长，他本人是全国总队部的秘书长，但他也没有管过我，我一直在李昌领导下工作。

我到总队部后，李昌让我管编印总队部机关报《我们的队伍》，兼总交通，有时也管和外地“民先”队的联系。

开始，主要是李昌告诉我怎样编排，以后慢慢就由我画出版样，请李昌改一改后，就送到《北平晨报》印刷厂找老冉（1940年我在延安碰见他时，他叫冉志恒，在枣园工作，以后不知去向）。记得每次我送和取队报时，他都和三四个工人在一起。他们帮我捆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由我驮回分发。

当时李昌工作很忙，还经常要给队报写稿，他就说一句要我记一句，然后叫我顺一下，他再改一下，就可往队报上登了。另外，我在看了巴黎《救国时报》登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的报告里的干部政策部分，觉得很好，我就把它改写成“民先”队应有什么样的干部政策的文章，请李昌修改，大部分原是抄的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很长又不大切合“民先”队实际，但经他一改，删掉了一大半，增加了“民先”队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就成了一篇比较好的文章，用化名登到队报上。

我兼总交通时，下面有五六个“外交”与区队交通联系。他们各管几个区队交通，区队交通各管若干分

队交通。当时，我那里有各区队交通的姓名、地址及“民先”队员的人数，也有各分队交通的姓名、地址及队员人数。队报和文件拿来后，都按分队分开。我记得有一次不慎拉下张洁珣（原是北平市妇联的负责人之一）分队的一份队报，她当时是该分队的交通，我就按该分队交通的姓名、地址送给她了。

我还经常收到《国防》、《长城》，也不知是什么人送来的（有一次，传达室叫我取回一柳条箱，打开一看，全是党的半公开刊物《国防》和《长城》），我每次都经过“民先”交通系统迅速分发下去了。我记得每期队报都给天津、上海、武汉、青岛等地“民先”队寄去，但都是少量的。

1937年2月，“民先”全国总队部与北平地方队部分开后，我就将北平地方队部总交通移交给北大孙兴诗（孙思白）了。

我当时很忙，经常不能去上课，有时上着课又被叫出来，常靠李欣（胡昭衡）等替我答到。孙思白也曾代我答过一份学年考试卷。可能当时我还分管总队部各部以及外地来人的联系和接头。

有关北京大学“民先”分队的一些情况如下：

1936年8月底，我刚从家乡回到学校，北大党支部负责人阎颀行（已逝世）让我立即到“民先”北大分队部任宣传干事。

当时的北大分队长为宋应（原名宋尔纯），组织干事为吴磊伯。

不久，宋应随班上到山西地质考察实习，分队长遂由谢邦治继任。最后一任分队长是莫家鼎。

吴磊伯调“民先”东城区大学区队部任区队长。

我在分队部时，小队一般是十人以上，小队会内容常常是一国际、二国内、三北平、四北大，能按期开会。

“民先”队的组织系统：

#### 一、总队部

1. 1937年2月前，“民先”总队部有总队长，秘书管编印队报和外地“民先”队联系以及交通系统等，还有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有时称武装部或军事部），妇女部（下面没有干事，又常同组织部在一块）。

2. 1937年2月，全国总队部和北平地方队部分设后，除将秘书改为秘书长，下设秘书外，其余同前。

二、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一二·九运动》中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文件》中，“组织系统”中的组织系统表和“说明”，与实际有如下几点不符：

1. 表中没有总队长，却设总务（一人），下设“交际”和“武装部”。

2. 表中的秘书（一人），下设文书处和印刷处，却不管交通系统。

3. 表中的组织(二人),下设组织部和交通。交通分“内交”(分管联络总队部各负责人,与外交发生联系)与“外交”(“担任总队部与区队部之联络”),并称“交通直属于组织”,这与实际不符。

4. 表中的宣传(一人),下设编辑部和干部训练部,也与实际不符。

5. 表中区队和分队有总务,没有区队长、分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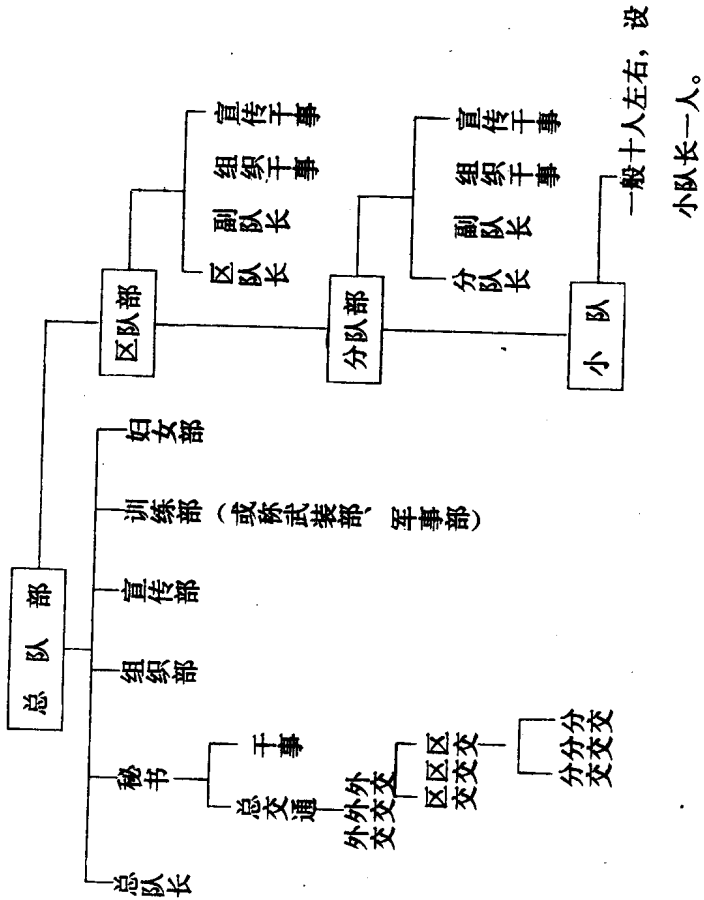
6. 小队当时一般为十人左右,并不是“说明”中的“三至五人”。

三、我记得的情况和“现行组织”的图表也不同,当时只有宣传部,没听说有政治部,也没有专对外的秘书。但该表是1936年10月4日“民先”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材料,是否是我11月去以前的组织,而我到总队部后又有所改变,或只是设想而未成现实的组织需查证。<sup>①</sup>

为了眉目清楚,兹将我记忆的情况列简表如下:

---

① “现行组织”图表是本文作者1985年在中共中央党校看到的一份复印材料,原件是民先总队部印的一份《公报》。《公报》印有《民先队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记录》字样。“记录”中印有“现行组织”的图表。该图表所示组织设置与作者印象之不同,图表有政治部和有对外秘书,作者印象无此两项设置。



1984年6月26日

(本文作者沈湘汉, 原名湛湘汉, 一九三五年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 记 1937 年上半年 北平“民先”总队部交通工作

孙 思 白

1936 年，我是北大史学系二年级学生，经同班同学赵春谷介绍加入“民先”队。我住西斋地字号宿舍，与外文系同学许宛乐（现名许东明）划入一个小组，许是组长。当时，我患神经衰弱症，虽然能一般地随组织活动，但病情纠缠得我很苦恼，以致设想找个幽静的地方，休养一年。当时正患严重肺病的同班同学李书箱（我介绍他入“民先”）和我最接近，他劝我不要作“休养”的打算，他认为“越幽静，想问题越多，脑子更不易得到休息”，相反，“投入到群众斗争中去，也许会好的”。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向组织表示愿承担更多的工作。这办法真有效，我的活动一多，工作一忙，病魔反

而被吓跑了。

1937年2月前后，“民先”队部通知我，要我担任北平地方队部的总交通工作。先征询我的意见，我没问具体的是干什么，就一口答应了。接着，住东斋的史学系同学谌湘汉来向我交代工作。他把一支破旧柳条包和两辆自行车都给我送来。他告诉我总交通的任务就是把“民先”总队部的队刊、文件、通知以及其他宣传品定期按人数送达到各区队部，然后由区队部分送到各学校分队中去。这样，交通队的系统就有“总交”、“区交”和“分交”三层。总交通共有五人或六人，让我当头头，负全责。他还给我一张北平市四个“民先”区所辖各校队员人数表。东、西、南与城外四个区总人数约三千左右。记不清文件、队刊等印刷品是怎样送到我宿舍来的了，反正隔若干天就有成包成捆的印刷品送到我的手里。在没有分送出以前，装满了那支柳条包，有时还容不下。“民先”队刊《我们的队伍》<sup>①</sup>是报纸型铅印的，报头是袁宝华写的。队刊印数最多，大概每个队员可以分到一份。其它油印刊物，多少不等，按各区人数比例分配。另外还有装订成期刊型、带封面的小册子，印刷得非常漂亮的有《长城》、《人民之友》等等。《人民之友》的封面题名是红笺黑字，其中载有毛

---

① 北平民先队刊名称是《我们的队伍》，还是《我们的生活》？回忆中有两种说法。



泽东同志后来收入《毛选》的几篇文章。这年春，发生了在和平门外师范大学为纪念“五·四”进步学生被殴打事件后，曾有一本记述与控诉吴葆三、陶希圣等人的小册子，题名《新五四事件》。这小册子印数较少，每区只能分到二、三十本。有时，还有总队部下达的临时通知，是有限期的。我印象中，有几回是北平市学联的紧急通知，也是由我们这一系统往下传送的。

总交通，除我以外的四、五人，现在只记得两个人了。一个是北大一年级学生陈瑞图，他住在北河沿北大三院。另一个是彭金波，河南人，他住在沙滩东老胡同平安公寓。他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没有问过<sup>①</sup>。此外，还有谁，记不清了。他们定期来我屋里，表面是来访友，背着一个空书包进来，把我早已按数点好的文件装入书包带出去。他们向各“区交”送达和“区交”向“分交”送达的情况，我无直接印象。我只记得家住西城某中学一个担任分交通的女同学和我接过头；彭金波向两吉女中贾唯英送过文件。北大五斋（女生宿舍）的文件是由我自己直接送交给王骥卿（王季青）收。当时是：每次我到五斋门口，让传达通知她“有人找”，她

---

① 彭金波的名字，我长期记不起来，但他的风度却留在记忆中。我向友人打听过这人多回。近来从袁宝华同志处转来一篇《回忆北平沙滩的“民先”生活》的手稿，署名彭金波。从中看出作者也在回忆一个忘了名字的人，正是我，而作者也正是我所打听的那个交通员。他原听说我已死掉，但我们又见面了。

到门口来，把文件递给她，两人各向后转，好象没有交谈过。

队刊是由谁编辑、校对、送印、没有问过<sup>①</sup>。只听说是《北平晨报》社代印的。解放后问谌湘汉，他讲：“晨报印刷厂代印，不错。印刷是由该厂职工冉志恒负责。”抗战后，他和冉在延安时曾见过面。

“民先”队的交通系统从什么时候建立，开头是什么情况，不知道。我只知在我以前是谌湘汉，谌湘汉以前，据谌模糊的记忆，说也是一个北大学生，好象姓孟。但也有同志说“民先”队成立前，北平市学联总交通负责人是孙敬文，等“民先”队成立后，原来市学联的好些交通队员就“一身二任”，或者转成“民先”队的交通了<sup>②</sup>。究竟市学联和“民先”队部的交通后来是一个系统，还是两套系统，说不清楚。还有先前成立的北平“民先”队部和后来成立的全国“民先”总队部两者的交通是一套，还是两套，也讲不清。但从1937年初，我接替总交通任务时被告知：我们这交通队是隶属于北平地方队部，这印象是清楚的。北平“民先”队部原先就叫“总队部”；到1937年2月，“民先”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全国总队部，北平队部就成为隶属于全

---

① 孙传文(孙陶林)同志说，队刊他和李昌、谌湘汉都编过。

② 郝诒纯、刘同晖所提供的情况，她们都是由市学联交通后转成民先队部交通的。有的同志说民先队最早的总交通负责人名叫孙白忱，不知是不是孙敬文同志的化名。

国总队部下的一个地方队部了。据北平“民先”队长孙传文(孙陶林)同志说,后来这两个队部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固定办公场所,也没有在门口挂两块机关牌子,他们的工作,还是混在一起的。所以北平队部的交通,实际也是全国总队部的交通。孙传文同志这一说法和我的印象是一致的。至于如前面所讲,我们也送达过北平市学联的文件,这大约是各组织的负责同志,多是一身兼数职,工作界限不是那么清楚的关系。

到1937年初,这个交通系统,(总交、区交、分交)应该说是比较健全的了。在传达紧急通知上,从没有误过时限这点来讲,可以看得出它的效能。总交的工作情况略如上述,区交与分交的情况,我所知不多。各学校先后有哪些同学担任这项工作,叫什么名字?除我前面所提到的同志外,都没见过面,现在几位老同志提供了十几个名字,暂且附录于后,作个参考:

郝诒纯(西城区交)、李践为(法商学院)

张潭(国立艺专)、李蓬经(同前)

刘同晖(中国大学)、杨振九(同前)

闻毓秋(镜湖女中)、张洁珣(华光女中)

张璋(北京大学)、孙国梁(东方中学)

冯灿文(艺文中学)、徐树仁(崇德中学)

贾唯英(两吉女中)、戴金赞(志诚中学)

黄甘英(华光女中)<sup>①</sup>

这十多个姓名,显然不完全,也不会很准确。当时北平大中学校一百多所,参加“民先”建立分队的有九十多所。“民先”区队先是分四个区,后来发展成十二个区<sup>②</sup>。把区交,分交合计,再加上先后的更换,这支交通队人数至少应在一百几十人以上,当时许多重要的大学与中学肯定都有担任交通工作的同学。现在这个名单中都还空白着,而且就是这个名单,也许有的不是“民先”的交通,而是市学联的,也说不定(假若是两套系统的话)。这里暂时把它记下来,作个线索,以待随后补充与订正吧。

我在任总交通工作的1937年4、5月间,开过一次总交通与部分区交通的工作会议。原来“民先”队部秘书处要我召开一次全市性的交通会议,因故没有开成。随后开了一个缩小范围的会,交流一下经验和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到会的总、区交通员只有十儿人。地点在北大东斋湛湘汉的宿舍里开的。会议不拘形式,是座谈性质。在座谈中间有一个中国大学的学生来参加,高高的个头,穿一件夹克,他作了总结性发言。据

---

① 这个名单中的大部分是中国大学刘同暉同志提供的。

② 孙传文同志讲述的。

介绍，他是“民先”总队部秘书长，名叫李平<sup>①</sup>。我只见过他这一次。全国解放后，再一次见到他，他正任外交部服务局副局长。

我在从谌湘汉手中接受这项工作之后，才知我的主要任务是收进、保管与分发文件、宣传品；有时处理些交通队中临时性的问题。因此我的主要时间精力是花在查点与分配队刊、文件数目上。我记得小谌曾跑来亲自向我作查点纸张页数的技术示范，就象纸店里售货员那样，把一领纸搬过来，一手按住纸的一角折起，“一五、一十”迅速地查出是五十张、一百张那样。我自己模仿着试了多次，稍微学会一些。我住的西斋宿舍是把一间房屋用书架隔成两间，挂上一个门帘，分住两人。我住在里边的一间。我进出通过外间；外间同学进出却不必通过我的房间。这一位置的“优势”，为我收发、保管、查点那些文件提供了方便。那只装文件的柳条包就在我床下，用床单一遮，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我在查点数目时，须在外间同学上课或夜晚他睡下之后。点数分配成扎后，分别包好注明，仍放回床下。总交队员来后，都知道自动地从床下取走。每周我总得花几个晚上或两三个半天用在查点数目上。从

---

<sup>①</sup> 《一二·九运动》（1954年人民出版社印）中有一张“民先”总队部的组织系统表，把“交通”放在“组织”之下，与“组织部”并列。我估计这张表上的系统只是设想，与实际情况有出入。我当时被告知是受“秘书”领导。李平同志以总队部秘书长名义出席我们交通会议，可以参证。

2月到7月；我认为外间那位表面看来朴实敦厚，只啃线装书的同学根本不晓得我在里间干什么事。解放以后，才知道其实不然。1959年从西北来了一位找我外调的人员，他告诉我那个同学自己交代，他曾参加过国民党的什么学生社团。他的上级指使他从我房里窥测或弄到点他们所希望的“秘密”。他不愿意干，在被迫之下，他从我桌上拿走了一张公开的油印救亡小报去交了差<sup>①</sup>。

1937年春季各项集体活动以及“新五四事件”，交通队员都及时送达了通知。

卢沟桥炮声一响，大家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这时交通队员的繁忙，正象所有的留校同学一样。7月28日城郊激战一天，大家正兴奋地期待着第二天的“捷音”，29日凌晨突然晓得守城的二十九军已于昨夜悄然撤退，平津实际已变颜色了。下一步怎么办？还没得到总队部的消息，留校同学互相商量着撤退的办法。我到沙滩附近兜了一圈，街上已经出现了慌乱的景象，有些同学已经转移，接不上头了。我想可能还会有交通员找我，回到宿舍坐等。到十一点左右，忽然有个绰号叫“二大妈”（原名张瑛，东北人）的北大同学来找我，

---

① 1937年上半年与我同舍共住的那个同学名叫司以忠，字尽忱，宁夏人，中文系学生。1959年5月外调人从宁夏来找我对我证他交代的材料，主要问我们的工作是否受到过破坏？我认为他交代的话是真实的，我们的工作没有受到破坏。

说“上面指示，赶快撤退，先出西直门，坐午后火车到门头沟，然后步行到保定。”我问是否普遍地通知了。他说，通过各种渠道，辗转通知，已不能单靠交通系统了（现在想来，他大约也是交通员）。话不宜迟，那时已来不及收拾什么，把门一锁，我两人出西斋奔西直门而去，边走，他边告诉我说，沿路有联络员，联络号的问话是“哪里来？”答“海上来。”我两人过了西四，快到新街口的路上，一个骑车子的青年迎面而来，问我们：“哪里来？”我们照约定的“海上来”答了话，他向身后一指说：“到西直门火车站，上车。”就继续飞车而去了。我两人出西直门时曾看见师大的同学丁发善（丁秀）和其他一些学生模样的人在路上走着。到车站上望见不少的北平学生，记得其中有化了装的北大杨雨民，还看见张瑞芳已坐在车厢里。但互相都不打招呼。等到下午三时，得到站上通知，说敌人已封锁了门头沟一线，火车开不出去了。当时，北平对外铁路线全部中断了。大家只好又折回校内。傍晚，我在北大图书馆门前，见到西斋同学何锡麟匆匆走来。他告诉我他曾试图步行穿过日军封锁线而没有成功，也返回来了。到后来平津通车，大家分别出走。在折回城内等待通车的一周多中间，由于各校同学的分散转移，互相失去联系，交通工作就终止了。不过，我曾想那天出西直门去门头沟沿路上的联络员，也许就是原来的交通员，但不知是

由哪个系统安排的。不过，可以看得出那天原定的撤退计划是有领导、有组织的。

1985年4月10日于北京

(本文作者孙恩白,原名孙兴诗,1934年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 记忆中的一鳞半爪

——北平学联、北大学生会和“民先”的几点情况<sup>①</sup>

陆 平

---

北平学联有一个演化的过程。1936年10月10日以前的第一届北平学联，不能说它全过程是一个秘密的学联。从组织方面来看，虽然它不是经过北平市各校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是为全市大中学校的同学所公认的学生抗日救亡的领导机构。全市的大中学生参加了学联，接受它的领导。从工作方面看，从“一二九”一直到1936年10月10日以前，全市大、中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都是在第一届北平学联领导下进行的。许多大的行动都是由它号

---

<sup>①</sup> 本文是陆平（卢荻）同志于1983年7月，在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研讨会上的两次发言。

召和组织的，如“一二一六”游行、“六一三”游行等，所以不能说它就是秘密学联。

1936年10月10日，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北楼阶梯教室召开全市大中学生代表会，到会的代表是各个学校学生会选派的。北大参加这次会的有孙传文（孙陶林）、谢云晖和我。那时我的名字叫卢荻。这是一次换届的代表会议。在会上对一届学联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女子文理学院的一个女代表是国民党员，围着一条花围巾，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她提出很多问题进行刁难，诡辩。会议中间还休息了十分钟，研究怎么对付她的反动言论。那时已经重视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和她摆事实讲道理，驳斥她，最后举手表决。在这次会上正式民主选举出第二届学联。选举办法不是以人为单位，是以每校学生会为单位，并规定了哪个学生会负责总务工作（总务实际上是主席），哪个学校负责宣传，哪个学校负责组织，对外联络等等。每校只有一票表决权。这次会上是以举手表决过半数通过办法选出了东北大学、北大、清华、中大、师大、平大法商学院、燕京等校组成了第二届学联。这届学联办公地点设在东大学生会。

1937年2月或3月，北平学联又改选了一次，这应是第三届学联，中大是总务，办公地点搬到了中大，一直到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前，即1937年5、6月间，北大党支部书记肯定是曹盼之。我一直在学生会和学联工作，没有在党支部工作过。我记得第一届学生会主席是韩天石，那时派到学联去的是姜世勋。北大第一届学生会，是十二月十日（“一二九”次日）成立的。先是各班选了班代表，开了班代表会议，在新四斋又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到“一二一六”时，已经组织得比较好了。

“三三一”后，学校停止了学生会的活动，还开除了四个人。后来我们商量重新成立学生会要争取学校同意，还曾经同国民党方面的学生谈判过。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六个人，他们六个人，举行过谈判，我和朱仲龙（朱穆之）都参加了。他们原来想要两个委员的位置，但选举的结果，他们只有李彬一个人当选，要不是我们做工作，一个也当选不了。<sup>①</sup>同年冬，学校当局要控制学生运动，公布了选举学生会的办法，自由结合，五个学生选一个代表；但这时民先队在学生中已有很大发展，我们又分配了任务，每个人团结一、两个同学，这样在选举时还是我们“民先派”占了绝对多数。我被选为学生会执委，又被派到学联去工作。何礼写的北平学联第一、二届代表名单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我记

---

① 这里讲的“只有李彬一人当选”，与本书中葛佩琦记述第四届学生自治会选举的结果不同，可能不是同一届选举的情况。

得 1936 年 10 月 10 日是在燕京大学的阶梯教室开的代表大会，成立第二届学联的。当时学联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争取二十九军以及支援绥远抗战。我曾经代表学联及“民先”到归绥参加绥东阵亡将士追悼大会，详情见我另一篇回忆这次追悼大会的文章。

我记得北大第四届学生会的正副主席是陈忠经和朱仲龙，执行委员会首席代表是刘玉柱，执委中也有我一个。在学生会的还有姜世勋、吴沛苍、葛佩琦等人。这是按学校规定的选举办法选出来的，所以是学校承认的、合法的。

北大的“民先”队，开始时叫大队，包括沙滩的分队（当时沙滩还有党支部，因为有不少学生住在公寓里）。头一任大队长我记得是杨雨民，后来孙传文也当过。<sup>①</sup>宋尔纯也可能当过队长。

关于 1937 年纪念“五四”十八周年的大会，当时我们是要求新、旧学联合作，以争取在下面的群众。但是国民党学生却是有充分准备来打架的，所以在史立德讲话后，陶希圣、杨立奎等人就大肆煽动，他们用童子军棍棒打我们的人，志成中学还发给他们每人三元钱。这事孙国梁是很清楚的，他当时是志成中学的学生。我们是没有什么准备的，只是弄了些纠察队在台下保

---

<sup>①</sup> “孙传文也当过”（北大“民先”队长），记忆可能有误。参看本书沈湘汉、袁宝华、孙传文等人的回忆文章。

护学联的负责人。打起来以后，我们只好且战且退，我带了一批女同学先撤退。

七七事变后，“民先”队总队部曾搬到太原。我由杨学诚介绍找到李昌，他就把我留在总队部工作，当时只有李昌、于光远和我等少数几个人。11月太原失守，“民先”队总队部随北方局撤退到临汾，在那里住在何二胡同15、16号，“民先”总队部旁边是平津同学会。这时在总队部工作的有李昌、丁浩川、顾大椿、卢荻、刘文革、夏英喆、许大远、徐明等，还办了一份油印小报《青年战线》，一张蜡纸可印1300张。当时的工作是直接受北方局领导的。

1938年2月，临汾又失守，根据北方局指示，“民先”队总队部撤退到西安。4、5月间，国民党曾传讯李昌，要封闭民先队。后来，林伯渠同志因宣侠父失踪，又得到情报，说国民党准备抓李昌和我，所以他对我们说你们还是隐蔽一下好，他就让我们住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地下室里。6、7月间，国民党逮捕了于光远、李连璧等西安五青年，都是“民先”队的干部。（何礼：1938年8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和“蚁社”等三个爱国团体。在这件事上，当时长江局受王明影响，是有错误的。在《新华日报》社论《抗议解散三团体》中，公开讲这三个团体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散三团体要影响国共合作，要求收回成命。这是很幼稚

的。当时这三个团体是抗日救亡团体，国民党下令解散是很不得人心的，沈老等民主人士、国民党内部邵力子等都很同情，要求收回成命。结果社论一出，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别人认为可能卷入党派纠纷，就不好说话了。后来，又叫三团体的负责人到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军委政治部第二厅那里去声明，表明自己是共产党员，证明这三个团体是共产党领导的，那更成问题。）

（本文作者陆平，即卢荻，1934年入北京大学教育系。）

## “一二九”时期北大学生会的更迭历程

葛佩琦

---

这里所说的一二九运动时期，是指从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发动游行示威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这段时间。

当时，为了争取抗日救亡的自由，北京大学学生会经过四次曲折的战斗历程：第一次组织成立，被迫停止活动；第二次组织成立，北大当局不予承认；第三次组织成立，又被迫停止活动；第四次组织成立，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 一、第一届北大学生会的成立及工作概况

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即秘密学联）。当时北京大学没有学生会，未能参加学联。但北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刘文卓（刘导生）同志和学联有联系。北大同学俞启威（黄敬）、刘松云（刘江陵）是地下党员，他们参加了学联的工作。

1935年12月初，我在北大西斋阅报室看到一本发起组织学生会的签名册，我在上面签了名。过了两天，地质系的同学宋尔纯（宋应）到我们班说，有些班倡议组织北大学生会，问我们班是否赞成？我们班表示赞成。12月6日下午在北大红楼二层的一个教室里，我参加了一次组织学生会的筹备会。会上推举了筹备委员十多人（每系一人），讨论了学生会的组织章程，公布了各班代表的选举办法：发给各班选举票，在文、理、法各院设置投票箱，限于12月9日上午投票截止，12时当众开票。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在12月9日以前，北大同学已经进行组织学生会的活动了。

1935年12月3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由南京来到北平，住在中南海居仁堂。他代表国民党政府，



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来北平组织特殊化的政治机构，即受日本控制的政治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

何应钦来到北平后不久，社会上便传说“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宣告成立。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于12月8日夜间，在燕京大学（现在的北大所在地）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大会，决定第二天全市各大中学校举行大规模的抗日请愿游行。

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游行，北京大学因事先未得到通知，参加的人数较少，约三百多人。晚上在西斋食堂吃饭时，大家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当天的游行情况。很多同学以未能参加游行而感到遗憾！“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这次未能走在运动的前头，大家感到有些不快，很希望能再来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

12月9日夜间，北大的党支部、团支部以及一些积极分子彻夜开会，研究如何组织北大学生会和发展抗日救亡大好形势的问题。10日上午在北大红楼的一个教室里，召开学生代表大会，选举学生会的负责人，并决定全校举行罢课。

下午2时，在北大新四斋院内（现在的沙滩北街乙2号后院）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宣布北大学生会正式成立。接着大家选举韩天石同学为大会主席。这就是一

二九运动时期的第一届北大学生会。大会讨论通过了学生会的章程以及下列决议：（一）以全体大会名义宣布全校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二）以北京大学学生会名义参加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三）以全体大会名义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四）由大会选举产生“北京大学学生救亡宣传委员会”及“交通委员会”。而后由朱仲龙（朱穆之）主持大会，进行选举。选出：朱仲龙、韩天石、徐綦燊三人为学生会总务（相当于主席、副主席）；王敬之（王大刚）、王德昭等二十余人宣传委员会委员；李彬等十余人为交通委员会委员。

12月10日晚上，在北大二院教室召开学生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我的记忆和讨论抽稿时同学们的补充，已知执行委员中有下列各位同学：卢荻（陆平）、陈忠经、刘玉柱、谢云晖、李欣（胡昭衡）、江之源、陈大觉、薄怀奇、姜世勋、顾德麟、李守权、姚震江、姚昌学、葛佩琦。

这届学生会做了很多工作，简述如下：

（1）学生会派代表参加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当选为学联执行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中，学联印发的各种宣传品，都是北大学生救亡宣传委员会拟的稿。代表这届学生会出席学联的执行委员，先后有江之源、姚昌学等同

学。

(2) 组织和发动北大同学参加“一二一六”示威游行。

1935年12月15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16日正式成立的消息。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立即决定发动全市学生于12月16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12月14日晚，北大学生会正在二院十五教室召开班代表大会，接到北平市学联关于16日全市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的通知。大会马上就北大是否参加游行问题进行讨论。结果，以绝对多数通过参加“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提案。代表大会散会后，学生会执委会彻夜进行游行的准备工作，确定北大游行队伍的编队顺序和游行路线，组织了游行时的纠察队、宣传队、交通队。刘志诚（刘居英）担任纠察队长，我担任北大各队之间的交通联系工作。学生会还赶制了两面“国立北京大学示威团”的大旗（队标）以及各种宣传品。

12月16日上午6时，北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有些国民党学生也参加了）都冒着严寒在各斋集合，整队准备出发。国民党武装军警此时已包围封锁了北大各斋以及三院（学生宿舍）的大门。西斋队伍出发时，遭到军警拦击，举大旗的巫省三、郝天和以及交通员葛佩琦就被逮捕了。被带上手铐，押送到前门内

国民党警察局。突破军警包围的东斋、四斋、五斋的游行队伍赶到了西斋，与西斋同学配合，内外夹攻，打退了反动军警，西斋的队伍冲出来了！游行过程中又汇合了三院的北大同学、精业中学、中法大学、朝阳大学、汇文中学、大同中学、贝满女中、河北省立十七中、女一中等校的学生队伍，北大担任领队，走在前面。

在游行的路上，几次遇到军警堵截，同学们与之展开了英勇搏斗。

游行队伍进到南长街南口，遭到大批保安队、消防队和警察队的堵截。他们用水龙、用皮鞭、阻止游行队伍进入西长安街。领队朱仲龙第一个冲上去抢夺水龙，被警察打破了头。紧接着，杨雨民、李彬、佟常义（佟城）等十几位同学冲上去，夺下了水龙，反击军警，逼得军警后退。学生队伍就趁机通过南长街南口，转到了西长安街，并把停在长安街上的一辆消防车用石头砸烂了。

游行队伍沿西长安街西进到新华门前，又遇上大刀队的阻拦，军警举着大刀，端着步枪，迎面冲上来，对学生乱砍乱打。学生们进行了坚决地抵抗。北大同学李俊明被几个军人按在地上，打得遍体鳞伤。北大同学蒋峻峯被大刀砍伤鼻管和嘴唇，鲜血直流。为了赶赴天桥开市民大会，学生们一面将受伤的战友送医院救治，一面化整为零，到西交民巷集合。

同学们分散到达西交民巷之后，宋尔纯（宋应）到布店买了一块白布，写上“北京大学”四个大字，作为大旗，率领同学们沿前门大街，奔赴天桥广场，参加了有两万多市民和一万多学生的市民大会。北大同学黄敬踏上一辆电车，向群众发表演说，慷慨激昂，激动人心！大会通过：（一）“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二）“通电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三）“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

市民大会结束后，马上开始了示威游行。由市民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长达二里。从天桥经珠市口北进，救亡歌声此起彼伏，嘹亮雄壮。“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声，正气凛然，气壮山河！在继续分队游行过程中，在宣武门内外，又分别遭到军警的猛烈袭击与残酷的镇压，一些同学被捕，一些同学受了重伤。

在“一二一六”一整天的斗争中，全市学生被捕的二、三十人，受伤的将近四百人。受伤最多的是北京大学和东北大学的学生。北京大学轻伤者四十多人，重伤者八人：李俊明、吴兰滨、蒋峻峯、黄淑生、梁发业、朱仲龙、董大年、杨雨民；被捕者五人：李俊明、巫省三、郝天和、王德昭、葛佩琦。北大同学会对受伤的同学进行了热情地慰问；对被捕的同学进行了积极地营救。被捕的同学李俊明因受重伤，当天就被释放了；被捕的其他四人，于12月20日由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到警察局

保释出来。

“一二一六”北平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卖国勾当，汉奸卖国贼惊慌失措，被迫宣布“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一二一六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和领导的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青年抗日爱国运动，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抗日犯法，爱国有罪”的恐怖统治，显示了中国青年为挽救祖国危亡，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气魄！北京大学学生在一二一六运动中，继承和发扬了“五四”精神！

### (3) 创办了《北大周刊》。

学生会成立了北大周刊社，刘玉柱同志任社长，李欣（胡昭衡）同志任总编辑，编辑出版了《北大周刊》。创刊号定名为《“一二一六”示威特刊》，出了两期之后，于1936年1月份改为《北大旬刊》。这个刊物报道了当时抗日救亡斗争的实际情况，对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是现在研究一二九运动的重要历史资料。

### (4) 反对选派代表赴南京“聆训”。

为破坏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于1935年12月23日下令各地大、专学校，选派学生代表及校长于1936年1月15日到南京“聆训”。北大学生会于12

月 30 日召开班代表大会，决定：北大学生会反对派代表赴南京“聆训”，并发表反对“晋京聆训”宣言。

北大当局于 1936 年 1 月 6 日宣布推选赴京“聆训”代表办法，让学生推选，结果无一人投票。学校当局指定学生杨某、李某、徐某三人伪称为学生“代表”，并发给他们每人大洋三百元。三人离北平南下时，徐某半路下车溜走，杨、李二人到了南京，参加了“谒见”蒋介石和“聆训”的全部活动。

1936 年 1 月 28 日，北平学联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会上通过制裁赴京伪代表办法。1936 年③月 18 日下午，北大学生会在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大会，决议：驱逐晋京伪代表出校。会后，有学生数十人到东斋宿舍，杨、李二人已躲到他处，学生们便把他们的行李扔到宿舍门外。

#### (5)组织和发动了反复课斗争。

1935 年 12 月 10 日下午，北大学生全体大会宣布全校总罢课。北大当局随即贴出禁止罢课的布告：“闻有人煽动本校学生罢课，实属破坏校纪。……一经查明，即予开除学籍。”学校当局企图以此恫吓学生，阻止罢课。但同学们仍然坚持罢课。

1936 年 1 月 2 日下午，北大当局向学生发出布告：限于 1 月 4 日全体复课。北大学生会一面在同学

中间宣传反对复课，一面组织纠察队进行反复课斗争。1月4日随即发生姚震江同学“怒斥胡适之”事件（详见姚的回忆），在同学中传为笑谈。

1月4日中午北大当局又贴出布告，要求学生“继续上课”。学生会为讨论罢、复课问题，于1月6日（5日是星期天）上午十时，在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同学大会。经过充分讨论，最后以绝对多数的票通过决议：继续罢课，不达到目的不止。

至此，北大当局看到“复课计划”已经彻底破产，遂于6日下午贴出提前放寒假的布告：“本校自1月8日起放寒假”。

#### (6)组织和支援北大同学南下扩大宣传。

为抵制国民党政府和各学校当局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阴谋，12月下旬的一天，北平学联党团组织开了一个会，决定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这样，可以避免因放寒假而涣散了学生群众的力量，可以锻炼和提高学生骨干的本领，可以击破国民党的阴谋诡计，可以使学生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

1935年12月底，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体育馆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南下农村扩大宣传的决议案。

12月30日下午2时，北大学生会召开班代表大



会，讨论通过：北大同学南下农村扩大宣传的决议案，并推选代表数人，组成北大学生南下扩大宣传设计委员会，筹划一切。北大自愿报名参加南下扩大宣传的同学共有五十多人，其中有女同学王骥卿、张毓珣、何兆仪、唐尊准四人。

由北京大学率领的第一团团员，于1936年1月3日清晨出发，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到处受到国民党的便衣队和保安队的追踪和包围。团员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在1月21日到达保定，于1月24日返京（详见刘居英同志回忆）。

北大学生会给北大南下宣传的同学以物质和精神的支援：

（一）扩大募捐，并将捐款及时送到前方，以解决南下宣传同学的吃饭问题；（二）将宣传团在农村的活动情况及时转达给留校同学及教师，并转告报社记者，以扩大宣传效果；（三）将北大以及北平市学生运动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反复课斗争的情况，传达给南下宣传的同学，以鼓舞士气。在支援南下宣传的工作中，孙陶林（孙传文）和刘玉柱等同学出了很多力。

北大学生会在1月7日收到北大南下宣传同学1月5日发来的两封信：一封是致留校同学的，另一封是致学生会执委会的。为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爱国学生的奋斗精神，现将致留校同学的信抄录于下。

留校同学公鉴：

本团于本月3日清晨，在农学院集合，与本市各大中学校同学共同组成扩大宣传团第一团。当日下午5时出发，7时达大井，即投宿于此。4日早4时许，由大井出发，绕过丰台、南苑，中午到达黄村，晚8时许，达青云镇，遂宿焉。计是日共走九十余里，途中虽然饥寒交迫，但士气依然旺盛，无有畏缩者。现已逐渐克服困难，前途已现曙光。不过，尚有一不易解决之难题在，即经费之支绌也！当出发之际，因时间迫切，仅筹措纸币二十元。私人所带，为数极少，学联方面亦不充裕，以此陷本校团员于苦境！……亟待留校同学，鼎力援助。

本团出发前，学生会曾允许以八十元作为本团补助费，但迄未照拨。本日已去函催促，希望留校同学，共同督促学生会，以济前方同学燃眉之急！

又此次出发，过于仓促，致同学中之具有热忱者，多抱向隅。同人渴望留校同学，作第二次动员之壮举，一致在“民族解放运动”旗帜下，携手前进！

平津扩大宣传团第一团第一中队第三四小队北大同学同启。

1月5日

北大南下宣传同学致学生会执委会的信的内容与致留校同学的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不再抄录。现将学生会的复信抄录如下：

××兄转扩大宣传团第一中队第三四小队全体同学公鉴：

诸位5日发来之信，已于本日上午收到。当即转交文书股，且嘱其油印公布；并会同学术股，将来信登载第二期北大周刊。

昨日上午在三院开全体大会，当场辩论剧烈，秩序井然。最重要之决议：一为继续罢课，不达目的不止；二为扩大募捐，接济南下宣传队；三为根本反对中日南京会议。关于会场一切详情，可由南下慰劳代表×××同学详细报告。

诸位此次不辞劳苦，深入农村，奋斗精神，实堪钦佩，深望继续努力，奋斗到底。经费一节，毋以为念，学生会立即进行募捐，在后方源源接济，不使中断。嗣后，关于前方详情，仍盼诸位随时报告勿误！专此奉复，并祝

长途珍重！

×××谨复，1月7日晚上。

北大学生会于1月8日上午派代表赴固安，慰劳南下宣传同学，并将学生会存款二十五元全部提出，由慰劳代表携交南下宣传的北大同学。

北大学生会于1月11日上午10时，在二院礼堂召开留校同学大会。请由固安返校的慰劳代表报告南下扩大宣传同学的情况，会场气氛热烈，大家听了甚受鼓舞。

自1月8日起北大学生会组织募捐队，分途向教授、同学募捐。截至1月10日，已募得捐款达百元。

学生会决定组织慰劳队，赴新城县，一面将捐款交南下宣传同学，一面代表留校同学向南下宣传同学，面致慰劳之意。

南下扩大宣传时期，在学生会组织下，前方和后方爱国同学中间发扬着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优良革命传统。

(7)“三三一”游行后，北大学生会在困境中坚持工作。

“三三一”追悼郭清大会，抬棺游行及同学们遭受国民党军警滥捕滥打的情况，我将在另一回忆文章中详细追述。这里，我只谈一下“三三一”游行后，北大学生会遭受最严重迫害，在困难环境中坚持工作，营救被捕同学，慰问受伤同学，坚持斗争的概况。

4月1日下午，学生会派刘玉柱、葛佩琦去见蒋梦麟，要求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恢复学生会活动，保释被捕同学。蒋梦麟余怒未息，气冲冲地说：把棺材抬进北大，是侮辱我蒋梦麟；你们学生会不经我批准，就召集校外学生来北大开会，是超越职权；“成命断难收回，学生会不能恢复。”蒋并表示，对被捕学生，不能“再予庇护”。

但学生会并没有因蒋梦麟的态度冥顽，而放弃对被捕同学的营救和对被开除同学的支援。学生会和民

先队进行了三方面的工作：（一）发动被捕和被开除同学所在的班、系，接连不断地派代表向蒋梦麟请愿，要求他保释被捕同学和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二）利用各种关系，访问同情学生运动的社会知名人士，请他们对北平市军政当局，晓之以爱国大义，早日释放被捕学生（在这一点，学联做的工作较多）；（三）组织被捕同学的朋友、同乡以及同班同学，到陆军监狱探监，给被捕同学送衣物。不准接见也去，去的人数、次数越多，越能给反动当局增加精神压力，促其早作出释放被捕学生的决定。

采取上述方法，对营救被捕同学，起到一定的作用。从4月2日到4日，每天都有各班学生代表多人，多次去见蒋梦麟请愿。例如，4月3日上午11时，有三十四个班的学生代表六十六人及女同学代表六人，一同去见蒋梦麟请愿，一直谈到下午两点，还不放他回家。蒋梦麟为摆脱困境，最后说：“予因今日接见同学次数甚多，精神疲倦，俟改日再谈。”代表们才退出他的办公室。经过三天的说理斗争和“疲劳轰炸”，终于逼得蒋梦麟改变了他拒绝保释被捕同学的态度。他说：“保释被捕同学事，本人已再三声明，决不帮忙。兹姑念师生感情，尚可尽力援助。”这样，营救被捕同学的工作，就得到了开展。4月13日张毓珣同学被保释，4月28日陈玉玑同学被保释，5月9日何兆仪同学

被保释，5月13日谢云晖、张肇敏、叶纪霖、赵祥铸四位同学被保释。据谢云晖同志谈，他们四人是最后一批出狱的。在这里附带说一下，被捕同学之所以能相继得到释放，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北大当局的保释，是个手续问题。

## 二、北大女同学会的成立及工作概况

1936年4月26日上午9时，北大女同学会在红楼法学院交际室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女同学三十多人，大家公推万仲寅为大会主席、黄淑生为大会记录。文学院院长胡适、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化学系主任曾昭抡、教育系主任吴俊升等十余人，到会祝贺。主席报告开会意义后，首先请教授胡适等讲演，次由女同学自由演说。随后，大会讨论通过了女同学会章程和两项决议案：（一）以大会名义函请学校当局，迅速保释被捕同学；（二）改良五斋（女生宿舍）环境。接着进行选举，选出各股干事——总务股：万仲寅，文书股：刘世纶，事务股：唐尊准，交际股：胡祖征，游艺股：蔡恩隳，学术股：黄淑生，体育股：金石。最后还表演了闽语唐诗、讲笑话、清唱、赋琴等游艺节目，至下午二时合影、散会。

在北大学生会被学校当局强迫停止活动的情况

下，北大女同学会的成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该会可以自己的合法地位，向北大当局提出各种有利于北大同学的要求。

现将北大女同学会的工作概况，简述如下：

1936年5月1日上午，北大女同学会为援助被捕同学事，派代表六人，携带请求书，往谒校长蒋梦麟。因蒋校长已赴湖南，由秘书朱洪接见，代表们先后发言，请求学校当局，从速保释被捕同学。

北大女同学会曾数次派代表赴陆军监狱，探视“三一”被捕的北大同学。第一次是我陪着她们去的，她们携带了一些糕点等慰问品。到监狱门口，狱吏不准接见。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当时妇女界的一位进步人士，她也是去探监的。她告诉我们，在押的学生都带上了脚镣，脚脖子磨破了，并说你们最好给他们做些“镣垫”。回校后，女同学们很快做好了一些“镣垫”，送给陆军监狱被押的北大同学。

1936年11月28日，为支援绥远抗战，在女同学会的号召下，北大全体女同学五十四人，每人捐款五角，共计二十七元。她们并共同动手，赶制了绒裤一百条、毛绒手套一百副，交给赴绥远劳军代表团，慰劳前方抗日战士。

### 三、第二届北大学生会——北大学生救国会的成立及工作概况

1936年夏天，华北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5月6日，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其中规定：二十九军撤到河北省南部，日军进驻平津，彻底消灭抗日运动。接着，日本将“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该部实际上成了日本控制华北和进攻全中国的最高指挥机关。驻津日军秘密屠杀了被迫为他们修建兵营的大批中国工人，将尸体抛入海河，河面上经常出现浮尸。这一亡国灭种的惨案，无人追查，激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在日寇武装的庇护下，日本“商人”拒绝中国海关的检查，不报关，不纳税，将大批日货，私运到华北各地出卖。到1936年夏天，这种武装走私活动，更加猖狂，发展成了公开的强盗活动。这不仅大大地减少了中国的税收，而且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打击。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自1936年5月中旬以来，由水、旱两路大举向华北增兵。使驻华北的日军，由八千人增加到了两万人。到5月底为止，由日本本土和伪“满洲国”新运到天津的日本侵略军，



就有七千多人，配备有大炮、坦克等各种武器，耀武扬威地开进日本兵营。日寇的种种侵略行动，激怒了天津的爱国学生。

5月28日，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天津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表达了中国青年的抗日救亡决心。

北大爱国同学，为响应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纷纷要求前学生会执委会，要有所表示。学生会随即于5月31日（星期日）上午10时，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到会四百余人。讨论决定：（一）自星期一（6月1日）起，停课三天；（二）发表宣言，响应天津学生示威运动；（三）恢复学生会，即行组织，并呈报学校当局核准备案。

6月1日，北大的上课钟声照常敲响，教授照常到校，但学生则均未上课。

由于北大当局拒绝批准恢复学生会，北大前学生会随于6月1日上午，在三院，再次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决定：

（一）将前学生会改为北京大学学生救国会；（二）即日下午，由前学生会执委负责印制选票，分发给全体同学，选举救国会执行委员；（三）限2日上午9时开票，执行委员名额定为二十一人。

6月2日上午，北大前学生会执行委员，分组到各

斋收集选票，到中午 12 时，共收齐选票六百多张。下午 3 时选举结果揭晓，计选出北大学生救国会执行委员二十一人。这届当选执行委员的名单，至今尚未查到。根据 1984 年 6 月 3 日，在北大开汇编小组扩大会议时，到会同学们的共同回忆，当选这届救国会执行委员的同学有：朱仲龙、袁宝华、宋尔纯、陈忠经、刘玉柱、李欣、卢荻、谢云晖、葛佩琦、石蕴华、傅安华、姜世勋、陈大觉、谭菁华等。<sup>①</sup>

这届北大学生救国会，虽然始终没有得到北大当局的批准备案，但在绝对多数同学的拥护下和民先队的支援下，仍然做了很多工作。现将其工作概况，简述如下。

(1)参加了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

1936 年 6 月 3 日下午 1 时，在清华大学召开北平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北大学生救国会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四十七校代表七十三人。北大当选为学生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

---

<sup>①</sup> 这届学生会的全名称是“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这一名称有把北大学生会（原学生会）与“北大救国委员会”（前学生会被“停止活动”后，同学临时拟议要求成立的）两名称之统一起来的含义。其间经过，参看本书“附编”收录的《北大学生会奋斗史》一文的末页。

### (2)组织和发动“六一三”示威游行。

1936年6月13日，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反对武装走私，要求彻查海河浮尸，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地游行示威。

这次游行时，采取了灵活迂回前进的方式，不和军警正面冲突，和他们“打游击战”。运用“头调尾、尾调头”的战术，当游行队伍遇到军警拦截时，就来个向后转，以后卫部队带头，绕道前进；再遇到军警拦截时，再来个向后转，原来的先头部队，就又在前面了。如果队伍的两头都遭到军警的拦截，队伍就约定集合地点，化整为零，分散到马路两旁或钻小胡同，继续前进，到达约定地点集合。大旗一举就又结队游行。这样，经过七聚七散，军警无法拦截。上午11时，各路游行大军在鼓楼后广场会师，参加者三十多校，四千余人。在广场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武装保卫华北等决议。会后游行，分路回校。这是一次胜利的游行，也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 (3)要求学校当局收回解聘教授的成命。

尚仲衣、马叙伦、许德珩都是进步教授，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尚仲衣教授受到胡适之迫害，被关进宪兵队，多方营救，始得出狱，但又被北大当局解聘。马叙伦、许德珩则被学校以休假名义迫其离校。北大

学生救国会曾在6月17日全体同学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学校当局收回解聘和强迫休假教授成命,并动员教育系同学,去见胡适,要求收回解聘尚仲衣教授的成命。胡适回答说:“解聘尚仲衣教授,难以收回成命。”

(4)组织政治观点不同的同学,讨论抗敌联合阵线的问题。

北大学生救国会和民先队分队部为了加强与国民党同学的联合,召开过两次讨论会。

第一次是在新四斋召开的,参加的人有孙陶林、肖敏颂、刘导生、葛佩琦、杨雨民、王毓铨、杨西昆、李守权等。讨论时争论很多,没有具体结果。

第二次是在红楼后面的大操场上召开的,时间是1936年6月19日晚上,有朱仲龙、曹盼之(曹振之)、杨隆眷、卢荻、宋尔纯、葛佩琦、刘玉柱、王蕙兰、丁景鸿、谭菁华、李彬等二百多人参加。讨论时争辩激烈,无结果而散。

(5)组成暑期工作委员会并公布工作大纲。

北大学生救国会为利用暑假,开展救国工作,特组成暑期工作委员会,并于1936年7月1日公布了暑期工作大纲,其内容为:(一)体育:包括军训、早操及各项

球类运动。(二)座谈会:包括时事讨论会、社会科学讨论会、新哲学座谈会、文艺座谈会、语文研究会。(三)话剧团:表演激发爱国思想的话剧。(四)歌咏团:歌唱能激发抗日救国热情的歌曲。(五)民众识字宣传队:到城内及四郊,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并教儿童及文盲识字,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激发他们的爱国思想。

#### (6)号召北大同学参加鲁迅追悼会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点25分,鲁迅先生在上海寓所逝世。噩耗传到北大,同学们甚表哀痛!北京大学文艺研究会为哀悼鲁迅先生逝世,特于10月29日下午2时,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举行“鲁迅先生追悼大会”。到会者有北大师生及校外人士一千三百多人。会场中央高悬着鲁迅的画像,周围布满了花圈和挽联,显得肃穆悲哀!北大文艺研究会的挽联是:“为人类为真理苦斗一生,哀中国哀世界哀丧斯人”。3点50分大会开始,全体肃立,奏哀乐,向鲁迅遗像行三鞠躬礼,北大女同学会代表献花圈,静默三分钟。而后主席致悼词:把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讲述了鲁迅先生对青年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热忱。最后还说:“叹息哀伤不足以纪念鲁迅先生,我们要含着热泪,继承先生的精神,为自由而奋斗,直到鲁迅先生理想的境地。”

随后有马裕藻、缪金元、魏建功、徐祖正等人讲演。还有外宾华罗琛夫人讲演，她说：“鲁迅先生的一切，不但中国人应当尊敬应当效法，全世界的人都应当尊敬和效法。”最后由周作人以家属的身份讲话。

(7)组织北大学生绥远抗战后援会。

1936年11月16日，日本驱使大批匪伪军向绥远进攻，傅作义将军指挥绥远守土将士奋勇抵抗，绥远抗战爆发。

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为给绥远抗战将士以物质援助和精神鼓励，特发起募捐慰劳绥远抗战将士运动。北大学生救国会随即发动北大同学，开展募捐工作。并要求学校当局自11月16日起至18日止，停止取暖炉火三天，以所节省之煤火费，援助绥远抗战将士。北大教职员会为援助绥远抗战将士，讨论决定：全体教职员各捐薪一日，作为劳军之用。

11月17日，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发出通告，要求各校成立绥远抗战后援会之组织。北大学生救国会随即组织北大学生绥远抗战后援会，由各班推举代表二人，于11月17日晚7时，在二院宴会厅举行班代表大会，讨论援绥工作。

11月19日，北平学联执委会决议：扩大募捐，集中捐款，促成万件皮衣运动。北大学生绥远抗战后援

会为扩大校外募捐，商请学校当局同意，于11月20日下午停课半天，在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当即议决11月21日全校停课一天，到校外募捐。

北京大学全体师生于11月21日、22日，分队出发，到北平市各重要地点募捐。截止到11月23日，总计北大学生停火三日所省煤火费、节食一顿所省之饭费，以及校内外募捐，共得款数达千元。

11月25日，绥远抗战将士完全收复为日寇侵占了的百灵庙，取得绥远抗战的大捷。消息传来，全校同学极为兴奋，继续加紧援绥募捐活动。

11月28日，北京大学音乐会在二院礼堂，举行援绥募捐演奏会。小提琴爱好者周丰一等同学登台演奏。演奏会收入，加上北京大学教职员捐薪一日之款一千三百五十六元，共计两千余元，全部向协和医院购买药品。连同前已讲过的女同学缝制的一百条绒裤、一百副绒手套，通统交由教职员劳军代表曾昭抡，于11月1日上午9时，携此大批药品离平赴绥。随行者尚有化学系教授孙成谔及学生代表谢云晖、陈福旭等六人。

1936年12月4日，北平援绥募捐委员会接到傅作义将军来电，全文如下：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募捐委员会公鉴：来电敬

悉。此次绥东告警，举国关怀，乃荷勛勉有加，予以捐募援助。三军闻命，益壮声威。自当更为激策，奋勇杀敌，庶效忠党国，亦仰副我爱国同仁之所殷望耳。特先电谢，惟希荃察。傅作义敬叩。

#### 四、第三届北大学生会——北大学生自治会的成立及工作概况

一二九运动后成立的北大学生会，因“三三一”抬棺游行，被北大当局停止活动。1936年6月1日，经全体同学大会决定成立的北京大学学生救国会，也没得到学校当局的承认。在1936年秋季开学后，原学生会的执行委员和各系推出的代表，曾多次向北大当局提出组织学生会的问题，一直拖延到11月底，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樊际昌，才有条件地答应筹组学生会，条件是：必须按照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的“高等院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进行组织，否则，学校就不予立案，所以这届学生会完全是按“法定程序”组织的。

为筹备组织学生会，各班选出筹备委员二人，于1936年12月4日，在二院礼堂召开第一次筹备大会。讨论决定：（一）推定刘玉柱、葛佩琦、袁宝华、陈忠经、王德昭、何佶（吕荧）、周文光等七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学生自治会章程；（二）指定该起草委员七人，为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并成立学生自治会筹备处。



12月5日，学生自治会筹备处通告全体同学，请直接向起草委员会提示意见，以便集思广益，制成完善的学生自治会章程。俟呈准学校备案后，即可召开成立大会。

1936年12月11日上午8时，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备处，在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通过了“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章程”，正式宣告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还通过建设新北大运动十大纲领：  
(一)克服个人主义；(二)发扬团结精神；(三)肃清不良习惯；  
(四)启发青年朝气；(五)改良物质生活；(六)力求整洁严肃；  
(七)锻炼健强身体；(八)学习时代知识；(九)促成师生合作；  
(十)光大“五四”精神。

在北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辅导”下，按五人自由结合选举代表一人的办法，各班分别选出班代表，于12月11日晚7时，在二院第十五教室，举行北大学生自治会第一次班代表大会，出席各班代表共六十五人。首先进行选举，结果选出：学生班代表会主席陈忠经、副主席葛佩琦；执行委员：赵超、姜世勋(姜纪常)、刘玉柱、李奉璋、顾德麟、蒋峻<sup>①</sup>、杨登华、袁宝华、兰铁年、王德昭、向远宜(肖离)、董觉民、许德富、卢荻(陆平)、周文光、顾瑞芳(顾大椿)、李欣(胡昭衡)等十七人；候补执行委员：李恭贻、邓延安、晏奉恩、何佶(吕荧)、傅世昌等五人。

其次进行议案讨论，经大会决定：(一)各执行委员的职务，由执委会讨论决定；(二)组织新北大运动委员

会，内设执行委员七人，并指定学生会学术股长及康乐股干事二人为当然委员，此外再选委员四人及候补委员二人；(三)成立《北大旬刊》编辑委员会，由学生会编辑股负责筹划，再经代表大会通过；(四)加入北平市学生团体；(五)由学生会正副主席向学校当局交涉，要求开放男女宿舍门禁。

现将这届学生会的工作概况简述如下：

(1)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双一二”示威游行。

1936年11月25日，傅作义的部队收复了百灵庙，便继续前进，不久就击溃了蒙奸德王的部队，又收复了大庙。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渴望中国军队乘胜前进，扩大抗日战果。而蒋介石派到绥远来的部队，虽名为协助，但是不是对抗战军民含有监视之意，当时好些青年对此是深有忧虑的。青岛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不堪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举行抗日大罢工。12月3日，日本以保护日侨为借口，突然派大批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遍地布岗，戒备森严，包围国民党党部和报馆，搜查党部文件，逮捕党部委员和报社社长，企图造成中日国交上的新事件。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反抗日军的公然侵略，反而作了屈辱的处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镇压全国抗日救国运动，于1936年11月22日深夜，派武装宪警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

史良等七人，关进监狱。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对日寇侵略，屈辱投降；对救国运动，严厉镇压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为了支援绥远抗战，支持青岛工人抗日大罢工，争取爱国自由，要求释放救国领袖，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加的有大中学校三十余校。共分为三路：东城各校学生为第一路，由北京大学领队；西城各校学生为第二路，由东北大学领队；城外各校学生为第三路，由清华大学领队。为避免一出校门，就和军警打“遭遇战”，这次采取了各校学生分散出发，到约定地点集合的办法。

12月12日早晨，天还不亮，各校门口和交通要道都布满了军警，但直到太阳高升，他们也没有发现学生队伍的踪影。八点左右，那些马路边、小胡同蹦蹦跳跳的学生，突然聚成了游行示威大军，高呼口号，齐声歌唱，使得军警，愕然不知所措。而三路学生大军，便奔赴东皇城根汇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遇到宋哲元的座车，就把小汽车包围了，要求宋哲元出来接见学生。宋哲元迟疑不答。学生们就高呼：“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等口号。最后，宋哲元答应，下午在景山接见学生。

放走了宋哲元的小汽车，大队继续游行。中午十二点多钟，全部游行队伍在北大一院大操场集合，正在

召开大会，忽然接到内六区警察署（在现在的公安医院所在地）转来的通知，说下午宋哲元在景山接见学生并发表讲话。游行指挥部经过议议，决定整队前往。

下午一点多钟，学生队伍气势雄壮，步伐整齐，进入景山公园，共有学生约五、六千人。直到下午五点过后，北平市长秦德纯才来到会场。他代表宋哲元向学生作了简单的讲话，含含糊糊地表示愿意抗日。大会主席向秦德纯提出同学们的几项要求，秦一一答应。全体学生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冀察！”等口号，大会结束。这次大会的主席是北大同学吴承明。

当学生队伍高举旗帜，整队出景山大门时，站岗的士兵向学生敬礼。学生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学生队伍离开景山时，天色已黑。各队在分别返校途中，仍然高呼抗日口号，齐唱救亡歌曲，抒发胜利愉快的心情。

(2) 围绕西安事变，和国民党学生展开斗争。

“双一二”游行示威和“双一二”西安事变，是历史的巧合。我们在游行示威时，并不知道西安发生了扣捕蒋介石的事变。12月13日上午看到报纸，才知道蒋介石于12月12日黎明，在西安临潼华清池，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捕了。这个突然的消息，在北大学生中间，引起了两种极端不同的反映：大部分学生兴高采

烈，欢欣鼓舞；少数学生垂头丧气，如丧考妣。

12月16日晚7时，北大学生会在二院十五教室，召开班代表大会，讨论对时局发表宣言的问题。大会讨论决定：（一）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出劝告电；（二）对时局发表宣言，宣言内容应包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各党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等五项原则，并定于12月18日将宣言发出。

12月17日晚上，继续举行班代表大会，讨论已经草成的宣言。法律系二年级等四班代表不同意已经草成的宣言，要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进行讨论。他们的要求未获通过。第二天（12月18日）他们就张贴启事，攻击班代表大会系受少数人操纵。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也发出紧要启事，说明宣言系根据五项原则草成的，无任何人操纵，并说明为慎重起见，决定明日（19日）上午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宣言。

12月19日上午8时，北大学生会在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宣言内容问题。第一个提案：要求张学良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并希早日予以释放。大会一致通过。第二个提案：要求南京政府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接受张、杨八项主张。但是国民党学生不容大会按程序进行讨论表决，就鼓噪而起，提出：请求“中央政府”迅速出兵讨伐张、杨，就地正法。会场辩论极为激烈。由于国民党学生乱吵乱闹，三易大会主

席，会场秩序都无法维持。主席乃宣布停止讨论。至11时，大会无结果而散。

散会之后，学生会主席陈忠经、副主席葛佩琦为劝告同学消除成见，平心静气解决问题，于当天中午12时，发表了告同学书，现将要点节录于后：“诸位同学：前日班代表大会议决的对时局宣言的五项原则，有些同学认为有重新商酌的必要。因此，我们接受地质系一年级同学的建议，在困难的环境中，于今天上午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希望大家作郑重地考虑。但是，因为同学意见的分歧，没有能平心静气地讨论，以致使大会中途流会。敝人等责任所关，甚为遗憾！……有何意见，尽可建议学生会，不应为一时的意气，使一校之内四分五裂，削减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诚恳地希望诸位同学，消除一切成见，团结一致，共同负起我们当前的重大责任。”

12月19日晚7时，北大学生会在二院礼堂召开时事座谈会，有五百多人参加。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樊际昌到会“辅导”。主席陈忠经报告开会意义后，同学们相继发言。李俊明同学在发言中，历数从“九一八”到“青岛协定”，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主要事实，用以证明实行独裁统治，必将亡国灭种！最后由樊际昌致词。他说，刚才那位同学（指李俊明）的发言，实属高见。他接着说：蒋委员长被扣，全国失去了重

心。好像一位管家的老太婆，把米柜、面柜……的钥匙都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她一旦出了意外事故，全家都乱了。会后，卢荻说：像这样的座谈会再开几次，樊际昌也可以跟着我们到马路上去游行了。

全体同学大会流会后，虽然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当即发表了告同学书，诚恳地劝告诸位同学“消除一切成见，团结一致，共同负起我们当前的重大责任。”但少数国民党学生不但不接受劝告，反而企图破坏北大学生会。他们于19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诬蔑学生会为少数人所操纵，不能代表同学公意，决定组织“北大非常学生会”。

为揭露少数国民党学生的非法活动，北大学生自治会于12月20日发表告同学书。现将要点摘录于后：诸位同学，昨日全体同学大会散会后，“忽有裴笑衡、刘春生等数十人声言，本会为少数人所操纵，不能代表全体同学公意，倡议组织非法团体，企图对本会加以破坏，查本会为本校各班代表在学校当局指导下，经数月之筹备，始告成立。如此而谓少数人操纵，不能代表公意；彼数十人擅自组织之非法团体，始能代表公意耶？……最近班代表大会所决议对西安事变态度，乃提交全体大会加以审查，不幸一部分同学不守会场秩序，致未获圆满结果，殊属遗憾！而裴刘诸君曲解事实，进行非法组织，尤为痛心！……尚望我全体同学，

维护正义，并希督促本会，向前迈进，勿为彼等淆惑蒙蔽。”

12月21日上午，学生会代表刘玉柱、葛佩琦往见学校当局，要求对进行非法组织之学生，加以制止。课业长樊际昌接见。他说：非法组织，校方未予立案，他们所提请求，校方当然不予考虑。12月21日下午，北大学生会因同学之间对西安事变态度，颇难一致，决定对时局不表示任何态度。

反对学生会的一部分学生，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李彬等人主张退让，裴笑衡、刘春生等人主张干到底，他们为反对学生会，四出找人签名，但无一人签署。当时全校共有五十三个班，其中表示拥护学生会的有三十八个班。坚决反对学生会的少数学生，为扩大影响，曾发出通知，订于12月23日下午2时，在北大新四斋会客厅，招待新闻界，报告一切。但届时，只有两位新闻记者到场。

12月24日，北大同学王业和、王德昭、齐永魁、金宪、孙一中等十三人，对本校同学之间的意见纠纷，发表告同学书，进行调解，并提出四项折衷办法。学生会方面表示欢迎调解；反对学生会者，拒绝调解。

依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原则，经过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位同志的调解，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25日释放了蒋介石。消息传来，许多进



步学生迷惑不解，认为蒋介石是屠杀革命人民和进步青年的刽子手，既然把他捉起来，为什么又要放走他呢？参加民先队布置的学习，才认识到放了蒋介石，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12月25日晚上，北大的少数国民党学生集合在一院操场上，放了几十个鞭炮，庆祝他们的“领袖脱险”。但没有引起广大同学的理睬。12月26日上午，北平市社会局强令一小部分中小学生对庆祝蒋介石“脱险”，组织游行，并到天安门集合开会。北大的国民党学生约七、八十人，在一院操场集合，由李彬带队，准备出发游行。适值刘玉柱同志（学生会执委）从那里经过，李彬忙说：“老刘！老刘！快来参加游行。”刘玉柱说，“我还没有穿‘蓝大褂’呢（意思是说国民党学生都是些蓝衣社分子）！”他们跑到天安门去集会，在那里，一些国民党学生组成了所谓“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当时，报纸上称这个组织为“新学联”，进步学生称它为“伪学联”。

随着伪学联的成立，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的国民党学生，纷纷成立了伪学生会。北京大学的国民党学生，虽然也曾大肆活动，但始终未能组成伪学生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一）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北大的民主空气比较浓厚，同学们坚持真理的比较多；（二）北大民先队分队部的工作做得深入具

体，每一个民先队员的周围，都团结了一些群众，进步力量占绝大多数，所以在每届学生会的选举中，都能提出进步同学当候选人；（三）学生会在同国民党学生斗争时，总是从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希望通过斗争，能使他们向抗日救亡的立场转化。每届选举学生会执行委员时，进步同学总是有意识地选举几名国民党学生的头头为执行委员，这些做法得到一般群众同情；（四）北大学生会的一些负责同学，学习好，生活俭朴，作风民主，深得同学爱戴。国民党学生多数生活腐化，态度傲慢，脱离群众。

（3）反对北大当局无理停止学生自治会活动的斗争。

伪学联成立之后，反动当局更加紧了对各学校进步学生会的迫害。12月28日，北大当局嗾使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通过决议，停止北大学生自治会的活动。详情如下：28日下午3时，北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在二院会议室举行会议，讨论决定：（一）本校学生自治会近日所为，不能符合同学公意，该会应立即停止活动，听候改选。（二）定于来年3月1日至8日为本校学生自治会各班代表改选日期。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闻讯后，当晚即往见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樊际昌，请求学校重新考虑，勿停止学生自治会活动。樊当即答称：

待明日与蒋校长会商后，再行决定。

12月29日上午10时，学生会主席陈忠经、副主席葛佩琦，执行委员刘玉柱、董觉民等六人，往见校长蒋梦麟，请对停止学生会活动事，重加考虑。蒋亲自接见，并答称：本校学生会甫经成立，即不能领导同学意见一致，且有提议改组学生会者，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决定的此项处理办法，本人认为甚为公允，无须重加考虑，希即遵照结束，听候改选。

12月29日，樊际昌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声称：此次停止学生自治会活动，主要意义系为避免学生之间的意见纠纷，今日已正式公布停止学生会活动的决定。当然，自公布之日起，学生会就不能再有任何活动。如果再有活动，学校当予以制止。

1937年1月6日上午，北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派人携函向学生会索要钤记。学生会正副主席陈忠经、葛佩琦于当日下午，往见辅导委员会主席樊际昌，表示学生会负责人对校方命令无接受之权，须经全体同学大会讨论，才能作出决定。现正在征询全体同学意见，请校方暂缓数日，俟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后，再行决定处理办法。樊际昌答称：容缓数日，于公务上恐有不合，望学生会负责人，最好于一日内，将一切钤记交还校方，暂为保存。

1月8日上午，北大学生会拟召开全体同学大会，

讨论学生会是否遵校方命令，办理结束。但北大当局不准再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学生会执委会以校方如此无理干涉，会务无法进行，乃决定全体辞职，将学生会钤记，交还校方。

#### (4) 北大学生会“停止活动”后的活动。

在北大当局强迫下，北大学生会“停止活动”了！但又没有停止活动。原在学生会任职的各位同学，仍在按照自己的职责，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例如：（一）1937年2月14日，为联系群众，宣传抗日，北大学生会康乐股组织了一部分同学，与师范大学、平大法商学院等校的学生二百多人，到西郊清塔寺、大钟寺一带旅游，聚餐联欢，演救亡话剧，并访问了一些农民家庭。（二）1937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二周年。北平各校学生代表五百余人，到香山碧云寺，向孙中山先生衣冠冢举行公祭。北大代表陆平同志担任大会主席，并首先在会上致词。（三）1937年3月15日，在绥远大青山下烈士陵园，举行“绥远抗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国民党中央派中政会主席汪兆铭（汪精卫）主祭。山西主席阎锡山、绥远主席傅作义及各军各地代表共数万人出席大会。陆平同志等三人代表北平学联前往绥远，参加了追悼大会，并于16日参加了阅兵典礼。

## 五、第四届北大学生会——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再次成立及工作概况

这届学生会是在北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的“辅导”下，按步就班成立的。1937年2月24日，北大当局通知各班，迅速推举班代表候选人，以便组织学生自治会。在推选中，一些国民党学生大肆活动，不但用请吃饭、看电影、听戏等手段拉选票，而且用“冒名法”、“绑票法”、“恐吓法”抢选票。为广大正派同学所不齿。

3月8日，北大当局公布了学生会班代表候选人名额，全校各班共计选出陈忠经、朱仲龙、袁宝华、邓力群、刘玉柱等一百一十七人为班代表候选人。3月15日开始，各班选举正式代表。3月19日公布了班代表选举结果。全校各班共计选出宋尔廉、胡昭衡、唐尊准等一百人为正式代表。

3月25日下午7时，北大学生自治会在二院十五教室举行第一次班代表大会，出席各班代表九十余人。首先由北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樊际昌致词，而后即进行选举。选出代表大会正主席陈忠经、副主席朱仲龙。继而讨论对执行委员的选举办法，两派学生之间发生了激烈辩论。由于时间已晚，即行休会。

3月26日下午7时，北大学生自治会继续举行班代表大会，进行选举。结果选出：首席常委刘玉柱，执行委员王德昭、刘长兰、王永宽、李涛、何佶（吕荧）、何善周、谢云晖、吴磊伯、蒋承立、刘济勋、李欣（胡昭衡）、梁华辑（白文治）、余文豪、张昭训、王恩治、董觉民等共十七人；候补执行委员施普猷、丁景鸿、刘著章、李彬、田治经等五人。

选举执行委员的结果，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届学生会选举之前，为了保持北大学生会的统一组织，以便团结抗日，民先派的代表曾找国民党派的代表谈过，只要他们不搞分裂，愿意说服进步同学，选举国民党派的几个人担任执行委员。但选举结果，国民党派的候选人丁景鸿、刘著章、李彬未能当选执行委员，只被选为候补委员。为解决这个问题，民先派当选执行委员的李欣、董觉民、吴磊伯主动提出辞职。经大会照准；并由候补委员施普猷、丁景鸿、刘著章递补。但国民党派的重要人物李彬还是没有递补上执行委员。于是进步同学就在大会上提出选李彬为新北大建设委员会委员，以后又选他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样，北大学生会初步出现了团结抗日的局面。

大会还选出李彬、陈纯英、傅世昌、郭树人、赵超、李欣、李涛等十三人为新北大建设委员会委员；选出王德昭、蓝铁年、陈大觉、王启成、王敬之（王大刚）等二十

一人为《北大周刊》编辑委员会委员。

大会最后通过决议：（一）发表宣言，呼吁北平学运统一；（二）提议目下学联改组，组织北平统一、合法、民主学生团体。

4月5日北大学生会《周刊》编辑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各委员职务分配如下：

**主 席：**董文羲；

**总经理：**孙云畴；

**出版股：**程金科、喻亮；

**发行股：**杨锡钧、王蕙兰、王启兴；

**会计股：**刘著章；

**总编辑：**王德昭；**副总编辑：**陈大觉；

**时事类：**岳养德、杨隆誉；

**社会科学类：**黄启威、蓝铁年、王敬之；

**自然科学类：**孔令晟、鄧玉汝；

**文艺类：**李欣、汪洪文；

**校闻类：**于仅、姚估生；

**书报评价类：**傅安华。

4月6日，北大学生会新北大建设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各委员职务分配如下：

**主 席：**李彬；

**文书组：**李欣、丁景鸿；

**卫生组:**傅世昌、万仲寅、郭树人;

**交际组:**陈纯英、钱翠麟;

**体育组:**王文光、向远宜(肖离)、唐尊准;

**游艺组:**赵超、蓝铁年。

现将这届学生会的工作概况简述如下:

(1)发展“生活路线”,组织郊区春游。

为了团结广大群众,壮大抗日力量,民先队和学生会提出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如歌咏团、读书会、球队、剧团、旅游、露营等。当时把这种工作方式叫做“生活路线”。在北大同学中间先后组织起黎明歌咏团、世界语学会、新文字研究会、文艺研究会、国防化学研究会等许多群众组织。男女同学合组的一个话剧团,曾在长安大戏院演出话剧《干妈》,还很叫座。这届学生会成立后,正值春光明媚,百花盛开之时。于是就决定以组织同学春游,为第一项中心工作。并组织了香山、农事试验场、汤山、潭柘寺、石景山、颐和园等旅游团,欢迎同学自由报名参加。

1937年4月4日,北大学生会组织同学约二百人,参加了北平学联举办的香山旅游。上午10时,在香山慈幼园门前广场集合,举行游艺,崔嵬和张瑞芳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很受大家欢迎!中午大家聚餐,吃面包夹香肠,每人一份。下午分别游览碧云寺、卧佛寺及香山园等处。6时乘大汽车返校。



4月10日，北大学生会组织师生六百多人赴农事试验场春游。课业长樊际昌、理学院院长饶毓泰以及教授多人参加。为这次旅游，学生会作了充分准备，对各部人员作了职务分配，指挥：陈忠经、朱仲龙；交通：白文治、王永宽、王恩治、吕茨；庶务：蒋承立、刘济勋、张昭训、何善周；游艺：肖离、赵超、刘长兰、李涛、谢云晖。上午10时，在农事试验场鸣号集合，由学生会代表作了简单报告，即开始野餐。然后举行游艺，有音乐学会歌咏队的四部合唱，校啦啦队的表演，黎明歌咏团的集体歌咏，蒙古胡琴及提琴等项的演奏，均甚精彩。继之以清唱杂耍等，亦引人入胜。最后，由“临时凑剧团”演出话剧《平步登天》，博得热烈掌声。至下午3时许，尽兴而返。

4月11日，北大同学五十余人参加了北平学联举办的汤山旅游。上午10时，各校学生三千余人，到达汤山下的广场集合，表演游艺：有歌咏、杂耍、清唱，还有各校同学排演的话剧《审讯》，以揭露国民党非法审讯救国领袖沈钧儒等。游艺节目，持续了一整天，午后6时，乘大汽车返城。

4月12日，北大化学会的同学赴石景山旅游，并参观了石景山发电厂。

4月13日，北大同学一百多人，赴潭柘寺旅游。白天举行爬山、参观，晚上宿在庙内，举行游艺晚会。

这次旅游是北大学生会派执委蒋承立、白文治预先来筹备的，食宿均极舒适，同学们感到愉快。

这一周叫做“春假旅游周”。为了办好旅游，使同学们生活方便，心情舒畅，需要接洽旅游地点，租用往返车辆，准备午餐和茶水、编组旅行队伍、配备救护人员等等，事情很多。在这一周内，学生会执委日夜办公，倍加辛苦。

### (2) 北大学生会促成北平学联的改组。

北大学生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为统一北平学运，加强抗日力量，特向北平学联提议：改组学联，变更学联宗旨，以协助政府办理社会公益事业，并辅助学校当局共谋全体同学之福利。这一提案被学联执委会接受。

1937年4月18日，北平学联在清华大学生物馆大讲堂举行第三届第一次代表大会，有四十二校代表八十六人出席。大会落实了北大的提议：修改了学联章程，改选了学联执行委员，发出了统一北平学运的呼吁。

### (3) 纪念“五四”运动十八周年。

1937年4月25日上午，北平学联召开会议，决定：关于纪念“五四”运动的问题，由北大学生约请其他

学校的同学，参加北大的“五四”纪念会。4月26日，北大学生会召开临时执委会，商讨纪念五四运动的办法。执委会认为：是否扩大举行，待征询学校当局意见后，再行决定。4月27日，北大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樊际昌表示：北大之于“五四”是一件最光荣的事，人人皆知，不一定要在此日举行仪式。校方已经决定，不举行任何纪念仪式，只放假一天。这时，市学联已与新学联协议在北师大召开“五四”纪念会，所以5月4日这天，北大没有再举行纪念仪式。但北大学生会这天组织受军训的一、二年级同学五百多人，在一院大操场举行军训大检阅。学生会主席陈忠经报告在“五四”纪念日举行军训大检阅的意义后，即由北大军训总教官白雄远开始检阅，上午11时检阅结束。下午7时起，在检阅台上表演各种游艺节目及提灯会。

#### (4) 募捐救济川、陕、甘、豫灾民。

北大学生自治会以川、陕、甘、豫灾情严重，灾民无衣无食，急待救济。特于5月7日晚，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决定组织北大学生赈灾委员会，并于次日组成。5月9日，北大全体同学为赈灾节食一日，所得节食费共计一百多元。5月15日，趁北大开运动会之际，在操场上向来宾进行了赈灾募捐。5月16日（星期日）组织募捐队，向校内教职员及校外人士募了捐。

所得的各项捐款，汇总寄往灾区，救济灾民。

(5)组织北大同学参加五院校联合举行的夏令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法大学、平大法商学院、中国学院等五院校学生，为锻炼身体，学习军事知识，团结抗日，于1937年6月28日开始，在西山大觉寺联合举行夏令营。有男女同学数百人参加，实行军事编制：司令杨雨民（北大）、政治部主任宋尔纯（宋应，北大）、后勤部长高元贵（中国学院），第一大队长丁发善（丁秀，师大）、第二大队长孙兴诗（孙思白，北大）、第三大队长边疆。开营期间的学习内容：学术讨论、名人讲演、各种游艺、爬山比赛，还请老红军袁也烈同志讲了游击战，并举行了野外演习。7月7日，夏令营第一期结束，正准备继续办第二期，忽然听到日寇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同学们顿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整队回城，投入保卫北平的战斗！

(6)发动北大同学，支援二十九军保卫北平。

7月7日晚上，日军炮轰卢沟桥，守桥的二十九军予以英勇还击，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抗战爆发！

7月8日北大进步同学纷纷表示：誓作二十九军抗日的后盾。北大学生会按照学联的布置，组织了几

个慰劳队，分赴战地及城内医院慰劳伤员。例如：谢云晖所在慰劳队，曾到卢沟桥附近慰问了守桥的团长吉星文及守桥战士；我所在的慰劳队，曾在东直门里陆军医院慰劳伤员，又登上东直门及朝阳门的城楼，慰问了守城战士。7月10日，一部分北大同学和平大医学院的同学组成战地救护队，我和宋尔纯都参加了。还请了一位美国大夫在北大二院十五教室讲了一次战地救护常识。日本进攻南苑时，该队曾到永定门外救护伤兵。

7月13日，学联发起捐献一万条麻袋运动，以支援二十九军构筑街头堡垒。北大学生会组织了捐献麻袋小组，动员同学外出募捐麻袋。募到大批麻袋，堆积在红楼后面的操场上。在募捐麻袋的过程中，我发现商人对支持抗战也很热诚。我到朝阳门里一家粮店募捐麻袋时，我要十条，他们给了二十条；并且说：“不够，还可以拿。”

在整个保卫北平的过程中，那些平时奔走呼号，要求组织“非常学生会”的国民党学生头头，一个也不见了；曾夸口说，“天塌下来我们顶着”的蒋梦麟、胡适之，也早已逃之夭夭。

#### (7)组织北大同学撤退。

7月28日凌晨，日军用大炮、飞机进攻南苑的二

十九军兵营。炮声隆隆，浓烟四起，北平处在敌人的包围中！上午，北大同学组织的慰劳队，仍然登上城墙，把饼干、毛巾等送到守城战士的手中，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下午，北大和平大医学院合组的战地救护队，到永定门外救护伤兵。有的同学自己出钱买热包子给伤兵吃。

7月28日，北平城外炮声隆隆，城内传说二十九军要发起反攻。爱国学生摩拳擦掌，准备配合行动。不料守土有责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却于28日深夜赴保定，二十九军撤退，北平沦陷！

7月29日早晨，按照民先总队部和市学联的布置，北大民先分队部和学生会马上通知：家不在北平的同学，到西直门车站集合，准备向保定撤退。我和男女同学三十多人到达西直门车站时，那里只有几节空车皮，没有工作人员。我们只得扫兴而归。袁宝华等同志骑自行车向保定撤退，到达西郊黄村时，遭到日军袭击，便仓促折回。有一位同学把自行车也丢了。

#### (8)自力更生办伤兵医院。

宋哲元撤退之后，北平处于无政府状态。7月29日上午，我和宋尔纯（我俩是战地救护队员）骑自行车到永定门外、朝阳门外转了一圈，看到大批伤兵无人收容，有的躺在玉米地里，连水都喝不上。我俩便找刘江

陵等同学研究决定：以北大和平大医学院联合组织的战地救护队为基础，在北大三院开办伤兵医院。没有经费，没有设备，没有医药，一切都靠自力更生去解决。同学们把宿舍里的床铺搬到三院大礼堂，布置起一个简易病房。经人介绍，我到灯市口公理会（基督教会）找到一位王大夫，他帮忙解决了医药问题（据说是红十字会捐给的）。我们就请王大夫担任医务组长，我担任总务组长，执行院长职务。宋尔纯任担架队长，负责收容伤兵。女一中、贝满女中等校的同学负责护理工作。这样，伤兵医院就于7月29日下午宣告成立，并开始收容伤兵。北大同学刘江陵、朱仲龙、徐世纶、宋尔廉、汪洪文、白文治、孙思白、张有民等人，都积极参加了抢救伤兵的工作。共收容伤兵一百多人，绝大部分是二十九军的伤兵，一小部分是伪冀东保安大队长张庆馥（驻通县）于7月28日夜间接反正时，被日军追击打伤的伤兵。8月5日听说日军要进北平城，我们就把伤兵转送到安全的地方。不久，我们也告别了可爱的北平！

#### （9）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

8月7日，平津之间正式恢复通车。我和刘江陵、朱穆之以及其它学校的一些同学，坐火车离开北平，到达天津，住在“法租界”广东小学。北平学生相继到达天津的，越来越多。大家急于南下做抗战工作，但天津

到济南的火车仍然不通。于是我们便搭乘轮船，准备赴上海。船到塘沽，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抗战。船长（英国人）要把船开回天津，我们坚决反对。船上坐了五百多名北平学生，大家推选出刘江陵、何礼（何维登）、谢云晖、葛佩琦、袁汝镛等同学组成指挥部，与船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最后，船长被迫答应将船开到烟台。据说，当年邓颖超同志也是搭乘的这只船。

到烟台下船后，同学们松了一口气，总算摆脱了日寇的控制。同时，爱国同学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赶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

离开烟台，几经辗转到了济南。民先队领导同志在济南开了一个会，研究决定：一部分同学北上到太原，支援山西的抗战工作；另一部分同学南下到南京，继续开展救亡活动。随着抗日战场的扩大，“一二九”时代的爱国学生骨干，绝大部分都奔赴到抗日战争的前线！

## 一 点 感 想

1939年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对一二九运动曾给以很高的历史评价，把它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他指出：“‘一二九’是抗战动



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sup>①</sup>。的确,当年有不少青年学生,其中包括我自己,正是通过一二九运动,认识了党,靠拢了党,在党的领导下,投入抗日战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二九运动的实践造就出大批有文化的革命干部。他们不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起了骨干作用,而且有些同志已经成为今天四化建设中的领导骨干。

“一二九”时代,在白区北平的革命青年和爱国学生,所处的环境是艰难困苦的,但是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冒险犯难,坚持革命工作。今天青年学生所处的环境,与“一二九”时代相比,那是有天渊之别的。今天的环境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热切希望青年同学们,继承和发扬一二九运动的光荣革命传统,为振兴中华,高高腾飞!

1984年12月写于北京九六陋室

(本文作者葛佩琦1933年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

<sup>①</sup>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39年12月16日第三版。

## 回忆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大周刊》

胡 昭 衡

---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爆发。次日上午，早已酝酿恢复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织，经过学生会筹备会的彻夜努力，召开了经过三个学院、十三个系、各年级班选出的一百零六个班代表的第一次班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北大学生会。我作为哲学系一年级班代表，被选入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执委会共有四十名执委，下设文书、庶务、会计、交际、学术、宣传六股。我分在哪一股工作，记不清了；只是记得“一二九”到“一二一六”期间，我曾担负为十六日游行示威作准备的传单编印分发工作；“一二一六”以后，参加了《北大周刊》的编辑工作。

这时期,《北大周刊》是北大学生会学术股编辑出版的。据几位同学的回忆,学术股的负责人是刘玉柱同学,参加编辑校刊工作的有杨隆誉、王经川(魏伯)、陈大觉及傅安华等同学。

《北大周刊》第一期,编印了“一二一六”示威特刊,于12月30日出版,距16日游行示威活动仅两个星期。正如本刊《编后》所说:本期登载的,完全是关系“一二一六”的文字,照性质来分,有探讨、叙述、兴感三类;按顺序来分,有背景、意义、酝酿、记实、影响、杂感、考据和歌颂八层。编者原意本想在本期内再加一层“比较”的文章,——有两个题目,一个是“一二一六”与“五四”,另一个是“一二一六”与“一二八”;但是因为时间短促,未能在付印时编入。这一期卷首及封面共刊出二十八幅照片,既反映了游行示威学生队伍的出发和行进情况,又摄留下游行队伍先锋和警察抢夺水龙、学生遭警察殴打、逮捕和受伤的景象。从9日到16日,北平大中学生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两次涌上街头进行轰轰烈烈的示威活动,影响深远,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启导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培育了一代革命事业的骨干,促发了卢沟桥畔抗战爆发的枪声。这期间,学生会的一些同学们日以继夜地活动工作。《北大周刊》本期特刊,能在运动后两周内留下这么多的珍贵史料,今日看来,实在是异常可贵的。

关于周刊的任务，编者在发刊词中阐述了，是在风雨飘摇，祖国危急的局势中，反帝与救亡；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进展里跋涉和开拓。为此，编辑部决定将以十分之八九的篇幅，来发表有关民族兴亡的科学论著，与富有新颖意义的文学创作；并为“本月16日之伟大的学生运动”出了纪念特刊。《北大周刊》第二期，也是按照上述编辑方针，于两周内（1936年1月13日）出刊的；并发表了有关本校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报道：学生会学术股的《寄给南下扩大宣传的诸勇士》，平津扩大宣传第一团第一中队第三、四小队，北大同学与学生会执委的通讯三则。按学生会学术股的决定，周刊第三期将特辑《南下扩大宣传专刊》，并在二期作了《附告》。但这一专辑并未刊行，由于什么原因我已说不准确了。据《北大旬刊》创刊号上，刘玉柱同学以刘砥笔名所写的《北大旬刊社的缘起和组织》中讲，第三期、四期之所以不能继续刊印，是由于遇到几层困难：没有钱了；寒假期间撰写、编辑、校印人员分散走了；学术股忙不过来，周刊没有独立的组织专办；周刊太短促，利用业余时间编印，不易保证文字质量。实际上，原因可能更复杂些。“一二一六”以后，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深入了，队伍也起了分化，不能不是一种因素。这从《北大旬刊》的代发刊辞“我们的任务”，以及该刊发表的建光同学《读了陶希圣先生“北京大学学生大会的感想”以后》文

中所讲的情况,可供资证。

以后,由仍属北大学生会学术股的《北大旬刊社》编印的《北大旬刊》,出了四期,实为两册,第二、三、四期为合刊。创刊号是1936年2月21日出版;合刊延至4月10日出版。但不知又由于什么原因,这以后《北大旬刊》便停刊了;跟“三三一”追悼郭清抬棺游行后的形势变化有无关联,我说不清楚。从此,直到1937年5月4日,卢沟桥抗战爆发前两个月,才由学生会周刊委员会编辑部又编印发行了一期《北大周刊》,内有纪念五四特辑。(据袁宝华同学回忆,尚有一期,1936年“迎新特刊”,未查到原件。)从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北大周刊》来讲,这期《北大周刊》已是尾声了。现在回顾,我看可以这样估价:以“一二一六”示威特刊创始的前两期《北大周刊》,是报道宣传北京大学及北平学生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展开;接着刊行的四期《北大旬刊》,则是这一运动的继续述评与深入宣传,其中许多资料和一些论点,是很有些史料价值的。对此,我在这里不作研究分析,因为那是另一种性质的任务。

这里我依次序列举有关“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文章和重要资料篇目于下,供查考。

一、《北大周刊》第一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

张汝璞：“一二一六”学生示威运动之发生及其意义

刘砥(刘玉柱)：“一二一六”以前的酝酿

谢雁翔：“一二一六”记实

寓 尘：“一二一六”我在北大的队伍里

何以行：一个被捕者的自述

李大江：“一二一六”消息汇志

山 城：“一二一六”后一周间的面面观

至 欣：“一二一六”示威运动的检讨

梅 村：由示威所得到的结论

周：“一二一六”示威运动感言

济 民：我们只有一个敌人

陈大觉：读胡适之先生“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鼎 峙：读“宋哲元告学生书”后

陶希圣：在民族解放大旗之下团结

曾 睿：学生爱国运动以后应采取的动向

赵九成：我国历史上的学生运动

昭：寄琬

林 火：我歌颂“一二一六”这一天

胡 蛮：补白(五则)

北京大学学生会：告全国后方民众书

照片二十八幅及发刊词和编后

## 二、《北大周刊》第二期

北大学生会学术股：寄给南下扩大宣传的诸勇士

若谷：“爱国运动”与民族解放

陈剑光：总清算与大展开

周作人讲、李欣笔记：日本管窥

明：我们今后的路线

马威农：“北平警察”

南下扩大宣传团北大同学与学生会执委的通讯  
(三则)

来函照登(十二则)

转载(七则)

北大学生会学术股附告

## 三、《北大旬刊》创刊号

北大旬刊代发刊词：我们的任务

时事情报(内有关学运部分)

建光：读了陶希圣先生“北京大学学生大会的感想”以后

饶舌：南京睦邻政府“保护”学生爱国运动的几个部局

益非：下乡记(南下慰劳纪实)

大众通讯(内有关学运二则)

颖 灿:到农村去

杜 文:残冬之夜

刘砥(刘玉柱):北大旬刊社的缘起和组织

照片(南下扩大宣传及其他)二十四幅

#### 四、《北大旬刊》第二、三、四期合刊

擎 宇:中国的出路

少 旭:立即停止内战进行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

罗伯士:动荡中的中华民族

剑 云:“民族复兴”与“民族解放”

孟建光:中华民族解放运动

陈 英:平津学生运动果然到了末路吗

洁 勤:不要忘掉了我们的“爱国蒙难者”

晨 风:郭清死

艾 芜:代邮

转 载:十五则,内有“民族解放先锋队宣言”

照片六幅

#### 五、《北大周刊》第一卷第一期纪念五四特辑,共六篇

其中有:

谢云晖:我们需要一种新运动



吴承明：五四告今日青年

李欣：纪念亡友蒋君昌声

在以上文章中，有我以胡蛮笔名所写的杂文，即《补白（五则）》。其他两篇署我原名李欣的文章，因均与一二九运动有些关联，我把它保留在这里了。

1984年12月9日于北京

（本文作者胡昭衡，原名李欣。1935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1936年转入史学系。）

## 辛勤灌溉的园丁们

——北大民众夜校的工作收获

宋 尔 廉

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大学附设民众夜校”,大家习惯地简称它为“民校”或是“夜校”。这个学校历史很久,是蔡元培先生掌校时创办的,附设在教育系;目的是给同学们一个办学与教学的实习场所,也给学校附近的失学儿童一个求学的机会。它的学制完全按正规小学来设置,有四年初小,两年高小;课程、教材完全按当时正规学校的要求来办。

教员不限于教育系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义务授课,不取任何报酬,行政机构设总务,教务、训育三个主任。总务主任也叫校长。每年由办校的同学推选,经过教育系主任同意,就主持学校的行政工作。每月学

校给经费50元，由总务主任负责支配。开支范围，包括夜校两位工友的薪金，及一切教学用具，文印纸张。

学生大都是家境困难的失学儿童；有少数青年工人；也有一些是正规小学的学生，因家长慕北大“民校”之名，愿意叫孩子们晚上也来多学习一些。1935年，还从东北来了一些不愿当亡国奴，到北平求学的学生。

学校是在夜间开课，由北大在二院提供教室数间和一排小平房作教室，及办公室用。

学生入学手续很简便，报了名就可以分班上学，除了自备课本外，不再交纳任何费用。

北京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北大“民校”在进步同学的操办下，随着革命形势的起伏，同样也发挥着它一定的作用。

我这里追述的是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北大“民校”的一些活动。

我是1934年考入北大文学院哲学系的，当时的形势是处于革命的低潮，各种进步活动也极其隐蔽。我入学不久，在宋尔纯那里认识了阎顾行同志。他当时是教育系三年级的同学，在民校工作，可能是担任教务主任，动员我参加民校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可见当时党是很重视这块阵地的。

1934年没什么活动。当时民校的总务主任是曹鹏翔，教育系三年级的同学，教学方法是老一套，动不

动搞体罚。记得有一次，看见他拿教鞭打一个比较顽皮的学生胡子元。那孩子不过八、九岁，打他不哭，越不哭，越打；孩子非常坚强，绷着脸，闭着嘴，涨红着脸就是不哭。结果是“打”的没了力气，以失败告终，孩子的犟劲则传遍了全校。

当时的教员人数不过十来个人。多数是埋头读书、按部就班地教课。学生中有少数是附近一个印刷厂的工人，十八、九岁的小工人。他们一心一意的想弥补失学的损失，好学、好问，个别的小工人还很关心时事。一次我教语文，下课时他们给我提个问题，问什么是“寓禁于征”。这是阎锡山开放毒禁搜刮民财的办法，我没有看报，一下给问住了。

当时民校的两位工友，一位姓白，一位姓吴。都是老老实实，任劳任怨，早来晚走。负责打水，照顾教员上下课，还负责整理“民校”的清洁卫生工作。他们一直工作到七七事变。

1935年的情况有了变化。主要是进步的思想比较活跃的同学参加了民校工作。有陆平（当时名卢荻）、于眉（当时名于经海）、李鸿年（当时名李稷年）、汪洪文、辛毓庄、马伯龙（后名马融）、李松筠、王鸿钧、王纪元、邳玉汝（现在美国印第安州大学终身教授）等。这些都是民校的骨干教职员，一直坚持到七七事变。在这些同学中，政治斗争经验比较丰富、工作办法也多

的，是卢荻，很自然地他成为实际的领导。“一二九”后，他忙于学生运动。大概1936年下半年才不担任学校教课或行政工作，可是他一直关心学校工作，一直到七七事变。于眉也是活跃分子，他读书认真，爱好足球。政治斗争的经历也比一般同学多。辛毓庄是老成持重，嫉恶如仇，关心青年进步。李鸿年是一心一意想办好“民校”。我们这几个人自然的形成了一个左右民校活动的核心。当时华北形势已日益危急。由于进步同学们参加教学活动，民校的风气有了改变，开始冲破了一潭死水的沉寂状况。爱国主义的教育，关心时事的风气，代替了死读书，不问政治的局面。

“民校”有一个放学后集中训话的不成文的制度，由训育主任主持，或介绍些学校情况，或作什么要求，或是表扬、批评一些同学。我们利用这个时间集体唱一些在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歌，象《毕业歌》、《大路歌》、《渔光曲》、《十字街头歌》等。这样在校内占统治地位的歌声如《毛毛雨》、《桃花江》、《可怜的秋香》等就不得不让位了。

这些进步同学，爱民族，爱国家，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屈膝投降，卖国求荣，是不满的。其中除个别的是地下党员，还有一些是参加过党领导的一些活动，或暂时失掉联系的党团员。他们的政治觉悟虽有程度上的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他

们爱孩子，同情这些因家境困难而失学的孩子，也愿意把孩子们培养成真正的进步的后代。自从这部分同学参加“民校”工作后，师生关系，教学方法，教学内容，都有了显著的变化。

靠教鞭制服不了的小同学，一旦你同他们建立了情感，他们非常听话。当时的经验就是你不要处处以“长者”“师道尊严”的面貌出现，而是他们中的一员，下了课同他们一齐玩。领着他们玩。你越爱他们，他们越怕你，怕失去你对他的爱护与尊重。孩子们的情感是丰富的，自尊心也是很强的。一位同学在星期日，领着几个孩子在二院草地上玩，他躺在草地上看书。孩子们围着他做自己的游戏，就象一个兄长带着自己的弟妹一样。这情况被一个教授看见了，这位教授一次在课堂上说：你们把师生关系处理得这么自然，是你们教学上的成功（大意）。但是，也有少数靠惩罚维持秩序的人，对这种师生关系不理解，认为是“胡闹”。师生关系的改变，使得教室秩序井然了，孩子们打架的事少了，校内空气也活跃了。星期日孩子们找老师去玩，老师们也领着学生在北大操场上骑车、打球。学生敢于接近老师了。高年级的同学，尤其是印刷厂的小工人，同后来几个纺织厂的女工，也敢于就政治、时局方面的问题同老师进行争论了。因为老师们对象九一八事变、“满洲国”、“何梅协定”这些问题先已在这些高年级

同学间公开的讲解了。这方面讲解最多的是于眉、李鸿年。李鸿年还向同学们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康德。介绍左翼文学最多的是辛毓庄，他讲鲁迅，讲高尔基，所以学生们也对国家大事感兴趣了。

这一阶段，从抗日救亡运动来讲，还是个酝酿阶段。也不大为学校当局所注意。“民校”的总务主任虽然是保守的，但还不到同我们尖锐地对立的地步。

真正的变化，是一二九运动以后。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对小小民校也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而学生运动的进步力量与顽固力量的斗争，也反映到这块小小的阵地上。

1936年上半年，北大民先队已经团结了广大的爱国、要求抗日的同学，在北大学生运动中占了绝对的优势。真正甘心作国民党反动当局御用工具的还是极少数的。少数人中有的公开与爱国同学为敌，破坏学生运动，也有的善于伪装，不敢公然暴露他的面目。当时民校的总务主任窦同贵，表面同进步同学嘻嘻哈哈，而对一些抗日活动是多方阻挠的。教务主任名字记不清了，是一位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对学生运动保持一定距离的人。我担任的是训育主任。记得在1936年初，卢荻提出一个令人兴奋的口号，就是要民先占领民校。于眉、李鸿年、辛毓庄，我们都赞同这个想法。于是在卢荻发动下，大批民先队员同进步同学到民校参加教

学活动。李欣(胡昭衡)、王骥卿(王季青)、倪学慧、何兆仪、杨锡钧、万仲寅、周克刚、韩振庭、曹盼之(曹振之)、许宛乐(许东明)、许德富等,到民校工作的大约不下二十几位。(事隔近五十年,有些同学的名字想不起了。)民校整个面貌起了很大变化。“民校”活动成为北京大学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听说学校当局当时很想解散民校,由于民校是蔡元培当年掌校时办起来的,一直延续到现在,在社会上有一定信誉,他们又不敢采取这个断然措施。窦某可能是秉承了学校当局的意图,也可能是由于他个人的政治立场,对我们的活动多方给予限制。卢荻、于眉,我们共同商量在上学期结束时开一个校务会,研究下学期工作。我同窦某去商议时,他一反常态,坚持不同意召开这个会。在争论不下时,他控制不住自己了,大声喊“这是共产党要开的会!”“我就是不准开!”这时才暴露出他那“顽固派”的真面目。我当时也气了,说“不管你准不准,我们一定得开!”事后他感到作的太过分了,也太蠢了,托人向我说项。又亲自道歉,多方缓和。会还是开了。系主任吴俊升亲自出席了我们这个会。对于我们热心办民校表示了支持,赞扬。会上改选了民校的行政人员由我担任了总务主任,于眉是训育主任,李鸿年是教务主任。卢荻因为工作忙,不再担任具体职务。但北大党支部叫他还要参与民校工作,实际是通



过卢荻同志，体现了北大的党对民校的领导。李欣、辛毓庄虽以教课为主，不担任什么行政管理职务，实际也是共同领导了民校工作。

我所以要记述这次会议，是因为“民校”从此完全由“民先”来领导了。一切教学活动都是从抗日救亡出发，为胡适之所迫害的尚仲衣教授所提出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的设想，在整个教育界得不到实现，但在北大民校却得到了实践。

抗日救亡歌曲，如《救亡进行曲》、《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少年先锋队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九一八小调》等等，这些激励爱国热忱、提高民族觉悟的歌声，充满了校园，已成为民校学生生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于眉同志组织出壁报，高年级的同学郭风娟（现名郭力），是壁报的主编，牺牲星期日的休息，组织一些同学抄写、编排。壁报的内容改变了过去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文风，有些稿子是老师帮助修改。于眉还亲自画报头。每周一期，每次出版后，都吸引了不少小读者。小小壁报也成为思想教育阵地。

于眉同志还对高年级部分同学，多数是工人学生参加的，专门组织了一个研究时局、政治的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可能还在这个班里吸收一些进步青年参加了“民先”，我记不太准了。

我们还组织了全校师生春游，到颐和园去玩，给学生每人一份面包、香肠作午餐。这在过去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些大部分是家境贫困失学的孩子，很少有机会到远距城市的名胜地方来玩。一个个欢天喜地，象小鸟飞翔在大自然中一样，各处奔跑；又组织他们作各种游戏，此情此景，至今不忘。

我们没有要求他们参加游行示威，但每次游行示威的当天夜里，老师们纷纷被小同学们包围起来，喋喋不休地询问当天的情况。当他们知道参加游行的是他们平时一些最敬爱的老师时，他们很自然地受到了激励与影响。

课堂上不只是作为政治常识似的讲“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了，而是公开地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屈膝投降，卖国政策。

我们组织孩子们搞街头宣传，搞募捐，作慰问绥远抗日军队的捐款。在高年级同学带领下，孩子们都踊跃参加。打着捐款慰劳抗日将士的旗子，挎着口袋，在王府井一带繁华地区拦住行人，要求人家捐献的情景，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孩子们走出课堂，走向了街头。

七七事变前，在“民先”领导下，组织了各大学“民校”之间的联系活动。我们联系密切的是东北大学“民校”。当时东大“民校”的负责人是东大的同学韩永赞。我们共同商量一些活动的办法。其中一项是搞体育活

动。我带着“民校”组成的篮球队，出征东大“民校”。双方队员的组成，除有学生，也有我们这些老师。因为光靠学生组织不起来。孩子们双方都组成啦啦队，各自为自己的球队加油。我们队里有马伯龙、辛毓庄。老马是北大校队队员，老辛也是篮球能手，都是连连得分。我们大获全胜而归。

这时我们已酝酿着把全北平各大学的“民校”组织起来。由于“事变”到来，没有办成。

另一个当时没有办成的事，是我们想把北大“民校”象正规小学校一样，毕业时发正式的文凭。这得要当时北平市的教育局承认才行。当时想法是，孩子们上的虽是“夜校”，但学的都是正规小学的课本，成绩并不差于正规小学，为什么不能拿到文凭呢？奔跑了几次，教育局没有拒绝，好象还有些希望，就在这时，卢沟桥的炮声响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有的“民校”同学，离开了自己的父母投身敌后，参加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士，如郭凤娟(女)、杨学咏(女)等。其他同学因失去联系，虽然也没有进行调查，但我深信，经过“民校”的教育，保持民族正气，追求进步的，恐也不乏其人的。

1984年12月27日

(本文作者宋尔廉，1934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后转教育系。)

## 我们为什么要打入青帮？

宋 尔 廉

.....

1937年2月，在彭真同志领导下，“民先”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要内容的第二条是：要把救亡运动广泛地发展到各阶层去，特别是工农大众中去……要使各阶层群众的救亡运动适当配合起来。根据这次会议精神，民先队员开展了更广泛、更深入的群众工作。但就在工人中开展抗日宣传的时候，遇到了在基层统治工人的青帮势力的阻挠和破坏。

青帮这个组织在当时社会上名声是很坏的，原本是一个封建性的民间秘密团体。虽然有不少的基本群众受生活所迫，参加这个组织，但由于这个组织的落后性及盲目的破坏性，多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早在

1927年，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时，就曾利用这一组织作为破坏劳动人民团结和破坏革命的工具。抗战前期，这个组织盘据在沿海及内地各工厂、码头、娱乐场所，以至军警各界，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和帮凶。蒋介石本人就拜二十二辈的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为师，借以笼络这个黑社会组织为其所用。

民先总队部为了解决我们接近群众这一障碍，也为了准备将来打游击时解决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决定民先队员打入青帮，利用这个组织。

1937年5月间，初夏。一天卢荻（陆平同志）同学找我来谈，说中国大学一位教授叫邝翰清。南方人，本人在帮，摆香堂收徒弟，而且专门收大学生。说邝有他的想法：为了将来搞什么选举时，有人给他拉选票。卢荻还说，我们打入青帮就能够利用它做掩护，接近群众，做发动劳苦大众的工作。并问我愿不愿意干。我同意了。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由卢荻带领我们十几个北大同学，一齐去邝家。记得是在老北大三院那条街（现在叫北河沿大街），一个胡同里的一家民宅，小四合院。邝老头并不太老，大约五十岁左右，瘦高挑，穿个灰绸子长衫，在一间厢房接待了我们。这次还来了其他学校的一些学生。每人交他两元拜香堂的费用。邝同我们讲：“拜香堂要磕很多的头，因为你们都是大学生，只

跪在那里，哪一程序要磕多少头，我讲一下，你们记住就行了。不必真磕头。”说罢，就引我们到他正房对过的一间屋子里去拜香堂。香堂正面桌上摆着香炉、蜡烛，供着祖师爷的牌位，气势很神秘，也很严肃。邝立在桌旁，把大褂右边上襟解开，折在里面，把袖口挽起来，要同学们跪下，他站在那里，又像司仪，又像讲解员，解释每道程序，例如要给祖师爷行礼，给本门师、引进师、传道师行礼，等等。他是我们的本门师；引进师、传道师不在场。他只介绍了引进师和传道师的名字，要大家记住。每次行礼要磕多少头，只说个数目，要大家知道，记下。大概拜一次香堂要磕几十个头。在香堂行完礼后，大家又都回到他的厢房，他发给每人一本《海底》，这本《海底》记载着青帮内部若干个不同的支派的标志和一般通用在帮黑话。帮内不同的一支派各有自己的标志：是什么样的船，船上挂的什么色彩旗子，船上多少钉，多少板，等等，数目都不一样。对自己的这一派标志要记熟、记牢。黑话有《海底》上所记载的通用的，如祖师爷姓潘，当受到别人盘问时，问：老大贵姓？要答“在家姓潘，出家姓×——指本人姓”，等等；另外，还有《海底》上没有的，由本门师口授的黑话。这是为了更进一步保密，也是更重要的黑话。邝还给我们讲解了入帮辈数，一如宗族家谱排辈数那样是二十四个字，我只记得最后四个字是“大、通、悟、学”。邝

是“通”字辈，也就是二十二辈，我们是二十三辈，“悟”字辈。据邝讲，当时最高的辈数是“大”字辈。他还讲了一些到外地遇到困难时，怎样到茶馆、饭铺去找当地的帮组织，如何对答人家的盘问，弄清辈数，对大、小辈如何对待；在街上打架采用什么手势，如同右手袖口向内挽，举着四个指头，喊一声“姓潘的都上”，就会得到在帮的帮助；以及敬茶，敬烟，左三，右四的手势如何用等等。第一次讲了很多，大家都很好奇地听着，但对《海底》的标志，太罗嗦，很多同学都不耐心去记它。记得好的是辛毓庄同学。除了这次以外，他还邀请大家定期的去听讲。

他为了广召徒弟，增加收入，提出谁给他介绍十个人，他可以给他开山门。所谓开山门，就是可以自己设香堂收徒弟。开了山门磕头的方式不同，原来是左三右四手指垫在头下，开山门后磕头时，可以左右手分开扶地。并“传”给“六字真言”。如果你收徒弟时有人扰香堂，盘问你时，只用代替“六字真言”的手势比划三两下就行。同时他讲，会了“六字真言”，在外地遇到盘问时，很多暗语答不上来，只要把表示“六字真言”的手势一打，就被得到承认。

北大同学中，开了山门可以收徒的，只有辛毓庄和我两个人，这可能是经过卢荻他们研究，给我们安排的任务。为了保持北大青帮的独立性，不同社会上的青

帮混杂，组织上决定辛毓庄在北大可以摆香堂代师收徒。

我记得在北大打入青帮的，除以上提到的卢荻、辛毓庄，我个人外，还有宋尔纯(宋应)、于经海(于眉)、吴磊伯、李稷年(李鸿年)、李松筠等同学。据孙传文(孙陶林)的回忆，还有曹盼之(曹振之)、刘志诚(刘居英)等同学。总数不下四、五十人(由陆平组织的及老辛和我介绍的，已有三十多人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民先队员。

从5月份到七七事变，不过两个月左右，利用青帮这个组织还只是刚开始，同学们就已分赴各抗日前线，所以在深入工农兵方面还没有显示出它的作用，几十年来也很少被人提及。在十年动乱期间却成了被整的罪名。如李松筠，当时的民先队员，原河北师范学院教授，直到他于1980年因病去世时，学校当局对他参加青帮问题还没有正式做出结论。

抗战开始，从平津撤退时，据辛毓庄同志讲，他们从天津坐船到龙口，在船上、码头上，利用青帮规矩，得到工人们的援助、照顾，使大家顺利地到达济南。据曹盼之同志回忆，在济南流亡时，辛毓庄同志还摆过香堂，代师收徒，准备打游击时运用。

我在1944年整风时，还把青帮的规矩、手势及“六字真言”教给了一些做敌区工作的同志，但不久日本也



就投降了。

以上情节比较简短，一则刚开始活动就已七七事变，为时暂短。二则民先队员大部分赴各抗日前线，除个别地区外，在根据地建设及发展抗日武装方面，有正式的党的领导，用不着利用这个组织，因之在效果上看，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事虽简单，确可以看出当时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的一个侧面：在党的领导下，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条件，去接近工、农、兵广大群众，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也可通过这一侧面，看到当年青年知识分子不避艰险，为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作准备的那种爱国主义的精神与英勇的革命气魄。

1985年6月10日

(本文作者宋尔廉，1934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转入教育系。)

## “保卫华北”石刻

陆 平

---

一二九运动到明年就是五十周年纪念的日子了。于今，记起了九年前，我又一次来到京郊樱桃沟的情况。那是1975年我二次“解放”后的一天，我来到沟底，久久站在刻有“保卫华北”四字的山石旁。我凝神注视着当年我和赵德尊（现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刻下的这几个不大的字，动情地环视着石旁的亭台、流水、峰峦，乃至一草一木。三十九年前，北平民先队员（全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这里举办夏令营的情景，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1936年，在那盛暑7月，为迎接抗日战争形势的到来，为培养和输送一批抗日武装斗争干部，北平民先

队和北平学联，在樱桃沟举办了第一期夏令营。烈日当头的一天，清华、北大、燕京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师大附中、女一中等学校的民先队员（包括双重身份的共产党员），沙滩民先分队的部分青年和私立中学的一些学生，约二百余人，一路唱着抗日救亡歌曲，从北平城步行到樱桃沟，就在这山石东畔的山坡上扎下营帐，打起地铺；在元宝石下的水泉边支起柴锅，燃起炊火；在破旧的东山小亭里吊起马灯，围起雨布，设立了夏令营司令部。从此，山谷里不仅有涛涛的风声，涓涓的水流，还飘荡着《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的歌声。

樱桃沟里，听不到北平城内那种亡国论的叹息，更看不见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丑行。民先队员心中除了悲愤，就是雪耻，就是肩负起重任，拯救中华、保卫华北！这股青春焕发的力量，活跃在夏令营生活的各个角落。

这山石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就是当年夏令营活动的中心地区。日日黎明，我都要越过这块山石，攀上沟西耸立着的巨大的峭壁，吹响军号，唤醒营员，揭开夏令营紧张、团结、艰苦、活泼的新的这一天。民先队员从西山爬山训练归来，就在这里的水边洗漱、就餐。一日三餐虽是小米稀饭，窝窝头就素菜，可大家的抗日救国的情热却格外高涨。在这里，我们争相传看当时很难

找到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这山石是当时的“讲台”，我们不止一次地围坐在山石四周，听杨秀峰教授、黄松龄教授等站在这讲台上分析抗日斗争的政治局势，听白乙化（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平北军分区十团团团长，于1944年平北马营战斗中牺牲）等同志阐述军事战略战术。我们常常在这里热烈谈论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爱国志士仁人的抗日活动；还常常从这里编队出发，登上樱桃沟尽头的北山，分“敌”我双方，展开攻防战、伏击战、遭遇战、游击战的演练，漫山遍野传出一片“杀”声。有时，我们也在这里对某些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发生激烈的争执，争得面红耳赤还不甘休；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这里猛烈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那高低不平的开阔地带，也被充作娱乐场所，营员们在这里表演一些自编的小节目。夜幕降临以后，营员们时常在山石上端的山谷里搞紧急集合、急行军、抓“舌头”的训练。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充溢着整个樱桃沟。

一天午后，营员们在做短暂的午间休息，我看见清华大学的赵德尊同学在用凿子向那块已成为夏令营活动中心标志的山石凿去，苍劲有力的“保”字，带着白色的粉末，深深地嵌在石里。我忙接过他手中的工具，互相倒替着，把“保卫华北”这几个最能表达当时人民心

愿的口号，刻在石上。

历史很快地翻过抗战这一页，蒋家王朝被推翻，新中国诞生了。虽然，夏令营的民先队员曾经相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一定要再聚樱桃沟”，岁月却匆匆地进入到1966年，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劫难爆发了。在面壁而坐的时日里，往事一一浮上心头，樱桃沟的夏令营也回到了我的脑海里。郁闷中，我把樱桃沟的一段经历讲给了儿女们听。1974年，我的儿女、侄女和他们的朋友几次进沟，终于从青苔下，发现了这个历史遗迹。他们从近于干涸的山沟里捧来溪水，冲刷掉淤积的泥沙，又用白色的石块，把“保卫华北”几个字刻划得格外醒目。1975年，我重访樱桃沟，当我依石而坐，抚摸着这几个重见天日的字迹，真是感慨万端，心情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全国解放以后，我曾经来过樱桃沟。如今，意外地发现，这块山石竟躲过了日寇的铁蹄，国民党反动派的战刀，心中一阵惊喜。可在那动乱浩劫的年月，自然界的生物倒仿佛凭添了感情，弱小的青苔，用它们的身体，保护了这历史的痕迹。我倾心静听山谷里的潺潺流水，山林里的飒飒风声，仿佛又听到当年民先队员那豪迈的歌声，心中顿时升起一股遏制不住的愤慨之情……

而今，祖国形势分外好。当我再度站在樱桃沟的山石前，已经是古稀之年。当年英姿焕发的民先队员

们大致也已和我的年纪相仿。振兴中华这个更伟大的历史重任，正由现在的亿万青年勇敢地肩负起来。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一定能实现的，就让这樱桃沟，这山石，和青年人在一起，去迎接那更加灿烂美好的未来吧。

（原载《北京日报》1984年12月11日，收入本书，略有改动。）

（本文作者，陆平即卢荻，1934年入北京大学教育系。）



## 缅怀师友

### 回忆曾昭抡先生的几件事

姚 震 江

---

在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中，我们的系主任曾昭抡先生是深受同学们爱戴和敬佩的。我和当时化学系的顾德麟、陈福旭等几位同学一起回忆和追记起曾先生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的几件事。

一二九运动中北大同学曾多次集会，邀请一些有名望的爱国教授到会发表演讲，激发同学们的斗志。曾先生经常被邀请，而且是每请必到，每到必作出激动

人心的讲话。他和马叙伦、许德珩先生于1936年在纪念“五四”大会上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上的发言，使人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常把马叙伦先生和曾昭抡先生并称为“二伦”，表示我们对这两位师长的衷心敬爱。

曾昭抡先生在学生运动中明确地站在大多数进步同学一边。当时化学系有些同学怕影响学业，对游行后继续罢课问题曾有疑虑，去向曾先生请教。曾先生首先向他们指出这次运动是民心所向。对于坚持罢课，他说：“你们自己下决心好了。老师到校，你们不上课，谁也不能强迫你们。”1936年春，寒假后学校恢复上课。校方和某些教授主张对上学期课程要补行考试。理由是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后的那一学期，由于罢课没有举行期末考试，没有成绩存档。但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学生运动施加压力和进行惩罚。由于曾昭抡先生等进步教授的极力反对，这次考试终于作罢。

1936年间，为了备战的需要，曾昭抡先生亲自为化学系高年级学生开设国防化学课。内容包括化学战争与防化、毒气、烟幕弹和炸药的制造储备等。他除了讲授，还亲自领导同学认真地进行了实验，曾在北大操场举行过施放自制烟幕弹的公开演习。应北大学生会组织的国防化学研究会的邀请，他举办过“化学战争与防化”的公开讲座，演讲时展出了不同类型的防毒面



具。此外，还为北平广播电台举办“防化讲座”节目。化学系陈福旭、张力田等同学和笔者都由曾先生安排积极地参加了这项活动。这些活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传授防化知识的本身，更在于借此传播积极备战、救亡图存的思想，冲破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于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在某些人中间造成的苟且偷安思想和民族自卑感的束缚。

1936 年夏，曾昭抡先生和孙承谔先生等率领当时化四毕业班和化三部分同学东渡日本作毕业参观旅行。为时约三周。曾先生和同学一行到达神户、东京、京都、大阪等地，参观了造纸厂、啤酒厂、化学陶瓷厂、炼钢厂和东京帝大、京都帝大、大阪帝大和理化研究所等工厂、学校和研究单位，也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他们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欢迎，由留日同学引导到处看看，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看不到的情况。这次参观旅行事先在考虑应否进行时是有争议的。这次旅日是由日庚款部分资助和由日华协会接待的。日方意图无非是借此显示日本之富强，企图造就一批亲日派。但曾昭抡先生的意图则是由备战的观点出发，认为应该“知己知彼”，是可以去的。曾先生的见解也是此行中大多数师生共同的主导思想。我们去日本同学此行的实际感受是：看到了日本军阀在青年中推行的军国主义教育的情况，例如经常遇到大批中学生身穿制服，持

枪在街道上操练横行。又看到东京的瓷器、花布、肥皂等比在北平卖的同类日本货品要贵得多，说明了日本财阀施行廉价向中国倾销日货的经济侵略政策。我们还看到了类似贫民窟式的工人住宅区和农民的破旧木屋，这与东京闹市银座的繁华景象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还了解到日本大学生也和当时中国大学生一样，存在着毕业即失业的问题。例如为留学生刘某补习日语的一位女教师的丈夫，他虽是日本名牌大学东京帝大法律系毕业生，却在家待业，靠妻子挣钱养活自己。另外，我们了解到日本进步力量也有较大的发展。日本共产党（当时处于地下）经常在中国饭庄开会（因为有单间），讨论他们的活动。总之，我们感到日本军国主义虽然野心勃勃，貌似强大，但也有它虚弱的一面，从而坚定了我们抗日必胜的信念。临离日本前夕，一个日本记者要曾先生谈访日观感。曾先生回答的大意是：日本工业是比中国发达，但不是很好，不如美国。日记者一怒而去，对参观团的离去未作报导。而在此以前是多次报导过参观团的到来和行踪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段插曲。

赴日参观归来以后，曾先生写了长篇的《东行日记》，在天津大公报上连载发表。这是一篇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据唐敖庆同学讲他是看了这篇文章后才决定报考北大的。

1936年冬，傅作义将军领导的绥远省军民在百灵庙抗击日本侵略军取得了一次很大的胜利，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北大师生组织了北大赴绥远劳军团，由曾昭抡先生担任团长。化学系师生参加的有孙承谔先生和凌大琦、尹立荣、张力田、陈福旭等，以及经济系谢云晖等同学。行前由各班同学上街宣传、募捐，由北大音乐学会举办了一次音乐会，义演筹集到千余元，另由北大教职员捐献了一日薪金约一千三百余元，共筹集到慰劳款两千余元。代表团的绥远之行，据陈福旭同学回忆，旅途是很艰苦的。时值严冬，火车又不畅通，走走停停。记得曾在中途某小站停车。他们住在旅店里用羊粪取暖。曾先生穿得比较单薄，到室外跑步取暖，以免手脚冻僵。他们越过大青山到百灵庙前线劳军，还在归绥（今呼和浩特）作了防化知识讲课和传授简易防化口罩制作及防化药剂配制等技术，受到了傅作义将军的热情接待。归途中应十三军的邀请，曾先生又在集宁（今乌盟首府）教堂作了一次防化讲演。讲演后接受了十三军提出的剖析美国进口的防冻剂的任务，随后，在曾先生安排下，由凌大琦、陈福旭等于寒假中把这项任务圆满完成了。由上可以看出，曾昭抡先生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其专业范围内，全力以赴地进行了大量切实的工作。这种务实精神使同学们很受感动。

曾昭抡先生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积极支持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也促进了曾昭抡先生与广大群众相结合。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先生随校南迁，曾和同学们一起由长沙步行到昆明。在西南联大期间，曾先生始终和进步师生联系在一起，积极地参加了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他和费孝通、闻一多等先生一起参加了筹建民主同盟的工作。成了一位衷心拥护共产党领导，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战士。

曾昭抡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他那种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他那渊博的学识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他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使我们终生难忘！

（本文作者姚震江，1933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

## 追念尚仲衣教授

宋尔廉 刘 火

---

尚仲衣教授是一位爱国的进步学者，“一二九”时代执教于北大教育系。他不仅业务上是我们的导师，而且在救亡运动中，也是最热情关怀，给我们以启发和支持的前辈。今当“一二九”五十周年纪念来临之际，我们不能不怀念起我们敬爱的老师尚先生来。

我们听说尚先生是河南省罗山县人，1902年出生，早年留学美国，专攻小学教育。学成回国，从事教育工作。他是哪一年到北京大学任教，我们不清楚。我们考进北大教育系，就受到他的亲切教诲。他那时看上去，还很年轻。尚先生在教学上严肃认真，对青年

循循善诱。他为人正直，常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现实情况表示不满，尤其是对脱离抗日救亡需要的国民党的教育制度和课程设置，认为必须迅速改革。在课堂上，他不断地介绍当时苏联的新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并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苏联新教育的优越性。他本来已熟练地掌握英、德两种语言，为学习苏联，他利用业余时间，加紧学习俄语，从事翻译和写文章。在实际活动中，他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压制学生爱国活动的政策，主张把现行的教育制度，转为抗日救国的教育，并系统地提出了“非常时期教育方案”。

尚先生不断地利用各种机会向青年讲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青年的出路。他和著名外国记者斯诺夫妇是朋友。曾在“全聚德”宴请斯诺夫妇和几个外国进步记者。在宴请时，他把教育系的一些进步同学也约去作陪，借这机会把同学们介绍给外国进步朋友，以扩大对抗日救国的宣传。他也有专约请同学的时候；从“一二九”到七七事变前，他曾四次宴请教育系的进步同学，借此共同交换对抗日救国的意见。

尚先生积极主张抗日救国，支持学生运动，遭到当局之忌。1936年6月，反动当局把他逮捕了，并搜抄了他的家。国民党宪警把尚先生的著作、手稿、讲义文稿，包括他起草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底稿，全部抄走

了。北大学生救国会，教育系同学和外界友好闻讯，皆起而设法营救。在各方奔走呼吁下，反动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为时不久，终于把尚先生无罪释放出来。

尚先生出狱后，第一次走上我们课堂时，同学们是那样高兴！他依然穿着一件旧长衫，提着一个黄色的旧皮包，只是经过监狱的折磨，脸色显得有些苍白。但神采奕奕，丝毫没有气馁的样子。他走上讲台，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我的讲义全部被当局搜走了。出狱后，找了几个上层人物交涉，要求发还我，但一直没有拿回来。后来，又找了几个小人物活动一下，讲义给拿回来了。”他举着一本讲义挥着说：“我这个讲义，已经官方化验，无毒。”语言和感情显示了他的义愤和对反动当局的嘲笑。

记得尚先生在这次讲话中，分析华北形势，说：“你们这一班就别想搬到新楼（新四斋）里面去住了！”意思是说，华北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了。

“新楼”是专为每届临毕业的四年级同学建的宿舍楼，又叫新四斋，一人一间，设施比较舒适。我们是二年级班，要住到新楼，还得一年以后，尚先生这句话是对同学们发出的警报！曾几何时，不幸而言中，一年后，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尚先生给我们班上的几堂课，等于是最后一课。因为不久（1936年暑期前）北大学校当局又作出了解

聘尚仲衣等三教授的决定。同学们为此推选代表到校方要求收回成命。1936年6月17日晚，北大全体同学在新宿舍内院空场举行全体大会，议决六项，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学校挽留被解聘的尚仲衣、许德珩及勒令休假的教授马叙伦，而文学院院长胡适的答复是：“碍难从命”。

尚先生被无理解聘后，即赴广西大学任教，他夫人赴香港居住。尚先生离开北大时，有十几名进步的华北学生，追随尚先生去了南方。他在南方任教时，时常想念着北平和他一起斗争的学生。1937年春，他带着去南方的同学回到北平。他安排南方来的同学和北大同学座谈，交换学生运动的经验。其间，我们班同学在什刹海的一个饭庄宴请尚先生，为他洗尘。

尚先生这次北来期间，带领着我们到崇文门内盔甲厂13号斯诺家去拜访，看斯诺在陕北苏区拍的电影。

斯诺的陕北之行，在同学们中早有传闻。大家渴望了解苏区与红军的情况。一个夏天的夜晚，大约有六、七位同学，跟随尚先生到了斯诺家。斯诺宅院开阔，通过一道幽静的走廊，到达会客室。斯诺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可惜的是他拍的陕北的电影片子被人借走。斯诺怕我们失望，便拿出很多他在苏区拍的照片，让大家传看；看到了崇敬已久的毛主席、朱总司令，



看到了红军开大会、儿童团跳舞等一幅幅景象。斯诺高兴地谈到他进入苏区的经过及他在苏区的见闻，还逐句地教我们学唱了一支红军歌曲。斯诺夫人尼姆（即海伦·福斯特）看到他那高兴的样子就说，斯诺在苏区三个月，虽然吃的小米，住的小土屋子，可是他自己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生活得最愉快的三个月。斯诺当时还很年轻，也很活泼，对我们非常亲切，象老友聚会，大家无拘无束。交谈中，不记得怎么谈到同反动势力斗争的问题，他问我们敢不敢拿起枪来？卢荻（即陆平同志）说：“敢！”斯诺马上站起来说：“我给你拿枪去。”说着便往他的内室里跑。斯诺夫人急了，象管教淘气的孩子似地拦阻了他，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这次随尚先生到斯诺家去的有卢荻、汪洪文、于经海（于眉），其他几位记不清了。大家过了个非常愉快的夜晚，知道了苏区情况，看到了进步力量，也受到了这位国际友人的鼓舞。“抗日要靠共产党”这个思想，大家更明确而牢固了。

尚先生回广西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他在广西参加了抗日工作。1937年或1938年暑假，尚先生赴香港探望他的夫人，于返回桂林途中，不幸因车祸身亡。这个不幸的消息，隔了好久，传到敌后，凡是听到的北大同学，无论识不识，都十分悲痛！尚老师学问深厚，又当壮年，正是可以施展抱负的时候，灾难意外地夺去

了他的生命！当时，可以告慰先生的是他的学生，不少人都奔赴了抗日的前线，正同敌人进行着浴血的斗争；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先生的抗日教育愿望，也得到实施。而在今天，尚先生向往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国家已成为现实，而且正在向四化的前景迈进。尚先生地下有知，当会含笑吧。

尚仲衣教授——我们敬爱的导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本文作者宋尔廉、刘火（原名刘济勋），1934年入北大教育系）

## 怀念老战友姜世勋同志

刘 玉 柱

---

姜世勋同志，我的北大同学，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他有家破国亡之痛；加以他思想进步，所以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特别积极。正因为如此，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就被同学们选为班代表、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北平市学联的北大学生会代表。也正因如此，1936年2月，民族解放先锋队一成立，他就在北大参加了民先。此后不久，又在北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我们不是同班同学，但因我们俩人都是北大学生会执行委员，又同在西斋袁宝华同志为小队长的民先小队里过组织生活，天天在一起活动，所以成为亲

密的战友。工作学习之余，他爱找人聊天。每次学生会执委会议结束和民先小队组织生活会后，他总要约我和宝华等几个同学留下，说：“再聊五分钟。”实际上，一聊起来，就不止五分钟，而往往是聊到夜半以后。于是，熟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聊五分钟”。这种聊天，并非把时间白白浪费；那时大家对国家大事，学运中问题想得很多，通过交谈，求得一致，是一种愉快的思想交流。记得每逢运动的关键时刻，如“一二·一六”大示威后，坚持罢课支持南下扩大宣传，拒绝派代表赴南京聆训；“三三一”抬棺游行，遭到镇压打击后，学生会坚持继续活动；西安事变后，孤立搞分裂活动的少数国民党派学生等等，都是先在少数骨干分子中深入交换意见，然后再将主张或方案提到学生会执委会和代表大会上讨论。这种作法，曾经起了很好的酝酿准备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8月初，平津通车。姜世勋同志和我，还有北大莫家鼎同志，根据中共北方局和北平市委决定，通知我们，撤离北平。我们一同到天津，搭乘英国海口轮，漂洋过海，到青岛换乘火车，经济南到达南京，组成平津同学会，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从此，我们就都走出校门，作了职业革命者。

此后不久，世勋同志去武汉，改名姜纪常。在一二

九运动两周年纪念日，他和其他平津同学杨学诚（清华）、袁汝镛（师大附中）等在武汉召开的纪念会上，发起成立青年救国团。中共湖北省委决定由杨学诚和姜世勋同志担任“青救”总团部党团正副书记。在“青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袁汝镛被选为总团部总务委员（相当于主席），姜世勋同志被选为组织委员。总团部设在武昌三道街一幢二层楼院。在当时国共合作呈现高潮形势下，经过大家的努力，组织发展很快，迅速建立起武汉三镇的区团部和各大中学校、工厂的分团部，在武汉郊区的一部分农村也建立起分团部。

1937年底，我和刘增奎（后改名刘野亮，已故）、葛佩琦等同学约百人，在景德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六部办的青年战地报务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河南第一战区各县任民运指导员，经过汉口，停留了几天。姜世勋同志得知，立即找到我，要我留下到“青救”总团部工作。当天，他征求我的意见，想介绍我入党，因为除了过去在北大的共同战斗生活外，他还听到我自离开北平后这半年来的表现，这是先我而到武汉的何维登（现名何礼）同志对他讲述的。那些情况是：1937年10月初，南京国民党政府曾强迫解散了平津同学会，将王文彬、郑代巩、丁发善（现名丁秀）、葛佩琦、赵启海、蒋南生和我等十个委员逮捕入狱。我们在狱中盟誓，坚决斗争，终于获得无条件释放。他还听说：我和

葛佩琦等民先队员，在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先是顾瑞芳(大椿)，后为刘增奎〕领导下，团结多数进步同学，曾对国民党 CC 系政治教官与特务外围组织《战斗社》，进行斗争，取得胜利。经过这些考验，他认为我够了入党的条件了。他保持着在北大“聊五分钟”的习惯，和我畅谈了大半天。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当时武汉政治形势和“青救”活动与组织状况，还谈了我到青救工作后的吃住等生活问题。于是，我就很高兴地应邀留在武汉参加“青救”总团部工作，并荣幸地于 1938 年 1 月，由姜世勋和杨学诚两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8 年春天，“青救”组织发展到武穴以外的地区了。河南省南阳地区与江苏省徐州地区原有青年救国会和其他青年组织，申请加入武汉的“青救”，作团体会员。于是，“青救”总团部决定在 5、6 月份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将青救扩大为全国性青年救国团体。姜世勋同志叫我负责大会筹备工作。因为我和全体与会代表接触较多，到选举总团部委员时，我得选票也较多。这就产生了由谁担任总团部总务委员问题。姜世勋同志和我商议，他直率地对我说，他主张仍由袁汝镛担任总务委员，理由是袁在代表“青救”对外活动中已经颇有名声，并且擅长作这方面活动。他自己仍任组织部长，要我任副部长，协助他工作。我表示完全同意。他在当时作为“青救”党团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很善于对

人量才使用，如让智体洁任“青救”交际部长，王惠兰任妇女部长，李涛任文化娱乐部长等等，都是很适当的人选。

在“青救”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河南省南阳地区“青救”会代表韩兴华（北大同学，与我同班），要求“青救”总团部派人到他们那里视察。我自报奋勇要去，得到姜世勋同志支持和总团部的同意。7月份，用了一个月工夫，我到南阳、镇平、南召、方城、叶县等十三个县青年救国会走了一趟。看到袁宝华同学家乡南召县等青救会会员已经发展到农村青年中去了。青救会员已掌握了县、区、乡、村各级政权武装与学校等阵地。我感觉这些地区山多，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极为兴奋。回到武汉，我向姜世勋同志和“青救”总团部的其他同志汇报了所见所闻，他们也很高兴。

1938年8月，武汉国共合作形势开始逆转，国民党从所谓“溶共”政策，转到了“限共”。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青救”、“蚁社”、“民先”三大进步团体。王明把持的长江局采取形左实右的对策，在《新华日报》“抗议解散三团体的社论中，宣布三团体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并让三团体的负责人员都到陈诚的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政治部，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收回解散三团体的成命，就影响国共合作。”姜世勋同志和我们“青救”总团部其他负责人员，都认为这种作法太幼稚，我

们不愿去。姜世勋同志以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说服我们一起去。实践证明，这种愚蠢作法，无济于事，只是赤裸裸地暴露我们自己。

三团体被国民党政府解散后，长江局青委召开三团体负责人员参加的青运工作会议，姜世勋、杨学诚、袁汝镛和我都被通知参加了。会上发生了“民先骨干论”与“多种多样论”主张的争论。我们和多数与会者主张青年组织名称与形式应该多种多样。这样，易于机动变化地应付国民党的迫害。但是，长江局宣传部长凯丰代表王明和长江局作总结，仍主张“民先骨干论”，会议不欢而散。

为了安排“青救”解散后总团部干部们新的工作，姜世勋同志让我协助他组成华北剧团，北上河南农村工作。派李涛任剧团团长，柳林任党支部书记兼副团长。对其他干部的工作，世勋同志也都作了妥善安排。

9月，武汉周围战争形势吃紧。组织上征求我们意见，愿意转到哪里工作？我表示，不愿去重庆，不愿继续在大城市工作，愿意到河南省南阳地区青年救国会工作。我的志愿得到世勋同志同意、支持，由他帮助我报到湖北省委和长江局青委，很快得到批准。9月底，我就跟随长江局青委书记宋一萍同志，到了河南省委所在地。我们受到省委书记朱理治（当时名黄岗）、组织部长陈少敏大姐、军事部长兼办事处主任彭雪枫



和农民领袖王国华等同志们的热情欢迎。省委分配工作，没有让我去豫西南的南阳地区，而是让我到豫东的西华特委任特委委员，分管青年与宣传工作。那里接近抗日前线。我高兴地去了。1939年初，我又奉调过新黄河到鹿邑县，到彭雪枫同志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四师前身）政治部工作。此后，在整个抗日战争阶段，我就参加淮北豫皖苏鲁边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我青年时期走过的这段革命路程，都和姜世勋同志的指引密切相关，至今铭记于怀。在与世勋同志的共同活动中，我们相互支持，和谐无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姜世勋同志对党与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同志、同学们极端热诚。不论大事小事，只要是组织上和同志们委托在他身上的，他都是积极负责地去办，而且办理得很周到。

武汉失守前后，他和杨学诚同志，都照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转到湖北省农村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参加新四军第五师创建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姜世勋同志先后任中共湖北随（县）北地委书记，鄂豫边区党委委员兼政权部长，作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后，因患肺病，在根据地中心区汉川湖疗养。在1946年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期间病故。想不到我

与姜世勋同志 1938 年 9 月在武汉的生离,竟变成尔后  
不久的死别。痛哉!痛哉!

1986 年 7 月 7 日,写于合肥市安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本文作者刘玉柱,1934 年入北大物理系)

## 缅怀宋应同志

袁 宝 华

~~~~~

这是一篇本应当在十年前就写的文字。

十年之前，1975年11月24日，当时担任国家地质总局顾问、原地质部副部长兼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主任的宋应同志，因患心脏病不幸辞世。宋应同志是我在北大读书时期的高班同学。我们同在一个党支部，一二九运动中有过较多的接触；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也曾见过面；全国解放后因工作关系仍有不少交往。1962年，宋应同志曾受林枫同志委托，主持召开过一次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座谈会，参加者有十几个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文革”中，这次会议被诬为“黑会”，

罪名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张目”。现在，当宋应同志逝世十周年和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纪念日到来时，他的形象每每萦回在我的脑际。这里谨记下片断回忆，寄托对亡者的哀思，也算是对一二九运动的一个纪念。

宋应同志原名宋尔纯，河北枣强人，1916年4月5日生于天津。九一八事变以前，他是一个不问政治、只知用功读书的学生；民族危机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1932年春，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任支部书记；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36年初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加入共青团并转为中共党员。入党以后，他曾担任“民先”北大分队的分队长、北大学生会救国委员会执委和中共北大中心支部书记。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根据党的指示到了山西，担任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特派员、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和临县中心县委书记、临县地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过党的晋绥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党校副教育长、离石土改工作团团长和县委书记、晋南工委宣传部长。1948年随军南下，1949年底川西解放后，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长，不久调任成都市委第二书记。1952年初，根据李四光同志提名，中央调宋应同志到北京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地质部成立后任副部长、党组成员、党委委员，1954年全国矿产储量委

员会成立之后，他又同时兼任了储委主任。宋应同志曾任第三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5年任国家地质总局顾问。

一二九运动中的宋应，留给我的印象是机智、勇敢、沉着、稳健、顾全大局。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游行示威之后，12月16日又爆发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在“一二一六”的前夕，宋应同志曾几次和学生会及进步的同学研究如何组织北大游行队伍、划分游行线路、各队联系及应付不测事件等问题。“一二一六”那天，游行队伍两度遭到军警拦截，站在前排的宋应，英勇地参加了与军警的搏斗。当领队同学身负重伤住进医院，宋应立即主动站出来整理队伍，并到商店买来一块白布，写上“北京大学”四个大字，作为大旗，率领同学们继续前进，由前门大街奔赴天桥广场，参加了有三万多市民和学生参加的群众集会。1936年“三三一”抬棺游行之后，在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北方局指导下，宋应同志带领北大民先开展多种不同方式的活动，组织歌咏团、话剧团、读书会、营火晚会。他还每天亲自带领同学出操，使工作更深入了，团结同学也更广泛了。1936年5月酝酿选举北大学生会救国会成员时，由于宋应等人事先作了工作，当选的学生救国会二十一名执委，绝大多数都是参加民先的进步学生，他本人也当选为执委委员。1936年6月

初，为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声援天津学生，北平学联决定6月13日举行示威游行。“六一三”的前一天，宋应主持召开全体学生大会，用举手表决的办法通过罢课决议，因为一部分学生不赞成，决议很难通过。这时，他灵机一动，采取赞成者站左边，不赞成者站右边的办法，左边同学拚命鼓掌，把右边同学拉过来，罢课决议终于顺利通过。在和国民党派学生的斗争中，宋应既坚持原则又非常注意策略。1936年12月的学生会选举中，他一方面发动每个民先队员尽可能多做其他学生的工作，保证民先学生在学生会占绝对多数，同时也有意识地布置投几位国民党派学生候选人的票。他和这些国民党派的学生，在原则问题上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在生活上仍然有说有笑，保持同学之谊。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学和老师投入救亡运动，北大民先和学生会还发起新北大运动，内容包括民主管理学校、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开展学术和文体活动、男女宿舍开禁等。宋应曾在全校学生大会上作过开展新北大运动的动员报告，讲得有声有色。这一活动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连《大公报》也发表文章表示赞扬，在校内外都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七七事变后，一部分北大同学和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学生联合组成战地救护队，后来又以战地救护队为基础开办伤兵医院，以实际行动支持二十九军抗日。

宋应参加了救护队工作，自告奋勇地担任了担架队长，冒着酷暑，和同学们一起，把一百多名伤兵从永定门外抬进城内，后来又把他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宋应不仅是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学习成绩也非常出色，曾经获得过奖学金。他的毕业论文《地质学在军事上的应用》，受到各方面的一致好评，刊登于《北大周刊》之后，国内一些很有影响的杂志《东方》、《读书生活》和《大众生活》等均作了转载。大学毕业时，他曾经积极准备报考研究生，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需要，他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放弃了自己在技术业务方面的进取，全心全意地投身到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战斗行列。建国以后，刘少奇同志在谈到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时，曾对宋应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赞扬，肯定他走的是历史必由之路。并称道他是“一二九”运动中涌现的优秀青年代表。

建国以后，在担任地质部门主要领导工作和业务管理工作过程中，宋应同志保持和发扬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光荣传统，在党的领导下，为我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宋应同志作风深入，非常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对于我国拟上武钢和包钢等建设项目，苏联有关方面认为地质资料依据

不足，在莫斯科谈判的我国政府代表团一时无法决定，于是电召宋应同志前往。宋应同志曾带领地质专家赴白云鄂博等地做过细致的调查。在白云鄂博铁矿现场，他不仅全面检查了解了勘探进度情况，对各项采矿工程直至采样、碎样、分析、化验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过问，对矿床成因和勘探网控制程度作了详尽的检查和指导。来到苏联之后，宋应对有关建设项目的地质资料依据作了全面介绍和透辟入理的分析，终于使苏方改变了态度。毛泽东同志后来在听取汇报时，曾表扬宋应同志立了一功。1960年冬，地质部党组安排他去南方休息一个时期，借此机会他邀请了地质专家和有关同志一同前往，把休息变成了调查研究过程。每到一处，他就向省地质局和地质队作调查，还遍访了海南岛的许多个矿区，“休息”结束，他写给地质部党组的一份书面调查报告也完稿了。1962年春，广东新丰江水库诱发强烈地震，宋应不顾身体不好，马上带领一些地质专家，火速奔赴灾区，进行现场调查，同当地地震地质队的同志一起，详细研究了开展水库诱发地震的科研工作措施。1962年1月，宋应同志在《中国地质》月刊发表了《谈地质勘探工作中的若干客观规律和业务政策问题》的著名论文。在写文章之前，他曾找过许多司局领导干部和地质专家分别谈话，还召开过一系列小型座谈会，谈经验，也谈问题，谈他个人多年对地



质勘探工作的体察,也互相切磋,上升到理论高度。文章写出后不仅分送地质部党组成员审阅,还广泛征求业务部门意见,反复进行修改,最后才请《中国地质》编辑部研究发稿。由于集中了广大群众和领导部门的智慧和意见,反映了我国地质勘探工作的客观规律,该文发表后受到读者一致的好评,对我国地质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63年,他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又主持编写了《地质勘探工作若干问题》的小册子,进一步对建国以后我国地质工作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1964年,他还曾组织有关单位对地质部门技术干部的学习状况进行调查,尖锐地提出了当时政治学习时间占得太多、学习技术业务时间太少,有些地方技术干部甚至不敢看技术书籍等问题。

作为国家业务部门的一个主要领导干部,宋应同志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决不人云亦云,随风转向。党的“八大”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主要的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宋应同志在地质工作中坚决贯彻八大路线,强调要把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作为领导的中心,技术是调节各种矛盾的中心环节。他说:“地质工作中主要是经济与技术问题,技术起决定作用”,“地质为中心要成为全部(地质部)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谈到“大跃进”时期的

地质工作时，他说“不用‘大大’、‘很大’来形容大跃进的成绩，也不会减少大跃进的成绩”，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1962年5月，他在地质部的一次工程师座谈会上发言：科学工作中的具体业务问题，应当信任科学家，由他们自己动手去解决。1964年，当林彪大讲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人的革命化时，宋应却在视察地质队时对队干部说：革命精神要落实到业务工作上。有个地质队提出的“矿产储量报告革命化提纲”，说储量报告革命化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宋应立即指出：“不要把什么问题都提高到阶级斗争上去”。有个省地质局工作组发现一个矿区勘探中原始资料质量低，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宋应不同意这个提法，他认为资料质量低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破坏，不应当作阶级斗争来看待。1955年6月，他公开发表《从一篇文章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文，鲜明地提出：“理论是重要的，但是任何理论，对客观实际来说，都是用以说明实际情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与方法，绝不能盲目地把理论当作客观实际的最高裁判者。”他的这些作法，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多么地难能可贵啊！

宋应同志主张技术干部的职称和职务应当合理解决，让技术干部有职有权。他说：“按现在的办法，大学毕业后七、八年才能当工程师，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要工作到六十岁才能提为工程师，政治觉悟再高，也发挥

不了积极性。”在他的主持下，地质部门六十年代初拟定了技术干部的技术等级线，规定要按时晋职晋级，可惜由于十年动乱兴起，这个文件没能得到贯彻执行。宋应还非常注意发挥老专家的作用。解放初，有一位老专家曾在解放前担任过原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被一些人认为有问题，在宋应提议之下，这位专家担任了华北地质局总工程师。有一位著名矿床学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六十年代初宋应与中国地质科学院领导谈话，建议发挥这位专家的作用，由他主编《中国矿床学》；当建议被采纳后，宋应又和有关单位对计划作了具体安排。另一位地质学家，地质业务有较深的造诣，外文功底也相当好，因1957年错划右派失去了工作，宋应建议把他安排在地质科技情报所作翻译工作。有一位在部机关工作的党员知识分子，被错划右派后下放南方劳动，因身体不好要求调回北方，宋应与人事部门联系后安排到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工作。有位专家因为有“海外关系”，省里不同意安排，经协商后宋应把他安排到另一个省做适当工作。这几位专家1957年的错划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都得到了改正，所谓“海外关系”更加不是个问题，但在六十年代，宋应同志的作法，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的。

宋应同志在生活上对自己也非常严格，保持和发扬了我们党历来提倡的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好作风。

在战争年代，他因身体虚弱，曾昏倒在农村的厕所旁，医生说吃两只老母鸡就可解决问题，但他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决不来半点特殊。五十年代初，由供给制改薪金制，主管干部给他爱人定了较高的工资，宋应同志坚持不同意，最后终于改定为普通干部的工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有一次出差海南岛，基层同志出于对他的敬重和爱护，托秘书转送他一些当地生产的咖啡，由于盛情难却秘书就收下来了。回北京后，宋应同志把咖啡全部交了公。我曾有机会看到1963年5月他写的一份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自我检查，读后感人至深。他说：“身体有病不要紧，顶多是自己早一点到八宝山，而思想上有病，则会给党造成危害，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多年来，他正是以这样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1953年，他就曾因风湿性心脏病发作而休克过，1956年又动了二尖瓣狭窄的心脏手术，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到1966年，他的心脏已扩大了30%，由于受冲击，到1969年心脏已扩大了90%，1972年从干校回京时已扩大了100%，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党的事业，关心我国地质工作的发展。他曾详细地研究过1972年我国地质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1973年的计划安排。1974年，我国用自己设计制造的钻探船打成第一口海洋石油探井，他马上把资料调来阅读研究。1975年

春，他认真听取了地质出版单位关于编辑出版一套大型地质词典的汇报，提出了如何保证质量的具体意见。被任命为国家地质总局顾问以后，他立即给地质总局党组写信要求先看些资料，熟悉情况，逐步开展工作，并且抱病研究地质工作中普查和勘探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有认识问题也有体制方面原因的卓越见解。就在逝世前的几天，因为内脏出血，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我去医院看望他时，他勉强地坐到沙发上，又关切地询问起地质工作和全国计划会议的情况，对于全国计划会议因“四人帮”捣乱而开得非常困难表示忧心忡忡。他是一直工作、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宋应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令人高兴的是，他曾经积极参加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巨大历史功绩，已经得到公正的评价；“文革”中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已全部推倒；他生前在广大职工实践基础上和地质部党组支持下，所提出的以地质观察研究为基础，以地质为中心，地质勘探工作必须结合工农业生产建设需要，又要照顾地质条件的可能，使用各种勘探手段和技术方法，必须以最大限度地取得地质成果为目的，地质勘探工作必须严格遵守一定的工作程序，正确处理区调、普查和勘探的关系，合理地运用综合勘探方法以及充分发挥技术人员作用，行政干部学技术，对主要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进行轮训等一系

列政策原则,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地质工作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地质工作部门和全行业改革都正在顺利进行中。宋应同志过去的许多正确主张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有的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另外实践中还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积累了新的经验,全国地质战线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如果宋应同志知道这一切,他当含笑于九泉了。

(原载《中国地质报》1985年12月9日)

(本文作者袁宝华,1934年入北大数学系  
后转地质系)。

## 附 编

### “一二一六”以前的酝酿

刘 砥<sup>①</sup>

---

如果“一二一六”的平市学生示威运动，能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历程上有几分帮助的话，那么，我们不但要热烈地纪念着“一二一六”，还应别忘了“一二一六”之前的“一二九”以及“一二九”至“一二一六”的一周间，因为“一二九”的学生游行为我们“一二一六”的大运动

---

<sup>①</sup> 刘砥，即刘玉柱。

揭开了序幕，而“一二九”至“一二一六”的一周间，完成了大运动的事前酝酿，现在我把酝酿的经过，分成五项小的标题来作一简要清晰的叙述。

### (一)“一二九”游行请愿的影响

12月9日，平市参加游行、请愿运动的人数虽不过一千左右，发生的影响却是很大的！第一，它喊出一切知识青年所愿喊出的呼声。“反对领土的割裂！”“反对卖国的自治机构！”“反对不抵抗的屈辱外交！”这三个口号全都是对着全国，尤其是华北的局势演变发出的警钟巨响，12月9日参加游行请愿的青年同胞们，用一种清朗沉痛的声调喊出了。全市的学生和民众受到了这呼声的鼓荡，心弦上立刻起了高度的共振，于是，青年的热血沸腾了，于是，少壮的活力迸发了。第二，它揭发了无知军人和丧心政客的卑鄙与凶残，认贼作父，反把善良青年当作仇人看待。严寒的天气里，他们运用大批的水龙和大刀，无情地向着学生们冲击扑打，并且无理由地逮捕了许多学生加以殴打审问。凡是看到了听到了那天学生们受到的残酷待遇的，便可以很清晰地想象到华北政治舞台上这一群人物的真实面目，他们是卖国的，他们是害民的。在12月9日



以前,无疑的还有不少的人们,受了“天下太平”论的学者的催眠,整天在那儿作着喜峰口阵亡将士反魂的灵梦;然而12月9日的水声刀影,把这一场美梦给了结了。12月9日之后的数日,虽然又有引人入梦的大学校校长们告学生书的出现,但是无用了,失效了,不再能有蒙蔽青年人耳目的魔力了。许多人看完了那篇告学生书都不禁嗤笑道:“如果被捕学生释放,同无伤亡女生的保证是我们的目的,那么,9日以前不早已有了更大的成功了吗?”显然的,9日以后的总罢课,是由于9日得到的认识而发的。第三,它唤起了危城中全体青年的牺牲精神。9日游行请愿的学生们,虽然整日被刀砍水冲,却始终没有散乱和退缩。同时,燕京和清华的学生空着肚皮在西直门外站了九小时的工夫,直到城内学生游行请愿完毕之后,才各回校舍。这种大无畏而有毅力的气概,成了各校学生的心底标样。到了“一二一六”,大家在游行示威的队伍里,很自然地把蕴蓄吐出了:“我们要牺牲!”“我们要流血!”

“一二九”开了伟大运动的先河,“一二九”的游行请愿,揭开了“一二一六”大示威的序幕。

## (二)全市大中学生的组织

12月9日以前的多数学校的学生，还在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中。“一二九”的呼声，给这种坏现象敲起了催命钟；学界的历史，从那天起，便进入新鲜的有活力的阶段了。9日以前罢课的学校不过四、五，而此四、五学校的罢课情形，还不尽一致，有的这个学院罢课，那个学院上课，有的这部分同学罢课，那部分同学上课，可是“一二九”的次日便不同了，10日那一天罢课的学校增到三十以上（据学联合会统计），而且罢课在一个学校里都获得完全一致的履行。这种一致行动的表现，一方面表示罢课有着很大的意义，一方面显示着，大的团结马上到来了。果然，自10日起各学校的学生，原有学生会而不健全的，努力健全起来了；原来没有学生会的，也产生学生会了。而一时应付非常的组织，如救国会、救亡团，以及其它隶属于会团之下的小组织，如交通队、宣传队、纠察队等等也都应有尽有了。同时各组织中的服务人员，所表现的勤劳程度，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有晚起习惯的同学，也不再恋惜自己以往晨觉了；讲究卫生早睡的同学，也很自然忙到晚十一二点了。作者自觉并不是一位怎样勤勉的服务员，但

是从9日起到16日止，已经坐过三次“下一点”了。其他较我更热心更勤勉的人们呢？其他过度劳累损及健康的人们呢？他们的勤苦自然更为可观了。

除了多数学生热心服务于各学校单独团体组织之外，还有每日奔忙于学联的代表们。他们作的是披星戴月的工作，冒着寒风，冒着比寒风更厉害十百倍的军警干涉，去组织去联络，使着学联成为二十余校学生的联合策动机关，凡此种种，都可以表示出学生运动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了发动较五四更伟大的更新颖的运动的的力量，终于不出一周，划时代的“一二一六”大示威运动爆发了。

### (三)全国各地学界的鼓励

9日之后，各地学界的函电，雪片一般地飞来；有勉以把“五四”精神恢复起来的，有赞为有过于“五四”，盼望再接再厉的，有愿作后盾不达目的誓死不止的。虽然多数的函电，一时错认了北平的游行运动是地方的，但是给与身处北方的青年的鼓励，实在是多而且大的；接连着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地发生了同样的学生游行，我们在危城下的青年们更感到了不可遏抑的兴奋。兹录12、13、14三日各地有关电讯一般，以示各

地响应和鼓励北平学生的情况：

汉口 12 日电：三十余校在武昌开学生大会反对华北政局。

上海 12 日专电：上海各大学联合会通电响应平市教育界宣言，略谓华北地方当局巧立名目，吾人难甘缄默，誓照政府既定方策，力保主权，虽流血牺牲，在所不惜。

又讯：上海总工会通电反对自治响应平市学生游行示威，略谓北平各校学生不畏强暴，毅然集会，举行反对自治之请愿游行，足徵民心未死，民意未泯，感激曷极，以全国同胞一致兴起反对任何伪组织之存在云（上海《申报》）。

杭州 学生大游行——杭市气候严寒，午后降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万余人在朔风凛冽中举行反对华北自治援助北平学生示威大游行，秩序良好（《申报》12 日专电）。

苏州 14 日专电：东吴大学及附中全体教职员学生电大公报转平津各团体各机关各学校响应平津学界宣言，誓为后盾（《大公报》）。

广州 学生罢课大示威游行——（广州 12 日路透电）国立中山大学等校男女学生数千人，于今日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侵占华北，沿途散放传单，促起华南学生援助华北学生爱国运动，并召集大会决定罢课，催促中

央迅速决定反日方案，并请华南当局要求中央采纳反日方案，决议电慰华北学生，并劝其坚持到底（北平时事新闻社）。

太原 13日中央社电：并市中等以上各校学生组织救国联合会13日下午开筹备会，决议通电全国，14日继续开会。

天津 14日专电：天津专科以上各校教职员学生电宋哲元，请释放被捕学生（大公报）。

国内其他各地的学生尚且如此奋发，处在国防第一线，目击走狗汉奸劣迹的北平学生们，自然更难忍耐了。

#### （四）多数学生罢课后的愤闷

10日罢课之后，学生的精神已经紧张得达到高度。各学校门口上增添的军警，架设上的水龙，以及被捕同学的释放无期，使各个学生的血管里，流着愤恨的血液，让各个学生的胸腔里，呼吸着郁闷的空气。大多数的同学不耐等待学联领导下的总动员，“我们不能忍耐了，我们要单独的出发呀！”“一二一六”之前，到处有这样的呼声在传播着，甚至有的同学认为学生会不宣布单独出发的命令，是为了怯懦和无能。他愤愤地

贴出引人注目的条子，上面写着有力的大字：“我们罢课已经好几天了，学生会还不领导我们去作我们大家要作的工作——游行示威，学生会太怯懦了，学生会太无能了！”记得“一二一六”以前，北大的班代表大会里，曾为了单独出发问题，辩论了一点半钟的工夫，“一二一六”以前，青年们积蓄的愤闷太多了。

### (五)“一二一六”前夜的北大

15日的晚上，北大学生会才接到学联会宣布16日游行示威的命令，正赶那天晚上是班代表大会开会的时期，等到大会开完，时间已经11点半了。各执委在会后面面相觑了一番，彼此都有所会意：“我们不能就去睡！”

“对，我们明天游行要用的东西，还没有预备出来。”

“走，工作去，我们这一夜不给他睡啦！”

于是“一二一六”的前夜，北大的一个宿舍里，点了一夜长明灯，灯的下面，有一卷一卷的各色纸条，印出、捆起、捆起、印出。这样一直到了三点多钟，一个自告奋勇来参加工作的同学困倒了。

“密斯特张，你的身体不好，倒在椅子上睡一觉

吧！”

寂寂的夜，呼呼的风，冷冷的屋子里，滋生着热力、温情与光明，一位同学把大衣脱下来给另一位倒睡在椅子上的同学披上了。屋子里没有钟声的“滴答”，屋子外没有鸡鸣的“格格”，喳喳的抄写声，伴着“拍答”的印刷声响彻了“一二一六”的前夜，唤出“一二一六”的伟大的光明的清晨，于是，划时代的学生运动爆发了，在“一二一六”的伟大的光明的清晨。

——原载《北大周刊》第1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

1935年12月28日

## “一二一六”纪实

谢 雁 翔

---

事情并不是偶然，在“一二九”过去之后，谁都能料想到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最近几个月以来，学生们被苦闷的空气压迫得太厉害了。“一二九”的小波澜，只是这次学生运动的序幕。

学生会宣布罢课令以后，各个同学在极度镇静的态度上，表现着正在积极准备作第二次牺牲的工作。终于在“一二一六”的早晨，这一个牺牲的机会到了。

大约有九点钟的光景，我正在拿着一本小说看，耳朵上还挂着耳机听无线电，忽然李君从外面回来说：“现在大队已经出发了！”我于是急忙放下书本，去掉耳机，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三步两步跑下了三层楼，随



着大队，嘴里喊着口号，浩浩荡荡的往北进发。

到了中法大学的门口，我们高呼“欢迎中法大学参加！”一位河南同乡从里面跑了出来，扬起双手，用一种激昂的声调大呼道：“参加！参加！”我见了他就和他紧紧地握一下手，表示热烈欢迎。

经过两吉女中门口，她们的门关得紧紧的，温泉女中的门虽然开着，可是里面没有一个人，北平高中的学生，站在楼窗里向外看，一阵“欢迎参加”的呼声，把他们喊出了好些。零乱的步伐，激昂的口号，雄伟的气势，热烈的态度，连两旁站在门前观看的民众，也兴奋得跃跃欲试了。

过后门穿景山西大街时，前面的交通队报告说，同学被捕去三位。到了南长街，女一中又有一部分学生参加，声势于是更大了。到了南长街南口，前面发生了障碍，原来警察又用水龙头向我们队里扫射，同时又举起带钩的长棍和大刀，往领队的同学身上乱打起来，这时全队大喊着：“冲！冲！”震得两旁的屋瓦也起了应声。有几个勇敢的同学，冒着冷水和白刀把喷水龙头抢了过来，对准了警察喷去，把警察们喷得抱头鼠窜，第一队和第二队便乘机闯了过去。第三队被警察截落在后面，稍微停了一停之后，又冲上前去，警察们拿大刀来斫打，我们就拿石子向他们掷；终于全体冲过去了，虽然有许多同学受了伤。

顺着长安街往西走了不远，前队又被警察拦头打散，无情的大刀和木棍，一齐向赤手空拳的学生们身上打来，我稍微慢了一点，脊背上挨了一大棍。这时受伤的同学都返校了，我因为不知道路线，一时又找不到大队，只好从一个胡同里向南走，顺着绒线胡同往西摸。到了绒线胡同西口，刚巧遇着辅仁大学和交通大学的大队，于是我就跟着他们游行。

很好，一路并没有发生很大的阻碍，经过西交民巷，穿过前门。有许多初中学生，也都随着来了，这时我心中忽然受了一个很大的感动，不由得滴下几滴眼泪来。

到了天桥，我才找到北大的大队，这时清华、燕大、师大、平大以及各中学的大队，也都陆续的到了，民众集合的也有好几千人。按照学联的决议案，我们在天桥开了一个市民大会。闭会以后，民众都被大批警察赶散了，我们的大队就决定全体进城。

由清华大学领队，折转来向前门进发，到前门外，警察和保安队一齐拦住了去路，并且开枪向学生示威，这时街上的交通也断绝了，两边的商店，也都一齐关上了门，形势突然严重起来。后队都纷纷向路旁行人道上躲避，隔街的保安队都在那里装子弹，学生也有些在弯腰捡石子。几分钟的静寂以后，我们依然整队向前进。还好，保安队的装上子弹的枪，却并没有向我们扫

射；当然，我们所捡的石子，也没向他们掷。

前门的四个门关起了三个，只有西边的一个半掩着，一排一排的警士和保安队，都在那儿立候着屠杀我们，任凭代表们说破了唇舌，他们无论如何不让我们进城，而且又第二次鸣枪示威。为了避免冲突起见，我们就放弃了进城的计划，便和平汉车站前召开一个市民大会。

但实际上，市民很多被警察和保安队打跑了，在没办法之中，遂决定重回天桥开市民大会。

正在这个时候，从城里出来一队带手提机关枪的丘八，态度和野兽一样，内中有几个确确实实的是常在东安市场闲逛的某国水兵，但外面穿的衣服和保安队一样，而且既没有徽章，又没有符号。当我们每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们就咬一咬牙。这时我心中忽然发生了许多疑问：为什么当局让某国水兵穿了中国保安队的服装来干涉我们的游行呢？莫非当局已下了决心来屠杀我们，又怕中国的警察和保安队的手段不辣，而特别请了许多外国的刽子手来行刑吗？想到这里，仿佛觉得他们已经开枪向我们扫射了，眼前突的现出一幅残杀的景象来。这时，我的血沸腾起来，全身震荡起来，真想上前去扑杀了他们；但理智告诉我手中连一件简单的武器也没有，上前去不惟是白送死，而且连全体学生的安全也有很大的妨碍，只好忍下一

口气，静候着代表们的命令。

官方不允许我们重返天桥开市民大会，只好就在平汉站前面开一个全体学生大会。略去了仪式，开始讨论提案，几乎每一个提案都是全体通过。我们在会议之后又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打倒汉奸！”等口号，一时热烈的情况，连外国的记者也欢舞得跳了起来，跟着我们喊：“中华民国万岁”！

大会的决议案之一是游行宣传，但官方不许我们结合成团体，又要夺我们的旗子，几度交涉，依然是毫无结果，最后才允许我们分成两支：清华、燕大、东北大、平大和师大等往南去，剩下我们和中大被某国穿了中国保安队的服装的水兵阻止着，无论如何不准往南，所以，我们只好由前门进城了。

进了西交民巷，街道两边的观众比上午还拥挤，有些随着我们喊口号。有几个站在门前的小学生，要参加我们的游行队伍，但是他们的父母拉着不让去，大约是怕危险。

我们的目的是出宣武门和城外的游行队伍会合。可是，到了宣武门内的时候，城门已经紧紧地关上了。我们的代表去交涉开门，都被警察扣住不放。这时两旁聚集的民众大约有千余人，我们临时举出几个宣传员，一面向民众宣传，一面派代表向警察交涉，结果，允

许把我们的代表释出，条件是我们退走。为了要使我们的代表恢复自由，只好放弃了出宣武门的计划，允许在我们的代表释出之后，我们折返城内。

代表释放了，我们也折转了，但是，从后面开来了二百多警察，见了我们不论分说就打，刺刀、枪托、大刀，象雨点一般的往我们头上落下。这时，我跑上人行道站住，迎面来了一个混头混脑的警士，照准我的前额刺下，吓得我急急的一低头，才躲开这一刺刀，可是，站在我后面的一个学生（大约是中国大学的）的头皮，却替我把这一刀接受了。我急忙躲在路旁一家木器店里，我们的一个女同学却被挤倒在地下，我把那女同学刚扶起来，一个警察又从外面赶了进来，幸亏这个警察还有一点血性，一声“都是中国人”把他说的手软了，所以刺刀在我背上轻轻的敲了一下，就让我出去了。

出得门去，满街尽是警察，平均每两步都要挨一下打，有使刺刀背的，有使枪托的，有拿刺刀往身上刺的，有拿大刀往身上砍的，亏我眼明腿快，只拣轻的挨；虽然身上穿的衣服厚，可是，待逃出重围时，脊背却被打得发烧了。

跑进一个小巷，后面的警察没有追我，我偷偷的看看大队，已经被打得四零五落了。定一定神，喘一喘气，才发现肚子有些儿不好受，原来早晨没吃早点，已饿了一天了。摸了摸腰袋里，连一只铜板也没带，没办

法，只好跑到附近一个同学的寓所，吃几个包子，喝一碗开水，休息了一会，便懒洋洋的走回了学校。

这时，夜神已经把黑暗之幕垂下，冷冰冰的北风，徐徐的向我脸上吹来，西单大街和西安门大街，依然是安静如常，模糊的白塔和景山依然是在那儿蹲着不动，我，却仍然平平安安的回来了。

写完这篇文章，忽然想起了尚在病床上呻吟的受伤的，和尚在囹圄中囚禁着的被捕的同学和同胞来，不禁使得我发生无限的惭愧！他们牺牲了，我们今后应该怎么作呢？

——转自《北大周刊》第1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

## “一二一六”我在北大的队伍里

寓 尘

自从北平市的学生在侵略者的铁蹄下，被压迫得不能再忍受下去，为表现我们的力量，和唤起全国民众一致起来挽救我们这危在旦夕的民族和国家，而不得不举行示威运动的次日——12月10日——北京大学的同学为增强这次爱国运动的力量起见，便在全体大会中通过了一致罢课和举行示威的议案，同时，学生会及各个同学也开始紧张起来，担负起救国的工作。

罢课以后，北大的各斋院便成了军警严密监视的中心：每天总有几十个便衣侦探和骑车队警布置在景山东街和沙滩附近；一院图书馆的门前还安放着一辆消防车，消防警都秣马厉兵地预备着用水龙来冲散学

生。

但是，爱国的青年是不怕武力的，而救国的怒潮又岂惧区区的水龙！同学们都是怀着无限的热望，兴奋地期待着，期待着我们怒吼的时期的来临。

果然，全北平市的大中学生，终于在学联领导之下担起了这救亡图存的重担，而造成了近几年来绝无仅有的悲壮的“一二一六”示威运动，于我们的民族奋斗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时于人的进化路程中，也迸发出一片辉煌的火花。

那天，全市的学生，以学校所在地的区域，分成了四个大队，每一大队有一学校担任召集。北大是第三大队的召集者，负责召集中法大学、精业、女一中、中法附中、河北高中等校。同时，本校的男女同学又分为三个中队，以西斋五斋的同学为第一中队，东斋四斋的同学为第二中队，三院的同学为第三中队。当一切都已计划妥当的时候，我们的交通队及各组组长便于16日的清晨分别地通知了各个同学，同时为行动严密起见，纠察队也全体出动，把住大门，不许闲人出入。

这时，全体同学都已起床准备出发，每个人的面孔上都充满了愉快、兴奋和激昂的表情。因为西斋的同学属第一队，所以西斋的几百个人就于九点钟时，排好了队，大踏步的冲出大门。警察早已得到消息，在我们出发以前，开来了大批队警，把住了西斋门口，把枪口



举向我们，预备放射。我们的打旗的和队伍前面的三位同学便不幸地在这时被捕了去，“北大示威团”的校旗也被扯毁。西斋的几百个同学眼看着我们的三个同学被警察一路毒打地架走，真是气愤填胸，无以复加。

我们，一面准备着作第二次的冲锋，一面派代表向军警交涉，要求释放我们的同学，并质问他们阻挠我们的爱国运动的理由。恰巧，正当这时，我们的援军来到，因为东斋和四、五斋的同学，知道了我们被阻的消息后，都先后在军警严密的防守之下冲出来接应我们。警察至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安然地让我们整队出来。

我们六百多人汇合后，就四个人一排地互挽着臂，排好了大队经过景山东街，直向北河沿进行。停在一院后门的消防队虽想再用水龙来阻止我们，但已来不及，水枪已被我们的纠察队很敏捷地夺下，直扔到一院的墙角，等到警察把水枪拾回来时，我们的大队早已去远。

到了三院和精业中学时，他们几百个同学已经站好了队，各自在门前等候着我们，相见之下，我们双方都热烈地振臂欢呼，立刻一千多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便融合在一起，直奔东皇城根，再转后门大街。沿途经过中法、河北高中等校，去会合他们一路前进。从后门转到景山西大街时，参加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二千。我们沿途大散传单，高呼口号，人人都勇气十足，秩序也极

端地整齐。民众也万人空巷地出来观看，拥塞在街道的两旁，追随着我们前进，争着读我们的宣传品。他们个个都义形于色，表示出“同仇敌忾”的决心。连警察也很温和地对我们表示敬意，我们高呼着“欢迎爱国的军警参加！中国警察要拥护爱国运动！”的口号，我们遇到每一个派出所或每一个警察时，都送给他们传单，他们也总是立刻立正，和蔼地，微笑地鞠着躬，由此，足见出他们大部分的爱国心还未丧掉，不过，有时碍于长官的命令，遂不得不做出极端野蛮的举动来。

大队快到南长街南口时，我们得到了报告，知道在南长街口上有一架水龙，打算冲散我们，但我们却更加英勇起来，个个都摩拳擦掌地准备着去把它抢过来。当我们距离他们约有二三丈远时，消防队使用水龙向我们扫射过来，一排大刀队凶狠地手握大刀、木棒冲向我们。而我们这方，也立时有十几位同学，不顾大刀的危险，不管水龙的威力，奋勇地冲上前去，出乎军警意料之外地把水龙抢在手中，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向他们喷射过去，直射得一般军警抱头鼠窜。等到他们第二次反攻，抡着大刀、木棒殴打我们的同学时，另一个同学已经掏出小刀把水龙割开了几个裂口，减低了它的射击力。这时，我们有二百多人乘他们正在扭打时，冲过南长安街口，到了西长安街。

发觉那架水龙便是接在西长安街的一个水管子上

后，我们在西长安街的同学就冲到水管的旁边，打算把水龙给卸下来，但疯狂的军警竟向我们下了极大的毒手，他们用铁锹、铁锤一类足可致人于死的笨重的武器，伴着大刀、木棒向我们猛击，而我们赤手空拳的同学也不甘示弱，这次我们受伤的人虽是很多，但最后的胜利终属于我们！水龙是从水管上卸下来了，他们的武器是被夺过来了，消防车的玻璃也因这次冲突的结果而被砸碎。

于是，我们在南长街的同学，便迅速的集到西长安街。见到被破坏的水龙死蛇似地躺在地下，见到失败的警察，丧家犬似地狼奔豕突，见到我们勇敢的同学被水龙淋得水鸡似地，一滴一滴的鲜血从手部或头部洒到了他们将要冻冰的征袍，旁观的中外观众，都大为感动，对我们表示着无限的同情和赞叹，对军警表示着无限的愤慨和不满。

我们同学整好了队后，沿途高呼着口号，顺着西长安街向和平门进行，有很多的民众和学生都自动地让电车停住，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走到将近中南海时，在西长安街牌楼的附近，布满了大批的警察，跃跃欲试地准备向我们进攻。但我们一方面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一方面还抱着一种“凡是中国人，都应当同情于这种运动”的自信，我们以为警察即使蛮横，也或不致于不可理喻的。所以，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有秩序地

继续前进，但是，长官的命令竟战胜了爱国的呼声，而人类的嗜杀狂也克服了他们的同情心，警察们不等我们近前，竟以大刀，枪刺向我们直冲过来。有的以木棒或枪柄，向头部猛击，有的竟以大刀向头部挥舞，北大的一个同学的鼻子和嘴唇都被劈开；又有一个同学在颈部挨了一刀。年幼的同学和女同学们受重伤的不计其数，被捕和失踪的更无从统计。他们这样“除枪以外，无器不施”地（某外报记者当时情形语）一直打了十几分钟，直杀得西长安街上血肉模糊，伤者遍地。想不到所谓“文化的城市”中，竟发生了这种极端野蛮的残暴的惨剧，这真是人类之耻，社会之玷！

但青年的爱国热诚，是绝不会因此而稍挫的。我们很快地分头从司法部街、石碑胡同等处向西交民巷集合，重整军容，继续向前门出发。除重伤的外，轻伤的同学还继续参加。我们各校的旗帜大半在长安街上为警察扯毁，而我们的衣服也被撕扯得零落不堪。虽然我们的外表很不整齐，但我们的纪律却更加严肃，精神也更加英勇。

过大棚栏后，我们便遇见东北大、平大、师大、中大及弘达等几十个学校的大队。我们双方热烈地高呼欢迎，既悲且壮，想不到残酷的现在，竟还有这样伟大的友爱存在人间！当我们合队到天桥时，辅仁、清华、铁大、育英、汇文等一、二十个学校也都赶到。我们在天

桥开过市民大会后，便议决整队向外交大楼出发。这时，我们参加的人数已经有一万多人，秩序井然。路旁观者塞途，甚至感动得落下泪来。沿途我们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外交！”“反对华北自治！”“铲除汉奸！”等口号，真是“声震云霄，气壮山河”，不愧称“感天地，而泣鬼神”的一次富有绝大的历史意义的壮举！

大队走到前门牌楼时，残暴的军警竟向我们头上开起枪来。但爱国的热诚和镇定的精神克服了“伤亡的恐怖”，无论枪如何响，我们总屹然不动，终于在枪声刀影中，我们到了城下。这时，前门业已关闭，我们一万多人就停顿在平汉铁路前的空地上，召开了第二次市民大会，通过议案多起。同时，我们便派代表向军警交涉，要求开城。从一点直到四点，我们交涉得才有结果，军警答应允许我们分头从前门和宣武门等处进城。清华、东北大、燕大、平大等大部学校都被准许由西河沿转入宣武门进城，而我们学校则和中大、精业、河北高中、中华中学校由前门入城。我们入前门后便经西交民巷，入绒线胡同向宣武门出发，打算同东北大等校再行会合。这时我们已是一天“水米未进口”了，我们虽口干舌暗，腹饥体倦，但我们的精神却丝毫不减于初出发时。

我们到宣武门后，才发觉军警欺骗了我们坦白的

青年。宣武门在二十九军和警察的戒备之下，竟关闭起来，不允许我们城外的同学进城。这时城外大队的旗帜，已经从门隙中隐隐地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位勇敢的同学，为打算接引他们起见，悄悄地溜到军警的背后，去开城门。不幸，恰当他拔门栓时，他已经被军警发觉捕去了。后来听说他被送到派出所，受到中国的警察和日本的便衣人的毒打。

我们全体同学，便停在那里，一面高呼着：“释放我们的同学！反对非法逮捕！”一面更派代表向军警交涉，要求释放我们的同学和为城外的同学们速开城门，同时我们各校还组织了许多讲演队，对附近的市民讲演，听众们无不大受感动。军警虽屡次的向我们恐吓，但我们的勇气终于克制了一切，我们的队伍丝毫没被扰乱。

我们和军警相持了一点多钟后，我们被捕的同学终于被群众的力量给要出来。这时，忽然从背后又开到大批的大刀队，把我们已经换了五次的校旗又给夺去，把学生们团团围住，任意毒打。对女同学和年幼的同学们也丝毫不留情面：我曾见一个警察一棍把一位女同学打在地下，口里还骂着说：“妹子的！我叫你爱国！？”又有个警察向另一个女同学砍了一刀，骂着说：“妈的！你们娘儿们也出来惹事！”

他们这样的惨杀了几分钟后，学生破头烂额的不

计其数，殷殷的血痕到处可见，这一片凄惨的景况，真是言之酸鼻，闻之落泪，令人目不忍睹。

当时我忽然涌出一些感想：看他们今天这样杀气腾腾地，拿着喜峰口抗日的大刀，任意屠杀，再衬着那形似南天门的宣武门，岂非宛然是一幕喜峰口战争的重演？足征他们的勇气还不减当年！只可惜，景况虽是，而对象已非。谁想到二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国度里，同样的刀上竟会染上了两种不同的血！可叹！喜峰口尸骨未寒，北平市鲜血又流！不知何以对死难将士？不知何以对爱国青年？将士有灵，固难瞑目！刀而有知，能不慨然！

一幕惨剧演过后，各校的同学便有一部分人护送着几十个受伤的人返校或住院。同时，我们另一部分人就几个人一组地，组织了许多宣传队，到处宣传，直到夜晚，才陆续回校，吃我们这一天唯一的一顿饭。

1935, 12, 20.

——转自《北大周刊》第1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

# 我们只有一个敌人

济 民

---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的苦闷已到万分。到了今日已至不可再忍的时候，于是才有轰轰烈烈的慷慨激昂的“一二一六”示威运动的爆发——民众救国运动的开始。它的意义是极伟大的。

一般人对于这次运动的误解甚深。他们以为此运动只是对于这次破坏政权与支离领土的政治机构而发。我认为如果其目的在此，则诚如一般学者及舆论所说举行一次请愿或示威运动，表示一下，也就够了。实在用不着罢课……，因为罢课是罢自己的课，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当然是一个损失——个人的或国家的。但是我们示威运动以及继续罢课的意义，决不在此。



我们也知道“此时此地”的限制，但是，我们仍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们想扩大这个运动，以唤起全国民众的同情，引起全国民众的援助，因而扩大为民众救国运动，督促政府和联络各阶级团体一致对敌抗战。

我们对于政府一贯的不抵抗政策，万分怀疑。凌辱到这个地步，委曲到这步田地，为什么还不下决心？我以为这就是最后关头了。与敌谋和平，是与虎谋皮。试看在这种犹豫徘徊的政策下，引起多少矛盾现象的发生。譬如汉奸的产生，卖国贼的纷起，民众国家意识的消沉，这种种现象，以我看来，都是不抵抗政策下的矛盾。有人说现政府在他的阶级立场上，决不能抵抗的。但是，我觉得用我们民众力量，能促进民族战争之爆发，也只是一战，才能解除国内的矛盾。我以为在对抗外侮旗帜下，各阶级可以团结起来的。我以为在对抗外侮旗帜下，只有汉奸卖国贼是我们的敌人。我以为在对抗外侮旗帜下，民众能恢复自信力，愤然蹶起抵抗。行动中才能团结，团结必能致敌于危。我们也知道敌人武力的优越，但是我们知道，殖民地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不能等待二三年乃至十数年之无济于事的准备。我们与敌人战，不能采取正当旗鼓的战争，最好利用游击战略，随地抵抗。我们知道柔弱的东北的义勇军是使猛烈的皇军疲于奔命的。引敌深入，而以散兵奇袭之，胜败未可知，而况庞大的军费，惨重的死伤，

未尝不能引起敌人内部矛盾之爆发。

我们不忍这样的苟活下去，我们不忍使中国领土由华北而华中而华南，这样的慢性沦亡下去。我们不忍使民众意识再度消沉枯萎下去，乃至民众国家意识忘却，自私自利心发展，以至作汉奸卖国贼，或准备作顺民奴隶。但是这唤起民众的责任，与扩大救国运动的责任，由谁来负？我想我们学生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不能听信御用学者的麻醉，我们不能屈服于帮凶者的武力之下。亡国之后，他们有前途——作亡国大夫，我们必任敌人之宰割。

我们此时不来抗敌，还等待何时？华北已是最前线，我们能在最前线上去埋头读书吗？我们要作一个战士，不愿作一个读死书的书生。难道还等待敌人在华北交通网完成后，经济建设完备后，敌军武力充实后，再去抵抗？难道等待亡国后再去作光复的工作？驱逐满清之光复，是容易的。将来驱逐日本，再造民国，是不容易的。我们试看东北义勇军之遭惨杀，可以知之。当年罗马时代，各地奴隶暴动，亦如东北义勇军曾几次光荣的勇敢的战败敌军之事，但结果空劳一场而被镇压下去。西西里岛有两万人参加暴动，但被罗马政府惨杀净尽。其后有斯巴达卡斯为首领的暴动大叛乱，与敌相持数年，但到最后，不免悲惨的失败。罗马支配阶级曾把六千名俘虏在阿匹安大道旁各处以

磔刑，陈尸数哩不绝，残忍野蛮程度，难以描述。我们知道作打倒满清之孙中山易，而作抵抗武力优胜之罗马的斯巴达卡斯难。

眼光远大的中国青年！深沉勇敢的中国民众，赶快奋起扩大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中华民族独立战争！

——转自《北大周刊》第1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

## 读胡适之先生“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陈 大 觉

---

“一二一六”大示威的头一天，胡适之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一篇星期论文，对于“学生运动”，于批评指摘之外，还指示了好几项修身养性，守己安分的教条。

胡先生以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这，诚然是历史上常见的事实；可是，其所以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胡先生未曾在实际上说出理由来，只是说：“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依照胡

先生这番评论，青年学生们，几乎都是些缺乏理智，盲目冲动的暴徒了。要之，胡先生所描写的，是青年队伍当中，一部分革命志士的血性，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感情底本质。但在另一方面，谁也不能承认青年学生，完全没有理智。在学生时代的青年们，还没有直接受社会上恶势力的包围、染污和腐化。所以，他们的感觉是敏锐的，头脑是清晰的，内心是纯洁的，思想，往往比中年人和老年人进步；认识，也有时较中年人和老年人正确。这班前进的青年，处于政治腐败，外患日亟的环境当中，既不甘心拿“环境决定意识”这条宿命论者的信条来消沉自己；那末，就要想打破现状，本着自我的意识，去创造新的环境。平日有了这种抱负，一遇到某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件的到来，当然激起热烈的情绪，勇往直前，敢於冒险。他们的理智，已经不让他们有“瞻前顾后”的余地了！干涉政治的运动，其所以发生于青年的学生界，实际上，有其复杂的原因在；并非如胡先生所批评的，只是一时的、单纯的和盲目的感情冲动。

胡先生很可惜“这几年中国国难之下，青年学生的沉寂，只是一种变态，而不是常轨”，其所以沉寂的原因，胡先生已经全盘托出。目击近年来，在党、政、军三位一体的高压之下，“特务的密布，秘密告讦的盛行”，使得一班大有为的青年志士：有的系身牢狱，有的悲壮

就义，有的销声匿迹。这是铁一般的事实，青年们可以不担负一丝一毫的责任，实际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罪恶。以“二十五年来一贯的和平主义”自赏的胡先生，现在也公开的攻击政府“滥用权力去摧残一切能纠正或监督政府的势力”。至于“钳制独立舆论，压迫好动的青年的政策”，胡先生也都认为是国家大不幸的事。

胡先生对于“一二九”北平各学校第一次游行请愿的举动，表示赞许，而对于陆续罢课，则表示轻视与厌恶。其理由，无非指摘“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丝毫感动抗议的对象，并且决不得着绝大多数好学青年的同情。”这一来，胡先生未免一笔抹煞罢课的意义了！我们罢课的动机，谁也不是想去感动我们内外的敌人。我们之所以实行罢课，消极方面，是向我们内外的敌人，表示严重的抗议，和坚决的反对。积极方面，趁着罢课的机会，宣传目前事实的真相，揭破政府卖国的阴谋。对内唤起民众，群起抗争；对外声明真正民意，借以博得全世界主持正义者的同情和援助。“一二一六”平市各学校第二次大示威的壮举，已给内外的敌人，一个当头棒喝。铁一般的事实，已经充分阐明了罢课的意义。

胡先生最后向我们苦口婆心，发出四项忠告：

第一，忠告我们应该认清我们的目标。

第二，忠告我们应该认清我们的力量。

第三，忠告我们应该认清我们的方法。

第四，忠告我们应该认清我们的时代。

胡先生第一项忠告，教我们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并指示我们的喊声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现。请问胡先生：我们“贤明”的南京政府，在什么时候，曾经实际允许过我们言论自由？在现阶段全国民众，处于党政军的恶势力高压之下，是否容许有真正代表民意的舆论！即使政府诸人，翻然悔悟允许言论自由，胡先生能否切实担保一切措施，完全为重民意？自从“一二九”示威以来，这几天之内，全国各级学校，纷纷通电宣言，总可以算是真正代表民意的舆论吧！试问南京政府，曾否收回成命，中止冀察政务委员会之成立，以示“改过迁善”；以示“有所畏惧”。

胡先生第二项忠告，是教育我们“要有组织，要有纪律，要有法治的精神。”当然，这些是“学生运动”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完备了，青年们的团结，才能牢固，才有力量。有了力量，才足以共同负担改革社会的重大使命。至于“一切少数人的把持操纵，一切浅薄的煽动”，胡先生不必担忧，只要是对于社会稍有认识，决不轻易受人欺骗与愚弄！

胡先生第三项忠告，教我们“应该教育自己，训练自己，严格遵守规则，独立的评判是非”，反面就是说：

你们不应该干涉政治！不应该运动民族解放！不应该不守纪律！不应该颠倒是非！丢开书本，去成群结队，高呼“反对一切内战！”“反对一贯的卖国外交！”“反对华北名存实亡的傀儡组织！”“拿办汉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此等类的口号，在胡先生听起来，当然要骂我们是在干“欺骗群众，假公济私，破坏法律”的勾当。殊不知这些“勾当”，适足以表现整个学生集团独立自主的健全人格。经过这番磨练，将来出了校门，决不配做顺民！也不配做奴隶！

胡先生第四项忠告，教我们不要呐喊空虚无补的口号，“空虚无补”，又是胡先生的看法。胡先生已经指示给我们，说我们今日所遭的国难，是空前的大难，现在的处境已够困难了，来日的困难，还要千百倍于今日。然则现在我们所遭逢的时代，已经是十二分迫切的时代了！正因为“来日的困难，还要千百倍于今日”，所以一班前进的青年便急起直追，大声疾呼，使全国的劳动大众彻底觉悟过来，自动执行历史上的任务，发动全国总动员的民族革命斗争，以求达到民族独立，自由和生存的目的。这样看来，一切耸听口号、标语，不一定都是空虚无补，完全没有意义的。

时代既然是这般的紧迫，环境又正在惊人的演变，客观的事实，再不容许我们进实验室，坐图书馆！我们的知识与能力，应在大革命的潮流中，求得飞跃的进步。



和充分的发展。

1935,12,18。

——转自《北大周刊》第1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

# 北大学生会奋斗史

(1935年12月到1936年9月)

黎 明

---

北大学生会自从去年12月10日呱呱堕地以来，已有整整九个月的生命了。这个组织，纯然是时代的产儿，所以它的肩上，从开始便负了时代的使命。

现在将它在这伟大的时代浪潮当中所担当的任务及其自身成长的经过作一个真实的叙述。除了可以当做史料保留外，还可以供给本届新学生会一般的参考。

在叙述它正式执行历史的任务，从事于救亡工作之先，关于它的时代背景及其酝酿经过，不能不作最简单的说明。

自去年5、6月间河北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未几，有向我国政府八项新要求之提出，有由武官会议提示之十三项条件，有香河事变之发生，有华北自治之酝酿，时局日趋紧迫，到了朝不谋夕的最后关头了！睦邻的政府，际此大祸临头，束手无策，只知低首下心，步步退让。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这些年轻的阿斗，再不能忍耐了！唯有团结一致，对此严重局面，作强有力的表示！这在当时几成为整个青年同志们们的共同要求。

经过“五二九”事变，华北残民以逞的各级×部，均被日本强盗驱散。因此华北整个的青年界始得暂时恢复自由。迫于实际需要，纷纷进行组织。同时本校方面，亦有学生会之酝酿。只以意见分歧，两次均告失败。最后，由某班单独发起，卒得过半班数之赞助，遂由各赞助班自动选出临时代表，再由发起班召开各班临时紧急会议，会商结果，由每系选出筹备员一人，共十三人，组织筹备会，筹划一切。

“一二九”北平其他各学校，为反对伪自治，联合请愿。结果不得要领，旋即游行示威。一队经过本校一院，本校同学临时加入者凡三百余人。是夜，学生会筹备会全体筹备员彻夜工作，准备于次日上午8时召开第一次正式班代表大会（按代表选出，系以各班人数为比例，每十人以内得选代表一人，二十人以内，得选二

人)。次晨，出席会议之班代表，拥挤一堂，情绪非常高涨！当即通过罢课三天，发表罢课宣言。下午2时，在新宿舍场地露天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则花在争辩“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之选举法上。最后决定，以各系代表之人数为比例，每系代表凡在三人以内，得由该系代表团选出执委一人，六人以内得选出二人，余以例推。由各系选出之委员，组织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其最高权力机关，属于全体会员大会。次为班代表大会。执委会之下，分设文书、庶务、会计、交际、学术、宣传六股。必要时，得设特种委员会。选举结果，当选执委者共四十人。下午2时，全校同学在狂风怒号之际，会合四斋场地，群情激昂，俨临大变。主席团宣布开会后，随即决议：（一）以全体大会名义，宣布罢课，发表罢课宣言。（二）以全体大会名义，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变相自治之政治机构；并主张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扑灭日本帝国主义。（三）为加紧宣传，扩大宣传，由大会产生救亡宣传委员会。当即选出二十余人为宣传委员。当晚，执委会开第一次会议，分配各股工作，讨论一切进行事宜，当推定出席学联代表。会议未终，学校当局，即派人召集学生会全体负责人训话，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文学院院长胡适之两位先生，均作长篇演说，劝说与恫吓两者兼施。各执委答以事关全体

同学公意，执委会本身，不敢擅自放弃责任，违反全体，当局应唯全体同学是问。至 11 时，未得结果而散。按是日下午，当局已发出布告云：“……如有破坏校规，煽动罢课者，一律开除学籍……”。执委会受了全体同学之重托，职责所在，一切在所不顾，只是讨论如何宣传，如何组织，如何扩大整个学生运动。此时有一不幸事件发生，即宣委会与执委会之间的纠纷。宣委会力持由全体大会产生，直隶于全体大会；执委会由班代表大会产生，与宣委会各不相属。执委会则以为全体大会选出之宣传委员，正所以加强执委会宣传股之宣传工作，应为一临时之特种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执委会。二者各是其是，互相对立。

12 月 16 日，为变相自治之“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成立的一天。15 日晚上，学联合会通告各校学生会于次日清晨，发动全体游行示威，本校为第三队领导队。执委会接到通知，即彻夜准备，组织临时纠察队、交通队、宣传队。翌晨，始通告全校同学，分别在各斋集合，由交通队分发宣传品，整队出发，声势浩大。不料西斋同学始出校门，即有武装警察以带刺刀之枪堵截，执旗等三位同学，即被捕去。当时因大队尚未出校，以致援救不及。旋，大队由景山东街奔赴第三院，途中遇有警察多人，以二架水龙放水喷击先头部队。大队中纠察队，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卒将警察手中水龙夺下。于

是，大队遂得冲过。到第三院门前重行整理，并加入三院同学，然后进发。跨北大河经皇城根、地安门、景山西大街、三座门，奔南长街。河北省立十七中学、市立高商、市立高职，每到一校门首，即高声欢呼该校同学参加。惟各校学生已外出者，临时尚可加入；其留于校内者，因军警临时封锁校门，不许外出，故冲出者甚少。当本校所领导之大队经过后门大街，一路浩浩荡荡、直奔南长街时，沿途高喊“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并散发传单，欢迎民众自由参加。沿途并无岗警拦阻，故没有发生冲突，安然渡过。及抵南长街南口，突有大批警察及保安队，一面用两架水龙喷击前头队伍；一面用铁棍及指挥刀实行向同学冲击。当时同学个个抱牺牲精神，尤以纠察队奋勇当先，用赤手空拳演其夺刀惨剧。大队一致向前实行与警察肉搏，卒将水龙破坏。是役，警察与同学互有受伤。冲过后，大队继续南行，并欢呼“胜利”口号。出南长街口，沿西长安街向西前进，抵新华门时，前头有大批军警全副武装。大队步伐严整，继续前进。行将临近时，突然保安队数人手持白刃，迎面奔来，继以大批警察，以铁棍相助，实行乱砍乱击。结果，重伤者甚多。本校同学某君被警察数人按倒痛击，致遍体鳞伤。另有同学数人，皆头破血流，且有被割断鼻管者。是役，被杀伤击伤者，总数不下二十余人。终

以军警密布，不能冲过。不得已，遂化整为零，折向前门奔去。抵前门，本校同学复聚零为整。队伍稍加整理，乃沿前门外大街直向天桥走去。不久，各校队伍，如燕京、清华、东北、师大、中大……皆相继开到，在悲壮的欢呼声中，举行大会合、大集结，总数万余人，当开露天全体大会。本校同学某君登电车作激昂沉痛之讲演，市民愈聚愈众，人山人海。沿街军警密布，皆持枪实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当经大会议决，前赴外交大楼请愿，遂整队北开，沿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悲壮之声，震动大地。当向军警喊出这些口号：“爱国军警与民众联合战线！”“爱国军警与民众联合游行示威！”“爱国军警武装保卫华北！”虽凶狠恶毒之军警，无不动容，且有怆然泪下者。不意抵前门，城门紧闭，且有二十九军兵士及武装警察列队以待。忽然枪声大作，阻止队伍前进。群情更为激昂，一时秩序大乱。前门大街商店均关闭，惟学生队伍沉着不动。大家当即携起手来，严守自己的阵地。后又有外四区警察，开枪二十余响，幸未伤人。时公安局派人出面与学联会总代表交涉，要求当场解散队伍。一时群众大哗！结果施其骗术，允许小队游行，分别由前门、宣武门进城，并由警车队引导。正准备出发，忽有人提议开市民大会，当即举行，通过重大议案九项：（一）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二）呼吁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三）即日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人罢耕、兵士罢战、商人罢市。  
(四)反对广田对华提出之三大原则。(五)要求政府取消政委会。(六)要求政府惩办汉奸。(七)限地方军警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八)通电全国及全世界宣布真正民意。(九)限地方军警当局自即日起向受伤学生道歉，并赔偿医药费。

市民大会开完之后，大队遂分由前门、宣武门进城，一部向西移动，东北、平大、清华、燕京等校开宣武门；本校、中大、华北等校入前门。不料甫入城，军警自后袭击，秩序大乱，一部份被驱入华北中学。通过此次袭击，所余尚有五百余人，乃经司法部街，绒线胡同，至宣武门内，又行会合，并向守城军警要求开城放进城外部队。该地长枪队、手枪队、大刀队，武装齐全，不惟不开城，且将交涉之代表扣留，以大队回转为释放之条件。大队不得已回转，但军警则以大刀、长枪、铁棒自后袭击，一时受伤者甚多。本校某女同学之臀部被刺刀刺伤，当时几有生命危险。学生群众因限于赤手空拳，无法抵抗，卒被冲散。是日，本校同学先后被捕者五人，重伤入医院者六人，轻伤者数十人。

本校学生会会员大众，自从参加“一二一六”这次伟大的斗争之后，救亡情绪更加高涨！工作亦更形紧张！内部团结，日趋牢固！学生会执委会与宣委会间的纠纷，无形和解，宣委会同意与执委会宣传股合并，



共同进行一切宣传事宜。

本校学生会自加入了学生联合会，即以学校名义，当选为学联执委，且领导一部分小组。学联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全部宣传事宜，亦由本校担任。“一二一六”学联之一切宣传品，全为本校宣委会事先拟定者。

大示威后，学联宣布继续罢课，各校纷纷组织交通队，调查被捕与受伤之人数及名单。又组织慰劳队，向各医院各学校慰问，并赠送慰劳品。本校学生会迫于实际需要，乃于执行委员会之下成立四个特种委员会。除宣传委员会早经设立外，加设交通、纠察、组织三个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则专门派遣交通队分赴各校探听消息，办理救亡情报。纠察委员会则分派纠察队在各斋舍把守校门。组织委员会则关于组织事宜负责设计。

同时，执行委员会学术股，创办“北大周刊”襄助宣传。该刊创刊号定名为“一二·一六示威特刊”，除刊载游行示威的记述，及关于救亡的理论文字之外，并刊载本校负伤诸斗士的照片，以备在民族革命史上，永远留下几点血迹，且为斗士们作为光荣的纪念。此外，并成立国防化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时事讨论会，尤以后者最能号召大众。

12月下旬，平津学联决议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实行深入民间，唤醒民众，俾将单纯的孤立的学生“爱

国”运动，展开成为广大的整个的民族革命运动。本校方面，经学生会第四次班代表大会多数代表赞助这个行动之后，当即推选数人，组织本校南下扩大宣传设计委员会，筹划一切。本校志愿参加的同学，前后达五十余人，其中有女斗士四位。第一批于1月3日零星往农学院集合，会同其他各大中学同学，混合编成“平津学生扩大宣传团第一团”，即于当日下午出发，在饥寒交迫的状态中，进行其神圣的宣传事业。

宣传队出发之后，学校当局强令于4日（星期六）复课，但学生会第四次班代表大会已决议继续罢课。执委会为了切实执行班代表大会交下之议决案，遂决定全数执委为当然纠察，另聘会员若干人，组织临时纠察队，分别在一院二院值岗，劝阻同学不要上课。翌日清晨，学校当局亦同时出动，大加干涉！某博士不惜与同学互相口角，某院长则整天陪同同学在一院门口站岗，虽然冷风砭骨，亦能忍耐。但结果上课之同学为数极少。此时，市其他各校当局，竟无一强迫复课者，独北大首先发难。因此全体同学大起反感！当晚各班分别召开班会，讨论学校强迫复课问题，结果纷纷发出布告，表示拥护第四次班代表大会继续罢课之议决案。顿时全校空气异常紧张！执委会为求实现真正民主主义，使全体会员每人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起见，乃决定于6日（星期一）上午8时，召集全体会员大会。

重要议题：（一）关于正在准备中的中日南京会议。（二）关于政府召集全国中等以上之学生代表晋京听训。（三）关于学校当局强迫复课。剧烈辩论的结果，关于第一项，议决通电反对。关于第二项，拒绝派遣代表。关于第三项通过继续罢课，不达目的不止。在临时动议项下，有人提议扩大募捐，援助南下宣传队，议决提交班代表大会讨论办法。这次大会，因为会场布置周密，所以讨论时，虽然空气紧张，情绪热烈而秩序井然，丝毫不乱。学校当局，鉴于大势已去，群情难侮，遂于同日宣布放假。当晚，执委会召开第五次班代表大会，讨论募捐办法，公推若干人组织募捐委员会，进行大量募捐。将募集之款项源源派人携往前方接济艰难困苦的民族解放斗士。

寒假中学生会会员群众，除一部分参加前方长途跋涉的宣传工作，及另一部份离校返里过其甜蜜悠闲的家庭生活者外，在学校里面留守的，尚不在少数。后方留守者，大部分是以工作为前提，在校内外积极活动。活动的中心，则为扩大募捐、近郊宣传、时事讨论和文字劳作。

学生会学术股主办的“北大周刊”第二期，在寒假中出版。该股为了集中力量，加强组织，便将周刊停刊。另外聘请校内一部份同学，成立“北大旬刊社”，创办旬刊。旬刊的使命：在积极方面：研究现实问题，发

表正确主张，提倡进化学说；在消极方面：反抗帝国主义，扫荡本位文化，排除封建势力。此外，关于各地救亡情报，宣传文字，无不备载。

在这寒假期间，令人无法解答者，乃发生了本校同学中，有人冒称“代表”潜伏听训这一疑案。但究竟有无其事，代表是谁，只能在推测之中。这儿顺便把南京召集各地学生代表听训之原委，稍微说一说：

在“一二一六”示威流血的第二天，南京教育部即电北平地方当局，请其保护学生正当的爱国行动。但几天之内，事态扩大，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太原、济南、开封……乃至全国各大中学，一起卷入“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罢课、请愿、示威、卧轨、被包围、被杀伤的紧张消息，有如风起云涌一般。“睦邻”的政府，深恐运动继续发展，有以促成工农群众的觉悟，而危及统治阶级的本身。于是，通令各地军警，实行镇压。随即宣布沪、宁、汉三处的紧急戒严令。更在另一方面，大施其“牢笼”、“麻醉”、“收买”和“分化”的手段，召集全国交通便利的各地学生代表，于本年正月十五日以前，入京听训。

12月下旬，各地报纸，同时披露了这个消息。不久，本校当局正式以部令转知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执委会便提交第四次班代表大会讨论，结果议决拒绝派代表晋京听训。执委会为慎重起见，遂将此项议决案

提交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征求全体公意，以作最后决定。结果，毫无异议，照原案通过。学生会始在报端天津《大公报》刊登启事，正式声明云：“兹经本会全体大会议决，拒绝派代表南下听训，如有假借名义，前往参加者，本会全体同学一致否认！”迨听训期近，校内有种种传说，同学们多不置信，以为既经班代表大会、全体大会双重议决，并且登报声明，决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料听训期过，杨某、李某两位代表的大名，忽然发现于报端。关于“听训”这一疑案，至此始得彻底明白。

寒假期限，至1月底2月初，即告结束。本校定于2月3日开学，13日正式上课。学生会鉴于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不适合于我们的实际要求，尤其文、法两科，大部分课程，根本背离时代，阻止进化，使青年们与现代实际生活及正确理论，完全隔离。诸如民族危机、国际现势、社会组织、历史法则，无从求得一个正确的认识与了解。此种麻木教育、奴隶教育，不知误尽天下多少青年子弟。对于广大民众，及整个民族，根本有害无益。以此，迫于整个民族及青年本身的切实要求，执委乃聘请各系同学，组织非常时期教育实施委员会，参酌学联所颁布之方案，制定本校非常时期教育实施方案大纲。其宗旨：在于唤醒并加强我们对于当前现势与民族危机的认识；积极养成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

所必需的智能，以完成中华民族解放的使命。大纲分课内、课外、社会服务三方面。课内方面：(A)增加共修科目：即社会科学方法论（指唯物辩证法）、国际现势、国防概论、社会进化史与社会学、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B)修理课程：(a)减少上课时间，文、法学院每人每周上课时间不得超过十八小时（增减课程包含在内），及两次实验；(b)集中上课时间，尽可能将上课时间集中在上午；(c)课程宜根据各系情形，将已有各学程加以取消或合并。课外方面分五项：（一）组织；（二）学术研究；（三）学术讲演；（四）实行军事生活；（五）施行救护训练。关于组织，以学生会为实践之最高指导机关，应与其他各校学生会及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取得密切联络。关于学术研究，应速成立以下各种团体，与学生学术股共同办理，即时事讨论会、社会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文艺座谈会、新文字推进会。关于军事生活之组织法：每十人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三大队为一团，全校共分三团，上设总指挥部。再在社会服务方面：分为宣传、调查、组织、训练四项。宣传是向民众说明民族危机与世界现势。调查是调查各地民众组织、抗日团体、交通、教育等情况。组织，是组织各阶层之抗日团体及民众自卫军。训练分为两项：（一）成立成人教育班；（二）增加并修改本校民校课程。

非常时期教育实施委员会拟定了这个纲领，便会同学生会向学校、当局要求实施。不料当局全不接受，其理由：以为全部课程及时间已经排定，无法更改。虽经学生会据理力争，仍然不得要领。以此轰动一时的非常时期教育之实施，本校首先遭受打击。

从13日起，正式上课了。但一切照旧未加变革。寒假中离校返里之同学，渐渐到齐。同学们对于杨、李二君违反全体决议，潜伏听训，无不愤慨！以此校内发生暗潮，大部分同学对于听训“代表”主张作某种有效对待。各宿舍先后贴出标语，加以痛烈攻击，且以驱逐出校相号召。执委会为防止事态扩大，致蹈北洋师大覆辙，演出一场恶剧，于是召集第三次全体大会，正式按照法律手续解决。大会共有三项主要议题：（一）关于实施非常时期教育方案；（二）关于组织学生自卫军；（三）关于伪“代表”潜伏听训。大会临时主席宣布开会及报告开会意义之后，即由执委会代表向大会报告寒假中工作情形，尤其关于本校南下宣传队奋斗经过，作详细之叙述。旋即讨论议题。关于第一项，讨论结果，议决由执委会偕同非常时期教育实施委员会，向学校当局竭力交涉，如坚不允许，仍遵照学联议决案，从3月1日起，自动实施。关于第二项，议决成立学生自卫军。详细办法，交执委会按照非常时期教育实施方案大纲关于学生自卫军之组织法组织之。轮到第三项议

题，会场空气骤然紧张！全体会员，无不异常愤慨！当即决议：永远开除伪“代表”会籍，散会后全体出动，将其驱逐出校，以示公意。并以大会名义，函全国各大学学生团体，拒绝其转入各该校。再将其照片略历刊登“北大旬刊”创刊号，以资识别。对于左袒伪“代表”、侮辱学生会之郎某女士（有会员某女士，临时向大会紧急报告）永远剥夺其本会会员的公权，其照片略历，亦同时刊载。散会后，会员大众共五、六百人，一齐拥入东斋，将杨、李二君，实行驱逐。惟已事先逃走，遂将其行李什物，搬出校外，间或有捣毁者。至是，一场风波，始渐趋平息。此二月中旬间事。

不久，有师大教授杨立奎其人者，恶意诬害学生联合会。于是本市军警当局，随即捕人，干涉学生运动。南京睦邻政府，于同月 21 日颁布“紧急维持治安办法”七项，对全国学生运动，大事镇压！本市中大、东北、朝阳、清华等校，先后大受检查，被捕之救国犯达数百余人之多。尤其清华被二千多武装齐全之军警一再包围，搜索，且实行巷战。同时本校三院亦全部受检查，被捕者数人。四斋检查一部份，被捕一人。时“北大旬刊”第二期，业已校对完竣，可以准时出版。不料在此风声鹤唳之际，竟被本校印刷部工友将排定之版全盘拆毁。在此高压之下，本校学生会，几陷于停顿状态。无论是自卫军教育方案，及其他一切活动，一时无法进



行。

在这一个大恐怖时期中，本市各级学校，先后被捕入狱之爱国犯达三百余人。不久，“三一八”惨案十周年纪念，即将来临，本校学生会筹备纪念。是日，本校全体同学，在三院举行纪念大会，先至本校殉难三烈士纪念碑前行礼致敬，并由本校教授马叙伦先生献花，随即入场开会，再由当日亲历其境之马先生详细报告经过，继由本校教授曾昭抡先生沉痛讲演。同学中自动演说者，亦不乏人。旋，在临时动议项下，有人提出三项提案：（一）以本校全体同学名义，呼吁全国督促政府立即停止内战，调开山西大军（中央军混同山西军不下数十万），讨伐侵入察省之日、伪军队。（二）以本校全体同学名义，声请政府撤消“紧急维持治安办法”。（三）以本校全体同学名义，声请政府通令本市军警当局，全部释被被捕学生，并保障嗣后爱国完全自由。这三项提案，完全通过，最后高呼口号而散。此时三院周围，军警密布，戒备异常森严！经过“三一八”纪念大会，本校学生会骤然活跃起来！“北大旬刊社”亦随学生会之恢复活动而重整旗鼓。该社以时日迁延太久，乃筹办第二、三、四期合刊本补足。

3月间，在爱国囚犯当中，发生一件不幸事件。即冀平高中学生郭清，年仅十八岁，因受刑过重，惨死公安局狱中。3月31日，由学联主持，假本校三院，举行

追悼大会，到各校同学数千人，本校参加者百余人。军警当局，即派遣大批武装军队，将三院包围断绝交通。追悼会在礼堂举行，军警入内干涉。追悼毕，因周围军警密布，除长枪、盒子枪、大刀这些武器外，并架置机关枪，以致参加追悼大会者于散会后，无法退去。顿时，群情愤激，一致主张冲锋！但因校门口武装密集，估计无法突围，不得已变更战术，冲破侧面，遂启门进孔德学校出大街，转北池子，实行游行示威。三院门口军警，探悉被围学生，已全部突围，便立即派遣大队从骑河楼出而迎击！学生先头队伍，当即徒手抵抗，军警用刺刀乱刺，重伤数十人！顿时军警愈聚愈众，突然实行冲锋，一时学生阵势大乱，向后溃退，军警便从后面追击，每捕获一人，于痛打之余，再行五花大绑。除当街捕拿外，并沿户搜索，企图一网打尽！一直到下午3时。是役，负伤者三、四十人，被捕者六、七十人，中有本校同学九人。大队冲散之后，随即检查本校三院。学校当局，以本校为肇事地带，本校学生会应负责任，遂将学生会执行委员二人、纠察队长二人开除学籍；明令制止学生会一切活动。学生会随即发“告全校同学书”，说明不幸事件真相，同时正式声明：学生会为全校同学之组织，是否停止活动，应取决于全体同学公意，学校不得“明令”停止。在学生会长未经全体同学决定自行停止活动以前，当继续活动，但事实上，等于无形停

顿。

“北大旬刊”第二、三、四期合刊，原定于4月1日出版。学生会这一事变发生后，直接影响到旬刊本身。但该社认为：“北大旬刊”为学生会之命脉，学生会既已暂时失去活动机能，旬刊社便当鼎力撑持，代表学生会作最后一次的奋斗！在某阶段，也应竭尽全力完成旬刊的任务。该社又为了顾及特殊环境，乃将该刊延期出版。在学联会及本校学生会大受损失之后的沉闷空气当中，旬刊出版后，颇能搅动空气，使同学们兴奋一时。该刊除了在民族解放的浪潮中阐明当前的救亡理论之外，还保留了许多含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重要文件，比如关于南下宣传纪载：“下乡记”、“到农村去”。又如“北平文化界救国会非常时期教育纲领”、“北平学生联合会非常时期教育方案”，以及“本校非常时期教育实施方案大纲”。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重要宣言。不过客观的事实告诉了它：在替学生会举行闭幕典礼之后，它自己也得要闭幕。

也可以勉强的说是在人意料之外吧，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在华北大量增兵，在平津任意捕人。增兵在政府当局的心目中，当然也是一件感觉不快的事。各地学生，尤其是天津的学生，情绪突然高涨！于5月28日举行示威。在这刺激之下，本市其他各学校要开始表示态度了。但本校自“三三一”事件发生后，学生会

在学校当局看来，是已经消灭了。而在学生会自己看来，虽无工作表现，组织仍然存在。直至华北增兵吃紧，聪明的政府，正需要学生轻轻地起来表示；各学校当局当然也有同感。因此，本市其他各校同学，渐渐活跃起来。独在本校鸦雀无声，镇静异常！此时，学校当局通过某种关系，表示愿意大家团结，另外成立一个救国会之组织。因此同学们一时忙于联络，经多方协商的结果，决定由学生会于6月2日召集全体大会。惟因军警禁止集会，监视会场，全体大会未得开成，临时改为谈话会，征求大家意见。谈话结果，以一部份同学名义，向执委会建议组织救国委员会，人数二十一人，由全校同学总投票。当晚，执委会重行集议。讨论是否接受该项建议，或更有其他较好的办法。当讨论之际，意见非常分歧：有人主张组织救国会，取消学生会；有人主张只整顿或改组学生会，无需成立救国会；又有人主张立刻组织救国委员会，执行救国工作，再召集班代表大会，由班代表决定改组或整顿学生会。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和斗争，后者提议始得通过。继又讨论救国委员会与学生会之关系问题。意见又行分歧：有人主张救国委员会与学生会各自独立；有人主张与学生会执行委员会平等，同属于全体大会；又有人主张直隶于执行委员会，为执行委员会下特种委员会之一，一切行动，受执行委员会之指挥。当第三项主张提出后，

会议席上一部份同学，猛烈反对！经过几番反复的争辩和解释，过半数始同意救国委员会与学生会不能机械似的分离，造成形式上兼实际上之对立。救国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负责组织，没法宣布独立，或者要求平等。至于学生会之应否改组、整顿或取消，执行委员会没有决定的权限。再从正面者，组织救国委员会，正所以强化学生会，实际答复学校当局强迫停止活动之“明令”。有学生会，救国委员会始有法律上之根据；有救国委员会，学生会始有执行救国工作的机能。两者是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最后所以造成了学生会与救国委员会之统一体，定名为“北京大学学生会救国委员会”。关于委员人数及选举办法，一致主张接受一部份同学的建议。遂于翌日由全校总投票，选出救国委员二十一人，担当救国工作。从此，沉寂久之学生会，又正式揭幕，开始活动起来！自然这个组织，非学校当局之所期望的。但亦无可如何。救国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执委会遂将救亡工作，全部移往。①

1936年9月4日脱稿

《北大迎新特刊》

1936年份(学生会迎新会)

---

① 本文标题下注“到1936年9月”。实际仅记述到6月初。6月到9月大事，可参看本书葛佩琦《一二九时期的北大学生会》。

## 北京大学学生继续罢课宣言

我们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而罢课，已经一个礼拜了！可是，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因情势的转变，逼着我们不能不这样的干。一方面，大批的日本军队，愈发集中华北，同时，冀察政委会是成立了，这些都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步调的加紧。在这种非常国难的时期，我们只有忍痛的停止了课堂上的学业，来努力非常时代所需要的救亡图存的工作。我们已经改变了学生的编制，实行更严密的组织，以期更能团结，更有力量，扬弃了静的生活，干更有效的行动。我们已经全体动员了：去唤醒民众，组织民众，以便集中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所以，我们的罢课，绝不是单单的以罢课作一种消极的手段，而且有更积极的更有意义的作用。

本来，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争取自由与平等，只

有实行民族革命的斗争。在这种革命的斗争里，基本的队伍，虽是一般的民众，可是，只有学生才能来作前哨与先锋。这种作用，在整个的民族革命过程中，似乎微乎其微；然而，这种工作正是最初步的，最重要的。我们既认识了这点，了解了这点，就得负起历史的时代的使命：唤起民众，组织民众，促进民众运动，发动民族革命斗争。“一二一六”的示威运动，不但是学生群众救亡工作的开端，而且是整个民族求解放运动的先声。

无疑地，“一二一六”示威运动，是学生运动史上的一个壮举。虽然，我们遭受了当局的摧残与屠杀，但我们绝不因此而恐惧，更不因此而畏缩；反倒因此更加强了我们的决心，加紧了我们的工作。伤者固然伤了，囚者尚在囚着；但是我们不但要对他们勇往直前的精神表示无限的钦佩，而且更要追随着他们，继续地奋斗。我们只有继续罢课，过去的牺牲，才有意义，未完的工作，才能完成。我们的工作伟大的，我们的罢课是最有意义的。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不达目的，誓不复课。

国立北京大学学生会

——转自《北大周刊》第2期

## 北京大学学生会为不派代表 “晋京聆训”宣言

自从这次学生运动发生之后，政府屡次表示非常的注意，这不能不说是政府对于民众意见的尊重和关怀。这次蒋院长令教部召各校代表赴京听聆政府的大计，尤其使我们感觉到万分的欣慰。但是我们觉得：政府果欲宣示大政方针，尽可昭告全国国民，我们学生实在没有这种特权来接受这种格外的好意。至于我们要贡献给政府的意见，我们已在宣言和通电上屡次表明过了；实在没有再派代表向蒋院长面陈的必要。因此，我们议决不派代表赴京。实在，我们所希望于政府的：不是空洞的训示，而是实际的行动。特此宣言，敬希垂察！

国立北京大学学生会

——转自《北大周刊》第2期





来奋斗了。因为铁的事实，已经不再容许我们相信那种“长期抵抗”，“安内攘外”的谎话；血的教训已经指示了我们只有坚决地起来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作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

亲爱的全国同胞们，我们是在热烈地期望着你们能够一致地起来和我们一同走上前线，自动地武装起来和那日本帝国主义者作一个最后的决战，积极动员起来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生存！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一条要用鲜血来渲染，头颅来堆砌的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生路！

国立北京大学学生会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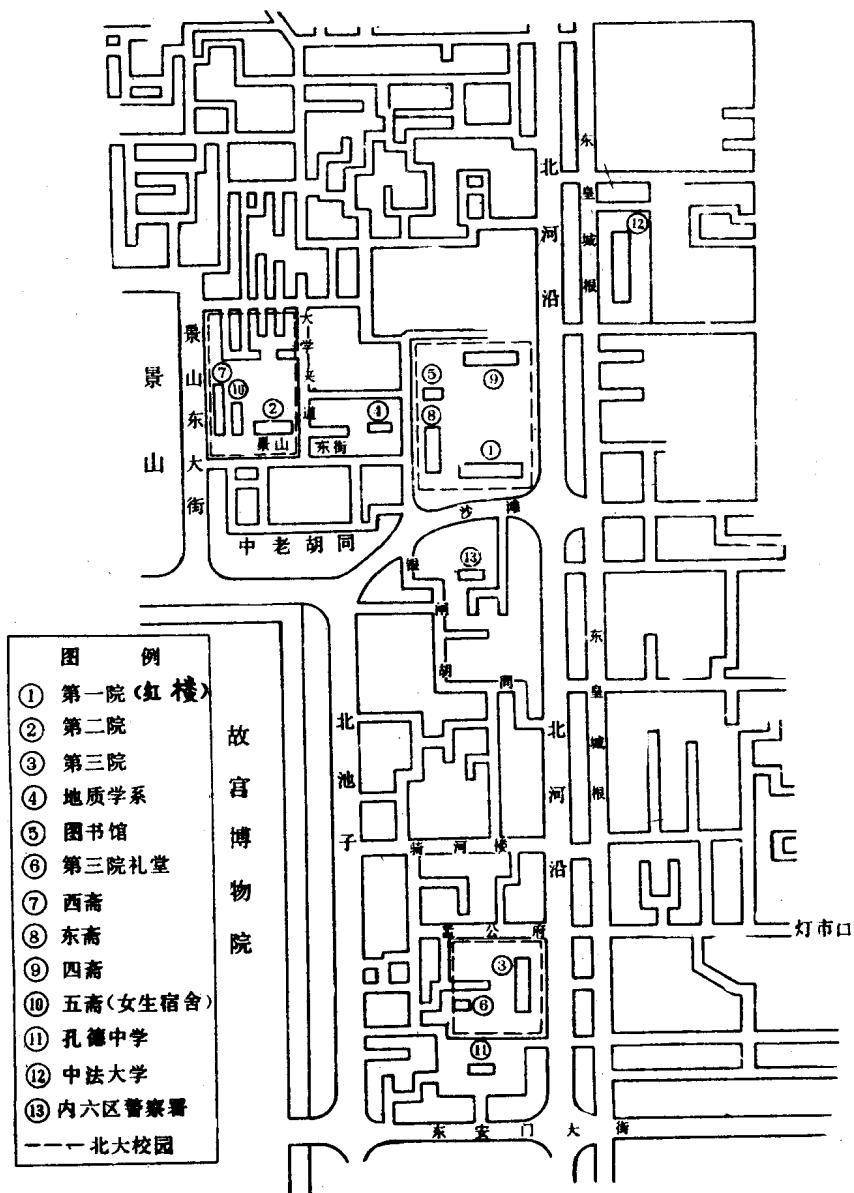
——转自《北大周刊》第1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

## 1937 年北京大学院系师生情况

| 院 系                              | 教授 | 讲师 | 学 生 |     |     |     |      |
|----------------------------------|----|----|-----|-----|-----|-----|------|
|                                  |    |    | 四年级 | 三年级 | 二年级 | 一年级 | 小计   |
| <b>理 学 院</b>                     |    |    |     |     |     |     |      |
| 数 学 系                            | 5  | 2  | 24  | 26  | 19  | 19  | 88   |
| 物 理 学 系                          | 5  |    | 29  | 20  | 21  | 18  | 88   |
| 化 学 系                            | 5  |    | 27  | 10  | 20  | 25  | 82   |
| 地 质 学 系                          | 6  | 2  | 17  | 7   | 23  | 24  | 71   |
| 生 物 学 系                          | 4  | 1  | 2   | 2   | 10  | 5   | 19   |
| 小 计                              | 25 | 5  | 99  | 65  | 93  | 91  | 348  |
| <b>文 学 院</b>                     |    |    |     |     |     |     |      |
| 哲 学 系                            | 4  | 6  | 5   | 5   | 5   | 12  | 27   |
| 史 学 系                            | 7  | 9  | 28  | 17  | 20  | 32  | 97   |
| 中 国 文 学 系                        | 8  | 8  | 22  | 25  | 25  | 28  | 100  |
| 外 国 语 文 学 系                      | 11 | 13 | 34  | 29  | 26  | 31  | 120  |
| 教 育 学 系                          | 5  | 4  | 10  | 17  | 16  | 26  | 69   |
| 小 计                              | 35 | 40 | 99  | 93  | 92  | 129 | 413  |
| <b>法 学 院</b>                     |    |    |     |     |     |     |      |
| 法 律 学 系                          | 7  | 8  | 7   | 12  | 9   | 11  | 39   |
| 政 治 学 系                          | 4  | 4  | 12  | 16  | 16  | 28  | 72   |
| 经 济 学 系                          | 6  | 3  | 20  | 21  | 35  | 63  | 139  |
| 小 计                              | 17 | 15 | 39  | 49  | 60  | 102 | 250  |
| 合 计                              | 77 | 60 | 237 | 207 | 245 | 322 | 1011 |
| (三个学院,十三个系,)教授讲师一百三十七人,学生一千零十一人。 |    |    |     |     |     |     |      |

据 1937 年毕业同学录整理

“一二九”时期北京大学校址位置示意图



## 后 记

刘 玉 柱

《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回忆录》的征稿工作，开始于1980年8月，在北大临湖轩举行的二十几位老同学的座谈会。会后，母校北大教师成汉昌同志将韩天石等十位同学的发言，整理了一份文稿，今成为本书领先的一篇综合性回忆录。

1983年春节，陆平同志于航天部老干部俱乐部主办“一二九”时期北大部分老同学团拜会。与会同志具体讨论了本书的准备事项，决定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征稿与编辑工作。有目的，就是为迎接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纪念日做准备；有计划，就是发动在京和外地的老同学，于二、三年内写出回忆录文稿。为帮助大家回忆往事，先由母校北大现任教师成汉昌、江长

仁、张泉田、楼开昭、杨重光五位同志根据报刊、档案编写一份《北大一二九运动大事记》，作为参考；有组织，就是成立汇编小组，推选刘导生、陆平、刘玉柱同志为正副组长，孙思白同志为主笔，胡昭衡、宋尔廉、白文治、肖超然同志为组员。以后，又增补了刘居英、葛佩琦同志为组员和现任北大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张学书同志为副组长。汇编小组不定期适时开会，作征稿的促进工作；并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在征稿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罗征敬、胡秀春同志和北大历史系的几位研究生，还帮助做了不少工作。

“回忆录”的征稿办法有二：一是老同学自己动笔写；二是老同学单独或座谈口述，请人整理，两者同时进行。北大几位同志所编写的《北大一二九运动大事记》，对于帮助各位老同学回忆往事起了不少作用。至今年7月底，共收集回忆录三十篇，连同《大事记》，两项共约二十余万字。以上材料，都由北大打印，分送给汇编小组成员和“一二九”时期北大党、团、民先队和学生会的负责人，征求意见。

今年6月，宋尔廉、白文治同志到首都博物馆，选取当年北大照片，得到该馆梁旭毅等同志的热情支持帮助，初选照片三十余张，汪洪文、唐尊准、张震寰同志还提供了不少宝贵照片。同时，经刘居英同志和刘晓

明、牛树江同志的介绍，由北大出版社与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印刷厂联系印刷事项。该厂在任务繁重的情况下，给予了大力支持，商定于短时间内印出此书。

为加快搞好本书审稿、定稿等工作，保证在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之前出书，今年7月14日，汇编小组邀请袁宝华、韩天石、张震寰、汪洪文几位老同学参加，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刘导生同志为本书写的序言，并议定了本书有关审稿定稿、编排顺序、封面及照片、题写书名及出版等事项。由于孙思白同志正忙于主持编写汇编小组原确定的另一本书——《北京大学一二九历史回顾》（正式命名为《红楼风雨》），无法兼顾本书的审定工作，会上决定另成立由胡昭衡同志牵头的审定小组，并推选宋尔廉、汪洪文、白文治、刘玉柱和江长仁、张泉田、成汉昌同志为组员，参加审定工作。

审定小组由胡昭衡同志主持，顶酷暑，连续工作了两周，完成了任务：审定了包括《大事记》在内的全部稿件；议定增加当年《北大旬刊》等登载的文章九篇；选定照片二十五幅；请九十五岁高龄的许德珩老师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并题了词。

在征稿和编写过程中，北大党委办公室李宝珍、郝平同志，国家物资局刘可华、兰波同志在组织会议、安排生活和通讯联络等方面，做了很多具体工作。

我代表汇编小组，向所有关心、支持、帮助和参加我们工作的各单位领导与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5年7月28日